



ISSN 3080-3039
eISSN 3080-3047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Modern
Education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主办：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2026
第2卷第1期

1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主管 香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

主办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编辑出版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邮箱 jyxb@wisvora.com

投稿地址 www.wisvora.com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总编辑 梅见华

编辑委员会

陈科存	孙文杰	苏天	穆艾伟	熊森浩
刘伟伟	吕憬岩	黄少安	刘宇	叶明裕
陈曦	景瑞宾	崔健	王正威	李泽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吴钰双	穆尚海	曹一君
陈立立	舒波	袁臣辉	郝澳茹	

版权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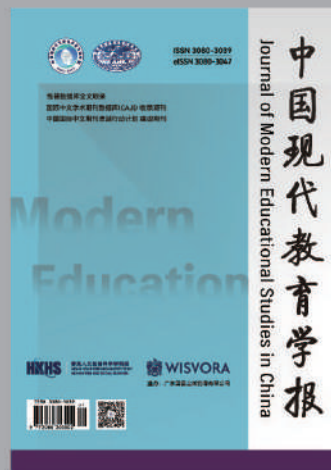
文章版权由文章作者与维思沃尔出版社(WISVORA Publishing)所有。单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所刊载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进行许可。根据该许可协议,任何第三方在明确署名原作者与出处的前提下,均可对本刊内容进行复制、传播、演绎使用,无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个别授权。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专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旨在为学者提供研究支持,并促进知识的共享与应用。研究院通过出版学术期刊、举办学术会议及提供政策建议,推动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对话与合作。

网址: www.hks.ac.cn 邮箱: info@hks.ac.cn



维普数据库
全文收录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印刷出版 ISSN 3080-3039

电子出版 ISSN 3080-3047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维思沃尔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蒲岗景福街99号启德
工业大厦8楼D07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国大陆引进
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大陆运营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维思沃尔出版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大思政”框架下公共管理群专业建设：价值、逻辑、路径 - 丁惠炯	1-7
新时代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研究 - 王雅迪	8-11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商科教育的结构性转型研究——基于“夕阳经济”的蓝海战略 蒋 中、莫童童	12-15
应用型本科院校学前师范生专业认同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 孙思洁、梁钰静、张文莉、戴熙玉	16-22
新高考视域下我国高中物理教学的研究现状与趋势——基于 CNKI 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 钱漪珂、梁丞天、林奕萱、邵欣、上官剑锋	23-28
国际传播能力导向的高职商务英语跨文化教学转型研究 - 乐冰洁	29-35
“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数学分层作业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 - 秦丹、范悦悦	36-40
非遗教育在小学课堂中实施现状及优化策略 张诗月、刘丽、徐亦婷、蒋雲涛、姚字轩、邵薪羽	41-46
延安精神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及实践路径 - 王雅迪	47-50
傣族南传佛教与文身习俗 - 唐飞、李刚惠芸、曾军、曾伟平、谭亮亮、奥特贡·T	51-54
社交媒体使用与大学生宿舍居住空间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 - 陈思雨	55-60
论人工智能时代播音主持专业的价值锚点及能力体系重构 - 徐子涵、高若栋	61-66
人工智能赋能《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思政效果增值评价的模型设计与实施路径 杨中亚、张龙、刘龙飞	67-73

体育心理学视角下高职武术教学中“正念训练”的融入路径与效果 - 商昌敏	74-78
地方文化融入校本课程的立体化体系构建与实践反思 - 董芳远、颜同宇、方梦麟	79-82
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面向“动态课堂”教学体系的范式创新探索 胡文嘉	83-88
非遗知识生产与教育转译：艺术本位研究视域下的鹤山狮头跨学科美术教育研究 - 简蓓殷	89-96
校企双导师赋能非遗影像创作与教学革新——以《再会金元川剧团》为例 - 叶伟、张林林	97-100
公共数据开放与农业经济韧性 - 王光荣	101-106
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河南县域高中美术教育的困境突破与振兴路径 - 仝召昇、赵佳亮	107-110
基于速度与力量训练对提高南拳套路运动员的竞技比赛能力的研究 - 赵嘉诚	111-115
供应链金融影响企业碳风险的经济后果研究 - 党燕茹	116-121
中世纪巴黎大学艺学院辩证法教学的实践形态与价值意蕴——基于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的思考 张凯	122-126
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调查及影响因素研究 - 张卓、葛蒲、唐勖、熊芮姝涵、余皓天	127-131
地方性红色资源融入思政课的教学改革探索——以潘家峪惨案主题“三阶育人”模式为例 王楠、赵婉华、张妍、潘素芳	132-135
数字化转型下外语教学改革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机遇与挑战 - 邹梦露	136-141
日语 MTI《专题翻译》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 - 金锦善	142-146
基于数智化的应用型本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 康松龄、刘琰	147-151
外语学科区域国别课程教材的全球素养培养研究 - 吴晶	152-157
人工智能赋能高职电商教学的模式构建与实施路径研究 - 方磊	158-162
新质生产力驱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策略研究 - 刘静静	163-168

“大思政”框架下公共管理学科专业群建设：价值、逻辑、路径

丁惠炯¹

(1.梧州学院 管理学院, 广西 梧州 543000)

摘要:在“大思政”育人格局下,公共管理类专业建设面临着价值引领与专业能力融合的时代命题。基于公共性理论、治理伦理与学科建构视角,提出专业建设需超越传统“课程思政”的局部嵌入模式,转向系统性重构。研究表明,唯有通过结构整合与过程创新,方能在专业教育中实现立德与育才的有机统一,为治理现代化培养兼具政治素养与专业能力的公共管理人才。

关键词:“大思政”框架;公共管理学科;价值;逻辑;策略

基金项目: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基于LOS理念的应用型地方高校‘公共管理类’人才培养模式——公共管理专业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设计与实现(项目编号:2025JGB401)”;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应用型人才导向的《电子政务》教学—实验课程体系(项目编号:202002245001)”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03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Management Group under the Framework of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Value, Logic and Path

Hui-Jiong Ding¹

1. School of Management, Wuzhou University, Wuzhou, Guangxi, China, 543000

Abstrac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mprehen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rograms faces the contemporary challenge of integrating value guidance with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Grounded in theories of publicness, governance ethics, and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advocates for a paradigm shift from the fragmented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education" to systematic restructuring.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only through structural integration and process innovation ca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chieve the organic unity of moral cultivation and talent development, thereby nurturing public professionals with both political literacy and specialized expertise for modern governance.

Keywords: The Framework of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Value; Logic; Strategy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2020年,《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中进一步明确,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文化知识、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通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2022年,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要求开门办思政课,突出实践导向,建设“大课堂”、搭建“大

平台”、建好“大师资”^①。

由此可见,“大思政”还应包括一切具有“立德树人”功能的专业和课程。20世纪初开始,作为公共管理学科主干专业的“行政管理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政治-行政二分),但是从理论角度,公共管理学科体系仍然应以政治科学作为其研究背景,其“行政学说史”及理论体系与“政治科学”重叠;从实践角度,作为特殊的人类活动,公共管理(行政管理)一直是离国家政治体系最为

作者简介: 丁惠炯,男,内蒙古包头人,博士,梧州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电子邮箱:249972197@qq.com.

^①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Z].教科社[2022]3号.

接近的管理行为,是政治活动的延伸,是国家政治体系(决策层面)的执行层面。一方面,公共管理专业群课程天然地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内涵,与“思政”教育具有共同育人目标指向;另一方面,公共治理理论中的“善治”之“善”本身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内涵中包含了在国家事务、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等领域的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公共政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层面的公共管理思想、行动、模式等诸多“善思”和“善举”。

一、公共管理专业群的育人要求

公共管理专业群不应单纯追求管理技术,而是以“政治学”为背景,更不应该忽视“思政”元素。公共管理专业群的“大思政课”建设目标是寓价值观念引导于育人之中,在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同时,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 培育有着坚定政治认同的公共管理者

公共管理专业群专业课程的本来属性之上还应兼顾政治引导功能,实现政治认同。公共管理专业不同于一般的人文学科,其在理论体系中的作用极为独特,尤其是在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大政方针前提下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管理,其具有宏观性(并不着眼于微观经济和商业企业管理)、战略性(并不着眼于具体战术和技术)和主导性(并不着眼于特殊视角和领域);在“政治”这一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对于包括国家事务、社会治理和宏观经济等的管理,应与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只有把准育人方向、明确服务对象、坚守育人的政治红线,才能坚守住意识形态的主阵地。

(二) 培育有着高尚道德情操的公共管理者

公共管理专业群课程都具有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同时也承载着“三观”教育的作用,更应该“跳出教育看教育”,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战略属性、民生属性;公共管理专业应拓宽学科视野,应锤炼受教育者的人文品质,培育深切的人类情怀、家国情怀、集体情怀等,造就德商、智商与情商“三位一体”人才。从其承担的育人责任及“公共”属性来说,公共管理学科不能单纯地培养懂管理的“社会精英”,而是要培育具备高尚道德情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包括坚定的政治自觉、良好的个人品格、优秀的职业精神和浓厚的家国情怀,等等。其中,“家国情怀”既是传统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根植于中华民族内心世界的精神要素;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应充分提炼中所蕴含的价值范式与文化基因,在“润物细无声”的知识学习中融入家国情怀的培育,强化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认同感与社会责任感。

(三) 培育有着强烈法治意识的公共管理者

道德从观念层面为法律提供思想基础,法律从制度层面为道德提供有效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公共管理实践中,道德与法治并行不悖,应追求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善治”目标。对于公共管理专业学生法治意识的培育,要坚持政治性与学理性的有机结合,在传播法律规则与法治思想的基础上,弘扬法治力量与法治真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宪法意识共同融入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仅要熟悉国家法律法规,而且在实际工作中能够灵活运用法律思维解决各种问题。

二、公共管理专业群融入“大思政”的育人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门课程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因此,“课程思政”应以“专业课”为载体,实现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无缝”结合,培养又红又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

公共管理专业群课程无疑是思想政治教育之“关键课程”,因其专业性质特殊,不应单纯地进行基础知识传授和管理技能掌握,还有责任切实解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类根本性问题;“行政管理”与人类社会其他“管理”活动不同,虽然从20世纪初开始“行政管理”作为一门学科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最为紧密的联系,行政管理为政治活动的延伸。政治实践为行政管理的实施指明方向;“行政管理”(乃至于此基础上兴起的“公共管理”学科群)从来就不以管理的“技术”作为自己追求的第一要务,是否符合“政治正确”才是其运行关键;管理技术手段的应用及其伴随现代先进科技发展的精进只是“政治方向”基础上的“锦上添花”;不同于其他管理门类,公共管理以基于公平和公正的社会效益为第一要务而不是基于竞争和利润的经济效率。这是本学科不同于一般的人文社科专业的突出特点。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思政”的建构,对丰富“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与形式、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文化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

(一) 完善“三全育人”的大思政格局

公共管理专业群以其学科特性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政内涵与特色，成为其开展“课程思政”的优势。“大思政”育人不是通过一门课程完成的，而是要求专业课程形成超越于专业课程体系之上的思政育人体系。公共管理专业群从基础类课程到实操类课程都有利于这种体系的形成。因此，对公共管理专业群课程思政建构的探索与实践，有利于深化对“大思政”体系性育人框架的形成。

“三全育人”的大格局必然要求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公共管理专业群课程当中，能够更好地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需求，切实提升立德树人的水平和人才培养的质量。将“思想政治”元素贯穿渗透于公共管理专业教育教学全过程，同时挖掘梳理公共管理专业群课程的德育元素，进而完善公共管理专业群的课程思政体系建设，才能实现公共管理专业群全科育人、全程育人和全员育人的“大思政”格局。这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人才的前提条件。

相应地，公共管理专业群开展“课程思政”，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因素：在民主精神、和谐理念、多元主义下以包容友善的胸怀应对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以协同共治的方式解决复杂的治理问题、以全面发展的眼光开发和利用公共人力资源，这些“因素”将有效地补充和完善“思政教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内容融入教育教学中，充分发挥专业教师、专业课堂的育人功能，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协同推进“种好责任田”、“守好一段渠”；可以增强学生的价值判断力、价值选择力、价值塑造力，培养出能够适应中国式现代化专业人才的必要条件。

（二）推动中国特色管理哲学（文化）建设

广义上，“文化”包含了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和积累起来的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诸多成果和现象。特定国家和民族的“大文化”要素特征必然会渗透和反映在一定的管理过程中，管理哲学和管理文化即是其在公共管理实践中的体现；管理文化蕴含着组织的发展目标和伦理价值，是管理精神中最本质的成分。以公平公正作为基本原则的公共管理，其管理方式、手段和途径，乃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然以管理哲学作为其思维的起点，指向公共部门及其个体的管理伦理和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管理文化深刻地浸润于国家和社会发展中并形成不同国

家、民族及不同时期的特色。管理哲学涉及到的公平公正、和谐包容、民主法治、诚实守信、天下情怀等当然成为公共管理专业群门类“课程思政”的德育元素，因此，管理文化与公共管理专业群“课程思政”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公共管理哲学（文化）有着鲜明的“中国印记”，管理哲学（文化）的传承整合与创新突破成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有力杠杆，而公共管理学科群在教育教学中必将为管理哲学的发展输送应有的铸魂要素和价值共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管理哲学）蕴藏着丰富独特的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及道德规范，从夏商周开始，从意识形态视角，以《易经》（中国式管理哲学、公共决策）为首的“四书”、“五经”群经，一直到现代当代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等；从社会发展视角，中华各民族在长期进取和奋斗中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丰富的社会现象，等等。这些都对于现代公共管理提供了丰富的创新基础，应成为公共管理专业群课程关键和重要的元素，也为公共管理专业群课程提供了不竭的素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全过程既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需要，也是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现实需要，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现实需要。

（三）促进课程思政更为生动、具象

相对于“思政课程”而言，公共管理学科群的“思政”教育更为具象化、精细化，从而更为生动化；相对于其他学科和专业的“课程思政”而言，公共管理学科群的“思政”教育更为自然而不僵硬，从而更为系统化。公共管理专业群课程必须收集“思政”相关实践材料（典型案例和生动故事），并以生动鲜活的语言讲述在课堂上；公共管理专业群课程必须艺术地将政治信仰、法治意识、家国情怀、社会责任、人文精神、专业伦理等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润物细无声”地融入专业教学中，用新时代的话语体系因时、因事、因势讲好中国故事，等等。

三、公共管理专业群融入“大思政”的逻辑理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量。”

在公共管理专业群科体系教学中系统总结、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能

够精确把握新时代管理伦理思想的价值追求,在管理哲学(管理伦理)层面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现代公共管理理论。马克思主义为公共管理专业群科奠定了科学而坚实的思想基础。其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都在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方法和实践探索方面为其指明了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公共管理专业群科提供了多样而丰富的养料。中国历史上儒家的仁政论、法家的法治论、道家的无为论等,都蕴含着富有哲理的治理和管理思想,这些思想已经被吸纳于现代管理思想体系之中。从“六经”之首的“易经”开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以贯之地强调以人为本、包容和谐、谦虚谨慎等理念和认识,为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多样而丰富的“养料”。20世纪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长期积累和形成的先进的组织管理经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铸就的先进的战略管理思维均为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与丰富提供了多样而丰富的“价值”。具体体现在:

(一) 以“人本”思想深入理解“新公共服务”理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社稷次之”等民本理念,均为公共管理专业群的建设与健康发展提供了多样而丰富的“养料”。《周易·贲》提出了“人文化成”,强调以人为本,关注民众的需求和福祉;通过对于民众的教育与引导作用,最终达成“善治”即社会的整体发展与和谐。

上述“民本”思想促使师生在教育教学中深入理解“新公共服务”系统理论的七项原则,政府及其公共部门管理者不是“划桨人”更不是“掌舵者”,而应该是忠诚于人民的“服务者”;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以人为本”,还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社区需求本位”都要求公共管理者从“统治”、“管理”转变为服务于公众的“治理”体系中与其他多元主体共治、共享、共有的“服务者”。

(二) 以“辩证思维”看待公共决策行为与模式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及其中闪耀着的哲学光辉为公共决策行为与模式提供了思想基础,公共政策理论与模型又充实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

上述“辩证思维”思想促使师生在教育教学中形成科学的公共决策行为与模式。面临着国际形

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公共管理的决策及其模式不应仅仅以是否符合客观世界发展规律之“科学”作为评估标准;其吸取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对于现在与未来、现实与虚拟、现状与变革等矛盾统一体,对于国家管理与社会治理、政府主导与多元合作、职能明确与协同治理等多领域共同体乃至“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等信念结合体均应在“辩证”认识论的基础上在时间和空间上予以深刻地、辩证地再认识;马克思主义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形成的“两分法”基础上的曲折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的“合和文化”基础上的守正而创新等,在公共政策的决策与执行模式、制定与贯彻过程、判断与评价标准等方面,及其公共决策相关课程的建设中,都显而易见地应成为正确看待问题,科学开展决策、严肃实施政策的基本遵循。

(三) 以“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丰富“现代人力资源”理论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要求社会化大生产中的人除了作为生产者外,还应作为消费者全方位地发展自身(而不能仅仅为适应社会分工而局限于某一个领域或者岗位),因此,以战略眼光更为重视公共人力资源的培养和成长,并将其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环节;以全局思维更为关注公共人力资源的使用和保障,并将其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上述“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促使师生在教育教学中深入理解“现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充分挖掘公共人力资源的潜力,关注公共管理者自身的需求与发展,通过制定和实施科学的人才培养和使用政策,促使其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贡献力量。

(四) 以“和谐包容”之胸怀创新社会“多元治理”理论

中华传统文化中处处闪耀着“和谐包容”的思想光辉。学者谈火生认为,《周易·兑》卦展示了比当代协商民主理论更加丰满的协商观念,构建了协商系统的基本模型,深刻地认识到协商过程的复杂性和政治领导在协商中的作用。其《彖传》中的“刚中”“利贞”“顺乎天”讨论的是协商和决策所应遵循的原则,“柔外”和“应乎人”则是对协商方式提出的要求^②。

上述“和谐包容”思想促使师生在教育教学中

^②谈火生.兑卦新解:协商、决策与政治动员[J].周易研究,2023,(03):48-55+71.

深入理解“多元主义”的发展观。作为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公共管理者，应该引领和主导国家和社会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形成和谐包容的“善治”环境；作为复杂国际形势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倡导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和谐共赢。

(五) 以“自强不息”之精神濡养公务员道德制度化建设

从《契约论》作者卢梭的观点出发，公务员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而作为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公共管理者，更需要一种情怀，敬畏公共权力，清清楚楚、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诚诚恳恳、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君子应遵循刚健无私的天道，自律而不屈；认同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上述“自强不息”的思想促使师生在教育教学中深入理解“公务员道德制度化”的必要性和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中”的深刻思想内涵，从公务员自身的内在修养和外在制度的约束两个方面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风清气正的政治气候。

四、公共管理专业群融入“大思政”的实践策略

无论从自身专业培养目标要求的角度，还是从具体教学活动设计的角度，公共管理专业群课程都有利于全员与全程育人、显性育人与隐性育人的协同推进。当然，在公共管理专业群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如何充分体现“育人”的功能，巧妙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课堂教学之中，从内容到形式都需要不断的探索与创新。

“大思政”不是专业教学的一种“补充”，而是要求思政育人理念与思政育人实践“贯穿”于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之中。“大思政”育人不是将思政元素从外部强行“灌输”给学生，而是要求将思政育人元素“融入”专业课程的具体教学内容之中。公共管理专业群课程教学内容恰好有利于融于思政育人元素，从而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一) 在融合中提炼思政元素

公共管理专业的兴起在于研究和解决面向社会的复杂型和复合型公共事务，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呈现出的经济、社会、治理方面的机遇与挑战；同时，公共管理实际事务还涉及众多利益群体，具有明显的公共价值特征，所以，公共管理专业课程培养方案的设计应坚持“专业导向、思政把关”的总体原则，融入爱

国主义教育、社会责任意识、文化制度自信等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元素，在专业水平提升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与意识。内容上，不仅要关注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积累，还要注重研究方法的过程，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和前沿内容进行教学，自然地引入思政内容；形式上，引入与纯粹贴合教材内容视频不同的，紧密联系实际的视频内容，选取与教材内容相关的研究前沿视频，使思政内容与公共管理专业课相融合。

“公共管理专业群”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可互为载体、互相成就，在二者融合中找到思想共鸣。因之，可以结合公共管理学科群课程特点，寻找契合各门课程的德育元素。深入挖掘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综合专业课程“精细化”的课程思政元素的基础上，形成“课程思政”育人体系，为专业课教学与思政课教学相互配合、实现同向同行的育人格局提供支撑。具体设计思路：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历程中汲取东方管理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革命史中借鉴组织管理经验（革命文化）、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学习战略管理思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等。

(二) 整合课程教材资源

现行各高校的公共管理学科群教材大致分为三大类：基础课教材（其中包含了思政课程教材）、学科基础课教材（为本学科各专业通识课程使用教材，包含“政治学”类、“社会学”类、“管理学”类）和专业课程教材（包含公共管理学科各专业专门课程教材），每一大类课程中均包含着丰富的“思政”内容。但原有的教学体系并未注重这些“思政”内容的系统性、整体性、连贯性（例如，“基础课”教材所关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内容，在专业课教材中却较少出现，至少没有结合中国现行的“公共管理”实践加以必要深化），并未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具有深刻思想性和现实针对性的立体化、网络化公共管理学科教材体系；无法实现不同专业与课程间形成联动机制进而充分调动公共管理育人资源以“互动”，无法衔接本学科各门课程的理论知识进而有效整合其育人资源以“突破”。上述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公共管理学科群课程育人价值的发挥。

为适应“大思政课”建设的需要，公共管理学科群应深化本学科教材改革，进一步整合教材资源，挖掘教材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思政元素。从教学理念上以中国特色管理哲学的价值理性引领“管理”方式和手段等技术理性，从教学内容上

将公共管理学科群各专业的“思政元素”融合、统一，从教学模式上将公共管理学科群各专业的“思政元素”系统化、时代化、实践化，促进“思政”内容公共管理学科群教育教学中“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确保公共管理学科群不同专业及其各门课程在思想引领、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上实现全过程育人目标。

（三）将“思政”元素融合于专业实践中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与中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座谈时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公共管理类专业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紧密结合的科学，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紧迫社会管理变革更需要走进社会实践去观察。“大思政”育人为本的落实，不只通过课堂教学的路径和单一教师主体就可以完成，还需贯穿于学生的实验、实习等环节之中，发挥校外机构和部门的合力，实现全程育人和隐性育人效应，实现课堂实践、校园实践、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以增强实践的涵育力，摆脱实践教学“摆形式”困境，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增厚度”“添温度”“聚力度”，让学习的力量转化为实践的力量。

围绕“大思政”理念框架，专业实习和实践中的“思政教育”符合教育教学发展规律。一方面，实习实践将课堂中的思想政治知识图谱予以延伸和补充。从知识的平面拓展来看，开展调查研究可以巩固和深化课堂所学专业专业知识；从知识的立体建构上来看，实习实践及相关的调查研究活动可以使公共管理类专业知识得到检验和完善并进一步得到建构。另一方面，开展探究性的学习实践活动，有助于学生找到公共管理类专业学术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方向。行之有效的“模拟实习”（课堂和校园内的实习模式）以解决当下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等问题为目标，通过教师前期指导、确定研究（实践）方向、小组深入讨论、课堂成果展示等环节，发现和解决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实践问题；在此基础上，于教学过程中不断地修改、完善“成果”，形成以各级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为主要形式和标志的精品。

围绕“大思政”理念框架，将学科竞赛、学术研究、实践调研等作为可选的评价手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政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首先，通过参加公共管理专业竞赛，学生可以在实践中应用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其竞争意识、团队合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学生将学到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专业论文写作、课题研究等环节中，可以使他们亲身体验科研过程；再次，实地考察使学生了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社会治理的认知水平；最后，参与公共管理实践使学生更深入地体验公共管理理论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实践领域中的应用，提高其专业技能。

围绕“大思政”理念框架，充分利用“案例教学”这一公共管理专业群门类实施“课程思政”得天独厚的条件，是马克思主义“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认识论在公共管理专业群思政教学中的集中体现。从教学案例的选用开始就有价值元素融入的可能性前提；同时，公共管理专业群“情境化教学”本身回归中国实际、回归本土经验，有利于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群各专业的创新性学习和研究。而高校间共建“大思政课”案例库有着充分的必要性，以确保具有时代性、针对性的公共管理案例能够资源共享，在共享中充分发挥并迅速提升案例优秀案例在教学中的价值。借此，公共管理专业群“课程与思政”可实现深度融合、同向同行。

（四）以大数据赋能“思政”教学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要求思政教育广泛融入各个课程教学中，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加速这一进程，拓展思政课堂教学空间。具体做法上：

首先，将思政元素的人本价值取向和主流价值导向同数字化技术鲜明的工具理性深度融合、协同发力，实现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以立德树人的价值追求引领数字化技术应用，将主流意识形态渗透进数字化技术的设计、应用和监管全过程，引导学生形成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围绕教学目标进行技术选择和育人场景构建，完成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输出；强化对虚拟现实空间的价值引导，把握虚拟体验之量与度。

其次，转变教学理念，在“大思政”格局下重新审视和推广信息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价值，建设好网络课堂，探索、综合运用现场展示与线上交流相结合、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线上学习和线下讨论相结合等开放的教学方式。

（五）提升专业教师的“思政”教学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广大教师要用好课堂讲坛，用好校园阵地，用自己的行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学识、阅历、经验点燃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与树人意识、育人能力影响着课程思政的效果，因此，公共管理的课程思政教育应首先加强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在本专业教师的培养和使用方面创新路径，提升本专业教师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

水平及讲授水平,提升其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理解能力,提升其自身修养和师德水平以胜任并积极投身于公共管理专业和思政元素的协同育人中;在教育教学评估体系中,应更为重视“思政”

元素的作用,并落实于对教师的奖惩机制中,激励广大教师在公共管理专业的教育教学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浸润学生们的心田,转化为日常行为”。

附表:“大思政”引领公共管理专业群建设的路径设计

路径方向	具体措施	责任主体	预期成效
课程体系重构路径	1.开发“公共管理+思政”模块化课程群;2.编写具有中国治理特色的课程思政案例库	专业教师、思政教师、教研室,等	形成3-5门深度融合示范课程,积累配套的教学资源
师资协同育人路径	1.设立“思政导师+专业导师”双导师制;2.开展跨学科思政教学能力培训	学院党委、院(系)所、教师发展中心,等	建设一支兼具政治素养与专业能力的教学团队
实践平台整合路径	1.与党政机关、基层社区共建思政实践基地;2.开展“治理中国”主题调研与社会服务项目	学工部门、实践教学中心、校外合作单位,等	学生公共精神与社会责任感显著提升,形成一批实践育人品牌项目
评价机制创新路径	1.将思政育人成效纳入专业评价指标体系;2.建立学生思政素养与专业能力融合发展的成长档案	“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质量监控中心、辅导员队伍,等	形成可量化、可追踪的“大思政”育人效果评估机制

参考文献:

[1]谭绍江.“大思政课”视域下校地协同育人的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5,(20):67-69.

[2]董旖旎,李国娟.高校“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机制构建的实践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5,(19):67-71.

[3]赵小兰,杨辉.“大思政课”视域下馆校协同育人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思想教育研究,2025,(10):111-116.

[4]徐秦法,常劫.善用“大思政课”推进价值观构建[J].教学与研究,2024,(01):58-66.

[5]丁惠炯,彭顺绪.公共管理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及方法论探析——对地方高校的实证研究[J].教育现代化,2019,6(93):1-4.

[6]崔戈.“大思政”格局下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07):138-140.

新时代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研究

王雅迪¹

(1.海南大学, 海南 海口 570100)

摘要: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沉淀的精神瑰宝, 蕴含修身、治国与处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社会转型、价值多元, 传承这份美德既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基, 也是筑牢文化自信、助推民族复兴的关键。本文立足新时代, 梳理其核心内涵与当代价值, 剖析传承难题并探寻适配时代的传承路径, 为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新时代; 中华传统美德; 传承实践; 文化自信; 创造性转化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04

Study on Inheri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s in the New Era

WangYaDi¹

¹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100, Hainan Province, P.R.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s are a spiritual treasure precipitated by thousands of years of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taining profound wisdom on self-cultivation,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dealing with the world. In the new era characterized by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diverse values, inheriting these virtues is not only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core socialist values, but also the key to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boost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Based o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ir core connota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in inheritance and explores inheritance paths suitable for the times,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virtues.

Keywords: New Era;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s; Inheritance Practice; Cultural Confidenc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一、引言

中华传统美德从来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 经过数千年时光的沉淀筛选, 一直没断过传承的脉络。回头看看历史,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各抒己见, 围绕伦理道德的争论不休, 给这份美德打下了最初的底子; 到了汉唐, 国力强盛、胸襟开阔, 在和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中, 这份美德被反复打磨, 变得更醇厚; 再到宋明, 理学深入探讨伦理问题, 让伦理体系更完整, 最终让“仁义礼智信”成了大家公认的价值标准。就在这样一步步发展里,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气质,

还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劲儿, 也慢慢攒了下来, 悄悄钻进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骨子里。仔细想想就知道, 正是这份刻在骨子里的美德, 塑造成了我们民族的性格, 也让整个民族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能紧紧抱在一起。

新时代以来,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已经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明确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当下, 我们正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作者简介: 王雅迪(1998—),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通讯作者: 王雅迪

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这个关键阶段，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很有必要——既能回应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道德失范问题，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基于这些考量，我将聚焦新时代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问题，梳理其内涵、剖析困境、探寻路径，希望能为传统美德适配现代社会、契合新时代精神，提供一点学理支撑和实践指引。

二、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内涵与新时代价值

（一）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内涵

很多人对中华传统美德的理解都偏了，总觉得它是些板着脸孔的老规矩，没什么现实意义。可事实并非如此，这份美德早已化成一套鲜活的价值体系，悄悄融进了我们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的日常里，从不是人为划分出来的僵硬框架。时光流转中，它的内容一直在慢慢丰富，但最根本的精神底色始终没变。就说做人的“仁”吧，这是中国人处世的核心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一辈辈传下来，而“君子慎独”的自我约束，更是帮人朝着“止于至善”的境界努力的关键，这也是咱们中国人向来重视修身养性的缘由。家庭里的“孝悌”也一样，“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是硬邦邦的规定，而是让家庭成为涵养道德的第一个港湾，这份家庭里的伦理感，慢慢也延伸成了“家国一体”的文化根基。与人相处时，大家自然会追求“和而有礼”，既能容得下彼此的不一样，又能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最后求得个人和社会的安稳和睦。至于刻在国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更是让“精忠报国”“鞠躬尽瘁”的爱国精神代代相传，把个人的日子和国家的命运牢牢绑在了一起。这些藏在不同生活场景里的美德内涵，相互交织、彼此支撑，构成了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也正是靠着这份精神力量，中华民族才能历经千年风雨依旧生生不息。

（二）中华传统美德的新时代价值

中华传统美德对当下的价值，绕不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滋养作用。不少人或许没细想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凭空出现，它的根深深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传统美德里的“仁义礼智信”，和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强调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本质上是相通的；那些刻在民族基因里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也在无形中为国家发展的目标注入精神动力。把这些传统美德传承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然

会多一份文化厚重感，也更容易走进普通人的心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面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道德难题，传统美德也能派上用场。这些年，市场经济跑得很快，社会结构也在跟着变，人们的价值想法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一些领域里诚信靠不住、凡事只看利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远了些。这些不太好的现象，给社会治理添了不少麻烦。而传统美德里藏着的老智慧，或许能找到破解的头绪。比如“诚信为本”“见利思义”的想法，能帮着大家摆正义与利的位置；“推己及人”的仁爱之心，也能慢慢重新拉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社会风气慢慢变得清朗了，不少矛盾自然会缓解，发展起来也更顺畅。

传统美德更像是一条精神纽带，能把大家的心聚在一起，帮我们筑牢文化自信的根基。文化自信不是空喊口号，关键是打心底里认同自己文化的价值。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美德无疑是这份认同的重要载体。通过传承这些美德，人们能更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特之处，自豪感和归属感会更强，这份力量聚起来，就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美德里“和而不同”“协和万邦”这些理念，放到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也能给出不少有价值的中国思路，让中华文化的价值在世界舞台上被更多人看到。

三、新时代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现实困境

（一）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引发认知偏差

现代性转型的浪潮里，传统美德与当下社会的价值理念难免会撞出火花，这种张力直接导致不少人对传统美德的认知出了偏差。有的人心目中，传统美德就是封建糟粕的代名词，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落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也有人走向另一个极端，把老祖宗的伦理教条当成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完全不管时代变了，这些理念需要与时俱进调整。之前接触过一些家庭，还在刻意强调所谓的“长幼有序”，把等级观念摆在明面上，这和现代社会追求的平等理念格格不入，很容易让旁人对传统美德产生抵触和误解。再加上全球化的影响，西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这些思潮不断涌进来，年轻人本就处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很容易受这些思潮影响，对传统美德的认同感慢慢淡了，这给传承工作添了不少麻烦。

（二）传承方式固化导致传播实效性不足

现在传承传统美德的路子，总感觉有些老套跟不上趟，很难贴合新时代的传播特点和大家的接受习惯，效果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就说教育这块，大多还是课堂上照本宣科讲理论、捧着书本灌知识，现代教育理念没怎么融进去，听着又干又枯燥，年轻人哪会愿意主动去了解。更关键的是，很多传承内容都飘在理论层面，和日常过日子脱节太远。常见的情况是，不少人谈起传统美德的道理一套一套的，真要落到实处做起来，却又打了折扣。这种纸上谈兵的状态，让传统美德很难真正走进生活、扎下根来。

（三）传承主体缺位与保障机制不完善

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从来不是单一群体能扛起的事，得靠多方合力才能走得远，这本身就是一项需要协同推进的工作。但现在的问题是，各方的力量都没完全发挥出来，彼此间的配合也不够顺畅。就拿家庭来说，如今社会节奏快，生活压力压得不少家长喘不过气，大多时候都在为生计奔波，根本没太多精力顾及孩子的道德教育，原本该是道德培育起点的家庭，这方面的功能慢慢弱化了。学校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道德教育常常被边缘化，课程安排得零散又有限，教学质量也没个准头，想让学校扛起传承主阵地的责任，难度不小。再看社会层面，缺乏能真正带动人的引导和激励办法，那些身边的道德模范、好人好事，没能被充分挖掘和传播，示范引领作用打了折扣，崇尚美德的社会氛围也就难以真正形成。国家层面的支撑也不到位，相关的政策规划、资金投入还有法律规范都不够完善，没能搭建起一套系统的保障体系，这也让传统美德的传承很难常态化、长效化地推进下去。

四、新时代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实践路径

（一）坚持创造性转化，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精准衔接

传承传统美德，核心不是抱着老祖宗的旧规矩不放，而是得让它真真切切走进现代生活。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对传统美德做些创造性的转化，赋予它新的时代生命力。常听人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话听着简单，实操起来得有个明确的标准——得看哪些理念还能跟上当下的社会节奏。像那些带着等级偏见、和现在平等民主理念相悖的老想法，比如老辈人里残存的顽固等级观念、男尊女卑的旧思想，肯定要果断丢掉。但传统美德里更多核心的东西，比如待人接物讲诚信、和

人相处懂友善，还有刻在心里的爱国情、遇事敢担当的劲儿，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好好挖掘的宝贝。而且不能直接照搬照抄，得结合现在的生活场景重新解读。比如说“孝悌为本”，放在今天早就不是过去那种无条件服从了，更多是对家人的一份责任，是打心底里的亲情关照；再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份担当放到现在，也变成了每个普通人的爱国举动和对社会的责任心。传统美德只有跟着时代的步伐走，才能在当下真正“活”起来。

（二）创新传承方式，提升传播的吸引力与实效性

跟着时代传播的节奏走，传统美德的传承方式总得变一变，不能再守着老路子不挪窝。学校本来就是德育的重要场所，可现在不少教学还是老一套的理论灌输，实在难吸引年轻人。其实不用刻意去调整课程框架，把传统美德的内容悄悄融入语文的课文解读、历史的人物故事、思政课的现实讨论里，效果会好很多。比起干巴巴的讲课，拿具体案例分析、设身处地情景模拟，或者让学生亲身参与实践体验，更容易让他们理解美德的内涵，感染力也强。除了学校，社会层面的传播也得花点心思，现在的新媒体平台就是个不错的突破口。年轻人爱刷的短视频、常看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互动感强的直播，都能用来讲美德故事。不用刻意找宏大的题材，那些藏在历史典故里的细节、身边普通人的美德小事，都能做成生动的内容。之前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典籍里的中国》《国家宝藏》，就觉得这种创新形式特别好，把传统文化讲活了，反响特别热烈，这对传承传统美德很有借鉴意义。不过话说回来，光靠说、靠看还不够，得有实实在在的实践机会。让传统美德走进社区志愿服务、融入乡村振兴的具体工作，让人们在做事的过程中真切感受美德的价值，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三）强化主体协同，构建多元共治的传承体系

传统美德要真正扎下根、传下去，单靠某一方的力量远远不够，关键是要让家庭、学校、社会和国家拧成一股绳。毕竟道德教育的起点在家庭，家长的一言一行都是孩子最直观的榜样，一个家风正的家庭，不用刻意说教，孩子在日常耳濡目染中就能养成基本的道德自觉。学校的作用也不可或缺，作为教书育人的主阵地，与其零散开设道德课程，不如把传统美德的滋养融入日常教学的方方面面，这就需要先建好师资队伍，把

德育质量提上去。再看社会层面，多挖掘身边的道德模范、讲好普通人的美德故事，比空洞的宣传管用得多，慢慢就能带动形成崇尚善德的氛围。而国家层面的支撑也不能少，做好顶层设计，完善相关的政策和保障机制，适当加大投入，才能让这份传承工作走得更稳、更长久。

(四) 融入国际传播，提升中华传统美德的国际影响力

要是不局限在国内看，把眼光放全球化背景下就会发现，传统美德的传承本就不该有国界，走向世界是早晚的事。现在正好赶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热潮，这对中华传统美德走出国门、让更多人知道，是个难得的好时机。其实不用特意找一堆传播渠道，比如文化交流时坐下来好好聊聊，学术研讨中互相碰撞想法，或是拍一部能打动人的影视剧，再或是在海外文化中心搞些让人有代入感的展示，这些方式都能把传统美德的内核讲清楚，把中国的道德故事讲生动。像“和而不同”“协和万邦”这些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理念，放到全球治理的大场景里，说不定能给解决难题提供不少有用的思路。我觉得，让这些带着东方智慧的想法被更多国家和老百姓理解接受，不仅能让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更有说话的分量，也能为人类文明往前走添上一把中国的力气。

五、结论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积淀的宝贵财富，既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也藏着鲜明的时代价值。新时代传承这份美德，本质上就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根基，也是破解当下道德困境、筑牢文化自信、助推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传承之路从不会一帆风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传承方式的陈旧、各方力量难以形成合力，这些都是绕不开的挑战。但这些挑战并非死

结，关键在于做好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用新的方式讲好美德故事，让家庭、学校、社会、国家形成传承合力，再借着国际交流的东风让这份美德走向世界，如此便能让传统美德真正融入现代社会，适配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往长远了说，等传承体系慢慢完善起来，实践探索也一步步往深了走，中华传统美德肯定能完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活出全新的时代气象。这份美德早就刻进了中华民族的骨子里，是我们独有的精神印记。未来，它会成为咱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重要精神支撑，陪着中华民族在文明发展的路上稳稳地走下去。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8.
- [2]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37-61.
- [3] 陈来.中华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20(5):4-22+206.
- [4] 李泽厚.伦理学纲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11-18.
- [5] 王蒙.新时代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J].道德与文明,2022(3):5-13.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Z].2017-01-25.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商科教育的结构性转型研究——基于“夕阳经济”的蓝海战略

蒋中^{1*}, 莫童童¹

(1.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智慧城市工程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55)

摘要: 当前中国正经历深刻的人口结构转型, 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导致传统生源减少, 且学生报考倾向呈现“工科热、商科冷”的趋势。为在生源危机中保持学科价值, 商科教育必须对接“夕阳经济”这一拥有巨大潜力的增量市场。本文结合人口统计数据与产业趋势, 分析了商科人才供需的结构性错配问题。研究认为, 商科院校应通过开设银发金融、适老化商业管理、老年市场营销等交叉学科方向, 培养服务于老龄社会的复合型商科人才, 从而实现从“存量博弈”向“增量开发”的战略转型。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商科教育转型; 夕阳经济; 银发金融; 人才培养

基金项目: 全国商科教育科研“十四五”规划 2025 年度课题 (SKJYKT-2505192)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05

Research o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Aging: A Blue Ocean Strategy Based on the "Silver Economy"

JIANG Zhong^{1*}, MO Tongtong¹

1. Guangzhou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hina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a profou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characterized by concurrent low fertility and population aging, which has led to a decline in traditional student sources. Furthermore, student enrollment preferences exhibit a trend of "enthusiasm for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and disinterest in business disciplines." To preserve the disciplinary value amidst the student source crisis, business education must align with the "silver economy," an incremental market with significant potential. Integrating demographic data with industrial tren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mismatch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business talents. The study argues that business schools should cultivate interdisciplinary business professionals equipped to serve an aging society by establishing specialized fields such as silver finance, aging-adaptive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senior marketing. This approach is proposed to facilitate a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from "stock competition" to "incremental development."

Keywords: population aging;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education; silver economy; silver finance; talent cultivation

引言: 人口变局与商科教育的生存危机

随着我国人口政策的转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根据统计数据, 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 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以广东省为例, 尽管作为人口大省, 其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 8.58%, 且呈现持续

上升态势, 部分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已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1]。这种人口结构的改变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双重挤压: 一方面, 出生率下降导致未来适龄生源绝对数量减少^[2]; 另一方面, 就业市场对技术型人才的渴求使得工科专业备受追捧, 传统商科专业因被视为“软技能”而面临生源流失和就业质量下降的挑战。在“未富先老”与“少子化”的双

作者简介: 蒋中 (1984—), 男, 硕士, 高级工程师, 研究方向为金融科技, 低碳制冷技术;

莫童童 (2004—) 女, 本科, 研究方向为金融科技, 适老化建筑。

通讯作者: 蒋中

重压力下,商科教育若不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面临边缘化风险。

经济下行,学生家庭环境对设置商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同样造成冲击。据笔者调研,2024-2025,大概在读学生每生生活费为1200至1800,中位数为1500,考虑到近年来2023年至2025年CPI长期增长在1%以内,甚至个别月份同比出现负增长的通缩状态,导致就业形势极具艰难。不少学生家庭受到影响,导致学生不得不通过国家助学贷款缴纳学费,即便对于生源家庭收入相对较好的民办高校,一个班的助学贷款率也接近50%。这导致学生选择专业倾向于能就业良好,毕业后尽快独立甚至反哺家庭,所以导致具有技术实用性的工科专业大受追捧,甚至不少中产家庭的海外求学方向也抛弃传统热门商科,转向工科。

1 市场新机遇：“夕阳经济”下的商业蓝海

尽管人口红利在消退,但“夕阳经济”正在崛起。预计2023年中国老年市场规模突破5万亿元,涵盖健康、养老服务、老年旅游、老年金融等细分市场。

1.1 金融服务需求的激增

根据“老年安全假说”,人口出生率和少儿抚养比的下降会提高家庭的储蓄率,以满足未来的养老需求^[3]。实证研究表明,人口出生率和年龄结构对金融发展有显著影响,老年群体消费意愿明显下降,老龄化趋势实际上促进了对财富管理、养老保险等金融服务的需求^[4]。

而老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目前是商科专业忽视的盲点,如何有效,安全,简单地管理金融资产是银发高净值群体的痛点,这为商科中的金融专业提供了巨大的转型空间。

1.2 适老化消费与管理的缺口

随着老年人口增加,对居住环境的适老化改造、低碳养老社区的运营管理提出了新要求。这种需求不仅是工程技术问题,更是商业管理问题——如何运营一个绿色低碳、适老化社区,如何设计符合老年心理的商业模式,是目前市场的空白点。

2 传统商科教育与老龄社会的错配及转型探索

当前商科教育体系主要围绕年轻消费群体和传统增长模式设计,存在严重的“专业结构性过剩与人才结构性短缺”矛盾^[5]。

2.1 供需错配：商科教育的“精英化思维”与老

年人的“实用主义”

传统的商科金融教育,核心逻辑往往是“收益最大化”和“高频交易”,培养的人才大多服务于机构投资者或中青年高净值人群。

现行课程鲜有涉及“衰老心理学”或“老年生理特征对决策的影响”。例如,商科学生学习复杂的衍生品工具,但却不知道如何向一个视力减退、对数字技术有畏难情绪的老人解释“资产配置”。

金融专业需要引入适老化金融工程线上产品。这不仅仅是把手机APP字体放大,而是从产品设计底层逻辑出发,开发低波动、强流动性、且易于理解的金融产品,将“复杂算法”转化为“极简操作”。

2.2 “银发高净值群体”的顾问式服务转型

未来的金融专业学生,不应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的交易员,而应是全周期生活规划师。夕阳经济产业链需要的是“商科+医护+科技+心理”的复合型人才。对于高净值老人,金融需求是与医疗、法律、康养高度耦合的。商科应增设养老产业投融资与康养地产管理。让金融学生懂得如何评估一家养老院的财务稳健性,如何为老人计算“以房养老”的精算模型。这种深度咨询能力是工科AI目前难以完全取代的人文商业价值。

2.3 伦理与法律

当金融遇到老龄化,伦理问题凸显(如老人认知障碍时的代为理财授权)。

商科教育应强化“老年金融法”和“金融伦理”。如果商科专业能培养出一批既懂金融逻辑,又具备极高职业道德,能为老人守住“钱袋子”的专业人才,那么这个学科的社会地位将不可动摇,其吸引生源的优势将从“赚钱快”转向“职业生命周期长、社会价值高”。

3 转型路径：构建“银发导向”的商科新生态

为了保住商科存在的价值并吸引生源,商科院校需意识到,银发金融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财产品销售”,而是一场关于生命周期管理的深度服务转型。

3.1 有效资产传承与购买力保值

银发群体的“有效”不再是追求翻倍,而是如何跑赢通胀以及如何实现跨代财富传承。转型点:加强家族办公室和信托实务的金融教育。研究如何通过法律与金融手段(如遗嘱信托),确保老人的钱真正花在自己的医疗和康养上,而不是被后辈挥霍或被诈骗。银发群体的财富管理目标具

有极强的“专款专用”属性。商科课程应引入法律与金融的双重叙事。不仅教授如何配置资产，更要教授如何通过家族信托、保险金信托等工具，设计分阶段拨付机制。这不仅是为了避税，更是为了在投保人失能、失智等极端情况下，依然能通过受托人制度确保资金精准用于自身的长期照护。

通胀对冲模型在商科教育理念的更新，传统的马科维茨均值-方差模型在老龄化背景下需要修正。教学中应加入针对医疗通胀的特定对冲研究，帮助学生设计能覆盖未来20年养老院费率波动、护工工资上涨的动态资产组合。

3.2 防诈骗与风险隔离

高净值老人是金融诈骗的首要目标。金融科技(FinTech)专业应研发针对老人的“异常交易识别保护系统”。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老人的日常消费习惯，当出现大额异地转账时，系统能自动触发亲属确认或人工干预。这种“守护型金融”是未来的蓝海。在老龄化社会，金融安全是尊严的底线。这就涉及到新型金融科技(FinTech)研发，金融科技专业需超越单纯的“反洗钱”逻辑，转向行为生物识别反向。利用机器学习捕捉老年用户在输入密码时的压力感、手部震颤频率或点击习惯的异常，从而判断是否正处于被胁迫或认知障碍状态。

同时注意资产隔离制度设计，扩充法商管理内容。商科学生应研究如何建立“意定监护+金融监管”的联动机制。例如，开发一种“双签账户”，当老人需要动用超过一定额度的医疗储备金时，需由其预设的信托监护人或专业机构进行二次验证，从而在制度上杜绝针对老人的金融收割。

3.3 认知负荷的极简化

老年人对认知负荷极度敏感。商科专业需跨学科培养“金融UI/UX设计”人才。商科学生需要学习如何设计“傻瓜式”的财富管理界面，甚至研究“语音交互金融”或“物理实物化金融”，让理财像看存折一样直观。

金融产品的复杂性是老年人融入数字文明的最大障碍。提倡认知金融工程的建立。商科应与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交叉。研究“认知退化模型”下的金融交互。例如，研究为何老年人偏好“实体感”，进而开发基于生物特征识别的硬件(如带有指纹确认的物理理财印章)，将复杂的线上交易转化为直观的物理动作。UI/UX课程应专注于“大

字体、高对比、无层级”的设计理念。甚至可以探索拟物化金融——在平板电脑上模拟真实的纸质存折，翻页即查账，滑动手感即确认。让商科学生学会如何通过减少选择来降低老人的决策焦虑，重塑他们对金融体系的掌控感。

3.4 专业设置的“老龄化+”改造

商科不应与工科硬碰硬，而应成为工科技术的“价值转化者”。增设“养老金融与财富管理”专业方向。结合老龄化促进金融发展的理论依据，重点培养掌握养老金制度、长期护理保险、老年理财规划的专业人才。转型“适老化商业管理”。针对存量房产和老旧小区的适老化改造需求，培养能够进行养老地产投融资分析、适老化社区运营管理的商科人才。开发“健康服务与管理”交叉学科。融合管理学与护理学知识，培养养老机构的运营总监和质量管理者。

3.5 课程体系的深度革新和场景化重构

在传统商科核心课中植入老龄化模块。市场营销课增加“老年消费者行为学”，分析老年人对传统媒体依赖、家庭协同决策等消费特征。金融管理课引入银发金融产品服务，针对银龄友好内容，金融服务理念和产品设计进行革新。创新创业课鼓励学生关注适老化产品(如大字版APP、防走失设备)的商业模式设计，而非仅盯着年轻人的奶茶和游戏。

建立“双导师制”实习基地，与养老服务机构、适老化产品制造企业合作，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消除对养老行业的偏见。开展老龄体验式教学，引入老化模拟设备(如视觉障碍模拟眼镜)，让学生切身感受老年人的生活痛点，从而培养同理心和基于用户需求的产品设计思维。

4 结论与展望

在工科强势的背景下，商科教育的价值不在于培养更多的普通会计或销售员，而在于培养能够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即日益增长的老龄化服务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供给之间的矛盾的管理者和创新者。通过将人口老龄化压力转化为产业发展动力，商科教育可以开辟出一条新赛道。这不仅顺应了人口出生率下降和结构转型的宏观趋势，也符合国家对“老龄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战略需求。商科院校应主动拥抱“夕阳经济”，通过跨学科融合，使商科专业成为连接技术与老年用户、资本与养老服务的关键桥梁，从而在生源竞争中重获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杨新洪. 广东省人口发展现状特征及趋势研究(上)[J].岭南学刊,2024,(01):94-106.DOI:10.13977/j.cnki.lnxk.2024.01.010.

[2]杨新洪. 广东省人口发展现状特征及趋势研究(下)[J].岭南学刊,2024,(02):101-119.DOI:10.13977/j.cnki.lnxk.2024.02.009.

[3]刘方,李正彪. 人口出生率、年龄结构与金融发展[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9,34(03):117-127.

[4]常艳华. 人口结构变迁驱动下高等职业教育适应性改革研究——以河南省为例[J].职业教育研究,2025,(10):60-67.

[5]吴前乐. 人口转变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J].中国市场,2025,(25):5-14.DOI:10.13939/j.cnki.zgsc.2025.25.002.

应用型本科院校学前师范生专业认同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

孙思洁¹ 梁钰静¹ 张文莉¹ 戴熙玉¹

(1.常州工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32)

摘要: 专业认同是在参与一定时间的专业学习和教育实践的基础上, 所形成的对职业性质的认识、对职业的情感态度以及从事某种职业的意愿与价值追求;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是师范生进行职业决策过程的重要评估。良好的专业认同感能提升师范生对专业学习的热情和未来从事教师职业的意愿程度, 对师范生职业发展规划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通过了解应用型本科院校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发展水平, 进一步分析并研究专业认同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两者的关系。因此, 本研究选取应用型本科院校学前教育专业一到四年级师范生发放问卷, 对调查结果建立模型发现专业认同对学前教育师范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存在预测效果, 研究结果显示应用型本科院校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发展水平良好, 两者存在显著关系。基于以上情况, 本研究在社会、学校、自身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教育建议, 以提高应用型本科院校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水平。

关键词: 专业认同;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师范生专业认同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社项目: 大学生职业决策与未来时间观的关系及对策研究(2023SJYB1297)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06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normal student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Sijie Sun¹, Yujing Liang¹, Wenli Zhang¹, Xiyu Dai¹

¹ Normal College,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China

Abstract: Professional identity i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engaging in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over a certain period, encompassing individuals'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fession's nature, emotional attitudes toward the profession, as well as their willingness and value pursuits in pursuing a specific occupation.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serves as a crucial assessment in the caree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A strong sense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can enhance pre-service teachers' enthusiasm for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their intention to pursue a teaching career in the future, holding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planning.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al level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career d

作者简介: 孙思洁(1993—),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直线电机分析与控制;

梁钰静(2002—), 女, 本科, 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

张文莉(1994—),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与终身教育、儿童发展与教育数字化;

戴熙玉(1951—),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学前儿童语言发展与教育。

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among undergraduate pre-service teachers major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t application-oriented institutions,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nstructs. Accordingly,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first- through fourth-yea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t application-oriented institutions. A model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revealing that professional identity exerts a predictive effect on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among these pre-service preschool teacher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al level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in this population are favorable, with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Based on these results, this study proposes targeted educational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ety, schools, and individuals to enhance the level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among undergraduate pre-service teacher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t application-oriented institutions.

Keywords: Professional identity; self-efficacy of professional decision-mak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normal students

一、引言

随着《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蓝图的全面推进以及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持续深化,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已成为国家教育发展的战略核心(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8)。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根基,其师资质量不仅深刻影响儿童早期发展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更关乎国家长远人力资本素质的积淀。在此背景下,以服务地方、注重实践为鲜明特色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承担着为基础教育一线输送“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合格师资,特别是学前师资的重要使命。师范生作为教师队伍的预备役,其在校期间形成的专业心理素质,尤其是专业认同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是影响其学业投入、从教意愿、职业适应性与未来专业发展持续性的关键内在机制(王鑫强等, 2010; 李宁, 2009)。

专业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建构性的心理社会概念,指个体在与专业/职业的持续互动中,所形成的关于该专业角色的认知、情感、价值观、行为倾向及归属感的整合性自我定义(Henning et al., 2001)。在国外教育研究,尤其是教师教育领域,它常与“职业认同”交融,强调教师在专业实践与社会互动中身份意义的协商与形成过程,积极的专业认同被视为教师效能感、工作满意度与职业持久性的重要源泉(Welmond, 2002; Stavrou, 2013)。国内的研究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涉及现状调查、差异分析及对学习投入、职业承诺等的预测作用(胡志海、黄和林, 2006; 方琦, 2014)。在研究专业认同的影响因素中,主要从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两个层面进行分析(杨清, 2015; 黄建武等, 2017),主要包括兴趣、人格、学业自我概念、动机、家庭期望、教养方式、教

学质量、市场需求、政策导向等(郑泽涛, 2015)。在针对师范生群体的研究中,揭示了专业认同水平可能存在波动性(周玉, 2016)及多重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然而,针对应用型本科师范生这一群体的专门、系统研究尚属少见,其基于实践导向的培养模式可能塑造独特的认同形成路径,值得深入探究。专业认同反映了师范生对“准教师”角色的内化程度以及对教育事业的价值承诺,是其专业发展的心理基石(晋燕云, 2011)。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概念源于 Bandura 的社会认知理论,特指个体对自身能否成功完成职业决策过程中所必需的一系列任务,如自我评价、信息收集、目标选择、规划制定、问题解决的能力判断与信心水平(Taylor & Betz, 1983)。它并非真实能力,而是基于直接经验、替代经验、社会说服和情绪状态形成的信念系统,对个体的职业探索行为、决策质量及适应性具有关键的中介与预测作用。国内研究在引进这一概念后,结合本土情境进行了应用与拓展。李宁(2009)强调了其作为“自我评估或自信”的本质。李新月(2017)和周基燕、方青(2021)则分别从心理状态和功能角度进行了阐释,突出了其在应对职业挑战中的重要性。研究进展表明,国内学者已广泛考察了其与人格特质、社会支持、家庭功能等前因变量的关系,以及与择业焦虑、职业同一性、求职结果等后果变量的关联(陈晓娟, 2007; 康廷虎、王晓庄, 2008)。针对师范生的研究亦逐渐增多,关注了性别差异、社会实践的影响等(张巍巍, 2017)。国际研究则更深入探讨了其在更复杂模型中的中介机制或与特定教育经历的共同作用。然而,聚焦于学前教育专业,并置于应用型院校语境下,细致考察其发展特点及与前因变量关系

的研究, 仍有待充实。

专业认同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紧密的、双向的建构关系。稳固而积极的专业认同, 意味着个体对自我和职业世界有了更清晰、更积极的认识与情感联结, 这为进行职业决策提供了坚实的认知地图、价值锚点和情感动力, 自然能增强决策过程中的自我效能感。反之, 在职业探索与决策中获得的成功体验与增长的信心, 也会反馈并强化个体对专业的认同感, 形成良性循环。先行研究初步支持了这一关联。傅滢滢(2015)对幼师生的研究发现, 专业能力与职业认同自我效能感相互促进。谭金凤等人(2022)在更广泛的大学生样本中直接证实了专业认同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些发现为理解二者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缺口, 其一, 研究对象多聚焦于综合性或研究型大学, 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这一特定类型, 尤其是其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针对性实证研究较为匮乏, 其独特性未能被充分揭示; 其二, 研究内容上, 多数探讨止步于变量间整体相关关系的验证, 缺乏对专业认同多维结构如何具体影响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各成分的精细化、机制化剖析, 导致理论解释深度不足, 实践干预缺乏精准靶点; 其三, 在学前教育就业生态发生变化的当下, 结合现实背景探究该群体心理状态的研究亟待加强。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师

范生, 采取随机取样的方法, 抽取江苏省某应用型本科院校一至四年级的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为调查对象, 共发问卷 350 份, 回收 319 份, 有效问卷 290 份, 有效率为 90%。

(二) 研究工具

1. 专业认同问卷: 本研究采用李媛媛(2019)自编的《师范生的专业认同现状调查问卷》即对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专业认同的现状进行调查, 该问卷设计严谨, 信度在 0.73-0.89 之间, 涵盖了五个维度以全面评估师范生的专业认知与情感倾向、专业价值观的形成、专业意志的坚定程度以及专业行为的实际表现, 共计 24 个题项。该问卷的评价方法采取五分制的评分系统, 即每个题项根据受访者的实际感受进行打分, 满分为 5 分。得分越高专业认同感水平越高。

2.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问卷: 本研究采用李宁(2009)修编的《师范类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问卷》。该量表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分为五个维度: 自我评价, 收集信息, 选择目标, 制定规划, 问题解决。共 36 个题项, 信度为 0.962, 评分采用 5 分制评价法, 分数越高, 则说明该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越高。

三、研究结果

(一) 应用型本科院校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

现状与差异分析

为了解目前学前教育师范生的专业认同现状以及在性别和年级上的差异, 本研究利用 SPSS27.0 软件对回收的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具体见表 1 所示。

表 1. 应用型本科院校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现状与差异分析

	描述性统计		男女差异		年级差异	
	M	SD	t	p	F	p
专业认知	3.890	.895	-2.547*	.014	4.844**	.003
专业情感	3.820	.955	-2.515*	.016	3.659*	.013
专业价值观	3.876	.968	-1.780	.082	5.349**	.001
专业意志	3.807	.961	-1.868	.069	4.218**	.006
专业行为倾向	3.865	.930	-2.193*	.034	5.253**	.002
专业认同	3.851	.877	-2.284*	.027	5.291**	.001

从表 1 可知, 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五个维度上的平均值均高于设定的临界值 3, 具体而言, 他们对于自己所学专业的价值、教学工作的热情以及职业生涯的发展前景都持有积极态度, 体现出较高的专业认同和对教育事业的热爱。这一结果表明, 多数学前教育师范生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他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所学专业的重要性和自身承担的责任。其次, 专业认同在性别上存在差异, 女生的专业认同感要高于男生($t=-2.284, p=0.027<0.05$)。具体而言, 在专业认知($t=2.547, p=0.014<0.05$)、专业情感($t=-2.515, p=0.016<0.05$)以及专业行为倾向($t=-2.193, p=0.034<0.05$)三个纬度, 女生的得分高于男生。在年级上, 专业

认同感也存在显著差异($F=5.291, p=0.001<0.05$)。随着年级的升高, 师范生对于学前教育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理解逐渐加深。他们开始形成自己对教育事业的理解和态度, 这种认识往往与个体的经历、经验以及学校提供的教育资源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 师范生对于专业的认识会逐步深化。

(二) 应用型本科院校学前教育师范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现状与差异分析

为了解目前学前教育师范生的专业认同现状以及在性别和年级上的差异, 本研究利用 SPSS27.0 软件对回收的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具体见表 2 所示。

表 2. 应用型本科院校学前教育师范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现状与差异分析

	描述性统计		男女差异		年级差异	
	M	SD	t	p	F	p
自我评价	3.847	.853	-2.634*	.012	3.817*	.010
收集信息	3.830	.927	-2.931**	.005	3.713*	.012
选择目标	3.854	.935	-3.073**	.004	2.722*	.045
制定规划	3.829	.966	-3.059**	.004	3.123*	.026
问题解决	3.865	.906	-3.058**	.004	3.925**	.009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3.845	.874	-3.065**	.004	3.696*	.012

从表 2 可知, 学前教育师范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五个维度均在 3.8 以上, 明显高于临界值 3 分。因此, 应用型本科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性($t=-3.065, p=0.004<0.05$), 且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各纬度在性别上都存在显著差异($t=-2.634, p=0.012<0.05$; $t=-2.931, p=0.005<0.01$; $t=-3.073, p=0.004<0.01$; $t=-3.059, p=0.004<0.01$; $t=-3.058, p=0.004<0.01$;)。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各个维度上来看, 通过平均值可知, 女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明显高于男生。此外,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年级上也存在显著差异性($F=3.696, p=0.012<0.05$)。在量

表各维度很明显可以看到大四学前教育师范生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均值高于临界值 3, 说明大四学前教育师范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最高。这种差异可能与他们的教育背景、个人经历以及所受培训等因素有关,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学生的职业规划和自我认知中。

(三) 应用型本科院校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分析

为探究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将专业认同的五个维度作为自变量,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五个维度作为因变量, 对其 Pearson 相关系数分析, 具体见表 3 所示。

表 3. 应用型本科院校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相关分析

纬度	专业认知	专业行为倾向	专业意志	专业价值观	专业情感
自我评价	.882**	.824**	.844**	.861**	.860**
收集信息	.889**	.816**	.859**	.880**	.863**
选择目标	.892**	.806**	.844**	.857**	.842**

制定规划	.859**	.808**	.845**	.860**	.809**
问题解决	.896**	.833**	.842**	.883**	.877**

通过 Pearson 相关系数分析可知,应用型本科院校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专业认同感各维度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专业认同分数越高,则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分数越高。说明本研究中学前教育师范生的专业认同水平越高,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越强。

(四) 应用型本科院校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

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分层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分析,进行模型建立,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作为因变量,专业认同的五个维度专业认知、专业情感、专业价值观、专业意志、专业行为倾向作为自变量,考虑到基本信息变量可能对模型产生干扰作用,因此将性别和年级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研究采用分层回归分析,结果具体见表 4。

表 4.应用型本科院校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分层回归分析

变量	M1			M2			VIF
	S.E		t	S.E		t	
性别	0.149	0.213	3.735***	0.041	0.071	4.605***	1.035
年级	0.044	0.154	2.698***	0.012	-0.028	-1.783	1.051
专业认知				0.039	0.303	7.628***	6.774
专业情感				0.027	0.114	3.826***	3.832
专业价值				0.032	0.131	3.696***	5.447
专业意志				0.031	0.295	8.698***	4.948
专业行为倾向				0.031	0.179	5.358***	4.816
R ²		0.071			0.935		
R ²					0.933		

根据表 4 可知,在模型 1 中,两个控制变量性别和年级解释因变量程度达到 7.1%,从标准化回归系数来看,两个控制变量性别和年级的 β 值分别为: 0.213, 0.154, 并且呈现出显著性($t=3.735$, $p=0.000<0.001$, $t=2.698$, $p=0.007<0.01$),意味着性别和年级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在模型 2 中, VIF 值均小于 10,意味着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为 93.5%,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上自变量后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为 93.3%,在排除控制变量性别的干扰作用后,自变量的 β 值分别是: 0.303, 0.027, 0.032, 0.031, 0.031, 并且呈现出显著性($t=7.628$, $p=0.000<0.001$; $t=3.826$, $p=0.000<0.001$; $t=3.696$, $p=0.000<0.001$; $t=8.698$, $p=0.000<0.001$; $t=5.358$, $p=0.000<0.001$),意味着专业认知、专业情感、专业价值观、专业意志和专业行为倾向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关系。

四、讨论

本次对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都表现出了中等以上的水平。在性别差异上,女生的专业认同感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都高于男生。具体来说,在专业认同方面,女生对于自己所从事职业的热情和认可程度普遍高于男生;在专业情感上也表现出相似的趋势,即女生更加倾向于将学前教育视为一份充满爱与关怀的工作;而专业行为倾向方面,虽然还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但女生的参与度和投入度似乎略高于同龄男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各个纬度都存在显著的男女差异,与刘毅(2001)、康廷虎(2008)研究结果相反的是,本研究中的女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高于男生,原因可能是:第一,学前教育教师男女比例失衡,教师的待遇较低,男生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其次,虽然教师的社会认可度比较高,但学前教育男性教师社会认同感会比女性低;

第二,性别的刻板印象,家长对于男性的期望水平更高,男性选择学前教育师范专业意味着未来的职业选择将受到限制,职业的性质可能会导致社交圈变小,社交能力减弱;第三,对于女生来说,学前教育的职业性质和发展潜力有助于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相反,对于男生来说,在女性主导的教育领域中,可能会面临性别歧视或误解的问题。

在年级差异上,大四师范生的专业认同感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水平最高,其主要原因在于:经历过前三年的学习生活中,对所学专业有更深入的了解,专业认知程度最高,同时,大四大部分时间是备战考研、实习、找工作、写论文过程中,又能够对所学专业有更高层次的的见解,对教师职业有新的认识。并且大四临近毕业之际,因此职业规划需要更加实际和迅速。除此之外,大四的课程相对较少,大部分时间都在实习或是找工作中,师范生可以通过实习积累经验,了解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更加明确自身的职业目标和愿景,考虑自己希望从事的职业发展道路。

本研究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作更深入的探究,对其 Pearson 相关系数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看,学前教育师范生对自己所学专业的认同感与他们在职业决策过程中展现出的自信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当一个人对其专业有高度认同时,他们往往会更有信心去面对职业生涯中的各种挑战和决策,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具备胜任这份工作的能力。反过来,这样的自信也会进一步增强他们对未来职业道路选择的决心和决断力。通过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性别和年级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专业认同各维度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师范生专业认知、专业情感、专业价值观、专业意志与专业行为倾向的提高和增强,能提升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水平。

学前教育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育阶段,对儿童的成长和发展起到关键性影响,学前教育也备受国家社会和家长的重视,幼儿园作为幼儿的“第二任教师”,幼儿教师是儿童学习的启蒙者,肩负着孕育祖国花朵的使命。意味着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在大学生活里应更加认真专注地学习专

业知识,积极主动地参与实践活动。由前文的分析可知,当前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水平虽然相对较高,但在大学四年里,水平发展不一,为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水平,本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社会作为外部环境,对师范生的专业认同感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具有重要影响。研究发现专业认同与职业决策自我存在显著的男女差异,且女生的专业认同感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要高于男生。针对这种性别差异,要改善固有的教师观念。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叫得上来名的女性教师屈指可数,但如今男女教师比例严重失衡,想要教育持续健康的发展,一所学校需要男教师和女教师的性别互补,才能促成学生的全面发展。紧密联系当今时代对教师的新要求,采取有效的措施,拓宽学前招聘市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

其次,学校作为师范生专业学习的主要场所,应对年级差异和性别差异,提供系统化的教育干预。研究显示,大四学生的专业认同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水平最高,而低年级的学生相对来说水平较低,因此学校需要注重分层指导和教育。学校应在低年级引入更多专业认知课程,如职业导向讲座和模拟教学实践,帮助学生尽早形成专业情感和价值观。同时,增加大一至大三的实习机会(如社区幼儿园见习),并为大四学生提供针对性职业规划模块,包括考研指导、就业模拟和论文写作支持。这能深化专业认知,提升专业意志,并通过实际经验积累增强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最后,个体作为内在驱动力,师范生需通过自我调节提升专业认同感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回归分析表明,专业认同感各维度对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个体的认知、情感、价值观等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有重要作用,应鼓励学生在职业生涯规划的过程中,对自己有基本的认知,树立职业目标。提升职业素养的基础在于认真学习好本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躬行实践为先,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当中,敢于接受各种挑战,不断突破舒适区,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抗压能力。

[2] 郑泽涛.农业院校专业调剂生专业认同及其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关系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2015.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EB/OL].

- [3] Welmond, M. Globalization viewed from the periphery: The dynamics of teacher identity in the republic of benin[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2002, 46(1), 37-65.
- [4] HENNING, SALLING, OLESE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s learning processes in life[J]. Journal of workplace learning, 2001(13): 7-8.
- [5] 王鑫强, 曾丽红, 张大均, 李森. 师范生职业认同感量表的初步编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6(5): 155.
- [6] 晋燕云. 免费师范生的教师专业认同研究[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17.
- [7] 胡志海, 黄和林. 大学生人格类型与专业认同间的关系研究[J]. 心理科学, 2006(06): 1498-1501.
- [8] 方琦. 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专业认同影响因素及前瞻思考[D]. 安徽大学, 2014.
- [9] Stavrou E, N. Fostering musical creativity in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Challenges and possibilit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 2013, 31(1): 35-52.
- [10] 杨清. 师范生专业认同调查研究以北京地区两所师范院校为例[J]. 大学(研究版), 2015(8): 63-71.
- [11] 周玉. 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6, 32(02): 126-128+136.
- [12] 黄建武, 马海娟, 揭毅. 地理专业免费师范生自我身份认同研究—以华中师范大学为例[J]. 教育现代化, 2017(40): 340.
- [13] Taylor KM, Betz NE. Applications of self-efficacy theory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treatment of career indecision[J]. J Vocat Behav, 1983, 22: 63-81.
- [14] 李宁. 师范类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现状及其与社会支持、人格特质的关系研究[D]. 辽宁师范大学, 2009.
- [15] 李新月. 大学生完美主义、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与职业同一性的关系研究[D]. 济南: 济南大学, 2017.
- [16] 周基燕, 方青. 大学生择业焦虑与职业价值观、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以芜湖市高校为例[J].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21, 37(04): 42-48.
- [17] 陈晓娟. 师范专业大学生职业自我效能感状况调查分析[J].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7, (03): 41-44.
- [18] 张巍巍. 师范院校女师范生择业自我效能感现状—以成都师范学院为例[J].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2017, 33(03): 31-36.
- [19] 傅滢滢. 高校幼师生学习能力以及职业认同自我效能感关系的研究[D]. 福建师范大学, 2015.
- [20] 谭金凤, 陈语萱, 郑雪艳. 专业认同对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J].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2022, 42(01): 68-71.
- [21] 康廷虎, 王晓庄. 大学生的择业价值取向与求职自我效能感[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8, 22(7): 475-479.
- [22] 刘毅. 职业辅导中男女生自我效能感的差异[J]. 教育评论, 2001(2): 1.
- [23] 李媛媛. Z 大学师范生专业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浙江师范大学, 2019.

新高考视域下我国高中物理教学的研究现状与趋势

——基于 CNKI 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

钱漪珂¹ 梁丞天¹ 林奕萱¹ 邵欣¹ 上官剑锋¹

(1.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自2014年新高考改革启动以来,高中物理教学面临选科博弈、教学模式重构等多重挑战,相关研究亦随之涌现。本文以CNKI数据库2016-2025年间收录的342篇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系统呈现了新高考视域下我国高中物理教学研究的发文趋势、研究热点、合作网络及前沿动态。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年度发文量呈“政策驱动型”波动上升态势;作者合作网络整体松散,呈现区域集中性;研究热点从初期的“走班制”“选科对策”逐步演化为“核心素养”“高效课堂”及“跨学科实践”;研究前沿聚焦于“素养落地”与“教学策略优化”。未来的物理教学研究应朝向深化素养教学、加强跨学科融合、构建协同研究共同体等方向发展。

关键词: 新高考; 高中物理教学;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 研究热点; 发展趋势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07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trend of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CNKI database

Yike Qian¹, Chengtian Liang¹, Yixuan Lin¹, Xin Shao¹, Jianfeng Shangguan¹

¹ School of Physic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in 2014,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has faced multipl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game of subject selec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ode, and relevant studies have also emerged. In this paper, 342 related literatures collected in CNKI database from 2016 to 2025 a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CiteSpace software is used for bibliometric and visual analysis. The system presents the publishing trend, research hotspots, cooperation networks and cutting-edge dynamics of China's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results of bibliometric and visual analysis show that the annual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shows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of "policy driven"; The author's cooperation network is loose as a whole, showing regional concentration; The research focus has gradually evolved from the initial "shift system" and "subject selection strategies" to "core literacy", "efficient classroom" and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e"; The research frontier focuses on "literacy landing" and "teaching strategy optimization".

作者简介: 钱漪珂(2006—)、林奕萱(2005—)、邵欣(2006—),女,本科生,研究方向为物理学科教学、科学教育;
梁丞天(2004—),男,本科生,研究方向为物理与技术学科教学;
上官剑锋,男,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BESIII 高能物理实验、物理学科教学、科学教育。

通讯作者: 梁丞天 lct.lctsoft@hotmail.com、上官剑锋 shangguanjf@ihep.ac.cn

Future physics teaching research should be directed towards deepening literacy teaching, strengthening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building a collaborative research community.

Keywords: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Research hotspots; Development trend

2014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标志着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正式启动,本轮改革的核心特征之一是打破传统文理分科,赋予学生科目选择权,形成了“3+3”与“3+1+2”等选考模式^[1]。物理学科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在新高考改革的初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当其冲即是“物理遇冷”和“理科萎缩”现象,即选考物理学生人数一度大幅下滑^{[2][3]},引发学术界与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催生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

至2025年,新高考改革已走过十余年历程,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开,相关政策不断调整完善,高中物理教学的研究图景也随之不断演变。这些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但同时也呈现出数量庞大、主题分散、观点交织的特点。然而,目前尚缺对这一领域研究文献进行的系统性分析。在此关键时间节点,系统梳理近十年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明晰其发展脉络、热点主题与未来趋势,对于总结《实施意见》发布以来的改革经验、指引未来物理教学研究方向、提升科学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笔者使用科学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对2016-2025年间中国知网的收录的相关文献进行量化分析与可视化呈现,旨在系统地整理和回答以下问题: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物理教学研究的发展态势如何?研究力量分布与合作情况怎样?研究热点的演进与政策调整有何关联?未来研究方向何在?以期总结改革经验、指引教学研究方向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撑。

一、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CNKI数据库,时间跨度为2016年1月至2025年11月。采用高级检索模式,以“新高考”并含“物理教学”并含“高考物理”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初步检索后共获得482篇相关文献,经人工筛查标题、摘要和关键词,剔除会议通知、书评等无关文献,最终得到有效文献342篇,包括期刊论文152篇、学位论文138篇、会议论文52篇,文献题录信息以Refworks格式导出。

(二) 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法,对CNKI已有的代表性文献进行系统性的概述。运用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 6.3.R1作为核心分析工具。CiteSpace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能够通过生成一系列知识图谱,直观地揭示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结构、热点前沿与发展脉络。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共现分析、聚类分析、突现检测等算法,挖掘文献数据中隐含的潜在知识^[4]。

(三) 参数设置

在CiteSpace中,时间分区设为2016-2025年,切片长度为1年。节点类型根据分析需求选择“关键词”和“作者”。术语来源包括标题、摘要、作者关键词与Keywords Plus。阈值选择采用g-index(k=25),并启用“Pathfinder”和“Pruning sliced networks”进行网络修剪。突现分析中 γ 值设为0.52,提取突现强度最高的前10个关键词。

二、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

(一) “政策驱动的波动增长”式年度发文量趋势

如年度发文量分布图(图1)所示,2016-2025年间,新高考视域下高中物理教学研究的发文量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且与高考改革的关键政策节点高度契合,具体可分为初步探索期、快速增长期和深化调整期三个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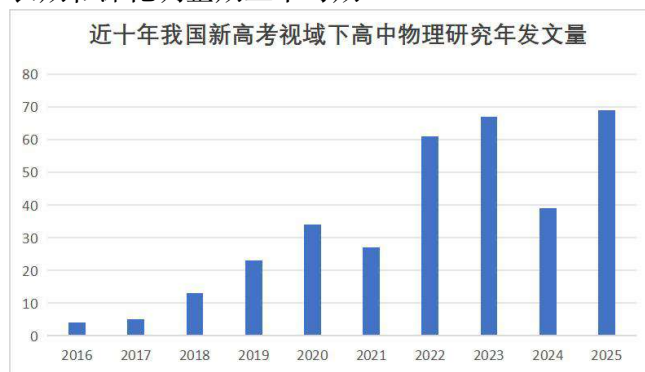


图1 年度发文量分布图

初步探索期(2016-2018年),年发文量维持在较低水平,且缓慢增长。这对应了新高考在浙

江、上海的首批试点阶段。改革伊始，“物理遇冷”现象初步显现^[2]。与此同时，走班教学、师资配置等现实问题也开始暴露^[5]，为解决此类问题，学术界仍处于观察、识别和初步回应阶段。

快速增长期（2019-2021年），发文量在此阶段迎来第一个显著高峰。其背景是北京、天津、山东、海南等第二批试点省份启动改革，以及河北、辽宁等8个第三批省份普遍采用“3+1+2”模式^[1]。同时，《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全面落实，强调核心素养，也推动了教学改革方向的研究^[6]。

深化调整期（2022-2025年），此阶段发文量在经历高峰后有所回落，并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较高水平。这表明该领域研究从“爆发式”增长进入“常态化”深耕阶段。随着全国绝大部分省份进入新高考周期，早期急迫的适应性问题得到一定缓解，研究焦点转向教学质量精细化提升、核心素养落地、对“新课标”实施建议细则的研究及“化学弃考”、“化学遇冷”等新问题的应对^{[7][8]}。

（二）作者合作网络分析——松散的合作与地域集中性

作者共现图谱显示，该领域共有198位研究者，形成31条合作连线，网络密度较低，表明研究力量分散，以独立或小团队合作为主。高产作者多集中于北京、浙江、上海等早期试点或教育发达地区，呈现明显的地域集中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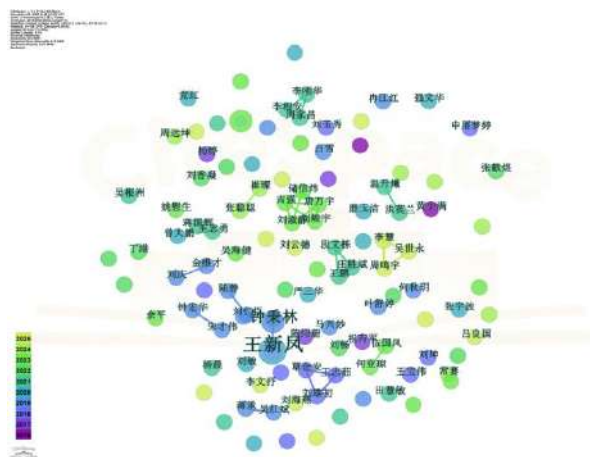


图2 作者共现图谱

（三）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分析——研究热点的集中呈现

运行CiteSpace得到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3)显示，该网络包含270个节点，466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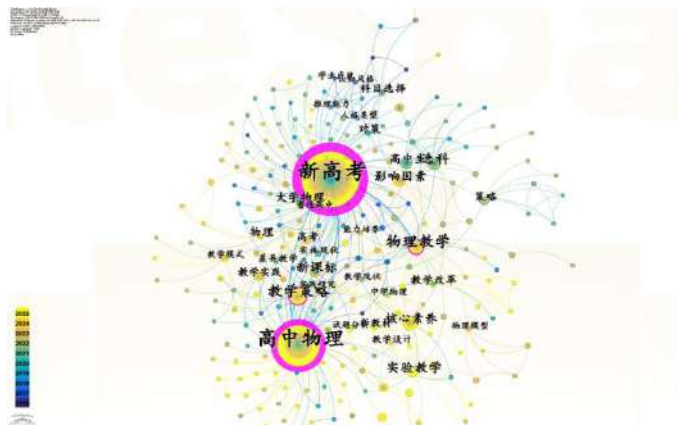


图3 关键词共现图谱

排序	关键词	出现频次	中心性	首发年份
1	新高考	212	1.14	2016
2	高中物理	121	0.62	2016
3	物理教学	22	0.19	2017
4	教学策略	26	0.13	2018
5	实验教学	15	0.09	2020
6	核心素养	18	0.09	2020
7	策略	5	0.08	2021
8	选科	13	0.08	2018
9	教学改革	5	0.07	2019
10	新课标	7	0.07	2018

表1 高频关键词及其中心性排序表

通过对排序前10的高频关键词及其中心性排序表(表1)的分析，可以提炼出该领域的四大核心研究集群。

集群一主要研究新高考政策框架下的教学适应与挑战。这是初期最核心的集群，包含“新高考”、“走班制”、“选科”、“策略”、“等级赋分”等高中心性关键词。该集群研究直接回应改革带来的制度性变化，聚焦于分析选科动机、探索走班教学管理模式、揭示“物理遇冷”的成因(如功利性选科、赋分制下的博弈)及应对策略(如科目保障机制)^[5]。

集群二主要研究核心素养导向的物理教学理念转型。以“核心素养”、“科学思维”、“教学改革”为代表。随着课标理念的深化，研究从应对制度挑战转向内涵建设，探讨如何在物理教学中落实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推动教学从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转型^[9]。

集群三主要研究课堂教学策略与模式的优化探索。包括“教学策略”、“高效课堂”、“分层教学”、“实验教学”等。该集群关注微观课堂实践，针对学生基础差异扩大、课时紧张等问题，研究如何构建高效课堂、实施分层分类教学、创新实验教

学方式，以提升教学实效^[10]。

集群四主要研究跨学科与综合评价的初步探索。关键词如“学科组合分类教学”、“项目式学习”和“综合素质评价”等开始出现。这反映了新高考“两依据一参考”中“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政策要求，以及应对复杂现实问题对综合能力的需要^[11]。目前已有相关研究开始尝试采用学科组合分类教学模式，将物理与地理等其他学科融合，并探索项目式学习等综合育人方式^[12]。

关键词聚类图谱（图 4）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热点领域的划分。模块值(Q 值)为 0.6617(>0.3)，平均轮廓值(S 值)为 0.9277(>0.7)，表明聚类结构显著且信度高。主要的聚类标签如#0 高中物理、#1 实践探究、#2 选课、#3 新课标等，清晰勾勒出该领域的研究疆域。各模块既相对独立聚焦不同研究主题，又通过关键词连接体现出领域内的交叉关联，完整呈现了当前高中物理领域的研究布局。



图 4 关键词聚类图谱

(四) 关键词突现分析——研究前沿的动态演进

关键词突现图谱（图 5）生动展示了研究热点的时序性演变，10 个突现词按其开始年份排列，清晰地呈现了其阶段性的演进过程，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Top 10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Keywords	Year	Strength	Begin	End	2016 - 2025
对策	2016	1.51	2016	2021	
普通高中	2017	1.43	2017	2020	
走班制	2017	1.26	2017	2018	
选科	2018	3.18	2018	2022	
高中生	2018	1.94	2018	2022	
科目选择	2018	1.53	2018	2019	
大学物理	2018	1.28	2018	2020	
教学改革	2019	1.31	2019	2020	
策略	2021	2.23	2021	2022	
高效教学	2022	2.07	2022	2023	

图 5 关键词突现图谱

阶段一（2016-2018 年）为应对与适应期，突现词“对策”、“走班制”、“普通高中”反映了改革初期，研究聚焦于解决最迫切的现实管理问题和教学组织形式的变革^[13]。

阶段二（2018-2021 年）为聚焦与深化期，“选科”以最高的突现强度（3.18）成为此阶段绝对核心，研究深入学生选科行为与影响因素，随后“教学改革”“策略”突现，重心转向“怎么教”。

阶段三（2021-2025 年）为提质与融合期，“高效教学”成为最新突现词，体现研究追求教学效果最优化，并与跨学科融合趋势相呼应。

(五) 时间线视图分析——研究主题的延续与演变

时间线图（图 6）将各聚类的研究主题沿时间轴展开，直观展示了不同研究领域的持续时间与发展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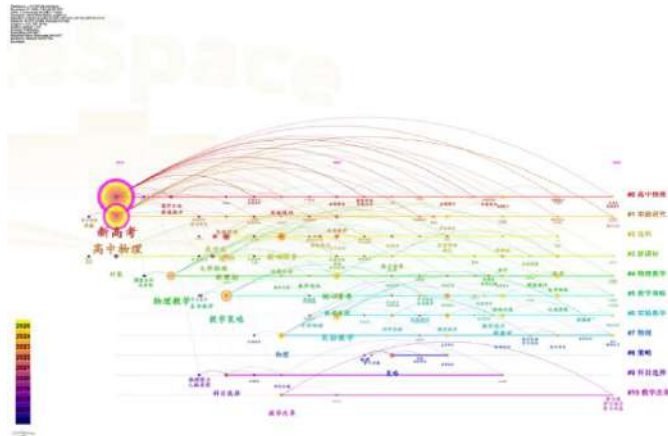


图 6 时间线图

如时间线图（图 6）所示，“新高考”“走班制”等早期主题随时间热度下降但影响持续；“核心素养”“教学策略”等从中期开始持续活跃；“学科融合”等新兴主题后期节点密集，成为新的增长点。整体呈现从制度适应到方法改进，再到跨学科融合的演进路径。

三、概括性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 2016-2025 年间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物理教学研究的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结论可总结成以下四点：

(一) 研究规模呈政策驱动型增长

研究历经初步探索、快速增长的爆发期后，目前已进入稳定深化阶段。基于 2016-2025 年 CNKI 的 342 篇相关文献分析（图 1），研究规模随新高考推进分三个阶段演进，分别为 2016-2018

年初步探索期（浙江、上海试点），发文量低且缓增，聚焦问题识别；2019-2021年快速增长期（多省扩围和2017年版课标落地），发文量达到顶峰，转向成因与对策；最后是2022-2025年深化调整期，发文量稳定，聚焦教学提质与素养落地。

（二）研究热点实现了应对性演进

研究从应对“走班制”、“选科”等制度性挑战，逐步深化至“核心素养”引领下的“教学策略”优化，并正向“跨学科”融合等前沿领域拓展。初期聚焦“新高考”“走班制”“选科”等制度应对，中期转向“核心素养”“科学思维”等内涵建设，后期形成“教学策略”“实验教学”“跨学科”等较大集群。研究热点从单一的研究应对政策与应试教育转向如何实现更多元化融合的高质量物理教学。

（三）研究力量分布不均，合作网络较为松散

研究者分布呈现以先试先行地区为核心的集中性特征，并且合作网络连线较为稀疏。如作者合作网络图（图2）所示，198位研究者仅31条合作连线，网络松散，无全国性核心作者群。高产作者集中于浙江、上海等试点或教育发达地区，非试点地区研究滞后，主要因研究者以一线教师为主，跨区域合作难度大。

（四）研究前沿转向实践探索

研究前沿正聚焦于“高校课堂”的实现路径和“高效教学”实践的探索。如关键词突现图（图5）与时间线视图（图6）所示，当下研究前沿为“策略”（于2021年后突现，强度2.23，应对学生差异与课时紧张）和“高效教学”（呼应2022年版课标，强度2.09，鼓励推动探索多领域融合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二者均贴合新高考提升质量与创新育人的目标。

四、研究与未来展望

（一）政策迭代驱动研究演进，需强化前瞻响应

新高考视域下物理教学研究年度发文量分布图（图1）清晰地反映出新高考物理教学研究具有很强的“政策响应”特征。年度发文量的三个波段与改革推进的“试点-扩围-深化”三阶段契合度较高。如关键词共线图（图3）与关键词凸显图谱（图5）所示，关键词的突现与演进，也是政策焦点在学术研究上的直接投射。《实施意见》发布初期，“走班制”“选科”等词汇的高频出现，直接对应新高考科目选择权下放的政策导向，相关研究聚焦选课走班的实施困境与优化路径，李军靠团队剖析了普通高中选课走班面临的资源配置、

班级管理等难题，并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14]；发布中后期，“核心素养”“课程标准”等关键词的持续升温，源于《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颁布实施，廖伯琴、马亚鹏等学者围绕课标要点的解读，推动了素养导向的教学转型研究^{[6][7]}。这些都充分说明，教育政策的变化为教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命题和强大的动力。

未来，研究需强化前瞻性，提前预判政策调整方向，开展前置性研究，并建立政策“实施-反馈-优化”的闭环机制，为政策完善提供实证支撑。

（二）研究重心战略转移，深化素养教学转化

早期研究集中于破解“物理遇冷”这一危机，旨在保障国家理工科人才培养的生源基础。冯成火从实践调查出发，深入剖析了学生选科的功利主义倾向、高校选考科目设置过于宽松、等级赋分制度的“逆向淘汰”效应等复杂成因^[2]；潘昆峰团队则通过大样本数据证实了新高考下“理科萎缩”的普遍性，为政策调整提供了实证依据^[3]；黄凌梅等从制度视角指出，等级赋分制度的“逆向淘汰”效应与高校选考要求的模糊性，是导致物理遇冷的关键因素^[15]。针对这些问题，教育部门相继出台“科目保障机制”（如浙江设定的物理6.5万人保障基数）和《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等补救措施。随着制度调整的生效，物理选考人数下滑趋势得到遏制，学术研究重心也随之实现战略转移，从“保住物理”的生存之战，转向“如何教好物理”的质量之战。这一转变在研究主题中体现尤为明显，2020年后，“核心素养”“高效课堂”“实验教学”等关键词取代“选科遇冷”成为研究焦点，这一时期的研究以探索高校物理教学方法为主流。罗玉芹以“木板+滑块”模型为例，探索了二轮复习中核心素养的培养路径^[16]，甘秉洪聚焦实验教学这一物理学科核心载体，提出构建高效课堂的实践策略^[9]。这种重心转移，标志着研究已经从关注制度补救转向聚焦育人本质，契合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任务。

未来需进一步细化核心素养在具体教学内容中的落地路径，构建可观测评价指标，推动素养目标真正融入课堂。

（三）合作网络存在局限，构建协同研究共同体

如作者共现图谱（图2）所示，新高考视域下我国的物理教学研究合作网络较为松散。新高考视域下的物理教学研究以一线教师和基层教研员为主体，而他们的研究往往基于个人教学实践和区域经验，如赵惠松团队聚焦浙江省试题分

析^[17],张健等学者则以北京市试题为研究对象^[9],区域间研究成果的共享与互证机制尚未形成。另一方面,合作网络的松散性也揭示了该领域学术交流机制的不完善和研究资源整合与区域间成果共享的不足,这些缺陷既限制了经验传播,也可能导致重复研究,印证了刘海峰等提出的协同机制缺失问题^[1]。

未来应推动高校与中学、跨区域教研机构的紧密合作,通过跨区域项目、共享平台整合资源,促进成果转化普及,缩小地域差距。

(四) 教学研究精细化发展,技术与跨学科赋能提质

随着研究重心转向“素养育人”,物理教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策略化”“精细化”发展趋势。这一转变的核心成因是新高考背景下教学场景的现实挑战,相关研究正是围绕这一挑战展开对解决方案的探索。针对选科制度导致同一物理课堂内学生基础差异显著,而课时总量的限制又对教学效率提出更高要求的问题,王善锋将其概括为“异质生源与有限课时的双重矛盾”并开展对策研究^[18]。

参考文献:

[1]刘海峰,唐本文,韦骅峰.十年新高考改革的试点推进与成效评价[J].中国教育学刊,2023(12):28-35.

[2]冯成火.新高考物理“遇冷”现象探究——基于浙江省高考改革试点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18,(10):25-30.

[3]潘昆峰,刘佳辰,何章立.新高考改革下高中生选考的“理科萎缩”现象探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7,(08):31-36.

[4]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科学学研究,2015,33(02):242-253.

[5]王润.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高中实施走班制的问题审视与路径超越[J].中国教育学刊,2016,(12):29-35.

[6]廖伯琴.以学生发展为本改进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解读[J].人民教育,2018,(10):43-46.

[7]马亚鹏,赵坚,杨威虎.弄懂新课程标准做实物理课教学——《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特点分析与实施原则[J].物理教学,2018,40(05):2-5.

[15]黄凌梅,钟秉林.新高考选科“遇冷”的制度主义分析——以物理学科为例[J].教育学报,2021,17(01):100-109.

[16]罗玉芹.激励学生命题,促成物理自觉,升华核心素养——以“木板+滑块”模型为例谈新高考理念下的二轮专题复习[J].物理教师,2021,42(11):86-89.

这反映了实践界在面对因不同选科组合而导致物理基础差异巨大的异质性增强的学生群体和教学课时有限的情境时,对可操作方案的热切需求。同时,试题研究的精细化程度与评价体系的完善也显著提高,张健等运用 SOLO 分类理论构建科学思维考查框架,为教学评价提供精准工具^[9];史载天等基于“四层”“四翼”评价体系,对 8 省市高考物理试题进行情境化评析^[19]。可见当前研究已然从宏大的理念倡导,下沉到具体的精细化的教学模式、教学评价、习题设计、实验创新等微观层面。

未来需深化数字化与教学融合,探索人工智能、虚拟仿真等技术应用;拓展跨学科研究广度,推动物理与人文、社科等领域融合,开发真实情境下的跨学科课程与项目式学习案例。

新高考改革为高中物理教学研究带来机遇与挑战,未来研究需紧跟教育战略,直面实践问题,通过深化素养教学、技术赋能、跨学科融合与协同创新,持续提升物理教育质量,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8]崔世峰,王娟.选科遇冷——高中化学教学如何适应“3+1+2”新高考[J].中学化学,2021,(06):4-6.

[9]张健,李春密.基于 SOLO 分类理论的科学思维考查层级框架初建与启示——以北京市新高考(2020—2023 年)物理试题为例[J].物理教学,2024,46(09):44-49.

[10]甘秉洪.新高考背景下构建高中物理实验教学高效课堂的实践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22,(S1):152-154.

[11]李宗灿.综合素质评价导向下的高中物理教学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9.

[12]孙通,苏峰.新高考制度下高中自然地理与物理学科融合教学探索[J].中学地理教学参考,2022,(24):39-42+53.

[13]郭丛斌,武玮,任静.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高中科学教育能否影响学生高考科目选择——基于 STEM 管道理论的实证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5,43(03):95-109.

[14]李军靠,丁一鑫,赵丹.新高考下普通高中选课走班教学的困境与跨越[J].中国教育学刊,2018,(01):26-30.

[17]赵惠松,严云佳.浙江省新高考物理试题分析及教学建议[J].物理教师,2017,38(03):74-78.

[18]王善锋.新高考模式下构建高中物理高效课堂的思路探索[J].中国教育学刊,2023,(S1):168-170.

[19]史载天,李贵安,樊琼,等.基于“四层”“四翼”的新高考物理试题情境化评析——以 2022 年“3+1+2”新高考 8 省市为例[J].物理教师,2023,44(07):78-82+8

国际传播能力导向的高职商务英语跨文化教学转型研究

乐冰洁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舟山 316021)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对商务英语人才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当前高职商务英语跨文化教学存在“重文化输入、轻文化输出”的结构性偏差,侧重培养学生理解和适应他国文化的能力,而忽视了培养学生向外方有效传播中国商业理念的能力。本文引入“国际传播能力”这一分析视角,在辨析其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应具备的国际传播能力构成要素,包括受众意识、叙事能力、话语转换能力和信任构建能力。针对当前教学在目标定位、内容设置、方法运用和评价体系方面的不足,本文从“文化适应者”向“文化传播者”的角色转变出发,提出包括微视频制作、双语对照分析、案例改写练习、反馈复盘机制在内的教学改革路径,并通过具体教学设计示例展示其实施要点,以期高职商务英语跨文化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 国际传播能力; 跨文化交际; 商务英语; 高职教育; “一带一路”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08

Intercultural Teaching Reform in Vocational Business English: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Perspective

Bingjie Le

Zhejiang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llege, Zhoushan, China

Abstract: The advanc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imposed new competence requirements on Business English professionals. Current intercultural teaching in vocational Business English programs is characterized by a structural imbalance that overemphasizes cultural reception at the expense of cultural projection—prioritizing students' ability to understand and adapt to foreign cultures while neglecting their capacity to effectively convey Chinese business concepts to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uilding on an examination of its relationship with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t identifies four constituent elements essential for Business English students: audience awareness, narrative competence, discourse reframing ability, and trust-building capacity. In response to existing deficiencies in pedagogical objectives, content design,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and assessment systems, this paper advocates a fundamental role shift from "cultural adapter" to "cultural communicator." It proposes a reform pathway comprising short video production, bilingual contrastive analysis, case rewriting exercises, and iterative feedback and review mechanisms. Concrete instructional design examples are provided to illustrate key implementation considerations, with a view to informing intercultural teaching reform in vocational Business English program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usiness English; higher vocational

一、问题的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持续深化。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22.07万亿元，同比增长6.4%，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伴随经贸往来的拓展，大量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市场，商务人才的跨文化沟通能力日益成为制约合作成效的关键因素。然而，实践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企业和中国方案常常面临“文化折扣”的困境，合作伙伴对中方商业理念理解不透、对合作模式存有疑虑、对中方诚意缺乏信任。这种理解鸿沟并非源于语言障碍，而是源于传播能力的欠缺。正如文秋芳所指出的，外语课程思政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1]。在“一带一路”语境下，这种积极作用不仅体现为“听懂对方”，更体现为“让对方听懂我们”。

反观当前高职院校英语专业的跨文化教学，其核心目标长期聚焦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理解西方商务礼仪、熟悉国际商务惯例、掌握不同文化的沟通风格。张红玲曾系统论述跨文化外语教学的目标与方法，强调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外语人才^[2]。如果将视野放到“一带一路”的实践场域中，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结构性偏差，教学过程“重入轻出”，重视培养学生“接收”和“适应”外国文化的能力，却忽视了培养学生“输出”和“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这种偏差在“一带一路”语境下尤为突出。中国企业在很多“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中更多地承担项目发起和方案提供的角色。张敬源、王娜在探讨外语课程思政建设时指出，外语教育应注重培养学生的价值塑造能力，使其能够在国际交流中传递中国声音^[3]。这意味着商务人才不仅需要理解对方，更需要向对方解释中国的商业理念、合作模式和发展愿景，他们不仅是跨文化沟通者，更应成为中国商业文化的传播者。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尝试引入“国际传播能力”视角审视高职商务英语跨文化教学，探讨如何培养学生在“一带一路”商务情境中有效传递中国声音的能力。这既是对当前教学薄弱环节的补强，也是对国家“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部署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具体响应。

二、国际传播能力的内涵界定

将“国际传播能力”概念引入商务英语教学领

域，首先需要厘清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并明确其在商务情境中的具体构成。

（一）国际传播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辨析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外语教学中的核心概念。Byram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被广泛引用，强调知识、态度、技能和批判性文化意识等维度，其核心关切是如何让个体在跨文化互动中表现得“恰当和有效”^[4]。胡文仲系统阐述了跨文化交际学的基本框架，指出跨文化交际的关键在于理解文化差异并据此调整沟通策略^[5]。这些经典理论的共同特点是适应对方文化、避免冲突和误解。

国际传播能力则有不同的理论渊源和侧重点。这一概念源于新闻传播学领域，指的是在跨国、跨文化语境中有效传递信息、塑造形象、影响认知的能力。其核心关切不仅是“适应”，更是“影响”。如何让信息穿越文化边界，被目标受众理解、接受乃至认同。这种能力涉及国家话语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的综合运用，是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关键^[6]。

在商务情境中，这两种能力并非对立，而是互补。跨文化交际能力帮助商务人员“读懂”合作伙伴，国际传播能力则帮助他们“让合作伙伴读懂自己”。前者是“入”的能力，后者是“出”的能力；前者强调倾听与适应，后者强调表达与影响。完整的跨文化商务能力应当兼具两者，形成双向互动的能力结构。

（二）商务情境下国际传播能力的构成要素

国际传播能力的构成要素可以从传播学与跨文化交际学的交叉视域中加以推导。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这一论述明确了“受众意识”作为国际传播的认知基础。在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这一论述为“叙事能力”提供了明确的方法指引。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正是“话语转换能力”的核心内涵。关于“信任构建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强调要“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根基”，这一论述明确了“民心相通”在国际合作中的基础性地位，也为商务沟通中

的信任构建提供了理论指引。

结合商务沟通的实际需求和高职学生的培养定位, 本文将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应具备的国际传播能力分解为四个核心要素:

第一, 受众意识。这是国际传播能力的认知基础。商务人员需要清醒地意识到, 沟通对象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认知框架和利益关切。同样一件事情, 中国人关心什么、外国合作伙伴关心什么, 往往存在显著差异。胡杰辉在探讨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时强调, 教学应引导学生从受众视角思考问题, 培养其换位思考的意识和能力^[7]。具备受众意识, 意味着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审视信息, 预判对方可能的疑虑和关切, 并据此调整表达策略。

第二, 叙事能力。在跨文化传播中, “讲故事”往往比“讲道理”更有效。抽象的理念和数据难以穿透文化隔阂, 而具体的故事和案例则更容易引发共鸣。杨华以大学生“外语讲述中国”活动为例, 论证了叙事能力在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价值^[8]。商务人员需要学会将企业理念、产品优势、合作愿景等抽象内容转化为生动的叙事, 用对方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讲出来。

第三, 话语转换能力。我国的日常商务沟通偏好正式表述。这种话语风格在国内语境中自然贴切, 但跨文化传播时可能造成理解障碍。话语转换能力是指将“中式表达”转化为目标受众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 减少程式化表达、增强具体性和说服力。这与张敬源、王娜所提出的“活用教材、深化育人功能”的理念相呼应^[3]。

第四, 信任构建能力。国际商务合作的基础是信任。信任的建立不仅依赖于商业利益的契合, 也依赖于有效的沟通。商务人员需要通过恰当的信息披露、真诚的态度表达和持续的互动跟进, 逐步建立对方对中方的信任感。这种能力尤其体现在应对质疑、解释误解、处理分歧等沟通场景中。

三、当前高职商务英语跨文化教学的不足

从国际传播能力的视角审视当前高职院校商务英语跨文化教学, 可以发现若干结构性的不足。这些问题并非高职院校独有。我国英语教育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早已引起学界关注。从丛在《光明日报》首次指出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9]。张为民、朱红梅对非英语专业本科生测试发现, 大多数受试者不能用英语恰当表述中国文化^[10]。肖龙福等学者的调查表明, 高校英语

教师和学生的中国文化知识及其英文表达都存在程度不一的“失语”现象^[11]。宋伊雯、肖龙福的调查显示, 现阶段本科院校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知识的掌握较好, 但欠缺用英语表达的能力^[12]。近年来, 针对高职院校学生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多。李清、张诗甯对高职高专学生的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进行了探析^[13]; 杨少双则针对高职公共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提出了应对策略^[14]。这些研究表明, 无论是英语专业还是非英语专业学生, 无论是本科院校还是高职院校, 都普遍存在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欠缺, 而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情况可能更为突出。

(一) 教学目标的单向性

当前跨文化教学的目标设定呈现明显的单向特征, 即培养学生适应、融入外国文化的能力。课程内容大量介绍西方国家的商务礼仪、沟通风格、谈判策略, 教学活动侧重于模拟学生作为“客方”与外方打交道的情境。这种设定有其历史背景: 在对外开放初期, 中国企业更多是国际规则的学习者和跟随者, “入乡随俗”的能力确实至关重要。但新时代外语课程思政建设需要培养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15]。在“一带一路”语境下, 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扮演项目发起者、方案提供者的角色, 教学目标需要相应地从“单向适应”转向“双向交流”。

(二) 教学内容的缺位

仔细审视现有的商务英语教材和课程内容, 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空白: 关于如何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商业文化的内容不多。学生学习了大量关于他国商业文化的知识, 却很少系统学习如何用英语介绍中国企业、中国产品、中国商业理念。徐锦芬在探讨高校英语课程思政素材建设时提出, 教师应通过“分析—筛选—增补”的策略挖掘和补充思政内容^[16]。然而在高职商务英语教学中, 更为缺乏的是“话语转换”的系统训练, 当学生需要把“合作共赢”“互利互惠”这样的中国表达解释给外国人听时, 往往不知从何说起。教学内容的这种缺位, 直接导致学生在实际工作中面临“有话说不出”的困境。

(三) 教学方法的局限

跨文化教学常用的方法包括案例分析、角色扮演、情境模拟等, 这些方法本身没有问题, 但在具体实施中往往侧重于“理解”而非“表达”。例如, 案例分析主要让学生分析外国企业的做法, 很少

让学生思考“如果是中国企业，应该怎么说”；角色扮演中学生更多扮演的是“接待外宾”的角色，但缺乏有效“向外宾推介中国”的角色。蔡基刚在探讨课程思政与立德树人的内涵时指出，外语教育应培养学生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这需要教学方法的相应调整^[17]。教学方法的当前倾向，强化了“接收者”而非“传播者”的角色定位。

(四) 评价体系的偏颇

现有的考核评价主要关注两个方面：语言的准确性和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学生是否能正确使用商务英语表达、是否记住了各国商务礼仪的要点，是评价的重点。但传播效果如何，信息是

否清晰、是否有说服力、是否能被目标受众理解，则很少被纳入评价范围。向明友基于《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指南》探讨了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强调评价应关注学生的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18]。这种评价导向容易让学生追求“说得对”而忽视“说得好”，追求语言形式的正确而忽视沟通目标的达成。

四、国际传播能力导向的教学改革路径

针对上述不足，本文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四个维度提出改革建议（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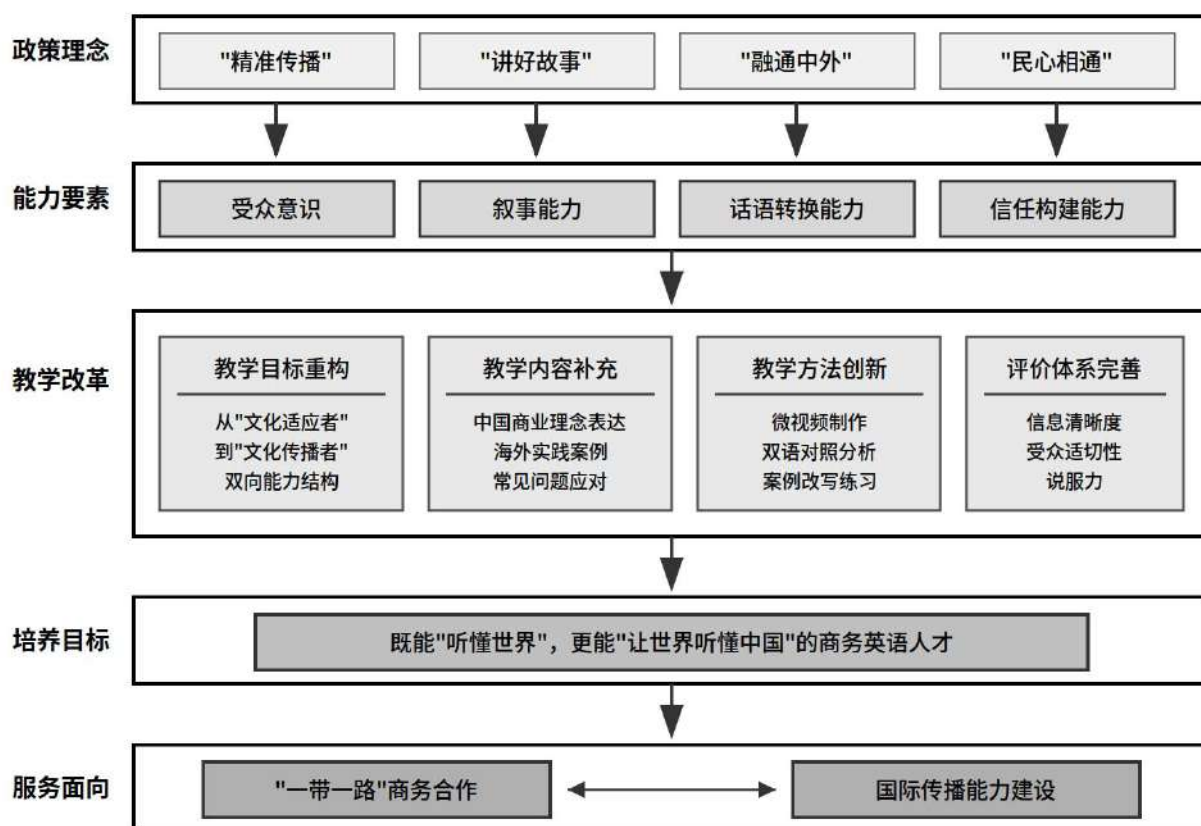


图1：国际传播能力导向的高职商务英语跨文化教学改革框架

(一) 教学目标的重构：从“文化适应者”到“文化传播者”

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调整培养目标定位。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学生不仅应成为能够适应跨文化环境的沟通者，更应成为能够有效传播中国商业文化的使者。这意味着在原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目标的基础上，增加国际传播能力的培养目标，形成“双向”的能力结构。具体而言，可将培养目

标细化为：能够用英语清晰介绍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和中国商业理念；能够根据目标受众的特点调整表达策略；能够将中国式表达转化为国际化表达；能够在商务沟通中有效建立对方对中方的信任。这些目标应与传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目标并重，贯穿课程设计、教学实施和考核评价的全过程。

(二) 教学内容的补充：增设“中国故事”对外表

达模块

在教学内容上,建议增设专门针对“中国故事”对外表达的教学模块。该模块可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中国商业理念的英文表达。选取“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核心理念,如“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互联互通”等,教授其英文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探讨如何用具体事例和通俗语言向外国受众解释这些理念的内涵。二是中国企业海外实践案例。收集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成功合作案例,分析其商务沟通的亮点和经验,供学生学习借鉴。三是常见问题与应对策略。整理外国合作伙伴对中国企业常见的疑虑和问题,教授应对策略和话术,帮助学生在实际工作中从容应对。

(三) 教学方法的创新:强化“传播者”角色训练

教学方法的改革应着力强化学生作为“传播者”的角色意识和实操能力。结合高职学生的学情特点和职业能力培养需求,以下四种教学活动值得推广:

第一,微视频制作。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制作2—3分钟的英文短视频,向外国受众介绍一个中国企业或中国产品。制作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思考:目标受众是谁?他们关心什么?用什么方式呈现最有吸引力?这一活动不仅锻炼语言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受众意识和叙事能力。视频成果可在班级展示交流。

第二,双语对照分析。选取同一事件(如某中国企业的海外项目)的中文报道和英文报道,组织学生对比分析:中方媒体怎么讲的?外方媒体怎么讲的?信息重点有何不同?表达方式有何差异?通过对比,学生能够直观感受到中外话语方式的差异,理解“话语转换”的必要性和方向。

第三,案例改写练习。提供一段典型的中国企业官方新闻稿或宣传材料,让学生将其改写成面向外国客户的英文介绍。改写的要求是保留核心信息,但用更具体、更生动、更符合国际商务惯例的方式表达。改写前后的对比分析,能够帮助学生体会话语转换的要领。

第四,反馈与复盘。学生作品完成后,邀请外教、留学生或有海外工作经验的企业人士提供反馈,从“外方视角”评价学生的表达是否清晰、是否有说服力、是否会引起误解。学生根据反馈修改作品,并撰写反思日志,总结经验教训。这种“做—反馈—改—再反思”的循环,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传播意识和能力。

(四) 评价体系的完善:引入“传播效果”维度

评价体系的改革应在语言准确性、文化知识等传统维度之外,增加“传播效果”维度。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价:信息清晰度:表达的核心信息是否明确?受众能否快速抓住重点?是否存在歧义或令人困惑的表述?受众适切性:表达方式是否考虑了目标受众的特点?是否使用了受众能够理解的词汇和概念?是否回应了受众可能的关切?说服力:表达是否有理有据?是否使用了恰当的事例和数据支撑?是否能够增强对方对中方的信任?

在评价方式上,除教师评价外,可引入同伴互评和外部反馈机制。同伴互评可以帮助学生从受众角度审视同学的作品;外部反馈则通过邀请外教、留学生或企业人士参与评价,提供更真实的“外方视角”,使评价更贴近实际传播情境。

五、教学设计示例

为使上述改革思路更具操作性,本节以一个具体的教学主题(90分钟)为例,展示国际传播能力导向的教学设计。

(一) 教学主题与目标

主题:向东南亚客户介绍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

知识目标:掌握新能源汽车行业常用英语术语;了解东南亚市场的特点和需求。

能力目标:能够用英语清晰介绍一家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核心优势;能够根据东南亚市场的特点调整表达策略;能够将中式企业宣传语言转化为国际化表达。

素质目标: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传播意识;培养学生讲好中国企业故事的责任感。

(二) 教学过程

课前准备阶段(线上自学):教师通过学习平台发布某中国新能源车企的中文官网资料和新闻报道,学生自主阅读,初步了解企业情况。同时,教师提供东南亚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背景资料,帮助学生了解目标受众的需求特点。

课堂活动一:双语对照分析(约25分钟)。教师展示该企业在国内媒体和国际媒体上的不同报道,引导学生分组讨论并对比分析信息重点和表达方式的差异。通过讨论,学生意识到:国内报道强调“技术创新”,国际报道则侧重“技术参数”“售后服务”。教师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这对我们向外方介绍企业有什么

启示?

课堂活动二: 案例改写练习(约 25 分钟)。教师提供该企业中文官网的“关于我们”页面内容, 学生分组将其改写为面向东南亚经销商的英文介绍。改写要求: 突出东南亚客户关心的卖点, 增加具体的数据和案例。各组完成后进行展示, 教师和学生从“受众视角”给予反馈。

课堂活动三: 小组展示与反馈(约 40 分钟)。各组派代表用英语展示改写成果, 模拟向东南亚经销商介绍企业。其他组从“东南亚客户”视角进行评价, 指出哪些表达清晰有效、哪些仍存在理解障碍。教师进行点评和总结, 提炼改写要领。

课后任务: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制作一段 2 分钟的英文视频, 模拟向东南亚经销商介绍该企业。视频完成后上传班级平台, 邀请外教或留学生观看并提供反馈。学生根据反馈撰写反思日志, 总结学习收获和改进方向。

(三) 评价方式

本单元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过程性评价占 60%, 包括: 课堂讨论参与度(10%)、改写练习质量(20%)、视频作品质量(20%)、反思日志深度(10%)。终结性评价占 40%, 采用“情境口试”形式, 学生随机抽取一个东南亚国家, 模拟向该国客户介绍企业, 教师从信息清晰度、受众适切性和说服力三个维度进行评分。

六、实施保障与建议

国际传播能力导向的教学改革需要相应的保障条件和配套措施。第一, 教师能力提升。教师自身需要具备一定的国际传播素养, 了解中外话语方式的差异, 熟悉“一带一路”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商务环境。高职院校可通过教师培训、企业实践、国际交流等途径, 提升教师的相关能力。第二, 教学资源开发。目前市面上适合高职学生使用的“中国故事”对外表达教学资源相对匮乏。教师团队可收集整理中国企业海外合作的真实案例, 开发适合高职学生水平的教学素材和活动设计。第三, 校企合作深化。邀请有海外业务经验的企业人士参与教学, 既可以为學生提供真实的“外方视角”反馈, 也可以帮助教学内容更贴近岗位实际需求。高职院校可与外贸企业、跨境电商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为教学改革提供实践支撑。第四, 优化课程设计。在教学内容上注重平衡“表达”与“倾听”, 既训练学生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 也培养其理解外方关切、回应质疑的能力, 形成完整的沟

通闭环。国际传播能力的核心是有效沟通, 而非单向灌输。教学应引导学生理解受众、尊重差异、追求真诚沟通。

七、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 为高职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课题。传统的跨文化教学以“适应他国文化”为目标, 这一目标在今天依然重要。当中国企业从规则的跟随者转变为倡议的发起者, 当商务人才从“客方”转变为“主方”, 培养他们有效传播中国声音的能力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本文引入“国际传播能力”视角, 尝试为高职商务英语跨文化教学改革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这一视角的核心在于转变学生的角色定位, 从文化的“接收者”和“适应者”, 转向文化的“传播者”和“诠释者”; 从被动地学习“他们怎么做”, 转向主动地思考“我们怎么说”。围绕这一转变, 本文从教学目标、内容、方法和评价四个维度提出了具体建议, 并通过教学设计示例展示其操作路径。

当然, 本文的探讨仍停留在探索层面, 具体实施效果有待教学实践的检验。此外, 国际传播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 涉及教师素养提升、教学资源开发、校企合作深化等多个层面, 单靠课堂教学的调整难以完全实现。这些问题有待后续研究继续深入探讨。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时代赋予的使命。高职商务英语专业作为培养一线商务人才的重要阵地, 应在这一使命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期待更多高职院校在实践中探索创新, 培养出既能“听懂世界”、更能“让世界听懂中国”的商务英语人才。

参考文献:

- [1] 文秋芳. 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和实施框架[J]. 中国外语, 2021, 18(02): 47-52.
- [2] 张红玲. 跨文化外语教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3] 张敬源, 王娜. 外语“课程思政”建设——内涵、原则与路径探析[J]. 中国外语, 2020, 17(05): 15-20+29.
- [4] Byram M. 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7.
- [5] 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 [6] 文秋芳. 国际传播能力、国家话语能力和

国家语言能力——兼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双轮驱动”策略[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7(03): 17-23.

[7] 胡杰辉. 外语课程思政视角下的教学设计研究[J]. 中国外语, 2021, 18(02): 53-59.

[8] 杨华. 大学生外语数字化叙事能力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课程思政的新探索[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21, 4(04): 10-17+91.

[9] 从丛. “中国文化失语”: 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 光明日报, 2000-10-19.

[10] 张为民, 朱红梅.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2(S1): 34-40.

[11] 肖龙福, 肖笛, 李岚, 等. 我国高校英语教育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状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0(01): 39-47.

[12] 宋伊雯, 肖龙福. 大学英语教学“中国文化失语”现状调查[J]. 中国外语, 2009, 6(06):

88-92.

[13] 李清, 张诗甯. 高职高专学生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探析[J].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2020(13): 100-101.

[14] 杨少双. 论高职公共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的应对策略[J]. 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01): 52-54.

[15] 肖琼, 黄国文. 关于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思考[J]. 中国外语, 2020, 17(05): 1+10-14.

[16] 徐锦芬. 高校英语课程教学素材的思政内容建设研究[J]. 外语界, 2021(02): 18-24.

[17] 蔡基刚. 课程思政与立德树人内涵探索——以大学英语课程为例[J]. 外语研究, 2021, 38(03): 52-57+11.

[18] 向明友. 基于《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指南》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J]. 外语界, 2022(03): 20-27.

“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数学分层作业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

秦丹¹ 范悦悦¹

(1.唐山师范学院教育学院,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 “双减”政策明确提出鼓励布置分层作业。研究以“双减”政策为研究背景, 以小学数学为研究对象, 利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梳理当前小学数学分层作业设计与实施中存在着内容单一、层级性不清晰等问题, 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小学数学教学需求, 提出优化分层作业设计与实施的相关策略。

关键词: “双减”政策; 小学数学; 分层作业

基金项目: 河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双减”政策背景下基础教育师资核心能力重构与提升路径研究(SD2022101); 2025年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地方师范院校教师教育课程群建设研究》(2025GJJG552)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09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Stratified Homework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QinDan¹, Fan Yueyue²

1.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Hebei 06300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 which explicitly encourages the assignment of stratified homework —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 Utilizing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he study analyzes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ratified mathematics assignments, specifically monotonous content and ambiguous stratificat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primary mathematics teaching,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to optimize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ratified homework.

Keywords: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Primary Mathematics; the Stratified Homework

一、研究背景

作业是课堂学习的延伸, 是课堂教学活动的必要补充, 是巩固和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有效手段。长期以来, 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着作业量大、作业形式单一、作业重复性高等现实问题, 加深了学生负担, 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差异。为解决这一问题, 切实提升作业的育人功能, 2021年4月,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义务

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 明确提出“坚决扭转一些学校作业数量过多、质量不高、功能差异化的突出问题”。2021年7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中明确指出要“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提高作业设计质量”“鼓励布置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 坚决杜绝机械、无效作业, 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本文立足“双

作者简介: 秦丹(1981—), 女,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教师专业发展;
范悦悦(2001—), 女, 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为小学数学教学;

减”政策落地和新课改推动的实践背景，以小学数学作业为研究主体，探讨小学数学课程分层作业的设计理念与实施路径。

二、“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数学分层作业的实践价值

“分层”指按照一定规律，对一组数据进行分组的过程。将分层的理念引入小学作业设计，即是教师根据学习者的学习水平、学习态度、思维方式等因素，将学生不同层级的划分，并设计适合不同层次学生发展需求的个性化、多元化作业。分层作业能够全面满足不同学习者需要，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分层作业设计理念方面，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 Epstein 教授（2020）主张依据学生发展阶段推荐适宜难度作业，以平衡思考激发与挑战维持，避免消极情绪。Ufuk Güven, Ahmet Oguz Akçay（2020）提到分层作业教会了学生责任感、规划、时间管理和独立工作等能力，这些技能在学生未来的生活和职业生涯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分层作业设计实践方面，X-Lu（2024）将作业分为基础层作业、提高层作业和拓展层作业，循序渐进帮助不同基础的学习者在巩固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补充更新练习，并最终指向思维锻炼和开拓视野。结合“双减”政策的要求，以及分层作业的内涵与相关研究可以看到，将分层作业应用小学数学教学实践的价值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理论研究层面看，教师根据学生数学学习的不同水平设计分层作业，让学生能找到适合自身努力可及近景目标，促使每个学生都能明晰自己的努力方向，提升学习动机。其次，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实施分层作业，使得教师要更精准设计与作业想匹配的多元评价维度，从基础层知识掌握，到提高层知识运用，再到拓展层创新思维考查，确保教学评价更为科学、更全面，以此发挥教学评价的激励导向作用。

第二，从实践研究层面看，分层作业能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基础层作业帮助他们巩固课堂所学知识；中等水平的学生，通过能力提升层作业挑战自我，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创新层作业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培养创新能力和探索。其次，优化教师教学方式。教师根据学生完成分层作业的情况，精准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学习难点。同时，分层作业促使教师不断提升作业设计能力，丰富教学资源，探

索更有效的教学途径，提高教学质量的效率。最后，合理分层的作业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能让学生在规定时间内高效完成，从繁重的作业中解脱出来，有更多时间休息和发展个人兴趣爱好。

三、“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数学分层作业的实施现状与问题剖析

（一）“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数学分层作业的实施现状

为了解目前我国小学数学分层作业的实施现状，本研究综合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法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研究。研究利用自编工具《小学数学分层作业设计与实施策略研究调查问卷》，面向河南省新蔡县的 230 名小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回收 221 份，剔除无效问卷 7 份，最终用于数据统计的问卷 214 份，问卷回收率 96%，有效率 96%。在被调查的 214 个学习者样本中，男生 107 人，占比 52.45%，女生 97 人，占比 47.55%。

1. 学生对分层作业不同类型的认可度。调查根据实际情况将分层作业分为基础巩固层、拓展提高层、实践操作层、趣味游戏层以及其他共 5 个层级。其中，基础巩固层作业帮助学生夯实课堂中的核心知识点；拓展提高层作业主要针对学有余力的学生，锻炼深度思考的能力；实践操作层作业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趣味游戏层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以及提高数学学习的参与度。

2. 学生对分层作业不同形式的认可度。在小学数学分层作业的设计中，教师经常使用计算题、应用题、动手实践题、小组合作任务以及数学游戏等形式，不同形式的题目对学生能力培养的指向性有所差别。其中，计算题帮助学生熟练掌握运算规则，提升运算速度；应用题培养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素养；动手实践能够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空间感知能力；小组合作可以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与团队协作意识，增强班级凝聚力；数学游戏降低数学学习的枯燥感，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巩固知识。根据统计可见，学生对数学分层作业中不同作业形式的喜好各不相同。其中，计算题占比 44.61% 居首，因其是数学基础，可巩固运算技能；应用题占 40.69%，能让学生将知识运用于生活；动手实践（如测量、制作）占 37.25%，助于直观理解抽象概念；小组合作占 39.22%，培养协作交流能力；数学游戏占 30.39%，以趣味激发兴趣；“其他”占 8.82%。出

现此现状，源于数学学习本身对基础计算等的需求，也得益于教学理念更新，既重视传统题型训练，也强调实践、合作及趣味教学，引导学生对多元作业类型产生兴趣。

为了进一步探析学生对数学分层作业中不同作业形式的喜好，对授课教师进行了访谈，教师提到：学生对那些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作业非常充满兴趣。例如，通过模拟小型超市来加强对人民币的理解，通过扮演小修理工的角色来感受三角形的稳定性。此外，学生对于操作性强、合作类的作业也非常感兴趣。访谈中所举模拟小型超市理解人民币、扮演小修理工感受三角形稳定性的例子，属于实践操作类作业，契合学生对与生活密切相关作业感兴趣的特点，在分层作业类型中，这类作业受学生欢迎，能增强知识理解与应用。且这些活动可采用小组合作形式开展，对应学生对合作类作业的兴趣，为小组合作提供载体。由此可见，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设计分层作业，应多融入生活情境，开展实践操作与合作类作业，优化分层作业类型现状。

3. 学生对分层作业时长的认可度。小学生注意力保持时间较短，是否能够让学生在完成一天在校学习后仍保持合理时间投入，是该阶段数学分层作业设计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之一。研究以20分钟以内、20-30分钟、30-40分钟以及40分钟以上四个时间段作为调研类别，了解学生在分层作业时间上的认可度。经统计，时间投入在20-30分钟的接受度最高（占比32.35%），其次为30-40分钟的接受度（占28.92%），在此为20分钟以内的接受度（占24.02%），40分钟以上分层作业的接受度最低（占比14.71%）。在访谈中进一步了解到，学生对分层作业时长的认可度取决于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差异性，掌握扎实、学习效率高的能快速完成，理解困难或习惯不佳的则耗时久；同时，作业难度与量也有影响，适中时多数学生20-40分钟可完成，偏难或量多则会延长学习时间。此外，学习习惯和方法不同，善于总结归纳、思路清晰的学生效率高，缺乏有效方法的学生易在作业上耗费更多时间。学生自身的学习能力和知识掌握程度是关键因素，不同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和运用能力不同，会影响作业完成时间。

4. 学生对分层作业影响因素的感知情况。分层作业本身的难度和题量对于学生也很重要，难度过高、题量过大，会使学生花费更多时间；反之则用时较短。在统计中可以看到，作业难度是

学生接受分层作业最大的影响因素，占比34.31%；其次为作业类型，占比为31.37%；认为作业题目数量会影响其接受分层作业的学生占比为25.49%。这一现状源于学生对作业适配性的需求，作业难度直接影响学生完成情况和学习效果，所以备受关注；多样化作业类型能提升学习兴趣，也受重视；题目数量关乎作业负担，学生也较为在意；而其他因素相对次要，所以占比较小。

在与教师针对同一问题的访谈中，有教师提到有时候“我也会针对某些内容进行特定的作业设计，通常会根据当日上课学生的学习状况，为教学中的难点、易错点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作业”，表明教师可依据学生当日学习状况，针对教学难点、易错点设计作业，既关注作业难度，又贴合学生实际，与分层作业考量因素相契合。还有教师提到“我一般会在每个单元结束后进行专门的作业设计，帮助学生查漏补缺。比如，针对那些实践性的课题，我们会进行相应的规划。当学生学完《年月日》之后，他们可以自主地创建自己的年度计划或者每月安排；同样，在完成《位置与方向》的学习任务以后，我们鼓励学生绘制出他们的卧室布局等。”由此可见，单元结束后的作业设计与分层作业设计考量因素紧密相连。既体现了对作业类型多样化的考量，能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又契合作业难度适中原则，让学生在巩固知识基础上进行拓展，有助于查漏补缺，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5. 教师在设计和实施分层作业中存在的困境。为了解教师作为分层作业设计和实施主体存在的困境，研究专门针对教师开展非结构化访谈。其中有85.71%的教师认为最大的困境在与难以评估学生的现实水平，有80.32%的教师将不愿意尝试分层作业归因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有57.14%的教师会认为缺乏有效的分层作业设计资源，有28.57%的教师认为家长对分层作业的支持力度不够。有教师在访谈中提到“我觉得实行分层作业对学生的学习是有益的，但其执行过程仍然存在挑战。首先，教师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制定这些作业；此外，增加了教师批阅作业的复杂度。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师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教师认为分层作业虽有益学生学习，但执行中教师面临时间精力消耗大、批阅作业复杂度增加的问题，这与分层作业困境中教师时间精力有限、难以准确评估学生水平紧密相关，凸显了分层作业推行的现实阻碍与教师需付出的巨大努力。

也有教师提到“对于老师和学生来说，分层作业是一个挑战。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包括学生的层次划分，教师对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的理解程度，还有学校的监督管理。学生的学习能力、知识基础参差不齐，要精准分层难度极大；教师在日常教学的同时兼顾分层作业设计，精力严重分散。学校若监管不到位，会让教师缺乏资源与指导”。可见分层作业对师生是挑战，需考量多种因素，学生分层次难对应评估难，教师兼顾教学与学生加剧精力困境，学校监管不足导致资源缺乏。因此，需要通过学校统筹规划、提供资源支持、规范评估体系，协助教师缓解压力，提升分层作业设计与实施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学校可定期组织培训，分享分层作业设计的优秀案例，还应建立动态评估机制，根据学生变化适时调整分层，保障分层作业切实发挥作用。

6. 师生对分层作业实施效果评价。在调查中，有 62.25% 的学生认为分层作业对于提升其数学成绩有帮助，认为“不太有帮助”与“完全没有帮助”的合计占 37.74%。这是因为分层作业能适配不同学生需求助力提升，但存在分层不精准、设计缺趣味、指导反馈不及时等问题，影响部分学生的提升效果。在与教师的访谈中，也有教师提到“一方面，平时教学任务就很重，还要备课、批改作业、处理班级事务，实在没有太多时间去精心设计分层作业。而且，要准确把握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把作业分出合理的层次，难度太大了，有时只能大概划分，不够精准。另一方面，有些家长也不能理解分层作业的意义，可能对于孩子所在的层次产生误解，没有得到家长的辅助和支持”。可以看出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学工作高强度，难以设计高质量数学分层作业来提升学生的学习水平；另一方面，家校沟通的不足也影响了作业的效果。

（二）“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数学分层作业存在问题原因剖析

1. 教师观念守旧，分层认知狭隘。部分教师受传统教育观念束缚，过于侧重成绩，把分数当作分层的主要依据，对分层作业旨在满足学生多元学习需求，促进全面发展的认识不足。这种片面认知导致了在设计分层作业时无法精准匹配学生实际情况。同时，也存在教师对分层作业设计重视不足的问题，将其视为常规任务，未深入钻研，使得作业设计环节漏洞百出，无法有效推动学生进步。

2. 教师能力短板，设计水平有限。一些教师缺乏系统的作业设计培训，在学情分析上能力欠缺，难以精准把握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在分层作业设计时，仅从难度和数量着手，维度单一，忽视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兴趣爱好。同时，他们整合教学资源的能力不足，难以开发出高质量、多样化的分层作业。此外，教师在作业评价方面方法单一，多以结果论，缺少过程性评价和针对性反馈，无法给学生有效指导，致使分层作业效果大打折扣。

3. 学生层次多样，差异动态变化。学生学习能力、基础知识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学习兴趣和态度也各不相同。有的学生基础知识薄弱，需要大量巩固练习；有的学有余力，渴望拓展提升。学生的学习状态是动态变化的，一段时间的努力或懈怠，都可能改变其学习层次。教师难以时刻关注到每个学生的变化，不能及时调整分层和作业内容，导致分层作业与学生实际需求脱节，影响作业效果。

4. 学生配合不足，自主意识淡薄。部分学生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规划，对分层作业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清，配合度不高。在完成作业时，态度不认真，遇到难题轻易放弃，无法充分发挥分层作业的作用。同时，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管理较差，不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作业层次，也不能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在缺乏教师和家长监督时，作业质量难以保证，使得分层作业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四、“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数学分层作业设计优化策略

1. 借助 AI 智能分析，精准分层提质。借助 AI 技术，整合学生课堂、作业、考试等多源数据，精准分析学生知识掌握和能力水平，以此为依据将学生分为基础巩固、能力提升、拓展创新三层。为基础层学生定制侧重基础知识巩固的作业，如针对数学运算薄弱点设计专项练习；能力提升层学生则获得难度适中、兼具综合性的作业，像数学知识的实际应用案例分析；拓展创新层学生得到探索性、开放性作业，例如数学创意项目。通过 AI 辅助，提升分层的科学性与作业适配性，减轻教师负担。

2.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合理分层促学。教师定期参与专业培训，学习前沿教学与作业设计理念。运用课堂观察、作业分析、问卷调查等方法，全面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分层时，综合考虑成绩、

学习态度、思维能力、兴趣爱好等因素。对于思维活跃但成绩不稳定的学生,提供难度适中且富有挑战性的作业;对学习态度认真但思维速度较慢的学生,先强化基础练习,再逐步提升难度。同时,依据学生阶段表现动态调整分层,确保精准有效。

3.关注学生心理状态,激励分层增效。教师关注分层后学生心理变化,主动与低层次学生沟通,分析知识漏洞,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帮助他们重拾信心。组织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如小组数学探究项目,促进不同层次学生交流互助。设立多元奖励机制,对提出新颖解题思路、积极参与小组合作或成绩进步的学生给予奖励,定期开展数学学习经验分享会,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在分层作业中的成就感。

4.创新作业评价体系,科学分层发展。构建融合过程性与终结性、定性与定量的多元评价体系。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作业态度、参与度和思维过程,如小组作业中评价学生的协作沟通、问题解决能力;终结性评价综合考试成绩、作业质量进行评定。评价结果以评语、等级、成长记录袋等形式呈现,帮助学生清晰了解自身优势与不足,明确努力方向。例如在“图形与几何”单元分层作业中,从多角度评价不同层次作业,全面考量学生表现。

5.加强家校沟通协作,携手分层共进。学校和教师通过家长会、家长群等方式,向家长宣传分层作业的理念、目的和意义,提高家长对分层作业的理解和支持。定期与家长沟通学生学习情况,让家长了解孩子在分层作业中的表现和进步,指导家长在家监督孩子完成作业,协助教师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调整作业难度和类型。同时,广泛收集家长的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分层作业的设计和 implementation,形成家校教育合力,共同促进学生成长。

五、结束语

相较于传统的书面作业和统一布置的数学作业,分层作业既满足了数学学科课程“课程内容活动化”“活动内容课程化”的新要求,又在促进学生差异化、个性化发展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新课程改革和“双减”政策的推动下,数学作业分层设计已初见成效。然而,鉴于升学压力较大、小学数学分层作业设计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教师在设计指导方面的不足,当前小学数学作业分层设计仍有待提升和完善。本研究通过师生问卷调查

分析目前小学数学作业分层设计的现状,归纳出当前主要存在的分层依据不足、设计环节欠缺、分层维度单一以及总结反思缺位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作业设计优化策略。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2021年)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2021年)
- [3] Epstein L J, Voorhis V L F. More Than Minutes: Teachers' Roles in Designing Homework [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020.
- [4] Ufuk G, Oğuz A A. Trends of Homework in Mathematics: Comparative Research Based on TIMSS Stud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truction, 2020.
- [5] X Lu -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2024.
- [6] 黄景怡. 小学数学分层作业设计研究——以“图形的周长计算”为例 [J]. 数学之友, 2024, (24): 69-71.
- [7] 邝儒军. 小学数学分层作业设计中差异化教学思想的应用 [J]. 数学之友, 2025, (04): 86-88.
- [8] 钱莉. “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单元作业设计策略分析——评《小学数学教学改革探讨》 [J]. 科技管理研究, 2023, 43(19): 263.
- [9] 牛玉娟. “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作业设计问题与优化策略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2, 42(35): 48-50.
- [10] 王兴, 刘玉洁, 夏友奎. “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作业设计模型建构与实施 [J]. 教学与管理, 2024, (27): 88-92.

非遗教育在小学课堂中实施现状及优化策略

张诗月¹ 刘丽¹ 徐亦婷¹ 蒋雲涛¹ 姚宇轩¹ 邵薪羽¹

(1.常州工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32)

摘要: 本研究以常州市 270 名学生和 70 名教师为调研对象, 通过问卷调查法了解非遗教育实施现状。研究发现, 常州虽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 但小学阶段的非遗教育仍面临课程结构松散、师资专业能力不足、教学内容与评价机制不健全等系统性问题。基于此, 本研究从课程体系建构、师资专业发展、教学策略创新及评价机制完善四个维度, 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实施路径, 旨在推动非遗教育从“活动化”走向“课程化”, 为区域性非遗融入基础教育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 非遗教育; 文化传承; 小学课堂; 教师专业发展

基金项目: 常州工学院“教育哲学专创融合”创新创业教育建设项目 (ZCKC202540); 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 (2024110550054Y)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10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 Classrooms

Shiyue Zhang¹, Li Liu¹, Yiting Xu¹, Yuntao Jiang¹, Yuxuan Yao¹, Xinyu Shao¹

¹ School of Education,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of Jiangsu, 213022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non-heritage education among 270 students and 70 teachers in Changzhou.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despite Changzhou's ric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ICH education at the primary level still faces systematic challenges, including a fragmented curriculum structure, insufficient teacher expertise, and incomplete teaching content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Accordingly, this study proposes actionable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across four dimensions: curriculum system development, teacher professional growth, innovative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improvement. The aim is to advanc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from a merely “activity-based” approach toward a structured “curriculum-based” model, thereby offering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integrating reg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o basic education.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Cultural Transmission; Primary School Classroom;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 张诗月 (2004—), 女,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 小学教育;
刘丽 (1989—), 女, 博士, 研究方向为问题青少年教育与矫正;
徐亦婷 (2004—), 女,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 小学教育;
蒋雲涛 (2005—), 男,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 小学教育;
姚宇轩 (2005—), 男,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 小学教育;
邵薪羽 (2005—), 女,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 小学教育。

通讯作者: 刘丽

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精神基因。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渗透与融合，已成为新时代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键路径。近年来，随着“增强文化自信”被纳入国家教育方针，传统文化教育逐步走向系统化与制度化，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课堂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与导向支撑^[1]。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文化数字化生产力快速发展^[2]。”小学阶段是学生文化认知形成、价值观念奠基的关键时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有机融入学科教学与实践活动，既能够通过审美浸润与体验式学习增强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亦能在动手实践与创造过程中促进其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常州市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根据《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权威统计，截至最新数据，常州市共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7项，省级项目30余项，涵盖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民俗等多个门类。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承载着常州人民世代相传的集体记忆，更构成了地方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非遗教育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通过引入地方非遗资源，如传统手工艺、民间艺术等，学生得以在接触与体验中理解本土历史文脉，进而建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认知。这种基于地域文化的学习过程，不仅促进学生对本土文化的感知与认同，也强化其文化归属感。非遗教育的价值远超单纯的知识传递，更涵盖文化理解、技艺实践与思维发展的综合培育。此举契合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所倡导的“以文化人”育人理念，体现文化传承、学科融合与人格塑造的有机统一^[3]。这一实践过程不仅锻炼其动手操作能力，更推动观察、分析与问题解决等高阶思维能力的提升。此外，非遗项目内蕴的工匠

精神、审美理念与文化智慧，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的价值观，使其在技艺习得中学会尊重传统、体悟文化延续的意义。因此，将非遗教育系统融入小学课程体系，既是回应文化传承的时代诉求，亦是促进学生综合素养发展、落实全人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

二、非遗教育在小学课堂中的实施现状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以江苏省常州市小学作为实证调研场域，采用问卷调查法展开系统探究。研究选取该市5所公办小学作为样本学校，针对教师与学生两类主体分别开展调查。研究工具为自主编制的《常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小学课堂应用调查问卷》，分为教师版与学生版。共向70名教师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66份，有效回收率为94.3%；向270名来自不同年级与班级的学生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63份，有效回收率为97.4%。

（二）研究程序

本研究历时12个月，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文献研究阶段。通过中国知网（CNKI）系统检索并梳理国内外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小学课堂中应用的已有研究成果，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相关政策文本，确立研究的理论框架与问题导向。

第二阶段为现状调研阶段。依托问卷调查，广泛收集教师与学生非遗课程实施的认知、态度与评价信息，初步构建本研究的基础数据库。

第三阶段为深度分析阶段。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量化处理与分析，通过描述性统计、差异检验等方法，揭示当前非遗课堂应用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并据此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课程改进策略。

（三）研究结果

本研究采用量化研究方法，对回收的有效问卷数据进行了系统分析。运用频数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以及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等统计方法，从教师对非遗内容了解、实施现状、面临挑战以及学生学习效果等多个维度，考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小学课堂中的应用情况。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表 1. 非遗教育在小学课堂实施情况

变量	频率	百分比	
常州非遗教育内容了解情况	非常了解	18	27.30
	比较了解	37	56.10
	不太了解	10	15.20
	完全不了解	1	1.50
非遗教育实施情况	非常好	9	13.60
	有一定成效	27	40.90
	效果一般	22	33.30
	需要改进	8	12.10

根据表 1 可知, 83.40% 教师对常州地区非遗项目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其中“非常了解”者占 27.30%, “比较了解”者占 56.10%; 教师均认为非遗与学校教育相融合具有十分必要性。然而, 对于当前非遗教育的实施成效, 教师的评价较为审慎: 认为“非常成功”的仅占 13.60%, “有一定成效”的占 40.90%, 而认为“效果一般” (33.30%) 和“需要改进” (12.10%) 的合计超过 45%。这表明, 尽管教师在理念上高度支持非遗进校园, 但对其实践效果的认可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 通过差异性分析进一步表明不同年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F(5, 66) = 1.13, p > 0.05$; $F(5, 66) = 0.88, p > 0.05$)。

对实施困境的调查结果 (表 2) 揭示了当前非遗教育在小学推进中的关键瓶颈。教师认为面临的主要挑战按比例排序依次为: “教学资源不足” (71.20%)、 “缺乏专业师资” (68.20%)、 “家长和社会认知度不足” (27.30%) 以及“学生兴趣难

以持续” (25.80%)。同时, 教师指出的现存不足主要包括: “课程设置不够系统” (59.10%)、 “教学方法缺乏创新” (47.00%)、 “教学内容过于单一” (45.50%) 和“缺乏有效的评价机制” (25.80%)。这两组数据共同指向了非遗教育在资源建设、师资培训、课程体系设计与教学方法革新等方面存在系统性短板。

根据表 3 可知, 在非遗教育是否对成长有帮助上, 男同学得分显著高于女同学 ($t_{(252.461)} = 0.41, p < 0.01$); 在非遗课堂是否有趣和是否支持非遗课堂上, 小学生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t_{(261)} = 0.17, p > 0.05$; $t_{(261)} = 0.61, p > 0.05$)。

从学生层面看, 非遗课堂教学产生了积极的学习效果。配对样本 t 检验显示 (表 4), 学生在参与课堂学习后, 对非遗的了解程度有显著提升 (学习前 $M = 1.97, SD = 0.67$; 学习后 $M = 1.85, SD = 0.65$; $t_{(262)} = 3.04, p < 0.01$)。

表 2 非遗教育在小学课堂中面临的挑战与不足

变量	频率	百分比	
主要面临挑战	缺乏专业师资	45	68.20
	家长和社会认知度不足	18	27.30
	教学资源不足	47	71.20
	学生兴趣难以持续	17	25.80
非遗教育存在不足	课程设置不够系统	39	59.10
	教学内容过于单一	30	45.50
	教学方法缺乏创新	31	47
	缺乏有效的评价机制	17	25.80

表 3 非遗教育价值性的性别差异性比较

变量	性别	N	M	SD	t	df
非遗课堂是否有趣	男	135	1.35	0.64	0.17	261
	女	128	1.34	0.52		
非遗教育是否有帮助	男	135	1.59	0.64	0.41**	252.46

是否支持非遗课堂	女	128	1.56	0.52	0.61	261
	男	135	1.18	0.64		
	女	128	1.15	0.52		

注: ** $p < 0.01$ 。

表4 小学生学习非遗前后的差异性比较

学习前		学习后		学习变化		t	df
M	SD	M	SD	M	SD		
1.97	0.67	1.85	0.65	0.12	0.63	3.04**	262

注: ** $p < 0.01$ 。

表5 不同年级学生对非遗知识掌握情况的事后多重比较 (LSD)

年级	年级	D(I-J)	SE	P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三年级	四年级	-0.24*	0.12	0.05	-0.470	0
	五年级	-0.30*	0.11	0.01	-0.510	-0.08
	六年级	-0.02	0.13	0.90	-0.28	0.24
四年级	三年级	0.24*	0.12	0.05	0	0.47
	五年级	-0.06	0.10	0.55	-0.26	0.14
	六年级	0.22	0.13	0.08	-0.03	0.47
五年级	三年级	0.30*	0.11	0.01	0.08	0.51
	四年级	0.06	0.10	0.55	-0.14	0.26
	六年级	0.28*	0.12	0.02	0.05	0.51
六年级	三年级	0.02	0.13	0.90	-0.24	0.28
	四年级	-0.22*	0.13	0.08	-0.47	0.03
	五年级	-0.28*	0.12	0.02	-0.51	-0.05

注: * $p < 0.05$ 。

通过 LSD 事后多重比较 (表 5) 发现, 这种年级差异具体表现为: 五年级学生的了解程度显著高于三年级 ($MD = 0.30, p < 0.05$) 和六年级 ($MD = 0.28, p < 0.05$); 四年级学生的了解程度显著高于三年级 ($MD = 0.24, p < 0.05$); 而三年级与六年级之间、四年级与五年级及六年级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p > 0.05$)。这一非线性的年级差异结果提示, 非遗教育的效果可能受到学生认知发展阶段、课程内容设计与年级衔接等多重因素的复杂影响, 其中四、五年级可能是学习成效显现的关键期。

三、非遗教育在小学课堂教学中存在问题

(一) 非遗传承资源与师资存在结构性困境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 非遗教育融入小学课堂中存在非遗传承资源挖掘不足和专业非遗传承教师结构性困境。这揭示了非遗教育在学校场域中仍处于“外部输血”而非“内部造血”的初级阶段。尽管多数学校已启动融合尝试, 但非遗教学高度依赖特定的技艺载体、场地设施及原生态材料, 通用的校本课程资源库严重缺位。同时, 具备非遗

专业素养与跨学科教学能力的教师极为稀缺, 现有教师多通过短期培训介入, 知识体系与教学技能均存在“专业性赤字”, 导致课程实施易流于表面化与碎片化, 难以实现教育效果的深度转化。

(二) 非遗课程与教学的系统性缺失

当前, 虽然多数学校尝试非遗与学校教育的融合, 但“课程设置不够系统”与“教学内容过于单一”存在不足, 这反映出当前非遗教育尚未融入国家课程的主干体系, 多以社团活动、兴趣小组或短期项目等形式存在, 缺乏连贯的年级序列与课程标准。教学内容往往局限于单项技艺的浅层介绍, 未能与语文、历史、美术、劳动等学科知识进行有机整合, 也未能深入挖掘非遗所蕴含的工匠精神、审美意蕴与社区文化脉络。这种“点缀式”的课程形态, 导致其教育价值被窄化, 难以支撑学生持久深入的认知建构。

(三) 学生学习非遗教育内生动力不足

小学生通过非遗教育对非遗的认知水平显著提高, 但通过观察却暴露出学生中存在“非遗教育可有可无”的消极态度。这一矛盾也揭示了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为主导、高度应试化的教育生态中，非遗课程容易被学生及家长视为与主要学业竞争无关的“额外负担”。学生对“占用课余时间”的担忧，实质上是功利主义学习观对非功利性文化教育的一种排异反应。若无科学的评价激励与升学评价体系的积极联动，仅靠课堂的短暂兴趣激发，难以维系学生长期的学习投入与价值认同。

（四）非遗教育评价与发展的导向性缺位

目前，对非遗教学效果的评价多停留在活动展示层面，缺乏基于核心素养如文化理解、审美感知、实践创新等过程性与发展性相结合的评价工具与标准。评价体系的缺位，使得教学效果无法科学衡量，教师的教学改进缺乏依据，学校的管理决策也难获支撑，最终导致非遗教育陷入“因重视而开展，因模糊而乏力”的循环。

四、非遗教育在小学课堂中实施的优化策略

（一）强化非遗师资培训，构建专业化教学支持体系

教师是非遗课程有效实施的关键主体。需系统提升教师对非遗文化价值与教育意义的认知，并加强其相关教学法与课程资源的运用能力。建议构建涵盖“知识、技能、激励”三个维度的立体化培训体系：在知识建构层面，可与非遗保护中心协作，开发体系化的培训课程，内容包括非遗基础理论、常州地区特色非遗项目深度解读、以及跨学科融合的教学策略；在技能提升层面，着力培养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指导其运用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等技术工具，并学习制作非遗主题微型数字教学资源；在激励机制层面，设立“非遗教学创新奖”，鼓励教师积极开展校本课程研发与教学实践创新。

（二）重构非遗教育内容，遵从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非遗教学内容的设计应遵循实效性、创新性与情感浸润性原则，并紧密围绕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进行一体化建构，形成符合小学生认知发展阶段的课程内容体系^[7]。具体而言，可依据年级差异实施分层教学：低年级（1-2 年级）以多感官体验为主，通过触觉、听觉等直观途径建立初步的文化感知；中年级（3-4 年级）侧重技艺实践体验，例如通过可拆解的古典建筑模型组件，让学生在动手拼搭中理解榫卯等传统工艺原理；高年级（5-6 年级）则重在文化内涵探究，开展如

“非遗中的科学智慧”等主题式学习。此外，应建立课程内容动态更新机制，每学期可基于学生兴趣调研，更新约 30% 的教学素材，确保教学内容兼具经典性与时代活力。

（三）创新教学方法，增强教学互动性与实践性

在教学方式上，应综合运用情境教学、项目式学习（PBL）、探究式学习等多种策略，以提升非遗教学的互动深度与实践品格。积极整合现代教育技术，利用 VR、AR 等手段为学生创设沉浸式、可视化的非遗文化情境。在实践环节，倡导采用“微项目学习法”，将复杂的非遗技艺分解为系列化、可操作的子任务，促使抽象的文化知识转化为学生可亲手完成的具体成果，实现文化内涵的“可视化”学习。

（四）推进家校社协同，共建非遗育人共同体

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家校社合作机制，鼓励社区、文化传承人、家长等积极参与非遗教育，共同营造良好的非遗传承生态。充分动员与利用社区、非遗传承人、文化机构及相关企业等社会资源，拓展非遗学习的外延空间，如与非遗保护单位合作共建“校园非遗传习基地”、联动社区文化站，开发本土“非遗发现地图”。此外，在家庭方面可建立“家长非遗人才库”，聘请非遗传承家长担任客座讲师，开设“传统木工”“家庭刺绣坊”等特色课程，进而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素养培养的双重目标。

结语

非遗教育不仅承载文化传承的使命，更应成为涵育学生文化认同、审美素养与实践能力的重要课程载体。本研究通过对常州市小学非遗教育的系统调查，揭示了非遗在基础教育阶段实施的结构性矛盾与课程化困境，并从师资队伍建设、非遗教学内容重构、方法创新、非遗教育共同体构建等方面提出策略。本研究虽立足于常州，但其揭示的问题与提出的路径对同类地区的非遗课程化实践具有参考价值。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关注非遗课程在不同学校文化中的实施差异、长效育人效果的追踪评估，以及数字化时代非遗课程资源的开发模式，从而推动非遗教育真正融入育人全过程，实现文化传承与人的发展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2035 年)》[EB/OL].(2025-01-19)[2025-09-14].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9914.htm.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EB/OL]. (2022-05-22) [2025-09-14]. https://www.ccp.gov.cn/xtt/202205/t20220522_153936.shtml.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22: 1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EB/OL].(2011-02-25)[2025-09-14].
https://www.gov.cn/flfg/2011-02/25/content_1857449.htm.

[7]文晓晓,田佳鹭. 非遗文化融入小学美术课堂的实践研究——以中国传统云肩的教学为例[J]. 甘肃教育研究,2025,(17):158-160.

延安精神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及实践路径

王雅迪¹

(1.海南大学, 海南 海口 570100)

摘要: 延安精神孕育于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革命征程, 是历经岁月沉淀的精神瑰宝, 其内核囊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核心理念。这份精神既承载深厚的历史底蕴, 又彰显鲜明的时代价值。将延安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范畴, 既是传承红色基因、延续精神血脉的历史担当, 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要求、培育时代新青年的现实诉求。本文立足历史视角梳理延安精神的形成脉络与核心要义, 从学术层面剖析其对高校思政教育的赋能价值, 结合实践案例探寻延安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多元路径, 为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思路。

关键词: 延安精神;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价值维度; 实践路径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11

The Value and Practical Paths of Yan'an Spiri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YaDi¹

¹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100, Hainan Province, P.R.China

Abstract: The Yan'an Spirit was nurtured in the arduous revolutionary journe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is a spiritual treasure precipitated over time. Its core connotation includes such fundamental concepts as self-reliance, hard work, emancipating the mi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serving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This spirit not only carries profound historical heritage but also demonstrates distinct contemporary value. Integrating the Yan'an Spirit into the fiel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not only a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to inherit the red gene and continue the spiritual bloodline, but also a practical requirement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new youth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formation context and core essence of the Yan'an Spirit, analyzes its empowering valu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an academic perspective, explores the diversified paths of integrating the Yan'an Spirit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combining practical case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idea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Yan'an Spiri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Value Dimensions; Practical Paths.

一、延安精神的历史渊源与核心内涵

延安精神孕育于特定的历史境遇, 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领导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凝聚而成的精神结晶。20世纪三四十年代, 民族危亡

与革命攻坚的双重压力交织,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积极推进抗日救亡行动、强化自身建设、组织开展生产自救, 在

长期的革命实践积淀中，逐步淬炼出独具特色的延安精神。这一精神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融合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入解读延安精神的核心内涵，会发现它是一个层次丰富、体系完整的精神集合体，不同维度的特质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它的精神内核。其中，坚定且正确的政治方向无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回想延安时期，国内外局势错综复杂，正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初心使命，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科学方针，才为革命事业照亮了前行的道路，这种坚定的政治定力也成了凝聚革命力量的精神旗帜。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准则，则是延安精神得以鲜活的精髓所在。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跳出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立足中国革命的实际国情去探索契合的革命道路，最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早期的突破性发展。再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风骨，这更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印记。当时面对敌人的封锁围困和物资极度匮乏的困境，延安军民没有退缩，主动开展大生产运动，全靠自身力量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也由此孕育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风尚。除此之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是延安精神最深厚的根本底色。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群众路线，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结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也正是这份情谊，为革命胜利筑牢了坚实的群众根基。

二、延安精神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维度

置身新时代发展语境，将延安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价值。其能够从思想引领、价值塑造、能力培育等多个维度为高校思政教育赋能，助力培育出能够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一）思想引领价值：筑牢理想信念之基

对高校思政教育来说，培育学生的理想信念是核心要做的事，而延安精神恰好能为这份培育工作提供鲜活又厚重的素材。现在社会上各种思潮搅在一起、相互碰撞，不少大学生都有点理想信念迷茫，价值取向也不太稳定。延安精神里那种坚定的政治方向和崇高的理想追求，正好能给这些学生指个清晰的方向。让他们多读读延安时期革命者坚守信仰、始终不变的奋斗故事，就能

引导他们深刻明白中国革命为什么是必然的，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不对，进而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还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把思想根基打牢，补足精神上的“钙”。

（二）价值塑造价值：培育正确价值观念

延安精神里那些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服务人民的价值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特别契合，完全能成为培育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鲜活滋养。现在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不少大学生慢慢有了享乐、功利的倾向，这其实挺需要引导的。借助延安精神相关的教育活动，让大学生多学学延安军民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劲头，就能帮他们树立起科学的消费观念和奋斗意识，改掉铺张浪费、贪图安逸的坏毛病。除此之外，让他们好好体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能引导他们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主动把自己的成长和国家发展、人民需求绑在一起。

（三）能力培育价值：提升综合素养能力

延安精神不只是能引导思想、塑造价值观，更能为大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提供实实在在的精神动力和方法借鉴。比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路，就能帮大学生跳出思维定式，培养辩证思考和创新的能力，学会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更能锤炼他们的意志，让他们在面对学习生活里的困难时更能抗压、更经得起挫折，主动扛起该担的责任。除此之外，延安时期积累的群众工作经验也很有价值，能让大学生树立起群众观念，提升与人沟通协调的能力和社会实践水平，为将来走进社会、服务群众打下好基础。

（四）文化传承价值：赓续红色精神血脉

延安精神可以说是红色文化的核心所在，里面藏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记忆和精神密码。高校本来就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阵地，传承红色基因这份历史使命自然也落在了肩上。把延安精神融入思政教育，能让大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革命历程和奋斗足迹，真切感受到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旺盛生命力，进而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通过持续的教育引导，让延安精神在青年一代中传下去、活起来，实现红色精神的代代相传，这也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注入精神力量。

三、延安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

实现延安精神与高校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需立足高校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创新教育载体与实施路径，构建“课堂教学+体验活动+实践践行+文化浸润”的多元育人框架，推动延安精神实现从“理论认知”到“情感认同”再到“行动自觉”的递进式转化。

（一）构建课堂教学体系，实现延安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延安精神要融入思政教育，课堂无疑是最核心的阵地，所以搭建一个能全方位覆盖的课堂教学体系特别关键。与其先把框架定得死死的，不如从课程内容本身入手优化——把延安精神自然地穿插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讲解、中国革命史授课，还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这些环节里。教学方式也得灵活点，别光靠讲授，多用案例剖析、专题研讨的形式，结合延安时期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鲜活的革命故事，把延安精神的核心内涵和当下的价值讲透，让学生在理论学习中真正读懂、读深。就像《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课，讲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的时候，把这些事件的背景、影响讲清楚，学生自然就能明白延安精神是怎么来的，背后有什么样的历史逻辑和实践基础。除了思政课，其他专业课程也能挖挖和延安精神的契合点，这就是课程思政的意义所在。文学课可以解读延安时期红色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感受里面的革命情怀；史学课就深入研读当时的文献史料，还原延安精神的本来面貌；工科课则能传承那种自力更生的创新劲儿，引导学生搞科技创新、为国家发展出力。另外，专门开发几门延安精神相关的特色选修课，编一套配套的教材和读本，也能给想系统学习的学生搭个好平台。

（二）创新体验式教育载体，增强延安精神的感染力与吸引力

传统的理论教学总免不了有些局限，而体验式教育正好能打破这个僵局，让思政教育变得更直观、更有感染力。对高校来说，完全可以借着红色资源的优势，多琢磨些体验式教育的新形式，让学生在沉浸式感受中真正读懂延安精神。比如说先从实景教学入手，和延安的革命旧址、纪念馆这些红色教育基地好好合作，组织学生去实地研学。当学生站在枣园、杨家岭这些革命遗址前，现场听讲解、学历史，那种延安时期的革命氛围扑面而来，比在课堂上看书本要真切得多，也能

真正实现“在现场学历史、在实景悟精神”的效果。除了实地体验，用新媒体技术做虚拟场景也很有必要，借助VR、AR这些手段，把延安时期的会议、生产、战斗场景还原出来，让学生做角色扮演、搞情景模拟，就像真的“走进”了那段历史，能直观感受到革命先辈当年是怎么奋斗的。另外，把艺术和思政结合起来也不错，打造些红色文艺精品，比如原创的红色音乐舞蹈史诗、革命题材话剧，甚至是红色剧本杀都可以。让学生要么参演、要么观演，在艺术的熏陶下，对延安精神的情感认同自然会更深刻。就像延安大学创作的音乐舞蹈史诗《延安》，把党史教育搬上舞台，学生看演出的过程，也是深度体悟红色精神的过程。

（三）搭建实践践行平台，推动延安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其实检验思政教育有没有效果，实践才是最实在的标尺，延安精神要真正落地生根，也离不开实践这个关键环节。对高校而言，与其搞一堆空泛的理论要求，不如多搭建些让学生能动手参与的实践平台，引导他们把延安精神落到实处。比如组织志愿服务就很好，让学生走进社区、乡村，或是深入革命老区，做点红色故事宣讲、支助教学的事，又或者参与乡村振兴调研，在服务老百姓的过程中，自然就能体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正含义。除了志愿服务，创新创业实践也能和延安精神结合起来，延安时期那种自力更生、敢闯敢试的劲头，正好能用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可以鼓励他们参加“互联网+”这类创新创业大赛，围绕国家需要、社会痛点找选题做项目，在实战中锻炼创业能力。还有调研实践也不能少，让学生去延安、陕甘宁边区这些地方走一走，看看延安精神现在传承得怎么样，老区发展有哪些实际情况。把这些调研发现整理成有价值的报告，既能给老区发展提些参考建议，学生自己也能在这个过程中，更深刻地明白延安精神在当下的价值。

（四）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实现延安精神“润物细无声”的浸润

校园文化其实是隐性思政教育的重要抓手，能为延安精神的传播弘扬营造出自然而然的氛围。对高校来说，把延安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比单纯说教效果要好得多。比如校园环境布局上，不用刻意追求规整，建个延安精神主题的文化长廊，或是在广场上立座精神雕塑，再

在教学楼、图书馆甚至宿舍楼道里贴些相关的标语海报、历史图片,学生每天路过看到,不知不觉就会受到熏陶。除了环境营造,特色文化活动也得跟上,不用贪多求全,定期办几场延安精神主题讲座,或是搞个演讲、征文比赛,邀请研究这方面的专家,还有革命前辈的后代来校讲讲当年的革命故事、分享亲身感悟,很容易就能调动起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另外,现在学生都爱刷新媒体,校园媒体矩阵可得用起来,校园网站、微信公众号这些是基础,抖音、B站也不能落下,多推送些延安精神相关的历史资料、解读文章和微视频。关键是传播形式和说话方式要接地气,别太生硬,这样才能让延安精神传播得更快、覆盖得更广,慢慢让红色精神在校园里真正流行起来。

(五)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延安精神教育的专业化水平

要让延安精神真正融入思政教育,师资队伍的支持作用其实是最核心的,一支政治素养够硬、专业能力扎实的教师队伍,是这件事能做好的关键。毕竟老师自己对延安精神理解透了、讲得活了,学生才能真正听进去、有共鸣。怎么打造这样的队伍呢?不一定非要按部就班来,实地研学或许可以放在前面试试——选派老师去延安和周边革命老区走一走,搞沉浸式的研学。亲身站在那些革命遗址前,感受当年的奋斗氛围,比坐在教室里听课更能体会到延安精神的魅力,还能收集到不少书本上没有的一手素材,把这些真实感悟转化成教学内容,课堂肯定会更有针对性,效果也会好很多。除了实地体验,专项的研修培训也不能少,定期组织思政课和专业课老师一起参与延安精神专题研修,把精神的核心内涵、来龙去脉和当下的价值讲清楚,帮老师掌握怎么把这些内容自然融入日常教学的方法。还有一点很重要,校内师资的研究和教学能力难免有局限,不

妨请些校外的专业人士来帮忙,比如研究延安精神的权威专家,或者革命前辈的后代,让他们来当客座教授、校外导师,做几场专题讲座,给老师做做教学指导。这样内外结合,既能弥补校内的不足,也能让延安精神的教育更专业、更有深度。

四、结语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积淀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份价值从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反而能为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注入鲜活且厚重的精神滋养。把延安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不只是简单丰富思政教育的内容、创新教学的方式方法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它能成为培育时代新人的强大精神后盾。其实高校首先要做的,是真正认清延安精神在当下的价值,找到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在此基础上,多探索些切实可行的融入路径,让延安精神能在校园里真正扎根、慢慢生长。比如说,引导青年学生主动传承红色基因,把奋斗精神刻进心里,成长为信念坚定、做事踏实、敢担当、肯奉献的时代新人。这些年轻人,终究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青春力量。

参考文献:

- [1] 谭虎娃.延安精神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0-36.
- [2] 张金锁.延安精神[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43-67.
- [3] 冯东飞,韩琳.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育人功能[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1):72-74.
- [4] 郝万喜.延安红色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性探析[J].陕西教育(高教版),2019(7):40-41.
- [5] 谭虎娃.历史的转折: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71-93.

傣族南传佛教与文身习俗研究

唐飞¹ 李刚惠芸¹ 曾军¹ 曾伟平¹ 谭亮亮¹ 奥特贡·T (Otgon T)^{1,*}

(1.蒙古研究大学, 蒙古 乌兰巴托 14200)

摘要: 傣族文身发源于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体系, 公元7世纪中期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中国傣族聚居区后, 文身的表现形式、核心内容与文化内涵逐步深度融入佛教元素, 图案体系日趋系统化、丰富化, 最终发展为傣族佛教文化的核心构成部分。傣族传统文身习俗历史源远流长, 形成了兼具民族特质与文化辨识度的完整体系, 其文身图谱为傣族文身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与精神文化支撑。傣族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孕育了别具一格的民族建筑风格, 佛寺作为宗教文化的核心载体, 其壁画中留存的大量文身形象, 进一步实证了文身习俗与佛教文化的深度交融历程。

关键词: 南传佛教; 傣族; 文身习俗; 佛寺壁画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12

Dai Southern Buddhism and Tattoo Customs

Tang Fei¹, Li Ganghuiyun¹, Zeng Jun¹, Zeng Weiping¹, Tan Liangliang¹, Otgon T^{1,*}

1. Graduate University of Mongolia, Ulaanbaatar, Mongolia, 14200

Abstract: Dai tattoos originated from the totem worship system of primitive religion. After Theravada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to the Dai-inhabited areas of China in the mid-7th century AD, the expressive forms, core content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attoos gradually integrated Buddhist elements in depth. The pattern system became increasingly systematic and enriched, and finally developed into a core component of Dai Buddhist culture. The traditional tattoo custom of the Dai people has a long history, forming a complete system with distinct ethnic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recognition. Its tattoo maps provide important material evidence and spiritual and cultural support for the study of Dai tattoo culture.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Dai people has nurtured a distinctive ethnic architectural style. As the core carrier of religious culture, Buddhist temples retain a large number of tattoo images in their murals, which further confirms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process of tattoo customs and Buddhist culture.

Keywords: Southern Buddhism; Dai nationality; Tattoo customs; Buddhist temple murals

1 傣族的佛教文化与文身传统溯源

由上座部佛教在东南亚地区有着广泛的传播基础, 中国傣族地区因与东南亚地缘毗邻, 上座部佛教在此得以落地盛行并持续发展。该宗教传入德宏傣族地区后, 对傣族的宗教信仰体系、道

德规范准则、社会生活模式及民俗传统文化产生了全方位的深远影响, 尤其推动了文身习俗的文化转型——佛塔、佛寺、佛祖等佛教核心意象逐渐成为文身的标志性图案, 承载着祈福禳灾、辟邪纳吉的宗教寓意; 随着佛教传播与傣文创制推广, 经文片段、宗教咒语及傣文字母等文字符号

作者简介: 唐飞 (1995—) 男, 博士在读, 研究方向: 艺术;

李刚惠芸 (1994—), 女, 博士在读, 研究方向: 艺术;

曾军 (1976—), 男, 博士在读, 研究方向: 艺术;

曾伟平 (1988—), 男, 博士在读, 研究方向: 艺术;

谭亮亮 (1990—), 男, 博士在读, 研究方向: 艺术。

通讯作者: 奥特贡·T (Otgon T)

也逐步融入文身内容，使文身的宗教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1]。

傣族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原始宗教图腾崇拜与南传上座部佛教（小乘教）交融共生的鲜明特征。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傣族男孩年满七八岁需进入寺庙（当地俗称“哭房”）修习傣文与佛法教义，这一习俗已成为社会共识，未履行该仪式者将面临一定的社会歧视，这为佛教文化与文身习俗的深度绑定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2]。云南地区自古便是傣族、佤族、德昂族、布依族等多民族的聚居地，这些民族均保留着文身传统，其中傣族的文身习俗传承最为完整，至今仍能在佛寺中见到佛爷、和尚等群体的文身纹饰^[3]。明代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载：“幼尝入神祠，见所塑部从，有袒露者，臂股皆以墨画花鸟云龙之状，即文身像也”，为傣族文身的历史传承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佐证^[4]。

傣族文身的起源与生存环境密切相关，最初承载着“纹身断发，以避蛟龙害”的实用功能，后因蕴含傣民族对生命的敬畏与“爱”的情感内核，在实用价值消退后仍得以传承，并逐渐发展为审美装饰的重要形式^[5]。傣族将驯良的大象与优雅的孔雀视为吉祥美的象征，融入文身图案中：大象表征驯良、神圣的理想男性美，关联着创世神话、图腾传说及农业保护神信仰；孔雀则象征温婉优雅的女性美，《召树屯》等民间故事便是这一文化内涵的生动体现，反映了傣族对和谐、美与爱的精神追求^[6]。



图 1: 傣族文身师

2 云南傣族佛寺壁画中的文身遗迹

2.1 佛寺壁画的文化属性与文身形象分布

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西双版纳后，壁画随寺庙建造应运而生，成为傣族艺术的重要载体^[7]。传统傣族壁画内容可分为四类：佛本生故事、傣族民间传说、原始宗教雕塑题材及社会生活写照，

同时涵盖佛经文本与吉祥动植物意象（如孔雀、大象、龙等动物，菩提树、莲花、榕树等植物），兼具宗教宣传与文化记录功能^[8]。佛寺建筑的厚墙结构为壁画创作提供了天然载体，其工笔彩描、漏金水印等技法造就了壮观的艺术效果^[9]。

截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初，西双版纳、德宏、保山、思茅、临沧等地的傣族寺庙仍保存大量原始壁画，其中文身形象频繁出现^[10]。据调查，仅景洪、勐海、勐腊等县十个乡镇的二十余座佛寺中，便有六处壁画包含文身形象，孟连、澜沧等毗邻地区的佛寺壁画也呈现相似风格，文身题材分布广泛^[11]。这些壁画以佛教本生故事、经变故事及善恶劝诫为核心主题，同时融入民间礼俗与生活化场景，画中文身者多为佛徒、佛爷、和尚、艺人等虔诚信佛之人，常出现在佛事活动相关的显要位置，强化了宗教教义的视觉传播效果^[12]。

原景洪夏洒佛寺的布画《佛祖叭召古塔玛遇难始末》与《生死图》是文身形象的典型载体^[13]：前者描绘的礼佛、迎佛人群袒臂露腿，以多样姿态展示文身纹饰，其中倚“纪勒叫”（双龙天梯）、“帕萨”（木塔）盘坐于“西里该”（经床）者，双臂满布花纹，与佛爷讲经时的形象高度契合^[14]；后者以善恶因果为主题，描绘善者升天、恶者下地狱的场景，其中多位“善者”绘有文身，曾作为侧壁壁画悬挂于佛殿^[15]。此外，孟连中缅寺的送丧队列图、勐遮佛寺的节日宴饮图、瑞丽姐东佛寺的驱象对舞图等作品中，舞蹈者身体醒目位置均绘有别致花纹，部分佛像肢体（如景洪曼宰佛寺菩萨手腕）也加饰蚯蚓窝纹、波浪纹等文身样式。



图 2: 傣族南传佛教

2.2 文身的形制特征与艺术表现

从形制来看，壁画中的文身可分为全身型与局部型两类：全身型文身覆盖胸、腰、腹、背及四肢，如昌宁帕旭佛寺天花板舞人、夏洒佛寺布画人物，布局分为散点形与块面状；局部型文身

则仅见于肢体特定部位，如勐遮壁画孔雀舞者刺纹于腰腿，孟连壁画跳鼓舞人刺纹于大腿与膝部，姐东壁画驱象舞者刺纹于腰与四肢。现存文身纹样包括蚯蚓窝纹、波浪纹、莲瓣纹、鳞状纹、水点团形花纹等，其中蚯蚓窝纹是佛寺文身与民间文身的核心基础纹样，流传至今仍被广泛使用。

壁画文身的设色以黑、蓝为主，部分采用朱色与赭色，与民间文身的视觉效果高度一致，体现了艺术创作与生活实践的关联性。画师采用写实手法，线条轻盈明快、图案生动传神，使文身形象具有强烈的视觉感染力。这些壁画不仅是艺术作品，更是宗教教义的可视化载体，通过直观的文身形象传递善有善报、虔诚信佛的宗教理念，为自幼入寺的僧人提供了持续的文化熏陶，也成为傣族民众接受文身习俗的重要文化诱因^[16]。



图 3：傣族腿部文身

3 傣族佛教与文身艺术的内在关联

3.1 宗教对文身艺术的双重影响

傣族文身图谱作为宗教艺术的重要形态，属于“借用宗教艺术形式宣传宗教教义、以宗教崇拜为目的”的艺术类别，其核心内容包括纯文字符咒、文字与几何纹/动物纹/植物纹/工具纹/人形纹/佛教建筑纹的组合纹样，形成了图文并茂的文化载体。佛教与原始宗教对文身文化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为文身提供了丰富的宗教题材与创作灵感，将宗教思想、教义仪轨融入文身图案，使文身成为宗教传播的重要媒介；另一方面，宗教教义对身体洁净的部分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身的普及范围，形成了特定群体（如僧人、

艺人）专属的文化标识^[17]。

3.2 文身艺术的社会文化价值

傣族文身艺术具有多元社会功能：在传统语境中，文身是借助佛法威力驱除邪恶、乞求福禄的宗教实践；在当代审美中，文身成为成熟、勇敢男性的标志，文身面积与图案精美程度被视为男性勇气与魅力的象征。对于傣族艺人而言，文身更是职业身份的重要标识，表演时亮出文身成为传统，与歌舞艺术交相辉映，共同提升了艺术表现的感染力^[18]。

作为“活的艺术”，傣族文身图谱具有重要的审美认知价值。通过解读文身符咒与图案，可深入了解傣族社会的政治、历史、医疗、战争、宗教、道德、婚恋、生产生活等多元内容，还原特定历史背景下傣族人民面对战争、疾病时的民族心理，追溯文身文化由盛而衰的历史进程^[19]。文身艺术与宗教、建筑、壁画等文化形态相互交织，形成了完整的文化生态体系，体现了傣族“肯定生命、追求幸福与爱”的美学思想，这一思想在南传佛教的影响下得以强化、规范并发扬光大，未发生本质改变^[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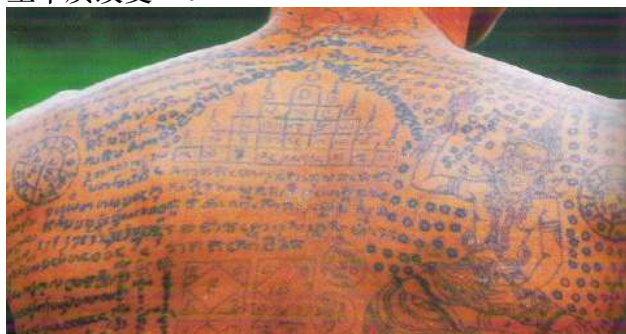


图 4：傣族背部文身

3.3 文化交融的历史意义

傣族南传上座部佛教艺术是中国三大佛教艺术中独具特色的分支，集中体现了傣族的文化传统、审美观念与艺术创造力，也是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见证^[21]。文身艺术作为这一文化交流的缩影，既保留了原始图腾崇拜的文化基因，又融入了佛教文化的精神内核，形成了跨越时空的文化遗产^[22]。与洞穴壁画、雕塑、建筑等永恒性艺术不同，文身以人体为载体，随生命消亡而消逝，却以“活在肉体上的造型史”的独特形态，记录了傣族文化的发展轨迹与民族心理的演变过程，展现了文化超越社会形态的“永恒性”特质^[23]。

小结

傣族文身是人类原始精神世界的鲜活遗存,已成为现代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研究课题^[24]。其起源于原始文化,在南传佛教传入后实现了文化内涵的升华,形成了兼具宗教性、审美性与社会性的文化习俗^[25]。佛寺壁画中的文身遗迹、丰富的文身图谱与鲜活的民间实践,共同构成了傣族文身文化的完整体系,承载着傣族人民对生命、美与信仰的永恒追求^[26]。作为“活的艺术”,傣族文身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傣族传统文化习俗,更以其独特的文化形态,为民族学、宗教学、艺术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彰显了文化传承与交融的强大生命力^[27]。

参考文献:

- [1] 龙晓燕. 西双版纳傣族文身的历史变迁研究[J].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2010 (02)
- [2] 龙晓燕. 西双版纳傣族文身的历史变迁研究[J].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2010 (02)
- [3] 徐一青, 张鹤仙. 信念的活史: 文身世界[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P117
- [4] 徐一青, 张鹤仙. 信念的活史: 文身世界[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P117
- [5] 吴之清, 杨杰, 墨婧金. 试论南传佛教对云南傣族审美艺术的影响[J]. 宗教学研究, 2013 (03)
- [6] 李旭. 小乘佛教与傣族民族美学思想[J]. 民族艺术研究, 1991 (04)
- [7] 赵云川. 傣族佛寺壁画艺术[J]. 艺术设计研究, 1994 (01)
- [8] 赵云川. 傣族佛寺壁画艺术[J]. 艺术设计研究, 1994 (01)
- [9] 赵云川. 傣族佛寺壁画艺术[J]. 艺术设计研究, 1994 (01)
- [10] 杨德鋈. 傣族壁画中的文身[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4 (03)
- [11] 杨德鋈. 傣族壁画中的文身[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4 (03)
- [12] 吴之清, 杨杰, 墨婧金. 试论南传佛教对云南傣族审美艺术的影响[J]. 宗教学研究, 2013 (03)
- [13] 杨德鋈. 傣族壁画中的文身[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4 (03)
- [14] 王晓东. 文身习俗研究: 以中国和日本文身习俗为中心[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15] 杨德鋈. 傣族壁画中的文身[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4 (03)
- [16] 吴之清, 杨杰, 墨婧金. 试论南传佛教对云南傣族审美艺术的影响[J]. 宗教学研究, 2013 (03)
- [17] 刘军, 雷磊, 冯秋菊. 傣族文身图谱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3
- [18] 吴之清, 杨杰, 墨婧金. 试论南传佛教对云南傣族审美艺术的影响[J]. 宗教学研究, 2013 (03)
- [19] 刘军, 雷磊, 冯秋菊. 傣族文身图谱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3.
- [20] 李旭. 小乘佛教与傣族民族美学思想[J]. 民族艺术研究, 1991 (04)
- [21] 李靖寰. 中国佛教艺术的一支奇葩——谈傣族的佛教造型艺术[J].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2001 (04)
- [22] 李旭. 小乘佛教与傣族民族美学思想[J]. 民族艺术研究, 1991 (04)
- [23] 桃小满. 内心, 刻在皮肤上——文身的故事[J]. 东方艺术, 2007 (22)
- [24] 徐一青, 张鹤仙. 信念的活史: 文身世界[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 [25] 吴之清, 杨杰, 墨婧金. 试论南传佛教对云南傣族审美艺术的影响[J]. 宗教学研究, 2013 (03)
- [26] 李旭. 小乘佛教与傣族民族美学思想[J]. 民族艺术研究, 1991 (04)
- [27] 李靖寰. 中国佛教艺术的一支奇葩——谈傣族的佛教造型艺术[J].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2001 (04)

社交媒体使用与大学生宿舍居住空间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 长期效应研究

陈思雨

(南通理工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00)

摘要: 本研究采用心理健康素养评定量表、SCL-90 症状自评量表及自填式人口社会学问卷, 从南通理工学院四类学生中收集 7838 份有效数据, 构建了社交媒体依赖行为、宿舍居住空间特征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定量分析框架。结果显示: 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总分为 86.15 ± 12.31 , 其中行为维度总分显著低于其他维度 (17.41 ± 5.75), 表明心理健康知识获取与实践能力之间存在显著脱节。人口统计学异质性分析显示: 女性学生、高年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良好者、父母婚姻关系和谐者及亲子关系密切者心理健康素养显著更高 ($P < 0.05$)。其次, 研究发现了一条清晰的数字媒体影响路径。社交媒体依赖并不直接导致抑郁或焦虑, 而是通过显著增强个体的社会比较倾向间接引发情绪问题。在控制了性别、年级后, 社会比较对抑郁 ($T=4.827, P=0.004$) 和焦虑 ($T=5.184, P < 0.001$) 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而社交媒体依赖则是社会比较的重要预测因子 ($P=0.029$)。在宿舍居住空间特征中,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 宿舍的功能完善性、空间独立性和满意度均能显著负向预测心理问题 (均为 $P < 0.01$), 是重要的保护性因素。与此同时, 家庭经济状况良好是最强的保护因素之一 ($\beta=-4.567, P=0.000$), 而社交媒体依赖行为则是最强的风险因素 ($\beta=0.645, P=0.000$)。

关键词: 社交媒体使用、宿舍生活空间、多元线性回归、大学生心理健康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探索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与心理危机之间的关系(2024SJSZ0742)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12

A Study of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Use and College Students' Dormitory Living Space on Their Mental Health

Siyu Che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enter, Nanto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tong, Jiangsu, China, 2260000

Abstract: In this study, 7838 valid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four classes of students in Nanto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ing th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Rating Scale, SCL-90 Symptom Self-Rating Scale, and self-administered demographic-sociological questionnaire, to construc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framework of social media dependency behaviors, dormitory living space characteristics, and mental health.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otal score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as 86.15 ± 12.31 , with the behavioral dimension scoring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other dimensions (17.41 ± 5.75), suggesting a notable disconnect between the acquisition of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capabilities. Demographic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ed that female students, upperclassmen, those from economically stable families, individuals with harmonious parental marital relationships, and those with clos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mental health literacy ($P < 0.05$). Furthermore, the study identified a clear pathway of influence from digital media. Social media dependence does not directly lead to depression

作者简介: 陈思雨(1989—),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

55

or anxiety but instead exacerbates emotional issues by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individuals' tendency for social comparison. After controlling for gender and academic year, social comparison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depression ($T=4.827, P=0.004$) and anxiety ($T=5.184, P < 0.001$), while social media dependence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social comparison ($P=0.029$). Regarding dormitory living space characteristic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functional completeness, spatial independence, and overall satisfaction with dormitory living spaces were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ors of psychological issues (all $P < 0.01$), highlighting them as important protective factors. Concurrently, favorable family economic status stood out as one of the strongest protective factors ($\beta=-4.567, P=0.000$), whereas social media dependence behavior was identified as the strongest risk factor ($\beta=0.645, P=0.000$).

Keywords: Social media use, dormitory living spac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一、引言

由于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近年来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比例高达30%,其中患有精神障碍的学生占比也超过10%[1]。因心理健康问题退学的学生占因病退学学生总数的约37.9%,而因该原因请假的学生比例甚至超过64%[2], [3]。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也清楚地表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已不再是孤立现象,而是成长道路上令人担忧的普遍问题,甚至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培养质量以及校园的稳定与安全[4],[5]。作为信息技术的产物,社交媒体能够拓展大学生的人际圈层、增加信息资源获取渠道、丰富日常生活,从而对他们的心理行为产生积极影响[6]。然而,由于海量杂乱的信息,难免会混杂低俗和负面内容,这些也可能对大学生的心理和行为造成负面影响。积极影响包括:拓展交流范围、提升社交技能、拓宽成长路径、形成正确价值观[7]。消极影响则表现为过度依赖媒体、沉迷虚拟世界导致人际关系疏离,现实中的社交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下降;长期沉迷虚拟世界可能导致大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如自我封闭、焦虑抑郁、盲目傲慢等。暴力、极端语言行为以及拜金主义和恐怖主义等不良文化的渗透会导致价值观偏差[8]-[11]。

大学生宿舍是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宿舍环境能提供温暖、舒适、安全的生活空间,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积极心态的培养。居住空间的温度与湿度、光照、规模大小、布局及环境噪音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而影响其睡眠质量与学习氛围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12]-[14]。因此,研究社交媒体使用与大学生宿舍居住空间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具有重要价值。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南通理工学院2022、2023、2024及2025届学生为研究对象,于2025年全年期间开展了心理健康普查。共发放8376份大学生心理健康问卷,实际回收有效问卷7838份,有效回收率为93.58%。

2.2 研究工具:

2.2.1 人口学与社会学特征问卷

自行设计了包含性别、年级、家庭特征、父母婚姻状况及亲子关系评分等基本信息的人口学与社会学特征问卷,并对大学生群体进行了调查。该问卷基于学校家庭经济困难评估结果编制,采用五级量表对亲子关系进行评分:1分表示极差,2分表示差,3分表示一般,4分表示良好,5分表示极好。

2.2.2 心理健康素养评估量表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ssessment Scale, MHLAS)

该量表用于评估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包含22个条目,分为知识、认同、态度和行为四个维度。每个条目采用五级量表评分,从“强烈不同意”到“强烈同意”,总分为1至5分。所有条目得分相加即为量表总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心理健康素养水平越高。本次调查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02。

2.2.3 SCL-90量表

SCL-90最简版包含90个条目,分为10个因子:躯体化、强迫症、人际美系统、抑郁、焦虑、敌意、恐惧、偏执、精神病性及其他。每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1-5分),分别为无、

极轻度、中度、重度和严重,总分由各单项得分累加得出。总分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差。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4。

2.2.4 社交网站依赖量表

本研究修订了社交网络依赖量表(SNDS),通过6个行为特征的5分量表,将分类变量(依赖行为 ≥ 24 分)转化为连续依赖评分(6-30分)。该量表包含六个条目,分别为:每日更倾向于刷短视频等社交媒体而非参与其他娱乐活动;选择刷短视频等社交媒体以逃避现实并缓解焦虑;增加在线刷短视频等社交媒体的时间以提升满足感;无法刷短视频等社交媒体时感到不适并试图缓解;即使意识到负面后果(如上课迟到)仍继续刷短视频等社交媒体;持续使用短视频等社交媒体;睡眠时间较之前减少”。量表采用5级评分(1-5分),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数越高表示对短视频社交媒体的依赖程度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5。总分 < 24 分视为正常, ≥ 24 分则视为存在短视频社交媒体依赖行为。

2.2.5 大学生宿舍居住空间特征量表

自行设计大学生宿舍居住空间特征量表。宿舍居住空间特征包括:(1)空间功能评分:基于生活单元空间设计(如卫生间、活动室、储物间及其他设施配置)的综合评分,该评分源自学生满意度调查;(2)空间独立性:是否设有独立卫生间或厨房(是=1,否=0)。(3)空间满意度: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学生对宿舍空间布局、私密性、便利性等主观感受进行评

分(1~5分)。

2.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0.0 软件录入数据并开展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三、研究分析:

3.1 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现状

基于心理健康素养评定量表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如表1所示。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总分范围为53至110分,平均分 86.15 ± 12.31 ,条目平均分 3.90 ± 0.82 ,表明整体心理健康素养处于中高水平。

就各维度而言:知识维度得分范围8-30分,平均分 25.06 ± 5.55 ,条目平均分 3.53 ± 1.14 ,该维度得分最低且标准差较大,提示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水平存在显著个体差异。识别维度的得分范围为7-25分,平均得分为 19.68 ± 4.30 分,条目平均得分为 3.24 ± 1.58 分,略低于知识维度,条目平均得分波动范围最大,标准差为1.58,反映出大学生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识别能力存在较大差异。态度维度得分范围为6至30分,平均得分为 24.00 ± 6.07 ,条目平均得分为 4.78 ± 0.11 ,该维度在四个维度中条目平均得分最高,标准差最小(0.21),表明大学生对心理健康普遍持积极态度,且具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行为维度得分范围为6至25分,平均得分为 17.41 ± 5.75 ,入学平均得分为 4.31 ± 0.58 。尽管入学平均得分较高,但总分显著低于其他维度,表明虽然大学生认同心理健康行为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践行这些行为的能力有限,这可能与现实生活条件或执行能力不足有关。

表1: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水平

维度	评分范围	平均分	条目平均得分
知识	8-30	25.06 ± 5.55	3.53 ± 1.14
识别	7-25	19.68 ± 4.30	3.24 ± 1.58
态度	6-30	24.00 ± 6.07	4.78 ± 0.21
行为	6-25	17.41 ± 5.75	4.31 ± 0.58
总分	53-110	86.15 ± 12.31	3.90 ± 0.82

3.2 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的因素分析

心理健康素养在不同人口学特征群体中差异的分析,即组间比较(通常使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揭示了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特征。结果见表2。

结果显示,性别、年级、家庭经济状况、父

母婚姻状况及与父母关系评分均与心理健康素养评分显著相关,所有相关性P值均 < 0.05 。

性别差异:女性心理健康素养总分(89.12 ± 11.89)显著高于男性(83.24 ± 12.15),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 $T=5.672$, $P < 0.028$ 。这可能与女性通常更关注情绪、更愿意谈论心理话题、求助意愿更强等社会心理因素有关。

年级变化趋势:心理健康素养得分呈现出“年

级越高，心理健康素养越高”的趋势（从大一到大四：85.53→88.51），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 $t=8.433$ ， $P<0.002$ 。高年级学生可能因在心理健康课程或社会支持资源方面积累更多经验，从而提升了其素养水平。

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学生得分显著高于 (90.23 ± 10.86) 平均组 (85.44 ± 12.04) 和贫困组 (80.17 ± 13.23) ， $t=12.853$ ， $p=0.000$ 。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可能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更开阔的视野、更少的生存压力，父母也更可能关注子女的全面发展（包括心理健康）。

父母婚姻关系：父母婚姻关系良好的学生得分最高 (91.47 ± 10.55) ，显著优于中等关系组

(85.64 ± 12.24) 和不良关系组 (78.37 ± 11.59) ， $t=15.322$ ， $p=0.000$ 。和谐的父母关系为学生提供了积极的情感模型和稳定的成长环境，这可能直接或间接（通过减少孩子的心理压力）促进了其心理健康知识、态度和技能的培养。

与父母的关系：在与父母关系维度得分较高的学生群体中，其心理健康素养得分 (92.18 ± 10.21) 显著高于平均水平组 (85.31 ± 12.41) 和低水平组 (76.82 ± 15.03) ， $t=18.917$ ， $p=0.000$ 。良好的亲子关系意味着孩子更可能从父母那里学到情绪调节的方法，更敢于向父母倾诉困扰，从而提升了识别和处理心理问题的素养。

表2：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人群的心理素养水平

项目	人数	比例	心理健康素养评分	T	P	
性别	男性	4027	51.38%	83.24 ± 12.15	5.672	0.028
	女性的	3811	48.62%	89.12 ± 11.89		
等级	大一学年	3121	39.82%	85.53 ± 12.33	8.433	0.002
	大二	2536	32.36%	86.26 ± 12.12		
	大三	1570	20.03%	87.81 ± 11.97		
	高三	611	7.80%	88.51 ± 11.65		
	差	708	9.03%	80.17 ± 13.23		
家庭经济状况	概要	4897	62.48%	85.44 ± 12.04	12.853	0.000
	好的	2233	28.49%	90.23 ± 10.86		
	差	912	11.64%	78.37 ± 11.59		
父母婚姻关系	概要	5103	65.11%	85.64 ± 12.24	15.322	0.000
	好的	1823	23.26%	91.47 ± 10.55		
	差	1467	18.72%	76.82 ± 15.03		
与父母的关系	概要	4164	53.13%	85.31 ± 12.41	18.917	0.000
	好的	2207	28.16%	92.18 ± 10.21		

3.3 社交媒体使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在明确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总体水平及其人口统计学差异后，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短视频社交媒体依赖行为如何通过社会比较机制加剧抑郁和焦虑，并成为心理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社会比较

是指个体将自己的状态与他人的状态进行对比，以评估自身能力、水平、价值或社会地位的心理过程。本研究分析不同预测变量（性别、等级等）对“抑郁”、“焦虑”、“社会比较”这三个结果变量的影响。表3展示了抑郁、焦虑及社会比较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

表3：抑郁、焦虑及社会比较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

结果变量/预测变量	抑郁		焦虑		社会比较	
	T	P	T	P	T	P
性别	1.432	0.283	1.875	0.112	2.389	0.047
等级	0.827	0.527	1.023	0.316	1.324	0.299
社会比较	4.827	0.004	5.184	0.000		
短视频依赖社交媒体	0.638	0.734	0.831	0.477	2.384	0.029
R2	0.077		0.022		0.028	

F

5.374

4.395

3.841

结果显示：短视频社交媒体依赖通过社会比较的中介效应影响个体的抑郁、焦虑水平。以抑郁和焦虑为结果变量，社会比较行为对抑郁($T=4.827, P=0.004$)和焦虑($T=5.184, P<0.001$)均呈现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表明社会比较倾向越强，个体的抑郁和焦虑水平也越高。性别、年级、短视频社交媒体依赖的P值均远大于0.05，说明在本模型中，它们对抑郁和焦虑水平的独立影响不显著。

以社会比较为结果变量，性别($T=2.389, P=0.047$)对社交比较有显著影响；短视频社交媒体依赖($T=2.384, P=0.029$)对社会比较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对短视频社交媒体的依赖程度越

高，其社会比较倾向也越强。年级($P=0.299>0.05$)对社会比较的影响不显著。

这个模型说明社会比较会显著增加抑郁、焦虑风险；而性别、短视频社交媒体依赖会显著影响个体的社会比较倾向。

3.3、大学生宿舍居住空间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宿舍居住空间的三个维度（功能性、独立性与满意度）对大学生心理健康（SCL-90总分）的影响。模型控制了性别、年级、家庭经济状况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并将短视频社交媒体依赖行为得分作为核心自变量之一引入分析。大学生宿舍居住空间对其心理健康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宿舍居住空间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β	SD	T	P	95%置信区间
功能评分	-0.217	0.049	-4.429	0.000	[-0.313, -0.121]
空间独立性 (is=1)	-3.874	1.236	-3.134	0.002	[-6.298, -1.450]
空间满意度	-1.952	0.287	-6.798	0.000	[-2.515, -1.389]
短视频依赖行为评分	0.645	0.065	9.923	0.000	[0.518, 0.772]
性别 (女性=1)	-2.101	0.756	-2.777	0.006	[-3.584, -0.618]
年级 (高年级=1)	-1.234	0.399	-3.094	0.002	[-2.016, -0.452]
家庭经济状况 (良好=1)	-4.567	1.102	-4.143	0.000	[-6.729, -2.405]
R ²				0.786	
调整 R ²				0.281	
F				42.75	

在控制性别、年级、家庭经济状况等变量后，宿舍居住空间相关变量对心理健康的负向影响显著。其中，功能性评分($\beta=-0.217, P=0.000$)、空间独立性($\beta=-0.3874, P=0.002$)、空间满意度($\beta=-1.952, P=0.000$)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在0.01水平显著，说明宿舍居住空间的功能性越弱、独立性越差、满意度越低，心理健康水平越低。短视频社交媒体依赖行为对心理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短视频社交媒体依赖行为评分的回归系数为正($\beta=0.645, P=0.000$)且在0.01水平显著，说明短视频社交媒体依赖行为每增加一个单位，心理健康问题得分平均增加0.645个标准差。即，短视频社交媒体依赖越严重，心理健康问题越多。人口学变量中，性别(女性=1, $\beta=-2.101, p=0.006$)、年级(高年级=1, $\beta=-1.234, P=0.002$)、家庭经济状况(良好=1, $\beta=-4.567, P=0.000$)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显著，说明女性、高年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相对更高。

模型整体拟合度方面，调整R²=0.281，说明上述变量共解释了心理健康水平 28.1% 的变异；F=42.75 ($P<0.001$)表明回归模型整体显著。

四、结论

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在关键维度上仍存在明显短板。其中，“心理问题识别能力”的不足尤为突出，表现为许多学生难以准确辨识自身或他人早期的情绪困扰、压力反应及潜在心理疾病征兆，这直接影响了及时求助与干预的可能性。这一识别能力的水平并非均质分布，而是显著受到性别、年级与家庭环境等因素的调制：女生往往在情绪觉察上更为敏锐，但可能伴随更高的内化问题风险；低年级学生面临适应过渡期的挑战，而高年级学生则更多受就业与前途焦虑影响；家庭氛围是否融洽、父母教养方式是否支持理解，更是奠定了个体心理弹性的基础。

社会比较过程是驱动抑郁与焦虑情绪的核心风险机制。在学业成绩、外貌体型、社交状态乃至未来出路等方面,大学生频繁进行上行比较,易产生挫败感与自我贬低,加剧心理困扰。与此同时,多层次的生态因素共同塑造着心理健康状态:在环境层面,宿舍的空间质量、私密性、卫生条件以及宿舍成员间的支持功能,直接影响学生的日常情绪与归属感;在行为习惯层面,短视频过度依赖不仅挤占深度思考与线下社交时间,其碎片化、算法强化的内容也可能扭曲认知、加剧焦虑或诱发身体意象问题。个体性格特质(如神经质倾向、应对方式)与前述家庭特征则构成稳定的内在与背景变量。

因此,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需采取系统化、有针对性的策略。在社会层面,强化心理问题的识别能力,通过心理健康课程、工作坊、宣传活动普及常见心理问题的表现与界限,降低病耻感,鼓励自我觉察与同伴关怀。在家庭层面,促进家校沟通,引导家庭提供更多情感支持与合理期望;在校园环境层面,优化宿舍物理设计与社区功能,营造安全、支持性的生活空间;在认知与行为层面,引导学生识别并调节消极社会比较,培养成长型思维,同时倡导健康的数字生活习惯,减少媒介依赖对心理的潜在侵蚀。只有通过这种个人-环境互动的综合干预,才能真正筑牢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防护网,助力其健康成长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Auerbach, R. P., Mortier, P., Bruffaerts, R., Alonso, J., Benjet, C., Cuijpers, P., ... & Kessler, R. C.(2018). WHO 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s international college student project: Prevalence and distribution of mental disorder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27(7), 623.
- [2]Zajac, T., Perales, F., Tomaszewski, W., Xiang, N., & Zubrick, S. R.(2024). Student mental health and dropout from higher education: an analysis of Australian administrative data. *Higher Education*, 87(2), 325-343.
- [3]Leow, T.,Li, W. W., Miller, D. J., & McDermott, B. (2024). Prevalence of university non-continuation and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and effect of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on non-continu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1-16.
- [4]Hernández-Torrano, D., Ibrayeva, L., Sparks, J., Lim, N., Clementi, A., Almukhambetova, A., ... & Muratkyzy, A. (2020).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 bibliometric mapping of the literatur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1226.
- [5]Etopio, A. L., Devereux, P., & Crowder, M. (2019). Perceived campus safety as a mediator of the link between gender and mental health in a national US college sample. *Women & health*, 59(7), 703-717.
- [6]Wang, R.,Mao, Z.,& Gu, X.(2025).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seeking, social media use,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Behavior Management*, 563-573.
- [7]Nikolinakou, A., & Phua, J. (2024). Do human values find genuine expression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e influence of human values on millennials' social media activities. *Internet Research*, 34(2), 538-562.
- [8]Bashirian, S., Besharati, F., & Malekpour, F.(2022). Internet addic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students: an application of social support theory. *Nursing And Midwifery Journal*, 20(4), 258-268.
- [9]Alsunni, A. A., & Latif, R. (2021). Higher emotional investment in social media is related to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university students. *Journal of Taibah University Medical Sciences*, 16(2), 247-252.
- [10]Jung, E. Y., & Yu, E. Y. (2018). Influence of SNS Addiction tendency and social support on cyber violence in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Digital Convergence*, 16(12), 407-415.
- [11]Aljehani, H. A.(2019).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Social Value System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Saudi Arab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Practice*, 7(3), 216-229.
- [12]Nazarpour, M. T.(201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Dormitory Physical Environment (Case Study: Female Student Dormitory of Shahid Beheshti University). *Journal of Fine Arts: Architecture & Urban Planning*, 24(3), 87-96.
- [13]Worsley, J. D., Harrison, P., & Corcoran, R.(2023). Accommodation environments and student mental health in the UK: the role of relational spaces.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32(1), 175-182.
- [14]Saba Sadeghpour, F.(2022). Effects of Physical Environmental Design Attributes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in University Dormitor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eriod. *Architectural research*, 24(4), 105-111.

论人工智能时代播音主持专业的价值锚点及能力体系重构

徐子涵¹ 高若栋²

(1.四川传媒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45, 2.香港人文社会科学院, 中国 香港 999077)

摘要: 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 生成式AI与虚拟主播的广泛应用对播音主持行业产生了颠覆性冲击, 引发了专业价值认同危机与教育改革焦虑。本文以人工智能时代传媒业态变革为切入点, 系统剖析播音主持专业面临的技术替代、功能重塑、生态变革等现实挑战; 基于传播学、社会学等理论, 重构了专业的三大核心价值锚点, 即公共价值引领者、深度叙事建构者与情感真实联结者; 据此构建了以深度内容策展能力为基础、人机协同创作能力为手段、跨媒介叙事能力为表现、即时伦理判断能力为保障的四维复合型能力体系; 最后从教育改革、行业实践、职业发展、制度保障四个维度, 提出价值与能力重构的实现路径。研究旨在为播音主持专业的转型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丰富传媒教育理论内涵。

关键词: 人工智能; 播音主持; 能力体系; 人机协同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15

On the value anchor and ability system reconstruction of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major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Xu ZiHan¹, Gao RuoDong²

¹ *Sichuan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Chengdu, Sichuan*

² *Hong Kong Academ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I and virtual anchors has had a disruptive impact on the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industry, causing the crisis of professional value identity and the anxiety of education reform. Tak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a format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major, such as technology substitution, function remodeling,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so on;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ology, this paper reconstructs the three core value anchor points of the major, namely, the leader of public value, the constructor of deep narrative and the true link of emotion; Based on this, a four-dimensional composite ability system is constructed, which is based on the in-depth content curation ability,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ve creation ability as the means, cross media narrative ability as the performance, and instant ethical judgment ability as the guarantee; Finally,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education reform, industry practice, career development and system guarantee,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value and ability reconstruction is put forward. The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major, and enrich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media education.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Capability system; Human machine cooperation

作者简介: 徐子涵(2003—), 女, 本科生,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高若栋(2003—), 男,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科前沿》《大湾区发展研究》编委, 从事文艺批评及文化生态研究。

通讯作者: 徐子涵

一、人工智能时代播音主持专业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 技术替代与职业边界模糊

人工智能技术在播音主持领域的应用已经从概念落地为现实,开始显现出一定的替代作用。虚拟主播能够全天候不间断工作,出错概率低,而且不受时空、生理条件的限制,在那些标准化、重复性的播报任务中,在高效性和稳定性上表现得比人类更有优势[2]。比如在财经简报、体育赛事播报、天气预报等领域,这些场景对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要求极高,但对情感温度和个性表达的需求较低,AI主播的优势在这里尤为突出。新华社联合搜狗推出的AI合成主播,到现在已经完成了数千万条视频播报,近2000天里一直没间断过服务,《杭州新闻联播》也曾启用AI数字人主播完成整期新闻播报,并且全程没有出现任何失误,这些案例都充分证明了AI主播在标准化任务中的显著优势[4]。不过这种替代并不是全盘否定人类主播的价值,而是呈现出“功能性替代”的特点,也就是说,被替代的只是播音主持工作中那些最容易程式化、标准化的环节。

不过,技术本身的短板也很明显。当前的AI主播本质上还是依靠算法和数据驱动的模拟智能,并不具备真正的意识、情感以及创造性思维。在情感把控、声音细节处理上,还达不到真人的水平,尤其是在面对情感波动较大、需要夸张艺术化处理的声音表达时,缺陷会更加突出[2]。它们没法理解新闻背后复杂的社会背景,难以应对直播过程中出现的突发状况,更没办法和观众建立起基于生命体验的情感共鸣[1]。这种“部分替代”让职业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播音员主持人不再是一个界限清晰的职业,其工作内容正和内容策划、产品运营、技术协调等角色相互交融[3]。未来的播音员主持人,可能需要同时具备与AI工具协作的能力、对内容的深刻理解能力以及灵活驾驭不同场景的能力,职业身份也将从单一的“出镜/出声者”,转变为“人机协作传播生态中的主导者与协调者”[5]。

(二) 专业功能的重塑:从“信息播报”到“价值传播”

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相对稀缺,播音员主持人的核心功能就是准确、清晰、生动地传递信息,“播读”能力被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但到了数字时代,信息呈现爆炸式增长甚至泛滥成灾,

获取信息已经不再是难题,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从海量、碎片化且真假难辨的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内容,并且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度解读、理性分析,赋予其相应的意义。这就意味着,播音主持专业的功能必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其核心功能应该从侧重于技术性的“信息播报”,转向侧重于智慧性的“价值传播”。播音员主持人不再是简单的信息搬运工,而要成为信息的“策展人”和“评论员”。他们需要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社会阅历和价值判断,为受众梳理信息的内在逻辑,揭示信息背后的深层含义,引导公众理解复杂的社会事件。这一转变要求播音员主持人必须具备强大的思想力,能够对社会现象形成独到且深刻的洞察,从而在传播过程中实现价值引领和意义建构。这种基于人类独特认知和价值观的“价值传播”功能,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下,AI是很难胜任的。

(三) 行业生态的变革

人工智能的引入正在重新塑造整个播音主持行业的生态。首先,内容制作流程发生了重构。AI可以承担初稿撰写、资料检索、视频素材初步剪辑等前期准备工作,播音员主持人的工作重心可能会向后转移,更深入地参与到内容的策划、创意以及最终的价值把关环节。其次,岗位需求出现了深刻变化。市场对那些只会“漂亮念稿”的播音员的需求会急剧减少,转而迫切需要既懂传播规律、又懂AI技术应用,还具备深厚人文社科底蕴的复合型人才。像“AI内容协调员”“智能传播策划师”这类新岗位可能会应运而生。

最后,行业的评价体系也需要与时俱进。过去那种单纯看重嗓音条件、普通话水平、镜头表现力的评价标准,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新的评价体系应该更加注重候选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能力、跨文化理解能力、伦理决策能力以及人机协作能力。这种生态变革,迫使专业教育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革新。

(四) 职业认同危机与专业教育的滞后性

上述这些挑战交织在一起,催生了严重的职业认同危机。很多从业者和在读学生都感到迷茫:如果多年苦练的“基本功”随时可能被机器超越,那自己的独特价值又在哪里呢?有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因为担心AI主播的发展带来的就业压力,选择了跨考其他专业。这种焦虑情绪如果不能得

到有效疏导,将会影响行业队伍的稳定性和行业的健康发展[4]。

更严峻的问题是,当前不少高校的播音主持专业教育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课程体系往往偏重技能训练、轻视素养培养,注重机械训练、忽视思维提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更新缓慢,和日新月异的行业实践严重脱节[1]。很多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在气息控制、吐字归音等单项技能上,却在批判性思维、内容策划、跨媒介叙事等核心素养方面缺乏足够的训练。对此,学界和业界都提出,高校应该优化培养方案,强化跨学科能力与综合素质教育,把人工智能基础知识等内容纳入课程体系,培养复合型人才[4]。这种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毕业生,进入职场后会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很难应对 AI 时代的复杂挑战,进一步加剧了“学无所用”的困境。因此,专业教育的系统性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二、播音主持专业的核心价值锚点重构

(一) 价值转型的理论依据

要化解职业认同危机,就必须回归本源,从理论层面理清播音主持工作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传播的本质不仅是“传递信息”,更是“共享意义”。播音员主持人作为传播主体,其核心作用在于通过个性化的解读和表达,把客观信息转化为能与受众产生共鸣的“故事”和“意义”,而这一意义共创的过程,是算法无法独立完成的。从社会学视角分析,播音员主持人作为公众人物,是社会文化符号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在塑造社会认同、凝聚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一社会整合功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信息传递。从职业发展理论来讲,任何职业在技术变革中能够存续的关键,都在于找到区别于机器的、基于人类特有智能(比如情感、创造力、道德判断)的“价值高地”。

(二) 公共价值引领者

在后真相时代,各种声音纷繁复杂,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变得愈发重要。播音员主持人作为媒体的直接代言人,其首要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就是担当“公共价值引领者”。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更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守护者和倡导者。在面对重大公共事件、复杂社会议题时,播音员主持人需要运用自己的专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进行理性的价值辨析和引导,帮

助公众拨开迷雾,认清事件的本质。

具体来说,这一角色要求播音员主持人具备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坚定的道德操守。他们需要通过有温度、有态度的评论和解读,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公众舆论朝着积极、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5]。尤其是在面对 AI 生成内容可能存在的偏见、错误甚至恶意信息时,人类播音员主持人的价值把关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工作者提出的“四力”要求的核心体现,AI 无法替代人类在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上的独特优势[4]。他们就像是信息海洋中可靠的“灯塔”,为公众提供值得信赖的导航。这种基于人类理性、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价值引领,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三) 深度叙事建构者

叙事是人类理解世界、建构意义的基本方式。AI 虽然能够熟练地组合文字、生成流畅的语句,甚至模仿某种写作风格,但它很难真正理解故事的深层结构、情感张力和文化隐喻。播音主持专业的第二个价值锚点,就是成为“深度叙事建构者”。播音员主持人擅长把零散的信息点,通过独特的视角、清晰的逻辑组织和富有情感的表达,编织成有开头、有高潮、有结尾的完整叙事,让信息变得更容易理解、记忆和传播。

这种叙事建构能力体现在多个层面:一是“内容解读”,即透过现象看本质,挖掘信息背后的深层含义和社会影响;二是“场景营造”,通过语言、语气、肢体动作、音乐、画面等多种手段,为受众构建一个沉浸式的信息接收场景,增强传播的感染力;三是“意义生成”,即在叙事过程中融入自身的思考和感悟,赋予内容独特的观点和灵魂,引发受众的深度思考与共鸣。无论是讲述一个动人的新闻故事,还是解读一项复杂的政策,优秀的播音员主持人都能通过自身的深度叙事能力,让传播内容产生“1+1>2”的效果。这种具有创造性、诠释性的智慧工作,是播音主持专业魅力的核心所在。

(四) 情感真实联结者

传播的最高境界是心灵的沟通与共鸣。和 AI 的“模拟情感”不同,人类拥有真实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世界,这是建立深度信任关系的基础。因此,播音主持专业的第三个价值锚点,是充当“情感真实联结者”。在冷冰冰的屏幕背后,观众渴望感受到真实的温度和真诚的互动。

这一角色要求播音员主持人具备三种关键能力：一是“共情传播”能力，即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感受，并在传播中体现出这种理解与关怀。尤其是在报道灾难、困境等题材时，真诚的共情远比完美的播报更有力量，而这正是当前 AI 语音合成技术难以达到的，机器无法根据具体的情景语境，自然地表达出正确且富有感染力的情感色彩[2]。二是“人格化表达”能力，即敢于并善于在传播中展现自己独特的个性、观点和情感，摆脱机械的“播音腔”，用鲜活、真实的人格魅力吸引和感染受众。就像风趣幽默的朱广权、沉稳大气的任鲁豫等优秀主持人，他们的独特风格是 AI 无法模仿的[4]。三是“信任构建”能力，通过长期稳定的专业表现和真诚地交流，与受众建立起牢固的信赖关系。这种基于真实情感和人格魅力的联结，能够产生强大的受众粘性，是媒体品牌最宝贵的无形资产[5]。在虚拟形象越来越多的未来，真实人类的“在场感”和“真诚性”将会变得愈发珍贵。

（五）三重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与统一性

公共价值引领者、深度叙事建构者和情感真实联结者这三重角色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依存、有机统一的整体。“公共价值引领”是灵魂，决定了传播的方向和高度；“深度叙事建构”是骨架，赋予了传播的深度和结构；“情感真实联结”是血肉，注入了传播的温度和生命力。一个优秀的播音员主持人，往往能够在这三重角色之间自如切换、融会贯通。比如在主持一档时政访谈节目时，他既需要以“价值引领者”的视角把握议题导向，以“叙事建构者”的技巧梳理对话逻辑，更需要以“情感联结者”的真诚与嘉宾和观众进行互动。这三重角色共同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播音主持专业坚不可摧的价值基石。

三、面向人机协同的复合型能力体系构建

（一）能力重构的逻辑框架

基于上述三大价值锚点，播音主持专业的能力体系必须进行一场革命性的重构。新的能力体系应以“价值引领”为核心，以“人机协同”为基本工作场景，构建一个多层次、动态发展的模型。该模型可理解为：底层是支撑所有能力的“通用素养层”（如人文社科底蕴、批判性思维）；中层是体现专业特色的“核心能力层”（即本章重点论述的四大能力）；顶层是面向具体实践的“综合应用与创新层”。能力培养的目标，是使学生从掌握单一

技能的操作工，成长为能够驾驭复杂传播生态的战略家。

（二）深度内容策展能力

在信息过载的时代，筛选、整合、阐释信息的能力比生产信息本身更为重要。深度内容策展能力是播音员主持人作为“价值引领者”和“叙事建构者”的基础。它包括：第一，信息筛选与验证能力。能够快速从海量信息中辨识出真实、准确、有价值的内容，并有效识别虚假信息和偏见。第二，知识整合与结构化能力。能够将来自不同信源、不同形态的碎片化信息，根据特定主题进行归纳、提炼和逻辑重构，形成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的知识体系。第三，价值附加与观点输出能力。在整合信息的基础上，融入独立的思考 and 专业的判断，提炼出核心观点，赋予内容新的视角和深度，引导受众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三）人机协同创作能力

未来，播音员主持人的工作场景将是与 AI 密切协作的“人机共生”环境。因此，熟练掌握并主导人机协作的能力至关重要[3]。这包括：第一，AI 工具应用能力。熟练使用语音合成、虚拟形象驱动、智能写作辅助、数据分析等 AI 工具，将其作为提升工作效率和创作效果的“得力助手”，例如利用微软 AI 配音工具可快速完成基础配音工作，节省时间成本[2]。第二，智能辅助决策能力。能够理解 AI 工具的运算逻辑和输出结果，但又不盲目依赖，始终保持批判性审视，将 AI 的分析结果作为决策参考而非最终结论[1]。第三，创意主导与审辨能力。在人机协作中，人类必须牢牢占据创意发起、审美判断和最终把关的主导地位。要明确“AI 能为创意做什么”，而不是“创意被 AI 所定义”，这一模式也是未来播音主持领域人机搭档主持的主要发展趋势[5]。这是人类智慧区别于机器算法的核心所在。

（四）跨媒介叙事能力

全媒体传播格局要求播音员主持人必须具备在不同媒介平台间自如转换、有效叙事的本领。跨媒介叙事能力包括：第一，全媒体表达与适配能力。深刻理解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不同媒介的传播特性和受众习惯，能够为同一主题量身定制最适合该媒介的表达方式和内容形态。第二，场景化叙事设计能力。能够根据特定的传播场景（如新闻直播、专题报道、综艺节目、线上互动）设计相应的叙事

节奏、话语体系和互动模式。第三，互动引导与社群运营能力。在社交媒体时代，播音员主持人需要具备与受众进行实时、深度互动的能力，能够通过有效的议题设置和互动设计，引导线上讨论，构建有活力的粉丝社群，实现传播效应的最大化。

（五）即时伦理判断能力

当 AIGC 可能引发虚假信息、算法偏见、隐私侵犯等一系列伦理风险时，播音员主持人的伦理素养变得空前重要。即时伦理判断能力是其作为社会公器代言人的基本要求。这包括：第一，价值把关与风险预判能力。在内容制作和传播的全过程中，时刻保持伦理警觉，能够敏锐识别内容中可能存在的价值观偏差、文化冒犯、社会风险等潜在问题。突发情况下的道德决策能力。在直播等不可预知的场景中，面对突发状况或伦理困境，能够基于专业准则和社会公序良俗，迅速、得体地做出正确决策，化解危机。第三，算法伦理批判能力。对 AI 推荐算法、数据采集等技术背后的伦理议题有基本认知，能够批判性地看待技术应用的社会影响，并在工作中尽量避免放大算法的负面影响。

（六）能力体系的系统整合与动态发展特征

上述四大能力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深度内容策展是基础，人机协同创作是手段，跨媒介叙事是表现，即时伦理判断是保障。在实际工作中，这些能力需要被整合运用。同时，这个能力体系必须是开放和动态的，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其内涵需要不断更新和丰富。终身学习将成为播音员主持人的必备素养。

四、价值与能力重构的实现路径

（一）专业教育体系改革

实现价值与能力的重构，源头在教育。高校播音主持专业的改革需从三方面着力：在课程设置上，必须打破传统的技能训练为主的课程壁垒，构建“通识教育+专业核心+前沿技术+交叉模块”的课程体系。大幅增加媒介伦理、社会学概论、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基础、创意写作等跨科学分，强化学生的人文底蕴和思维训练[4]。教学方法上，彻底摒弃“满堂灌”和机械模仿，全面推行项目制教学、案例教学、工作坊等模式。大力建设智慧教室、虚拟演播实验室，创设高度仿真的“人机协同”教学环境，让学生在实战中学习如何

与 AI 工具共事[5]。评价机制上，改革“一播定乾坤”的考核方式，建立多元综合评价体系，将项目报告、策划方案、伦理辨析、团队协作、创意展示等纳入考核范围，重点评估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3]。

（二）行业实践模式转型

行业层面需要积极探索新型工作模式。首先，建立明晰的人机分工协作机制。媒体机构应系统梳理采、编、播、发各环节，将重复性、标准化任务（如资料检索、初稿生成、简单剪辑）交由 AI 处理，让人力资源更聚焦于创意策划、深度访谈、价值把关、情感互动等机器难以替代的高附加值工作[1]。其次，重构内容生产流程。推动播音员主持人更早、更深地介入内容生产的前端，使其从被动执行者转变为主动的策划者和主导者，充分发挥其深度叙事和价值引领作用。鼓励组建包含播音员、记者、编辑、工程师、数据分析师在内的跨职能团队，共同进行内容创新，这也是媒体跨界合作常态化趋势的具体体现[4]。

（三）职业发展路径拓展

对从业者而言，必须主动拥抱变化，拓展职业边界。职业方向应从传统的播音员、主持人，向内容产品经理、品牌故事官、新媒体策划、传播策略顾问等更广泛的领域拓展，就像直播平台的兴起为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生提供了网络主播、运营策划等新的职业选择方向[1]。这意味着需要持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因此，构建终身学习体系至关重要。行业组织、媒体机构和高校应联合搭建继续教育平台，提供关于 AI 技术、数据新闻、跨媒介叙事等方面的短期培训、在线课程和高级研修班，支持从业者知识结构的持续更新[4]。

（四）制度保障与生态建设

良好的行业生态需要制度和标准保障。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应牵头研究制定人工智能在传媒领域应用的行业标准与伦理规范，明确人机协作的边界、数据使用的规则和伦理底线，尤其要关注 AI 语音合成技术带来的版权伦理问题，避免出现侵权和诈骗等风险，为行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2]。在政策层面，应鼓励和支持播音主持专业的教学改革和学术研究，将其纳入新时代文艺人才培养的重点方向。同时，建立健全播音员主持人的职业资格认证和继续教育制度，推动职业走向更加专业化、规范化的道路[4]。

五、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主要结论

本研究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对播音主持专业带来的严峻挑战,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与实践研判,得出以下核心结论:第一,播音主持专业在AI时代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实现价值基点的根本性转型,即从可被技术替代的“信息播报者”,重塑为不可替代的“公共价值引领者”、“深度叙事建构者”和“情感真实联结者”。这三大价值锚点构成了专业安身立命的根本。第二,围绕这三大价值锚点,专业能力体系必须进行系统性重构,形成一个以深度内容策展能力为基础、人机协同创作能力为手段、跨媒介叙事能力为表现、即时伦理判断能力为保障的四维复合型能力框架。第三,这一价值与能力的重构,需要通过教育、行业、个体和政策的多方联动,在课程改革、实践模式、职业发展和制度保障等路径上协同推进,方能实现。

（二）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超越了“冲击-应对”的简单范式,从价值哲学的高度为播音主持专业的存续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丰富了传媒教育学和职业发展理论的内涵。在实践层面,本研究为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提供了清晰的逻辑框架和具体的能力维度指引,为一线教师创新教学模式提供了思路;同时,也为面临转型的从业者指明了能力提升的方向,为媒体机构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构建新型人机协作模式提供了决策参考。

（三）研究局限与不足

本研究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其未来对行业的具体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本研究的某些预测可能需要根据技术演进不断调整。其次,研究主要基于文献分析、理论推导和有限的案例研判,缺乏大样本的实证数据支持,其提出的能力框架的有效性和普适性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此外,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国内语境,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和比较尚可进一步深化。

（四）未来研究方向

展望未来,相关研究可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

深入:第一,开展长期的追踪实证研究,持续观察AI技术在传媒领域的应用动态及其对播音主持职业生态的实际影响,验证和修正本研究所构建的能力框架。第二,加强跨学科交叉研究,特别是与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学者合作,更深入地探讨人机协同的最佳模式和未来传播形态。第三,推进国际比较研究,系统梳理不同国家和地区应对传媒智能化的策略与经验,为中国播音主持专业的转型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多元的解决方案。播音主持专业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转型之路已然开启,唯有主动求变,方能于变局中开新局,于挑战中觅得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 [1] 丁治. 新媒体技术浪潮下播音主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 大众文艺, 2024(24): 101-103.
- [2] 韩志浦. 智能语音技术下播音主持的探索与思考——以微软AI配音为例[J]. 文学艺术周刊, 2023(16): 80-82.
- [3] 汪晨馨. 人工智能时代播音主持职业发展探析[J]. 中国报业, 2024(21): 252-253.
- [4] 秦小杰. 大量AI主播抢饭碗 播音专业何去何从? [N]. 羊城晚报, 2025-02-16(A03).
- [5] 黄荔南. 新媒体环境下AI技术与播音主持的融合探讨[J]. 中国传媒科技, 2025, 32(5): 138-141.
- [6] 王忱忱. 从声音符号到智能媒介: AI时代播音艺术的范式转型发展研究[J]. 大众文艺, 2025(10): 59-61.
- [7] 曾涛. 智能语音技术推动下播音主持专业与行业发展——以AI配音为例[J]. 中国传媒科技, 2025, 32(6): 80-83, 92.
- [8] 郭琳媛, 谢继欣. 智能传播时代高校播音与主持专业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应对分析[J]. 传媒论坛, 2025(22): 9-11.
- [9] 高贵武. 生还是死: 技术变革视野下的主持传播[J]. 中国主持传播研究, 2018(00): 6-13.
- [10] 潘中康. 人工智能时代虚拟主持人的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D]. 湖南工业大学, 2022.

人工智能赋能《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思政效果增值评价的模型设计与实施路径

杨中亚^{1*} 张龙¹ 刘龙飞¹

(1.六盘水师范学院, 贵州 六盘水 553004)

摘要: 为应对传统课程思政评价中存在的静态化、主观性强及与专业教学脱节等问题, 本文以《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为实践载体, 构建人工智能赋能的课程思政效果增值评价模型。研究基于“体育育人为本、智能技术赋能、数据循证增值、知行融合导向”理念, 通过初始素养分层、动态指标建构、主客观耦合赋权、多模态数据采集等模块, 形成覆盖“国家认同—专业知识—文化素养—社会实践”多维度的评价体系。该模型依托学习分析、多模态感知及区块链等技术, 实现对学生思政素养发展轨迹的全周期动态追踪, 并通过智能平台实现评价结果的可视化呈现与反馈。研究表明,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显著提升课程思政评价的精准性、过程性与适应性, 为体育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人工智能; 课程思政; 增值评价; 体育测量与评价

基金项目: 贵州省一流课程(金课)建设项目《体育测量与评价》(2023-02-16)、《体质健康测试实践》(2024-02-14) 六盘水师范学院课程思政教改项目“聚、导、融、践、评: 体育专业理论课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2023-08-006)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9.222

AI-Enabled Value-Added Assess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ffectiveness in the Course "Sports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Model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Zhongya Yang^{1*}, Long Zhang¹, Longfei Liu¹

1.Liup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Liupanshui, Guizhou, 553004, China

Abstract: To address the issues of static nature, strong subjectivity, and disconnection from professional instruction in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valuation within curricula,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enabled value-added assessment model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ffectiveness, using the course "Sports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as a practical carrier. The research was grounded in a framework prioritizing student-centered physical education, empowered b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driven by data-based evidence, and guid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Key components of the model included initial competency stratification, dynamic indicator construction, integration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weighting, and multi-modal data collection. This formed a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encompassing national identity, professional knowledge, cultural literacy, and social practice. Supported by technologies such as learning analytics, multi-modal perception, and blockchain, the

作者简介: 杨中亚(1990—), 男,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运动与体质健康促进的理论与实践;

张龙(1977—), 男,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体质健康测量与评价研究;

刘龙飞(1994—), 男,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体质健康测量与评价研究。

通讯作者: 杨中亚 (yangzhongya@lpsy.edu.cn)

model achieved dynamic, full-cycle tracking of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development. An intelligent platform facilitated the visualization of assessment results and provided timely feedback. The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AI technologie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precision, process-oriented nature, and adaptability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valuation. This model provided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a practical pathway for enhanc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in sports-related professional course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Value-Added Assessment; Sports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前言

随着新时代教育教学改革不断纵深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也在加速扩展，路径更丰富，触角更细密，不再只停留在“有无”的层面，而是转向“怎么做得更有效”。《体育测量与评价》是体育教育专业的核心基础课，天然带着两条育人线索，既要训练学生的科学测量、评估与数据分析能力，让专业学习有硬支撑，同时也要在学习过程中帮助学生形成科学健康观，强化责任意识，并把积极的价值取向落到具体行动里。教育部2020年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强调“人才培养效果是检验课程思政建设的首要标准”^[1]，这一要求为《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思政效果评价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直接政策依据与核心理论遵循。从研究脉络来看，高校课程思政研究多围绕内涵界定、建设必要性、核心特征及实施路径等基础问题展开^[2]，或通过探讨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的协同育人机制来研判育人实效^[3]。也有研究引入模糊综合评价、层次分析等量化方法，尝试构建课程思政效果评价指标体系^[4]。但整体而言，现有研究仍停留在理论建构与静态指标设计阶段，缺乏兼顾过程性、动态性与智能化的评价方案，难以精准衡量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思政素养增值变化。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驱动教育评价体系发生深层次变革。《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以体育数据测量、统计分析、结果评价为核心教学内容，本身具备扎实的数字化基础与天然的算法适配性，为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应用提供了独特优势。基于此，本文提出“人工智能赋能《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思政效果增值评价模型”的研究框架，旨在通过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科学精准、动态演进、智能高效的课程思政效果评价

体系，实现从传统静态结果评价向现代化智能化增值评价的转型，为高校体育教育类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新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1.智能时代《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思政效果评价的价值、逻辑、理念

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度渗透，正在从理念层、方法层到制度层持续重构传统教学与评价范式。以智能技术提升课程思政效果评价的科学性、精细化与可解释性，已逐渐成为新时代教育研究的重要关注点。构建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思政效果评价体系，不仅契合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要求，也为提升体育教育课程的育人质量与发展水平提供了关键支点与内在动力。

1.1 育人认同转型：从“专人主导”到“全员共育”的评价格局重构

体育教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场域，其课程思政建设首先依赖于教师的价值引领功能。教师被普遍视为课程思政实践的“第一责任人”，在育人方向把握与价值生成过程中承担关键角色。体育课程思政具有鲜明的情境性与生成性，需要在课堂互动、实践测评、数据解读等多维教学环节中实现价值的共同建构，从而形成“人人皆为育人主体、处处皆有思政元素”的育人格局^[5]。就《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的现实教学而言，部分教师仍存在“重技能传授、轻价值挖掘”的结构性偏向，教学重心更多落在测量方法训练与测评技能培养上，而对体育数据背后所承载的团队协作、规则意识、公平竞争以及自我反思等育人内涵关注不足^[6]。这种偏向使课程思政效果评价容易停留在“专人评价”的既有框架内，评价主体相对单一，难以完整呈现育人过程及其真实成效。

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为这一评价困境提供了

可操作的技术路径。借助 AI 学习分析平台，能够对学生在课堂参与、测评实践与项目研究等情境中的多维数据进行持续采集与关联分析，并以过程性方式描绘其在体育认知、技能发展与价值观养成方面的动态变化轨迹。评价主体也因此获得拓展空间，从少数教师或特定人员主导的评价，逐步转向师生共同参与、数据支撑下的“群体共评”。只有当育人认同真正由“专人主导”转向“全员共育”，体育课程思政效果评价的客观性、全面性与科学性才能得到制度化保障。

1.2 价值呈现升级：从“线性传导”到“多维立体”的评价维度拓展

实现“体育课程”与“思政育人”的深度融合，要求教师具备深度课程理解能力、创新课堂设计能力，秉持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學理念与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评价立场。在传统体育教学模式中，课程内容多以“线性传导”方式推进，教师严格遵循教学大纲按部就班开展知识讲授、练习布置与成果测试，缺乏对学生价值认知的多维度引导与综合素养的系统性评价^[7]，难以充分彰显课程思政的多元价值。

智能化评价体系的引入，有效打破了传统“线性”思维的桎梏。在《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中，通过 AI 算法与大数据技术的融合应用，可实现对学生学习行为、运动表现、团队协作质量、课堂互动频次、健康意识践行等多维度数据的全过程采集与精准分析，推动体育课程思政价值从“单一维度”向“立体呈现”转变，全面覆盖情感态度、身体素质、社会责任等核心层面。这种从“线性传导”到“多维立体”的评价维度升级，不仅重构了课程思政评价的核心内涵，更推动体育教育从单纯的知识技能传授，迈向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协同育人新范式。

1.3 素养发展导向：从“静态赋值”到“动态增值”的评价逻辑革新

体育教育的根本宗旨在于塑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年。《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应立足科学测评核心，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公平竞争内涵、锤炼科学探究精神、强化社会担当意识，助力学生体育思政素养实现“动态增值”。但

在实践中，多数评价仍聚焦于学业成绩与测评结果的“静态赋值”判断^[8]，忽视了学生思想认知提升与价值观念塑造的动态过程，难以精准衡量课程思政的实际育人成效。

人工智能赋能的“增值评价”模式有效破解了这一难题。依托学习分析技术与机器学习模型，可全程追踪学生在课程思政实践中的成长变化，量化其在认知、情感态度与行为实践等层面的进阶轨迹。AI 驱动的过程性评价不仅能够清晰呈现学生体育测评专业能力的提升，更能精准刻画其在公平意识、团队精神、责任担当等思政素养方面的内在进步。这种从“静态赋值”到“动态增值”的评价逻辑革新，推动了学生从“被动接受测评者”向“主动追求成长者”的身份跃迁。

2. 人工智能赋能《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思政增值评价模型建构

对于体育教育而言，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体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教育评价正从传统单一的技能测评向“育体+育心”的多元、动态、智能化评价转型。增值评价依托统计建模与学习分析技术，可精准追踪学生特定学习周期内体育思政素养的动态变化轨迹，量化其在体育实践中涵养的精神品格与价值理念成长幅度，进而科学评估《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在培育学生体育精神、强化社会责任、塑造正确价值观等方面的净效应。

秉持“体育育人为本、智能技术赋能、数据循证增值、知行融合导向”的核心理念，构建人工智能赋能《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思政增值评价模型（模型图见图 1）。该理念紧扣体育教育“育体与育心相统一”的本质特征，以教师与学生为核心主体，以智能评价平台为交互枢纽，形成“初始素养分层—评价指标动态建构—权重等级科学设计—评价标准多元制定—多模态数据采集—全周期监测反馈”六大核心模块的循环递进体系。模型融合人工智能算法、5G 网络、云平台、虚拟仿真及区块链安全机制等技术支撑，聚焦体育教学、训练、竞赛等核心场景，构建全域覆盖的智慧体育教育生态，为课程思政效果的全过程、全场域、全维度评价提供系统性保障，呈现出自下而上、层层递进的立体化结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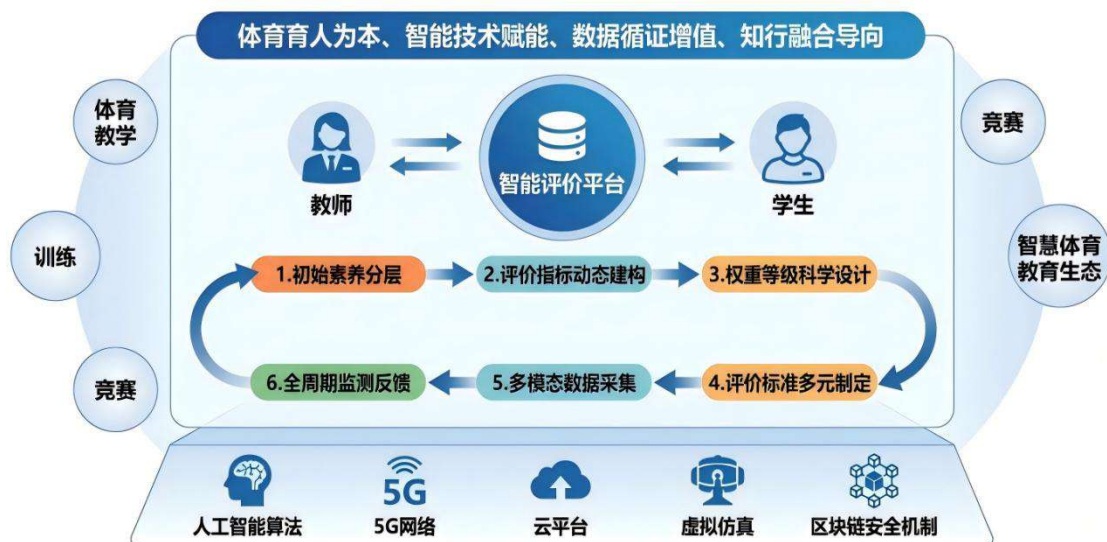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AI的“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思政增值评价模型图

2.1 初始素养分层: 锚定体育思政能力基线与起点水平

《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思政增值评价的核心要义,在于紧扣“体育育人为本”核心,精准衡量学生在体育知识学习、技能训练与实践应用中思政素养的成长增量,本质是对学习起点与学习成果间差距的科学化测算。该评价体系的首要环节是开展学生体育思政素养初始水平分层,重点明确其在体育专业知识储备、测评技能掌握、体育精神认知、价值观认同及运动实践表现等维度的基础状态,为后续针对性评价奠定基础。

实践层面,可综合运用智能问卷调研、虚拟任务场景模拟、AI深度访谈等多元方式,系统评估学生的体育数据分析能力、健康理念认知、团队协作意识及社会责任担当,并将评估结果以分级描述形式录入智能评价平台,构建动态更新的初始分层数据库。此环节为后续增值分析提供客观基准参照,确保不同起点学生的体育思政素养变化均可被科学、可视化地追踪与横向比较。

2.2 指标动态建构: 实现预设目标与动态反馈的交互耦合

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直接决定评价模型的有效性,是模型建构的核心环节。基于《纲要》核心精神,结合《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理论+实践”的专业特质,紧扣“知行融合导向”,从学生发展视角出发,构建涵盖国家认同、专业知识与技能、体育文化素养、运动实践表现四大一级指

标的增值评价体系。依托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可实时动态监测学生在体育认知深化、运动行为规范、价值导向塑造及实践担当体现等方面的细微变化,实现对“育体”与“育心”成效的同步追踪。

体育课程思政价值生成具有显著的开放性与动态性,难以通过固定指标完全预设。智能评价系统可借助行为识别、情绪分析、语义理解等技术,实时捕捉学生在课堂教学、实验实操、体育竞赛等场景中的表现数据,使“人一技”深度互动成为课程思政效果的动态建构过程。人工智能赋能推动《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思政效果评价从静态“结果性评价”向互动生成的“过程性评价”转型,实现知识传授目标与价值育人目标的双向融合。

2.3 权重等级设计: 达成主客观赋权与等级划分的科学耦合

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中,不同维度指标对学生体育思政素养培育的贡献度存在差异,需结合体育教育专业特点科学设定指标权重,以凸显“体育育人”核心导向的相对重要性^[6]。模型融合层次分析法(AHP)与熵权法的,结合体育教学专家、一线体育教师及思政教师的实践经验,通过主观赋权与客观赋权相结合的方式,对各层级指标进行综合赋权,有效规避单一赋权方式的局限性,保障权重分配的科学与客观性。

智能评价系统将学生学习成果数据(含体育测试表现、学习投入度、课堂互动频率、实验实操成效等)进行技术转化与标准化处理,依据预设规则划分学生思政素养等级,构建多维度增值

梯度模型。等级划分既全面体现学生体育专业能力与价值观素养的综合水平，又精准反映其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成长趋势。人工智能模型可通过时间序列分析与深度学习算法，持续优化等级权重设定，实现评价体系的动态自适应调整。

2.4 标准多元制定：推动价值导向与评价标准的联动共建

科学规范的评价标准是体育课程思政效果测评的核心准绳。该模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遵循，立足体育教育专业人才“懂体育、会教育、善育人”的培养要求，紧扣“体育育人为本”与“知行融合导向”，注重价值导向与评价标准的互动协同。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是其显著特征，参与主体涵盖体育专业教师、思政课教师、教育管理者、智能评价专家及第三方测评机构，充分吸纳体育教学实践经验与评价技术优势。

在人工智能平台技术支撑下，评价标准制定摆脱对单一经验的依赖，通过多方主体协商论证，形成数据化、可测量、可操作的标准化体系。每个评价等级均对应明确的表现性描述，全面覆盖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的核心指标。例如，学生在体育测量任务中是否坚守公平公正意识，在团队协作项目中是否展现责任担当，在数据处理中是否秉持严谨求实态度等。该标准体系的建构推动体育课程思政评价从“外在监督约束”向“内在激励驱动”转变。

2.5 多模态数据采集：实现量化分析与质性观察的融合对话

体育课程思政效果具有潜隐性特征，且紧密关联体育实践场景，其测评不能仅依赖单一量化数据，需紧扣“数据循证增值”核心，实现量化分析与质性观察的双向融合。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可聚焦体育课堂、训练场馆、竞赛现场等核心场景，实现学生课堂行为、运动轨迹、技术动作、面部表情、语音语调、互动记录等多模态数据的全方位、伴随式采集^[9]。

同时，教师可通过AI辅助工具记录学生在日常体育活动、志愿服务、社团组织、社会实践等非正式学习场景中的表现，构建校内外、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立体化数据获取网络。智能系统对多源数据进行清洗、融合、分析，生成“行为、情感、认知”三维增值报告，全面反映学生在体育知识掌握、思政素养提升、社会责任担当等方面的多层次进步，为增值评价提供丰富的证据支撑。

2.6 全周期监测反馈：构建动态优化与激励追踪的双向闭环

体育课程思政育人成效具有渐进性与持续性，且需通过体育实践不断强化，难以在短期内显现，是一个持续积累、渐进优化的过程^[10]。人工智能赋能的评价系统紧扣“知行融合导向”与“数据循证增值”理念，通过学习分析模型，实时跟踪学生在体育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中思政素养的变化曲线，构建“数据采集、分析研判、反馈干预、优化提升”的动态闭环机制。

一方面，系统通过定期监测学生在体育实践中的表现，精准捕捉其认知深化、情感升华、行为转变等层面的细微变化，实现评价的持续化与常态化。另一方面，通过智能反馈机制，教师可依据系统分析结果精准调整教学设计，对学生的进步给予及时强化或个性化激励。当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将价值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时，系统自动生成成长轨迹报告，助力教师精准识别“言行一致”的育人成效。最终，人工智能驱动的持续监测与反馈机制，推动体育课程思政评价从静态评估向动态增值转型，使技术真正服务于“以体育人”的教育本质，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青年提供坚实支撑。

3. 人工智能赋能课程思政增值评价的实施路径

3.1 全时空生态构建：聚焦技术前沿，为增值评价提供“高度”赋能

随着智能技术加速渗透教育场域，传统体育教学生态已难以适配“育体+育心”的育人需求，数字教学生态可实现体育教育数据的安全、均衡、高效流转^[11]。《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思政建设成效评价需紧扣“体育育人为本”，全面覆盖国家认同、知识能力、文化素养、社会实践四大维度：国家认同可细化为政治认同、制度认同、文化自信；知识能力可细化为测评方法掌握、数据分析能力、批判性思维；文化素养可拓展为体育审美素养、道德修养、情感态度；社会实践可落实为规则意识、志愿服务、竞赛组织、劳动教育等。上述维度中思想、精神、情感等价值性指标具有较强潜隐性，需结合体育实践场景，借助图像、视频、语音、传感数据等多模态证据实现过程性呈现。

面向人工智能与云计算等技术发展新态势，构筑“全时空”智慧体育教学生态，实现课堂教学

—体育训练—竞赛实践—社会实践的连续跟踪，为增值评价提供“高位”支撑。“高度”赋能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持续跟踪智能技术前沿动态，推动技术与体育教学深度融合，提升评价技术适配性；其二，打破时空边界，实现学生学习与实践数据的随时随地获取，支撑一体化智能评价平台建设。为此，学校需完善校园网络基础设施与智能设备供给，配套建设教学数据平台与安全保障体系；教师需提升数字素养与技术应用能力，完成从“会用技术”到“以技促育”的理念转变。核心在于将智能技术贯穿课程思政实践全过程，以“技术之势”助推“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形成时空贯通、要素协同的数字化评价生态。

3.2 全链条证据整合：搭建数据仓库，为增值评价提供“广度”赋能

增值评价以“证据”为核心基础，而体育课程思政证据需紧扣“数据循证增值”与“知行融合导向”，建设大规模学生纵向追踪数据库是实施前提。鉴于情感、态度、价值观具有较强潜隐性，且其表现与体育实践紧密相关，传统听评课、终结性考试等方式难以直接捕捉课程思政达成度，必须依托智能技术构建覆盖体育理论与实践全场景的全过程证据链，明确数据采集标准、流程与技术转化要求，形成立体、连续、可比对的数据体系。

数据采集环节强调“全面性”，形成“因时因地、多源归一”的规范流程。可借助VR/AR技术创设沉浸式教学情境，按“课前预习—课中互动—课后反思”全流程采集学习数据；在课堂、场馆、操场、竞赛、社区等不同空间，灵活组合穿戴式设备、视频分析、移动端记录等方式采集实践数据^[12]；内容上覆盖知识理解、能力表现、情感态度、社会实践等全要素^[13]。数据存储环节，面向多模态数据异构需求，构建“链上一链下”联合存储体系：如生理与时序特征数据存入InfluxDB，互动与社交网络数据存入Neo4J，行为与日志数据存入HBase等，提升数据存储容量与吞吐效率，确保数据真实性与完整性。数据治理环节强调“精准性”，完成缺失值填补、异常值处理、特征抽取、自动分层等工作，通过统计分析与机器学习实现数据清洗、融合与标签化，最终汇聚至智能管理服务平台。实质上，全链条数据链贯通“课程教学—思政培育—评价分析—改进优化”全流程，是提升评价信度、效度与可解释性的关键枢纽。

3.3 全方位实践落地：研制智能平台，为增值评价

提供“深度”赋能

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为增值评价提供广阔发展空间，智能技术则为学生发展追踪平台建设提供“硬核”技术支撑，助力实现“智能技术赋能”核心理念^[14]。在数据仓库基础上，需结合体育教育专业场景研制专业化学生智能管理服务平台，贯通“数据感知—处理分析—等级评定—结果呈现”全链路，实现课程思政成效的数字化表征与智能化分析。平台融合情感计算、语义理解、姿态/行为识别、学习分析、预测建模等技术，重点针对课堂讨论、实操测评、团队协作、赛事实践等体育特色场景的伴随式数据进行自动分析与归因，提升评价准确度与效率，使增值评价更智能、更客观、更贴合体育专业特点。

评价主体需从“专人评价”（思政课教师）向“多元评价”（专业教师、教练、管理者、第三方评估机构等）转型，并聚焦两项“深度”任务：其一，数据分析之“深”，即对过程性数据开展深度挖掘、内容分析、预测建模，完成多模态数据融合与核心指标提炼；其二，结果呈现之“真”，秉持量化与质性并重、可视化与文本互证原则，在评价报告中用柱状图、折线图等呈现素养成长曲线，辅以描述性证据与典型案例阐释，通过交叉验证增强结果稳健性。通过可视化仪表盘展示国家认同、知识能力、文化素养、社会实践等维度的“发展指数”，实现课程思政建设效果的透明化与可追踪。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人工智能技术为《体育测量与评价》课程思政增值评价提供了全新发展机遇，本文立足体育教育“育体与育心相统一”的专业特质，构建的“体育育人为本、智能技术赋能、数据循证增值、知行融合导向”核心理念，以及“六大模块循环递进”评价模型与“四全”实施路径，实现了技术赋能与体育价值育人的深度融合。该模型通过初始素养分层锚定评价基线，依托动态指标建构、科学权重设计、多元标准制定夯实评价基础，借助多模态数据采集与全周期监测反馈保障评价实效，有效破解了传统课程思政评价中存在的主观性强、数据单一、过程缺失及脱离专业场景等难题。

理论层面，本研究丰富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评价的研究成果，拓展了课程思政增值评价的应用场景，为体育类课程思政评价体系构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实践层面，构建的评价模型与实施路径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可为高校《体育测量与评价》及同类体育专业课程的思

政建设提供实践指导,助力提升体育教育的育人质量。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技术与体育课程思政评价的融合程度,重点突破多模态数据融合分析、评价结果可解释性等关键技术瓶颈;扩大样本范围开展追踪研究,检验评价模型的长期有效性与适用性;结合不同高校体育专业特色,探索差异化的评价方案,推动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个性化与精准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教高〔2020〕3号)[EB/OL].(2020-06-03)[2026-01-05].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2]高德毅,宗爱东.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从战略高度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J].中国高等教育,2017,(01):43-46.

[3]薛冬雪.体育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师策略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5,44(01):52-58.

[4]刘曦.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研究[J].高教论坛,2021,(09):67-70.

[5]胡婕婷.生成性学习理论视域下体育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策略研究[C]//第十二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墙报交流(学校体育分会),2022:272-273.

[6]杨中亚,王继,张龙,等.高校体育理论课程思政的意义、设计、实践与反思——以“体育测量与

评价”课程为例[J].课程思政教学研究,2023,4(01):92-104.

[7]陈如平,朱忠琴.育人方式变革:内涵阐释、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J].中国教育学报,2025,(11):29-35.

[8]史建兴,杨波.高校舞蹈专业课程思政体系建构与实践——以包头师范学院舞蹈学专业为例[J].中国现代教育学报,2025,1(2):16-20.

[9]原世伟,茅洁,付志华,等.数字技术赋能体育教育评价转型:内涵、动力、问题与策略[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4,43(03):31-38.

[10]方万一心.高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机制构建研究[D].银川:宁夏大学,2025.

[11]Coskun,Tura Karademir,Alper, et al. Evaluating the evaluato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I and teacher assessments in Higher Education[J].Digital Education Review,2024,(45).

[12]Sekin,Ahmet Ada,Ate, et al. Review on Wearable Technology in Sports: Concep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J].Applied Sciences-base 1,2023,13(18):39.

[13]包伊琛,于英,滕育松.人工智能赋能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逻辑、现实问题与实践路向[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5,48(03):425-432.

[14]刘艳春,尤伟.高等教育数智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J].江苏高教,2025,(07):69-75.

体育心理学视角下高职武术教学中“正念训练” 的融入路径与效果

商昌敏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3)

摘要:从体育心理学视角出发,本研究旨在探讨正念训练融入高职武术教学的有效路径及其对教学效果的影响。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梳理相关理论与前期研究成果,通过问卷调查法了解高职学生特点与教学环境支持情况,并运用实验法对比正念训练融入前后学生武术技能、心理素质及教学满意度的变化。研究发现,正念训练可通过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及教学评价等多层面融入武术教学。融入后,学生在武术技能规范性、熟练程度上有显著提升,情绪调节与注意力集中等心理素质也得到改善,且对教学的满意度较高。

关键词: 体育心理学; 高职武术教学; 正念训练; 融入路径; 教学效果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34

The integration path and effect of "mindfulness training" in martial arts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s psychology

Shang Changmin

Yantai Vocational College of Culture and Tourism, Yantai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s psychology,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path of integrating mindfulness training into martial arts teach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its impact o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e research adopt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o sort out relevant theories and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uses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support of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employs experimental method to compare the changes in students' martial arts skills,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gration of mindfulness training. The study found that mindfulness training can be integrated into martial arts teaching through multiple levels such as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After integration, students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proficiency of martial arts skills, and their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such as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concentration have also been improved, with a higher satisfaction towards teaching

Keywords: sports psychology; martial arts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mindfulness training; integration path

一、引言

近年来,高职武术教学在传承传统文化、提升学生身体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对职业教育要求的不断提高,单一技能传授的教学模式已难以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

与此同时,体育心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逐渐深入,为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方向。正念训练作为一种源自东方哲学的心理干预方法,因其在情绪管理、注意力提升等方面的显著效果,在教育领域受到

广泛关注。研究表明,将正念训练融入体育课能够显著改善学生的无聊倾向,并促进其心理健康。此外,正念训练与体育教学的结合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运动技能,还能增强其心理韧性,为高职武术教学注入新的活力。

尽管高职武术教学在培养学生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心理素质培养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例如,高职学生普遍面临较大的学业压力与就业焦虑,而传统武术教学往往忽视了对学生情绪调节能力与心理适应力的培养。同时,部分学生在武术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畏难情绪与自信心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进一步影响了其学习效果与心理状态。在此背景下,探索如何将正念训练有效融入高职武术教学,以弥补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正念训练通过强调专注当下与接纳自我,有助于缓解学生的心理压力并提升其学习动力,从而为高职武术教学提供新的改进路径。

本研究旨在从体育心理学视角出发,探索正念训练融入高职武术教学的有效路径,并系统评估其对教学效果及学生心理素质的影响。具体而言,研究将围绕以下目标展开:首先,通过分析正念训练与武术教学理念的契合点,构建适合高职学生的正念训练融入方案;其次,结合高职学校的教学资源与环境,设计可操作性强且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路径;最后,通过实证研究验证正念训练对学生武术技能提升及心理素质改善的实际效果,为高职武术教学改革提供科学依据与实践指导。

二、文献综述

(一) 体育心理学相关理论

体育心理学作为心理学与体育学交叉的重要领域,其核心理论在武术教学中具有显著的指导意义。运动动机理论强调个体参与体育活动的内在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直接关系到武术技能的掌握程度和心理素质的培养。例如,在武术教学中,教师通过设置明确的目标和适当的挑战性任务,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内部动机,从而提高其学习效率与专注力。此外,注意力集中理论指出,注意力的分配与控制在体育技能学习中起着关键作用,尤其是在需要高度协调身体动作和呼吸节奏的武术训练中,集中注意力是提升技能表现的重要前提。研究表明,通过刻意营造紧张氛围或增加干扰因素,教师能够帮助学生筛选外界信息,强化心理抗干扰

能力,进而提升其注意力水平。这些经典理论为探讨正念训练融入武术教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 正念训练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正念训练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逐渐增多,尤其是在体育教学中展现出显著的效果。正念训练是一种以觉察当下为核心的心理干预方法,其核心理念包括有意注意、非评判态度以及对当前经验的开放接纳。已有研究表明,将正念训练融入体育课程能够显著改善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例如减少焦虑情绪、增强注意力集中能力,并提升整体学习效果。在武术教学中,正念训练的价值得到了进一步体现。例如,通过结合正念呼吸与武术动作的练习,学生不仅能够更好地掌握技术要领,还能在训练过程中培养内心的平静与专注力。此外,正念训练还被证明有助于调节情绪状态,特别是在面对高强度的竞技压力时,学生能够通过正念练习快速恢复心理平衡,从而提升比赛表现。这些研究成果为正念训练在高职武术教学中的融入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

(三) 高职武术教学研究现状

高职武术教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传承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重要形式,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然而,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模式创新等方面,而对于如何通过心理干预手段提升教学效果尚存在较大空白。现有文献指出,高职武术教学的特点在于注重技能传授与文化内涵的结合,同时强调对学生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全面培养。然而,由于高职学生普遍面临较大的学业压力和就业压力,其心理素质的培养往往被忽视,导致部分学生在武术学习中表现出畏难情绪或缺乏自信。尽管一些研究提出了通过“禅武合一”理念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建议,但具体实施路径仍不明确。此外,目前关于正念训练在高职武术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较为匮乏,尤其是在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及评价机制等方面的系统性探索尚未深入开展。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为正念训练融入高职武术教学提供科学依据与实践指导。

(一) 正念训练与武术教学理念的契合点

正念训练作为一种以专注当下、觉察内心为核心的心理训练方法,其理念与武术教学中强调的身心合一、内外兼修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武术

教学注重通过形体动作与呼吸配合来实现对身体和意识的全面掌控，而正念训练则强调通过觉察当下的经验来提升个体对自我和环境的认知能力。例如，在武术练习中，学生需要集中注意力于动作的细节与呼吸的协调，这种专注状态与正念训练中的“专注当下”理念高度一致。此外，正念训练提倡接纳放下和不评判的态度，有助于学生在武术学习中减少因动作不熟练或失败而产生的焦虑情绪，从而更好地投入到技能掌握的过程中。这种心理上的接纳与武术教学中所倡导的“泰然自若”“从容不迫”的精神内涵相呼应，为学生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学习体验。因此，将正念训练融入武术教学不仅能够强化学生对武术动作的理解，还能促进其心理素质的全面提升。

（二）高职学生特点与正念训练的适应性

高职学生在心理和学习方面具有独特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正念训练在其教育过程中具有较高的适应性。首先，高职学生正处于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初步形成的关键阶段，但由于缺乏社会阅历，往往容易表现出心烦气躁、自信心不足等问题。正念训练通过引导学生关注当下的感受和体验，帮助他们缓解负面情绪，增强情绪管理能力，从而改善心理状态。其次，高职学生的学习动机普遍较弱，部分学生可能存在学习倦怠的现象。而正念训练能够通过学习过程中的专注力培养，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进而提升学习效果。此外，武术作为一项内外兼修的传统体育项目，其学习过程本身就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力。正念训练的结合可以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抗挫能力和坚韧品格，使他们在面对学习困难时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综上所述，正念训练不仅能够满足高职学生在心理发展方面的需求，还能够为其综合素质的提升提供有力支持。

（三）教学环境与资源支持

高职学校现有的教学环境和资源为开展正念训练融入武术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首先，从场地设施来看，高职院校普遍配备了专门的体育场馆和武术训练场地，这些场地不仅能够满足武术教学的基本需求，也为正念练习提供了安静、舒适的空间。其次，在师资力量方面，高职院校的体育教师通常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这为实施正念训练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教师可以通过系统的培训掌握正念训练的基本原理和实施办法，从而将其有效地融入武

术教学中。此外，高职院校还可以通过引入外部专家或开展校际合作的方式，进一步优化教学资源，提升正念训练的质量和效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部分高职院校在正念训练的相关设备和教材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这需要学校在未来加大投入力度，完善相关配套设施。总体而言，高职学校的教学环境和资源已经具备了开展正念训练融入武术教学的基本条件，但仍需进一步优化和补充。

四、正念训练融入高职武术教学的路径

（一）课程设计层面

在高职武术教学中，正念训练的融入首先需从课程设计层面进行系统性规划。理论课程作为武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递正念理念的理想平台。在武术理论课程中，教师可以引入正念的概念、原理及其对武术学习和身心健康的益处，从而为学生奠定理论基础。研究表明，正念训练强调的专注当下与觉察内心等核心理念，与武术教学中注重身心合一、内外兼修的理念高度契合。通过讲解正念的神经科学机制及其对情绪调节和注意力提升的作用，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正念在武术实践中的潜在价值。此外，正念训练还被证明有助于缓解焦虑、增强自我意识，这些益处对于武术学习者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实践课程中，正念练习的设计应紧密结合武术动作的学习与训练。例如，在武术套路练习中，可以安排专门的正念呼吸与动作配合环节，让学生在动作执行过程中专注于身体感受与呼吸节奏的变化。这种练习方式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对动作的掌控力，还能增强其对“形、神、气”的理解，从而更深刻地体会武术的内涵。已有研究指出，正念练习与体育项目的结合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运动表现和心理素质，特别是在技能掌握和情绪管理方面表现出积极效果。因此，在武术实践课程中融入正念练习，不仅是对传统教学方法的有效补充，更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途径。

（二）教学方法层面

在教学方法层面，引导式教学法和反馈式教学法是实现正念训练融入高职武术教学的关键手段。引导式教学法通过教师的语言引导，帮助学生进入正念状态，从而更好地专注于当前的学习任务。例如，在武术动作练习前，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闭上眼睛，专注于身体各部位的感觉，并通过深呼吸调整身心状态。这种引导方式不仅能够

帮助学生快速进入练习状态，还能培养其对自身身体感受的敏锐度，从而提高动作的质量和效率。此外，教师还可以结合具体的武术动作，设计针对性的正念引导语，例如在太极拳练习中强调动作的流畅性与呼吸的协调性，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正念体验。

反馈式教学法则通过及时给予学生正念练习的反馈，纠正其练习中的偏差，从而强化正念体验。在武术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观察学生的表现，指出其在正念练习中存在的问题，例如注意力分散或呼吸节奏不稳等，并提供改进建议。同时，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之间相互反馈，促进彼此的学习与成长。研究表明，及时的反馈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正念练习效果，并增强其对正念训练的兴趣和信心。此外，教师还可以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如录音文件或视频资料，为学生提供标准化的正念练习指导，确保其在课外也能持续进行正念训练。

（三）教学评价层面

在教学评价层面，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是评估正念训练融入高职武术教学效果的重要方法。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在正念训练过程中的表现，如专注度、情绪变化以及参与度等，作为评价的一部分。通过观察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教师可以及时发现其在正念练习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例如，在正念呼吸与武术动作配合练习中，教师可以记录学生的呼吸节奏是否稳定，以及其在动作执行过程中是否保持专注。这种评价方式不仅能够反映学生的正念练习效果，还能为其后续的学习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

结果性评价则将学生经过正念训练后在武术技能和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提升作为评价依据。在武术技能方面，可以通过对比实验前后学生的动作规范性、熟练程度以及整体表现来评估正念训练的效果。在心理素质方面，则可以运用心理测量工具，如焦虑量表和注意力测试，分析正念训练对学生情绪调节能力和注意力集中水平的改善情况。此外，教学满意度调查也是评估正念训练融入效果的重要补充。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学生对融入正念训练的武术教学的满意度和反馈意见，可以了解教学的可接受性和改进空间。这种多维度的评价体系不仅能够全面反映正念训练的实际效果，还能为教学改进提供科学依据。

五、正念训练融入高职武术教学的效果评估

（一）学生武术技能提升效果

正念训练作为一种心理干预手段，其在高职武术教学中的应用对学生武术技能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通过对比实验前后学生的武术动作规范性、熟练程度等指标，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正念训练对技能掌握的积极影响。研究表明，正念训练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集中注意力，从而在动作练习中减少错误率并提高动作的精准度。例如，在学习复杂的武术套路时，学生通过正念呼吸与动作配合练习，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动作的细节和要领，进而增强对动作的记忆和理解。此外，正念训练还强调通过表象训练强化动作的心理模拟能力，这种内在的心理练习与实际动作练习相结合，有助于学生在实践中更加流畅地完成动作组合。研究数据表明，经过系统正念训练的学生在武术套路的规范性评分上显著高于未接受训练的学生，且动作的熟练程度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从运动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正念训练通过增强学生的专注力和身体觉察力，为其技能学习提供了重要支持。在武术教学中，学生需要同时协调身体多个部位的动作，这对注意力资源的要求较高。正念训练能够帮助学生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的动作执行过程，避免因外界干扰或内部杂念而导致动作失误。同时，正念训练还通过反复的心理模拟练习，强化了学生对动作顺序和巧的记忆，从而提高了动作的整体连贯性和稳定性。这一发现与相关研究结论一致，即正念训练能够有效促进运动技能的学习与表现。

（二）学生心理素质改善效果

正念训练在高职武术教学中的应用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武术技能，还对其心理素质产生了显著的改善作用。通过运用心理测量工具，如焦虑量表、注意力测试等，研究发现正念训练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调节情绪状态，增强注意力集中能力，并缓解因学习压力带来的焦虑感。具体而言，正念训练通过引导学生专注于当下的身体感受和呼吸节奏，使其能够在面对紧张或压力情境时保持冷静和沉着。例如，在武术比赛或考核中，学生常常会因为心理压力而出现动作失误或情绪波动，而正念训练则能够帮助学生通过深呼吸和专注力训练快速恢复平静状态，从而提高应对压力的能力。

此外，正念训练还对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研究表明，高职学生在武术训练初期往往因动作不标准或运用不流畅而产生焦虑

情绪,这种负面情绪可能进一步影响其学习效果和自信心。然而,正念训练通过打破传统的机械式记忆训练模式,引导学生通过表象训练将动作形象化和具体化,从而激发了学习兴趣并稳定了心理状态。研究数据显示,接受正念训练的学生在焦虑量表评分上的改善幅度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其注意力集中能力也得到了明显提升。这表明,正念训练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克服学习过程中的心理障碍,还能为其心理素质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持。

从心理适应性的角度来看,正念训练还增强了学生的心理韧性和抗挫能力。在武术教学过程中,学生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失败或挫折,而这些经历可能对其自信心造成打击。正念训练通过培养学生对当下体验的接纳态度,使其能够以更加积极的心态面对挑战。例如,在武术对抗或竞赛活动中,学生通过正念训练学会了“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品质,从而形成了坚韧不拔的意志力。这种心理韧性的提升不仅有助于学生在武术学习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还为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教学满意度调查结果

为了全面评估正念训练融入高职武术教学的效果,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学生对教学改革的满意度和反馈意见。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对融入正念训练的武术教学持积极态度,认为这种教学方法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武术技能水平,还对其心理素质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具体而言,超过80%的学生表示,正念训练帮助他们更好地集中注意力,并在动作练习中感受到更强的身体觉察力。此外,约70%的学生认为正念训练有效缓解了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焦虑情绪,使其能够以更加轻松的心态参与武术训练。

从教学可接受性的角度来看,学生对正念训练融入武术课程的设计和实施方式普遍表示认可。例如,许多学生提到,教师在课堂上通过语言引导帮助他们进入正念状态,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增强了他们对动作的理解,还提升了整体学习体验。同时,学生对正念练习的反馈机制也表示满意,认为及时的反馈有助于他们纠正练习中的偏差并强化正念体验。然而,也有少数学生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如希望增加正念练习的时间和频率,以及进一步优化正念训练与武术动作结合的实践环节。这些反馈为未来教学改进提供了重要的参

考依据。

总体而言,教学满意度调查结果表明,正念训练融入高职武术教学具有较高的可接受性和有效性。学生在技能提升和心理素质改善方面的积极体验,进一步验证了正念训练在高职武术教学中的潜在价值。这一发现为未来相关研究和教学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同时也为高职武术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六、研究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需要进一步改进。首先,研究样本范围较为有限,仅选取了部分高职院校的学生作为实验对象,可能无法全面反映不同地区、不同背景高职学生的整体情况。其次,研究时间相对较短,正念训练的长期效果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尤其是在学生心理素质的持续改善方面仍需更长时间的跟踪观察。此外,由于教学资源的限制,部分学校在开展正念训练时面临场地不足或师资短缺的问题,这也影响了研究的推广性与普适性。

参考文献:

- [1]秦银健,石俭. 正念训练对体育高考武术专项考生执行功能的影响研究[J]. 运动与健康,2025,4(10):109-112.DOI:10.20272/j.cnki.ydyjk.2025.10.028.
- [2]珥贵芳. 基于缓解高中生焦虑情绪的武术教学策略和方法[J]. 冰雪体育创新研究,2025,6(14):86-88.DOI:10.20155/j.cnki.issn2096-8485.2025.14.029.
- [3]姜来鹏,勾庆华. 竞技武术套路新规则背景下“Choking”现象的困境与破解路径研究[J]. 中华武术,2024,(01):91-93.
- [4]唐龙. 正念训练对散打运动员执行功能影响研究[D]. 首都体育学院,2023.DOI:10.27340/d.cnki.gstxy.2023.000144.
- [5]王肖天. 正念视阈下运动员竞赛焦虑心理训练探讨[J]. 当代体育科技,2019,9(28):31-32.DOI:10.16655/j.cnki.2095-2813.2019.28.031.
- [6]徐守森,杨东霖,祝卓宏,等. 武术套路运动员的状态流畅与正念、认知融合、经验回避的关系[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9,33(10):798-800.
- [7]向伟,徐远超. 国内关于正念训练的应用研究综述[J]. 管理观察,2018,(33):109-111+114

地方文化融入校本课程的立体化体系构建与实践反思

董芳远¹ 颜同宇¹ 方梦麟¹

(1.广东梅州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梅州 514011)

摘要: 在文化强国与数字中国战略引领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活态传承与校本课程的深度融合成为文化教育领域的重要命题。梅州客家非遗作为岭南文化的核心载体, 其山歌、围龙屋营造技艺等项目蕴含丰富的审美、历史与文化价值, 但传统校本课程中存在传播形式固化、互动体验不足、传承链条断裂等现实困境。本文基于文化资本理论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结合TTM-2.0模型的核心逻辑, 构建“数字化资源建设—混合式教学实践—自媒体创作赋能—延迟性公共化”的全链条理论框架, 以梅州某职业院校为实践载体, 通过1+3+N立体化资源库、“线上—线下—线上”混合教学、学生自媒体创作培育等路径, 验证新媒体与非遗教育融合的可行性。实践显示, 该模式显著提升学生文化资本储量(CCP提升87.3%)、新媒体应用能力(提升439.2%)及毕业生非遗传播参与率(提升458.5%), 同时完善校本课程体系、扩大非遗传播影响力, 为地方非遗校本课程的文化浸润与可持续传承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 新媒体; 非遗校本课程; 高校课程; 实践路径; 客家文化; 文化传承

基金项目: 2025年梅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MZSKLX2025098); 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项目(2024WQNCX264); 梅州市教育教学研究课题(MZ12YBKT381)。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45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Reflection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System of Integrating Local Culture into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ong Fangyuan¹ Yan Tongyu¹ Fang Menglin¹

1. Guangdong Mei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Meizhou, Guangdong 514011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a culturally strong nation and a digital China, the dynamic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and its deep integration with school-based curricula have become significant topics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education. As a core carrier of Lingnan culture,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Hakka people in Meizhou, including items such as folk songs and the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of Weilong houses, embodies rich aesthet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However, traditional school-based curricula face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rigid dissemination formats, insufficient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and broken inheritance chains. Based on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and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 and incorporating the core logic of the TTM-2.0 model,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digital resource development—blended teaching practice—empowerment through self-media creation—delayed public dissemination." Taking a vocational college in Meizhou as the practical context, the feasibility of integrating new media wit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is validated through approaches

作者简介: 董芳远(1972—),男,研究生,广东梅州梅州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
颜同宇(1988—),男,研究生,广东梅州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
方梦麟(1990—),女,博士,广东梅州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

通讯作者: 方梦麟

such as a 1+3+N three-dimensional resource database, "online-offline-online" blended teaching,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self-media creation skill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is model significantly enhances students' cultural capital reserves (an 87.3% increase in CCP), new media application abilities (a 439.2% improvement), and graduate participation rates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issemination (a 458.5% rise). Additionally, it refines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system and expands the influe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issemination, providing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paradigms for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sustainable inheritance of loc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school-based curricula.

Keywords: new media;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practical pathways; Hakka culture; cultural inheritance

一、引言

非遗作为民族文化基因的活态载体，其传承质量直接关系到文化多样性的延续与文化自信的培育。《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提出“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将非遗融入校本课程成为落实文化传承教育的核心举措。梅州客家非遗历经千年积淀，形成了以山歌、汉剧、竹编、围龙屋建筑为代表的多元文化体系，但在传统教学模式中，非遗内容多以理论讲授为主，学生缺乏沉浸式体验与实践机会，导致文化认同薄弱、传承动力不足。

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这一困境提供了破解思路。短视频、直播、VR/AR等数字化工具打破了非遗传播的时空限制，实现了静态展示向动态互动的转变。然而，当前非遗与校本课程的融合仍存在重形式、轻内涵、重传播、轻教育的问题，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与可操作的实践路径。基于此，本文以梅州客家非遗为研究对象，结合文化资本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TTM-2.0文化传播模型，构建新媒体赋能非遗校本课程的理论体系，并通过职业院校的教学实践验证路径可行性，为同类课程开发提供借鉴。

二、理论基础与体系构建

文化资本理论：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将资本划分为身体化、客观化与制度化三种形态。非遗作为客观化的文化资本，需通过身体化实践（技艺实操、情感体验）转化为学生的内在素养，新媒体技术为文化资本的系统化输入与情境化转化提供了高效载体。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是学生在情境中通过主动参与、互动体验建构知识的过程。新媒体赋能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线上资源学习、线下实践体验、线上反馈迭代的闭环，为学

生提供了非遗知识建构的多元情境。

TTM-2.0 模型核心逻辑：借鉴“高校课程—课程实践—文化公共化”的三阶框架，突出“延迟性公共化”理念，将学生在校期间的非遗素养转化为毕业后的持续传播行为，实现从“校园传承”到“社会辐射”的长效转化。

以梅州某职业院校校本课程为核心实践载体，依托“数字化资源建设—混合式教学实践—自媒体创作赋能—延迟性公共化”的全链条框架，开展为期三年的系统性教学实践，形成三条相互支撑、协同发力的核心路径，为非遗与校本课程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可操作、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三、新媒体赋能非遗校本课程的实践路径

数字化资源建设作为整个实践体系的基础支撑，创新性构建“1+3+N”立体化资源库，彻底打破传统非遗教学中资源零散、获取不便、呈现单一的局限。数字化资源建设以“1+3+N”立体化资源库为核心，联合非遗传承人、新媒体企业搭建多终端数字学习平台，实现资源“一站式”访问。通过模块化拆解非遗技艺视频、虚拟现实沉浸式场景、“视频+互动+文本”数字化教材，覆盖N个本地核心非遗项目，紧扣“非遗+时尚+传播”跨界融合，破解传统资源零散、体验不足等问题。

混合式教学构建“线上—线下—线上”闭环：线上依托“非遗云课堂”与在线教学平台，实现传承人远程授课、精准化教学衔接；线下通过传承人面对面指导、客家古村落田野调查、校园文化节，推动理论实践转化与文化沉浸式体验。打破传统课堂边界，通过抖音直播、腾讯会议等新媒体平台开设“非遗云课堂”，邀请非遗传承人远程授课，借助平台互动功能实现实时问答与交流探讨，营造开放多元的学习氛围；学习通等在

线教学平台的应用,进一步强化教学的系统性与规范性,教师通过平台发布精准化预习任务、在线测验与讨论话题,引导学生自主预习与巩固复习,形成线上线下教学的有效衔接。线下实践深化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传承人面对面指导下参与非遗技艺实际创作,实现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的转化线上反馈迭代形成“学习—实践—反馈—优化”机制,动态提升教学质量。

自媒体创作赋能环节聚焦培育非遗传播“青春力量”,将学生从非遗学习者转变为主动传播者,构建传承长效动力机制。技能培训紧扣新媒体传播时代需求,开设“短视频剪辑”“直播运营”等配套课程,邀请行业专家开展专题培训,系统传授内容创作、平台运营技能,让学生熟练掌握专业工具,具备独立开展非遗新媒体传播的能力。创作激励机制有效激发学生创作热情,采用“岗赛课证”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从不同视角挖掘非遗文化内涵与价值,创作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新媒体作品,实现非遗文化多渠道、多角度传播;这种以赛促学、以赛促创的模式,既提升学生创作能力,更让学生在创作中深化对非遗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四、TTM-2.0 文化传播模型的实践应用与效果分析

为高效落地 TTM-2.0 文化传播模型,核心需围绕“场景适配—全链落地—机制保障—数据迭代”形成闭环,通过精准优化模型要素、强化多元协同与量化评估,实现文化传播从“短期成效”到“长效辐射”的转化。实践中需以“文化资本积累为核心、数字化技术为支撑、延迟性公共化为目标”,将模型四阶段框架与具体场景深度融合:优先根据应用场景(校本课程、文旅传播等)调整核心要素权重,如校本课程侧重学生情感认同与新媒体能力培育,文旅传播侧重传播覆盖面与产业转化;在全流程落地中,以“适配性数字化资源建设”夯实基础,通过“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教学实践”建构文化认同,借助“技能赋能+激励引导”推动自媒体创作转化,再以“数字化跟踪平台”保障延迟性公共化的长效性。同时,构建“校-企-社-传承人”四方协同机制,配套针对性激励与多元评价体系,破解资源不足、动力薄弱、跟踪困难等痛点,最终通过数据反馈持续优化模型应用效果。

评估维度	传统教学模式 (均值)	TTM-2.0 优化模式 (均值)	提升幅度	核心驱动环节
文化资本储量 (CCP)	38.6 分	72.3 分	87.3%	混合式教学+技能赋能
非遗知识掌握 (K)	45.2 分	78.6 分	73.9%	数字化资源+闯关学习
非遗技艺实操 (S)	18.5 分	65.3 分	253.0%	传承人进课堂+项目式学习
情感认同度 (E, 5 点量表)	2.1 分	4.2 分	100.0%	场景化体验+文化浸润
新媒体应用能力 (M)	15.3 分	82.7 分	439.2%	专项课程+案例拆解
传播效果指数 (CEI)	38.5 分	75.7 分	96.6%	自媒体创作+平台推广
毕业生非遗传播参 与率	12.3%	68.7%	458.5%	延迟性跟踪+职业适配

注:数据基于梅州某职业院校 92 名学生前后测、126 条新媒体作品监测及毕业生 1 年跟踪调研,采用 SPSS 26.0 统计分析,所有指标提升均满足 $p < 0.001$ (极其显著差异)。

从数据可见,TTM-2.0 模型通过全链条设计,在非遗技艺实操、新媒体应用能力及毕业生传播参与率等关键维度实现跨越式提升,尤其解决了传统模式中“技艺实操弱、传播动力不足”的核心痛点。实践中可基于此类量化数据,进一

步调整各环节权重与实施细节,例如针对情感认同度仍有提升空间,可增加非遗主题研学、传承人故事分享等场景化活动,让模型应用更贴合实际需求。

五、实践成效与反思

通过校本课程,在学生培养、课程建设与文化传承三个维度形成良性互动与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课程层面,成功构建“理论+数字+实践+传播”的立体化课程体系,彻底打破传统非遗课程重理论、轻实践,重传承、轻传播的局限。该体系以理论知识为基础,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以实践操作为核心,以文化传播为目标,实现多要素有机融合与协同发力,丰富课程内容与教学形式。

为进一步推动非遗校本课程持续优化与高质量发展,需从师资、评价机制、协同合作三方面发力。师资建设方面,构建分层分类培训体系,根据教师现有基础与发展需求设置基础层、提高层、专家层培训内容,分别聚焦非遗基础知识与数字化工具应用、数字化资源开发与教学模式创新、课题研究及课程体系建设。

评价机制方面,打破传统单一评价模式,建立“教师评价+学生互评+平台数据评价”的多元体系,教师评价侧重知识掌握与技能提升,学生互评关注作品创意与表现力,平台数据评价关注传播效果与社会影响力;评价内容实现全面化,将知识考核、技能测试与实践参与度、情感认同度、创新能力、传播贡献等纳入评价范围,采用“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协同合作方面,进一步深化“校—企—社—生”多方协同机制,高校与本地非遗企业、新媒体公司、文旅企业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明确各方在课程建设、实践教学、资源开发、就业推荐等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与地方非遗保护中心、博物馆、文化馆等社会组织合作,共同开展非遗普查、文化展演、课题研究等活动,借助其平台资源推广课程成果与学生作品;推动校校之间合作交流,与本地中小学、兄弟院校共享数字化资源库与实践基地,开展“非遗进校园”共建活动,扩大课程覆盖面与受益群体。

六、结论与建议

新媒体技术的深度应用为地方文化校本课程创新发展提供强大赋能,构建的“数字化资源建设—混合式教学实践—自媒体创作赋能—延

迟性公共化”四阶段实践框架,实现文化传承从课堂内部到社会层面的有效延伸,形成“教育传承—实践转化—社会传播”的长效机制。梅州某职业院校的实践充分证明,这种融合模式不仅有效丰富校本课程内涵与形式,打破传统学科教学边界,提升课程吸引力与实效性,更在学生文化素养培育、地方文化传承与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学生通过参与课程学习与实践,既掌握专业技能,又深化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与热爱,成为非遗文化的积极传承者与传播者;地方非遗文化借助数字化传播渠道与青年群体力量,扩大影响力与覆盖面,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高校通过课程建设与实践,发挥服务地方文化发展的职能,实现教育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这种多方共赢的实践模式,为地方高校开展非遗校本课程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具有重要推广价值与应用前景。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深化,技术应用上探索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在非遗教学中的深度应用,打造更具沉浸感、互动性的教学场景;研究对象上将课程实践范围从职业院校扩大至中小学,探索不同教育阶段非遗校本课程的建设路径;研究内容上加强对延迟性公共化长期效果的跟踪研究,深入分析非遗传播的长效机制与影响因素,为非遗可持续传承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让非遗文化在数字化时代真正实现活态传承、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 [1] 孟霆,姜海丽,刘艳磊.美国高校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经验及启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39(4):80-84.
- [2] 张莉.优秀非遗与艺术设计专业课程结合的教学模式探索[J].天工,2024(14):69-71.
- [3] 陈燕.基于混合式“金课”的高职非遗广绣课堂教学实践研究[J].大观(论坛),2025(4):165-167.
- [4] 宋春华,方梦麟.现代教育与文化发展的融合研究[M].北京燕山出版社.2024(1)
- [5] 冯晓英,王瑞雪,吴怡君.国内外混合式教学研究现状述评——基于混合式教学的分析框架[J].远程教育杂志,2018(3):13-24.

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面向“动态课堂” 教学体系的范式创新探索

胡文嘉¹

(1.四川省青神中等职业学校, 四川 眉山 620460)

摘要: 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是土建类中职学生的核心必修课,也是较难掌握的专业基础课。为了适应新时期中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针对中职学生的学习基础现状和传统教学困境的现实情景,结合互动式教学理念与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构建了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的“动态课堂”教学体系,该体系包含递进式教学、任务驱动式教学、交互式教学和虚拟仿真教学的集成教学方式,并以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行为引导、知识传授、技能训练、教学反馈和专家检验为主要实现步骤。以此为推动中职教育的相关专业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环境的范式创新提供教改策略和实现路径上的有益参鉴。

关键词: 建筑制图与识图; 中职教育; 教学改革与实践; 教学模式创新; 动态课堂

基金项目: 2023年四川省教育科研课题:基于县域经济需求的中职学校特色人才培养路径探构(SCJG23A278); 2020年四川省教育科研资助金项目重点课题:基于非遗传承的竹编特色专业校本课程开发研究(SCJG20A079); 2024—2025年度眉山市教育科研课题:中职“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的动态课堂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49

Research on Teaching Reform of Architectural Drawing and Recognition Courses - Exploring Paradigm Innovation in a "Dynamic Classroom" Teaching System

Hu Wenjia¹

¹ Sichuan Qingshe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Meishan, China

Abstract: The course of Architectural Drawing and Recognition is a core compulsory subject for students in civil engineer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a challenging foundational course. To meet the demand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current learning foundations of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the realitie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dilemmas. By integrating interactive teaching philosophi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a "Dynamic Classroom" teaching system for Architectural Drawing and Recognition has been developed. This system incorporates an integrated teaching approach that includes progressive teaching, task-driven teaching, interactive teaching, and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The main implementation steps involve teacher-led and student-centered activities, including behavioral guidance, knowledge imparting, skill training, teaching feedback, and expert validation. This serves a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innovative teaching content, methods, and environments in related vocational education courses, offering strategies and pathways for educational reform.

Keywords: Architectural Drawing and Recogni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s; Dynamic Classroom

一、研究背景

中等职业教育在中国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为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发挥着关键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等职业教育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近1.6亿的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支撑^[1]。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中等职业教育作为培养具备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重要载体,对于服务国家新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教育教学及其培养质量上有着更高和更优的教学改革要求,其紧迫性也更为凸显。

中等职业教育在新时期的高质量发展上,需要以中职学生现状为基础,以就业与深造并重,以服务学生生涯的多样化发展为导向,从而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有效创新。首先,根据研究数据统计,2010~2021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占比基本在40%以上,其毕业生规模占职业教育毕业生规模总量的60%以上,凸显了中职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1];其次,相对于普通高中学生而言,中职学生普遍存在知识基础较差、学习兴趣淡薄、学习能力参差不齐、缺乏持之以恒的钻研精神等现实问题;最后,传统的教学教案设计、照本宣科的讲课模式和填鸭式的知识灌输已经无法满足中职学生薄弱的基础、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和高质量的教学效果要求。为了改善这一现状,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和法规来促进中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推进,如《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2022年新修订)等,均鼓励运用现代化教学方式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改革;以及通过创新教学模式与方法来满足中职学生的多样化学习需求,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因此,推动中等职业教育中课程现代化教学模式的改革则显得尤为关键,紧迫且意义重大。

在土建类专业的现代教育体系中,“建筑制图与识图”是中职学生最早接触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基础专业课程,既是学习后续建筑设计、建筑构造、建筑施工等课程所应具备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储备的重要基础,也是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最为重要的专业技能和能否长远发展的重要职业素养^[2]。由于该课程对学生的空间想象力、逻辑思维 and 动手操作能力有较高要求,从而成为了

中职学生较难掌握的一门专业课程。并且,传统单向、静态和二维的课程授课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新时期中职教育中学生的多样化学习需求和高质量教学效果的提升。因此,如何利用现代化教学方式和采用创新思维来推动“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的教学范式创新,激发中职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成为中职土建类教师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现状综述

近年来,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核心技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实时模拟、动态可视、互动合作的多媒体教学方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应用,促进了中职教师在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中多元方向下的教学改革和创新。既有研究不断探索适用于中职学生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促进了该课程的教学方式和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的一系列突破。既有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模式的研究:其一,在不同目标下的课程设计研究中,赵绍青^[3](2011)探索了中职建筑制图与识图教学中不同阶段的课型选择;欧永健^[4](2020)通过赛课的备赛过程,对该课程中教学流程和教学内容进行了课程匹配的实例探索;郑竞适^[5](2021)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获取为目的进行了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改革;陈恒贵^[6](2022)对思政课程在建筑制图与识图教学中的融入进行了实践。其二,在新型教学模式的教学改革研究中,王玉^[7](2018)探索了“做学教合一”教学模式在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的应用;沈思思^[8](2018)探索了任务驱动法的教学模式在该课程中的应用;刘心迪^[9](2020)、贺娟^[10](2021)对微课资源在该课程教学中的运用进行了有效实践。同时,在中职的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中,也出现了虚拟仿真技术(如Sketchup、Revit、VR等软件)的初步应用探索,如范晓红^[11](2019)和王敏娜^[12](2019)基于BIM技术探讨了该课程设计的改革方向,促进了该课程的二维教学理念向三维教学理念的有效转化。

既有研究已证明,虚拟仿真技术在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中的运用对于解决学生普遍存在的理论基础差、理解能力弱和三维空间想象能力差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其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从而提高教学效果^[2,11-13]。相较于中职学生而言,高职学生和本科学生在该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已有较多虚拟仿真技术的教学实践和软件技能的掌握,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教

学效果、加强就业竞争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2,13-16]。然而,虚拟仿真技术在中职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改革的探索中,大多是理念性的课程宏观方向的改革建议,在具体课程的微观实践和教学范式创新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

为弥补此局限,研究结合了互动式教学理念与虚拟仿真技术,构建了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的“动态课堂”教学体系,旨在推动该课程教学改革的范式创新,促进二维教学理念向三维教学范式应用的有效转变,为新时期中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课程教学改革和授课方式转变的有益借鉴。

三、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的“动态课堂”教学体系架构

(一) 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的现实困境与教学改革

革的解题思路

在实际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发现中职学生存在理论基础薄弱、理解能力有限、三维空间想象力较差等问题,以及存在传统单一维度的教案设计、照本宣科的讲课模式和填鸭式的知识灌输方式的教学困境。近年来,虚拟仿真技术等新型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为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手段和解题思路。因此,研究结合该课程的特点,提出通过递进式教学、任务驱动式教学、交互式教学和虚拟仿真教学的改革方向,以期解决学生现状和教学困境的难点、痛点(图1),旨在推动该课程的教学范式创新,激发中职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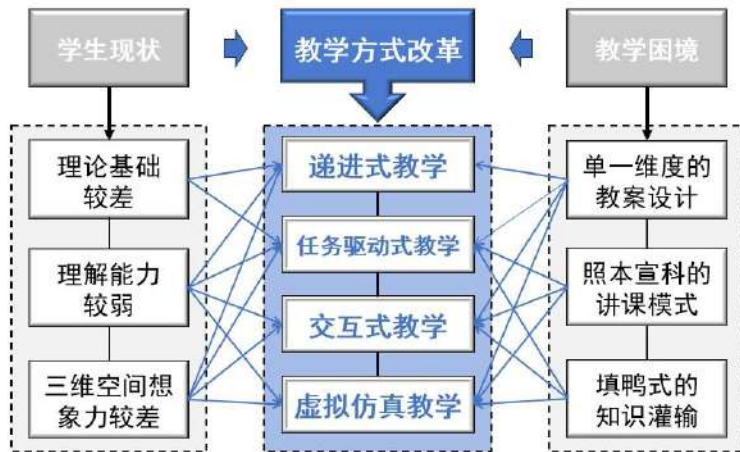


图1 学生现状和教学现状对应的教学方式改革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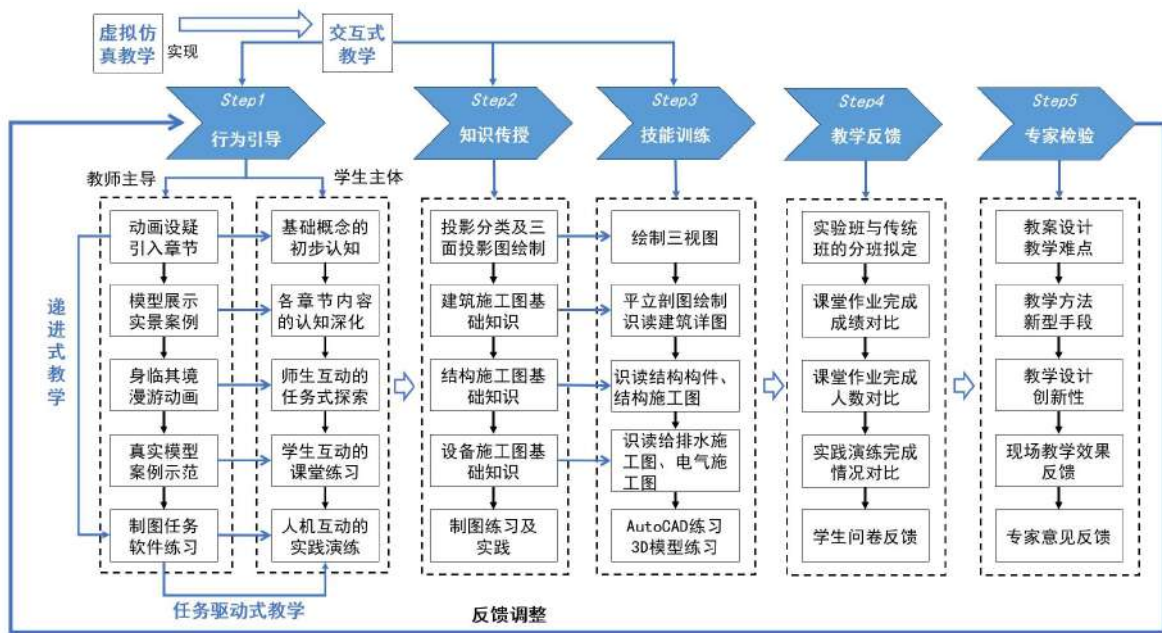


图2 “动态课堂”新型教学体系架构图

(二) 针对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的“动态课堂”

新型教学体系构建

“动态课堂”是以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为例构建的一种新型课程教学体系(图2),其结合了互动式教学理念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虚拟仿真技术),通过多种教学方法(递进式教学、任务驱动式教学、交互式教学和虚拟仿真教学)的综合应用和有机衔接,以及多元教学步骤(行为引导、知识传授、技能训练、教学反馈和专家检验)的逐步实施来构建而成。其教学体系在其他课程的应用上也具有较好的可推广性和参考价值。该体系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和教师的主导责任,以互动和任务为导向,以教学反馈与专家检验为改进途径,通过灵活多变的教与学模式为手段,以实现教学环境、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正向反馈和调整迭代的动态循环优化。其目的是创造出一个灵活互动、积极反馈且接近实际的学习环境,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主动参与到教学全过程,从而深入理解课程内容,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最终达到高质量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是。

(1) 递进式教学是按照从易到难、由表及里的步骤进行的一种渐进式教学方法。能够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与学习进度,将课程内容划分为难度逐步递增的层次阶段。教师会在每个阶段提供相匹配的教学内容的指导,以此帮助学生逐步理解和掌握课程知识。递进式教学的重要性在于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和基本需求,精确匹配教学内容,确保学生能够逐步吸收和理解课程知识,帮助学生逐步构建课程的知识图谱,以此提高学习效果和质。如图2所示中,递进式教学是从教师主导的“动画设疑、引入章节”开始,到“制图任务、软件练习”为止的渐进式的教学方法。

(2) 任务驱动式教学是以完成任务为主线,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一种教学方式,能够凸显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重要性。其核心在于设计匹配课程知识的任务,通过为学生提供具体任务或知识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引导他们主动探索知识和解决问题。任务驱动式教学的重要性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使学习内容更具有指向性、应用性和可操作性。如图2所示,任务驱动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能够一一对应教师主导的“递进式教学”中五个步骤的实现,即从“基础概念的初步认知”开始,到“人机互动的实践演练”为止。

(3) 交互式教学是指师生互动、学生互动和人机互动的一种多元积极交互的教学方式。通过灵活运用师生问答、小组协作、上机实践等多样教学形式,促进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激发学生主动思考和沟通表达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形成。交互式教学的重要性在于能够创造积极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学习效果和技能训练,并有效提升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沟通能力。如图2所示,交互式教学贯穿课程教学中“行为-知识-技能”的全过程(步骤1到步骤3)。

(4) 虚拟仿真教学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如Sketchup、Revit、VR、AR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造模拟实际环境的仿真学习环境,使学生可以进行虚拟实践和模拟实验,提供在书本知识以外的直观视觉感知和操作体验。学生可以进行建筑制图与识图相关知识的实际操作和练习,加深对概念和知识的理解,能够提前接触真实工作场景,提高技能实践能力。其重要性在于提供安全、便捷和可控的实践环境,促进学生实操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虚拟仿真教学是贯穿整个动态课堂体系运行的基础,是实现“交互式教学”、“递进式教学”和“任务驱动式教学”教学效果提升的重要保障(图2),同时也是传统二维教学理念向三维教学理念转变的重要技术手段。

(三) “动态课堂”的教学步骤解析

“动态课堂”教学包含五个步骤:行为引导、知识传授、技能训练、教学反馈和专家检验。这个过程从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行为-知识-技能”的层层递进和紧密关联的教学步骤,到教学反馈和专家检验的教学反馈机制的构建,从而实现教学体系的正向反馈和调整迭代的动态循环优化,能够推动该教学体系的不断自我完善和进步。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成效。同时,动态课堂也为教师提供了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及其资源应用,具有较高的教学灵活性和可推广性。

(1) 行为引导包含了教师行为和学生行为,是指教师在动态课堂中扮演引导者的角色,通过设计一系列与中职学生学习水平相匹配的教学活动,让学生能够跟随教师的教学引导,明确学习目标、规范学习行为和激发学习动机。其重要性在于能够将教学任务与学生为主体的学习目标进行合理的衔接和对应,通过教师的示范和指导,

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性和自主性。行为引导应用了“递进式教学”和“任务驱动式教学”的方法,将两者在此课程教学设计中“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五个步骤进行了一一对应(图2)。

(2) 知识传授在动态课堂中具有更多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应用的支持基础,教师通过对课程中各章节知识的难点解构和逻辑重构,并结合教材、多媒体资源、在线学习平台、真实/虚拟仿真模型等,通过讲解、演示、示范等方式,促进学生通过听、看、问、练等方式,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课程的相关知识。针对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具体而言,知识传授主要将其教材内容的难点重新解构,并针对就业和升学的实用性,通过“递进式教学”的逻辑重构,将该课程的知识传授总结为“投影分类及三面投影图绘制”、“建筑施工图基础知识”、“结构施工图基础知识”、“设备施工图基础知识”和“制图练习及实践”五个方面的学习内容(图2)。

(3) 技能训练是动态课堂中教学成果的重要体现,其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和操作能力。教师通过设计实际案例、模拟练习和实践项目等任务,引导学生进行实际操作和技能训练。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有效应用(如3D模型对应知识点的讲解、软件上手练习等),帮助学生强化知识传授的教学效果,从而掌握正确的实践技术和方法,并通过技能训练的实践活动,促进学生的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针对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具体而言,技能训练能够对应“知识传授”中五个章节知识点的技能衔接训练,具体对应内容如图2所示。

(4) 教学反馈是动态课堂中教学效果有效与否的重要验证手段。一方面,教师需要给予学生作业练习或考试成绩的及时反馈,以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展和问题所在;另一方面,教师通过不同班级的课堂测验、作业评价、期末成绩等形式的比较,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表现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估和反馈;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收集学生对授课内容、教学方式、新技术应用等的问卷反馈,了解学生对整体课程教学的看法和建议,以便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和改进策略(图2)。

(5) 专家检验是动态课堂体系中的最后一步,也是整个课程教学体系是否能够得到广泛认可和同类教学优劣评比的最终检验手段。通过参与教学竞赛,邀请专家对整个课程教学体系(教学改革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效果等)、

现场学生的表现和效果来进行评审和意见反馈。专家的评审意见可以帮助教师了解教学效果和存在的问题,并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建议。教师可以根据专家的反馈进行整个教学体系中各部分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的调整和改进,最终形成教学体系的正向反馈和调整迭代的动态循环优化(图2)。

四、结语

本研究结合互动式教学理念与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在根据中职学生的学习基础现状和传统教学困境的基础上,构建了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的“动态课堂”教学体系,该体系包含递进式教学、任务驱动式教学、交互式教学和虚拟仿真教学的集成教学方式,并以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行为引导、知识传授、技能训练、教学反馈和专家检验为主要实现步骤。以期在中职土建类专业课在教学内容、教学环境和教学方式上的范式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参考和教学改革实践的路径指导。同时,也期待在更多课程和专业中引入和实践这种教学模式,以期推动我国中职教育的全面提升和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岳金凤,郝卓君.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报告——基础与方向[J].职业技术教育,2021,42(36):17-26.
- [2] 陈梅,刘娟,陆化来.仿真数字化资源在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中的应用[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08):67-70.
- [3] 赵绍青.浅谈中职建筑制图与识图教学中课型的选择[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1(05):15-17.
- [4] 欧永健.中职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教学能力大赛备赛初探[J].安徽建筑,2020,27(08):167-168.
- [5] 郑竞适.“1+X”证书制度下的建筑制图课程教学研究[J].教师,2021(35):95-96.
- [6] 陈恒贵.中职《建筑制图与识图》教学中的课程思政实践[N].科学导报,2022-12-20(B02).
- [7] 王玉.“做学教合一”教学模式在中职学校《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中的探究[J].考试周刊,2018(87):20.
- [8] 沈思思.任务驱动法在中职建筑制图课程中的应用——以“点的投影”教学为例[J].职业,2018(12):62-63.

[9] 刘心迪.微课在中职建筑制图识图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33(01):60-62.

[10] 贺娟.中职建筑制图识图教学中微课资源的具体应用[J].现代职业教育,2021(34):176-177.

[11] 范晓红.基于BIM的中职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设计改革探讨[J].现代职业教育,2019(29):40-41.

[12] 王敏娜.基于BIM的中职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设计改革探讨[J].福建建材,2019(06):117-118.

[13] 张杰,韦灵.基于BIM的职业本科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砖瓦,2023(07):169-172.

[14] 刘文吉,严瑾.基于BIM技术的“建筑构造与识图”课程教学研究[J].住宅与房地产,2020(12):278.

[15] 张瑾.BIM+VR在《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中的应用研究[J].四川水泥,2019(05):149.

[16] 魏世辉,杨金凤.装配式与BIM技术融入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绿色科技,2019(21):277-278.

非遗知识生产与教育转译：艺术本位研究视域下的鹤山狮头跨 学科美术教育研究

简蓓殷¹

(1.鹤山市第一中学附属中学, 广东 鹤山 529700)

摘要: 本文以鹤山狮头为案例, 探讨其在跨学科美术学习中的课程组织与学习证据生成方式。研究采用艺术本位研究取向, 将学生作品、课堂过程与展示反馈视为主要材料, 关注传统文化内容在教学情境中如何被提炼、表达并在实践中被验证。教学实践主要面向七年级学生, 按递进结构展开。先以图文任务建立共同理解, 通过图文简报、明信片与曼陀罗式填色等不同形式, 引导学生分别从语境叙事、传播表达与情绪联结三条路径进入对象, 并形成可阅读的成果; 再以三维泥塑制作推进操作性理解, 学习者在体积、比例、层次与细节处理中不断修正, 使原本停留于纸面的特征判断转化为可触可检验的结构处理; 最后结合舞狮体验与作品展示, 使动作协作带来的经验校准与公共呈现中的解释互动共同促成意义回流。研究发现, 鹤山狮头在课堂中逐步形成三类可教学的知识形态。围绕地方语境的叙事性知识、面向“他者”说明的表达性知识、以及依赖材料与结构判断的工艺性知识。三类知识在不同任务与媒介中留下对应的证据, 并通过展示反馈得到再组织。本文据此提出一条可迁移的非遗跨学科美术学习路径, 为非遗课程的目标设定、过程记录与作品评价提供参考。

关键词: 非遗教育; 鹤山狮头; 跨学科美术教育; 艺术本位研究; 课程转化

基金项目: 2024年度鹤山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课题批准号: HSJY-2024-A-026)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48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al Translation in ICH: An Arts-Based

Cross-Disciplinary Art Education Study of the Heshan Lion Head

Jian Beiyin¹,

¹ *The Affiliated Middle School of Heshan No.1 High School, Heshan,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Heshan lion head as a case to examine how cross-disciplinary art learning can be organised and how evidence of learning can be generated through classroom practice. Adopting an arts-based research approach, the study treats student artworks, documented classroom processes, and exhibition feedback as primary sources of evidence, focusing on how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tent is selected, articulated, and tested in pedagogical settings. The intervention was implemented primarily with Grade 7 students and followed a progressive sequence. It began with visual-textual tasks to build shared understanding: through art briefs, postcards, and mandala-style colouring, students engaged the topic through contextual narration, communicative expression, and affective connection, producing shareable artefacts. The work then shifted to three-dimensional clay modelling to develop procedur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iterative decisions about volume, proportion, layering, and detail, students translated paper-based feature recognition into materialised and assessable structural reasoning. Finally, lion-dance experience and a public exhibition were incorporated, where embodied coordination and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 during presentation supported meaning negotiation and reflective consolidat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Heshan lion head gradually emerged in the classroom as three teachable forms of knowledge: narrative knowledge grounded in local context, expressive knowledge

作者简介: 简蓓殷(1996—),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美术创作及美术与书法教育

通讯作者: 简蓓殷

oriented to an external audience, and craft knowledge dependent on material and structural judgement. These forms of knowledge left traceable evidence across tasks and media and were further refined through exhibition feedback. The paper proposes a transferable pathway for cross-disciplinary art learning wit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fering reference points for goal setting, process documentation, and the assessment of student work in ICH-oriented curricula.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Heshan lion head; Cross-disciplinary art education; Arts-based research; Curriculum translation

一、绪论

近年来,“非遗进校园”在美术教育与美育实践中被持续推进,但其课堂化、任务化与成果化的过程并不等同于对传统文化的“原样移植”。非遗一旦进入学校体系,往往会经历选择、重组与再语境化。一方面,这为课堂教学提供了可操作的知识结构与学习路径;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符号化”“展示化”的倾向,使原本依附于材料工艺、身体动作、社群协作与场景语境的活态知识被压缩为可快速呈现的图像或口述要点。因此,或许被真正追问的并不是非遗是否应该进入课堂,而是非遗在进入课堂的过程中如何被转译为可学习、可创作、可交流的教育经验,以及这种转译如何形成可分析、可追溯的知识形态与教育价值。

基于此,本研究以鹤山狮头为研究对象,在跨学科美术教育框架中展开艺术本位研究(Arts-Based Research,以下简称为ABR)。研究依托“狮舞心语、绘彩传承”等主题活动,以鹤山狮头非遗文化为核心,强调通过多维度、多学科融合教学提升学生美术技能,以此加深对鹤山狮头非遗的理解与传承意识。使非遗教学不再局限于知识讲授,而是以美术为枢纽,将历史理解、多语言表达、情绪联结与身体体验纳入同一学习链条。此外,本研究并未停留在二维层面的理解与表达,而是进一步将学习推进到三维的物质化重构,从而为教育转译提供可观察的过程结构。

要而论之,研究形成递进的三阶段路径,并构成本文讨论非遗知识生产与教育转译的分析主线。第一阶段以二维视觉与文本成果为主要载体,通过教师讲授与跨学科任务引导学生进入鹤山狮头的文化语境。即围绕历史溯源与象征意义完成简报,通过英语表达与明信片设计模拟对外传播情境,以心理色彩寓意为线索开展情绪联结与图像创作,将非遗从地方生活实践转化为课堂中可叙述、可书写、可视化的二维证据。第二阶段由二维表征推进至三维物化,以泥塑制作为核心任务,遵循文化要素提取,到造型建构,再到功能

与情感整合的设计逻辑,使学生在材料操作、比例塑形与细节处理的过程中,将造型、色彩、寓意落实为可检验的形式,从而把对非遗的理解由符号认知深化为“做中知”的结构性与工艺性知识。第三阶段则以具身体验以及成果展示收束并外化学习过程,将阶段性产出置入体验与公共语境,使作品成为意义协商与学习反思的媒介,进而形成作品到过程,再到呈现证据闭环。

在三阶段实践框架下,本文以ABR为方法论,将艺术实践视为知识生成与论证的媒介。基于此,本文的研究关切凝结为两项核心问题:第一,鹤山狮头相关知识在跨学科组织中如何被选择与重组,并在二维阶段实现文化理解、对外表达、情绪联结的整合性转译;第二,在三维作品制作与最终展示的连续过程中,传统要素如何经由元素提取、形式决策、功能与情感整合被再生产为可评价的设计证据,并通过公共化呈现与反馈推动意义回流与学习反思。

二、先行研究与理论框架

(一) 鹤山狮头与非遗教育

关于鹤山狮头的研究与叙述,往往同时涉及“狮艺”与“狮头制作”两条线索,前者体现为身体性、协作的表演传统,后者体现为材料、结构、造型与象征语汇的工艺传统。鹤山狮艺于2007年进入江门市首批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同年进入广东省第二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江门市人民政府,2022);与此同时,鹤山狮头制作技艺也在市级层面获得非遗名录认定,自2012年起逐步推进并视为“狮艺进校园”等传承工作的关键抓手(鹤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2023)。可见,鹤山狮头相关传统本身就处在保护、传承、教育化的现实链条之中,故而研究其在美术教育中的转译路径具有明确的实践基础。

依国际视野而言,UNESCO《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教育与传播明确纳入保护措施,

在第14条提出应通过面向公众,尤其青少年的教育与宣传、社区内部的教育与培训项目等方式促进对非遗的认识、尊重与弘扬(UNESCO, 2003)。UNESCO“非遗与教育”专题进一步强调:教育在非遗保护中具有关键作用,非遗亦可为教育提供情境化内容与教学法资源,从而提升教育的相关性与学习成效(UNESCO, n.d.-a)。此外,UNESCO在正规与非正规教育中保护活态遗产的项目文本中同样强调跨部门协作、方法与评估工具开发、以及把经验固化进教育体系的重要性(UNESCO, n.d.-b)。据此,非遗教育在学理上不宜被简化为“文化知识讲授”或“符号再现”,更应被理解为一种课程工程,它既涉及知识形态如何被选择与组织,也涉及学习如何通过实践、作品与公共表达实现意义协商与价值稳定。

故而,对于本研究而言,鹤山狮头的特殊性在于其复合结构,同时连通视觉表征、物质工艺与具身传统。因此,当其进入跨学科美术教育时,哪些要素被转化为可学习任务,如何通过媒介与评价机制被经验化,以及学习者如何在二维表达、三维制作与成果呈现中形成对地方文化更具结构性的理解成为研究的重点。

(二) 跨学科美术教育与“转译”研究

跨学科课程研究普遍认为,课程整合并非多学科内容的拼接,而是围绕真实议题重组学习结构,使学生在理解、行动与价值层面形成连贯经验(Beane, 1997)。在艺术教育国际政策语境中,《艺术教育路线图》强调艺术教育对创造力、文化意识与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性,并倡导通过伙伴关系与知识共享促进艺术教育融入教育系统(UNESCO, 2006)。这些研究与政策共同指向:跨学科美术教育的关键在于“如何组织经验”,也就是把文化议题转化为可操作的学习任务,并通过评价机制维持学习的连续性与严谨性。

然而,跨学科并不能自动解释非遗进入课堂如何改变其知识形态。为把分析推进到机制层面,本文引入“转译、再语境化”视角,将非遗从地方生活实践进入课堂的过程理解为一种结构性改写。也就是,某些要素被凸显、某些要素被压缩;某些经验被步骤化、任务化与评价化;并且在“正统与创新”“理解与应用”“文化与功能”等要素中形成课堂可接受的解释与标准。

(三) ABR 方法谱系

ABR的核心立场是:艺术不是研究的装饰,而是认识与论证的方式。Barone与Eisner系统阐

述ABR框架,指出艺术形式能够扩展质性研究对经验复杂性与意义层次的把握,并以更具感知密度的方式呈现社会文化现象(Barone & Eisner, 2012)。Leavy将ABR视为跨学科方法工具集合,强调艺术方法既可用于材料生成,也可用于分析与呈现,使“作品”能够同时承担研究材料与论证媒介的功能(Leavy, 2015; 李维, 2019)。在美术教育研究语境中, a/r/tography进一步将艺术家、研究者、教师的三重身份交织为“生活探究”,通过作品与文本互证的方式呈现经验如何生成理解(Irwin & de Cosson, 2004; Springgay et al., 2005)。对本文而言,ABR的关键价值在于:它允许将课堂中生成的二维作品、三维文创与成果展示视为“证据节点”,并通过过程档案、反思文本与反馈材料将作品与其生成条件连接起来,从而使研究能够从“成果罗列”推进到“解释”。这也意味着,本文的论证不依赖单一量化指标,而是依托从作品到过程,再到展示的证据链来分析非遗知识如何在教育转译中被选择、被改写并被稳定。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纵向跟踪设计,自2025年1月12日启动。样本以七年级学生为主,但会随研究时间呈现自然递进。研究设计以实践过程为中心,强调在真实教学情境中追踪知识如何被选择、组织与再语境化,并通过作品与过程材料建立可论证的证据链。整体上,本研究采用ABR作为方法论框架,将艺术实践视为知识生成的路径与论证媒介(Barone & Eisner, 2012; Leavy, 2015; McNiff, 1998),并以课堂实施的过程性资料为支撑,形成对转译机制解释,而非停留于成果描述。

研究场域为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所依托的学校美术课程实践,教师以课程讲授、任务组织与评价反馈等方式参与并构成研究过程的重要条件。研究者在此并非外部观察者,而是以“课程设计、教学实施、作品生成、反思分析”交织的方式进入现场:一方面需要承担教学组织与任务推进,另一方面需要以反思性立场记录关键决策与课堂互动,辨析哪些文化要素被强调、哪些经验被压缩,及其背后的教育逻辑与限制。为减少研究者与教师双重身份可能带来的偏差,本研究将反思记录与作品、过程材料进行对照,并在关键节点引入同伴讨论与学生反思材料,以提升解释的可检验性。

在资料与证据方面,研究遵循ABR“作品即

证据”的原则，建立从作品到过程再到呈现的证据链。核心材料包括：其一，作品材料，涵盖二维视觉、文本成果、三维泥塑文创作品及最终展陈文本与呈现形式；其二，过程材料，包括教学设计与课堂实施记录、课堂影像与照片、学生制作过程记录、草图与修改痕迹、阶段性展示材料；其三，反思与评价材料，包括教师的过程性观察与评价记录、学生个人与小组的学习总结与改进建议等。上述材料共同指向同一研究目标：不仅呈现“做了什么”，更能追踪“如何做成”“为何如此做”，从而支持对转译机制的分析。

研究程序与教学实践保持一致，采用“三阶段递进”的结构组织资料采集与分析。在分析策略上，研究采取与资料形态相匹配的综合分析：一方面对作品进行视觉材料分析，聚焦造型结构、色彩、纹样处理、材料塑形与细节策略，追踪文化要素提取、形式组织、意义呈现的链条；另一方面对过程与反思材料进行主题分析，通过开放编码与聚合归类识别反复出现的机制性主题，并将其与三阶段实践的关键节点对应起来，形成解释框架。分析过程采用迭代方式推进，先以阶段为单位建立初步主题，再跨阶段对照，识别哪些机制在不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稳定结构，哪些机制因任务与评价条件而发生变形，从而将发现提升到转译机制的层次。

为确保研究的严谨性与可信度，研究重视解释的可追溯性，并在论证中明确指出结论对应的作品证据与过程证据来源，使读者能够追踪“结论从何而来”；在伦理层面，研究遵循教育研究基本

规范，对影像与作品呈现进行必要的授权与匿名处理，避免将学生个人信息暴露于公开文本；在文化层面，强调对非遗语境与地方主体性的尊重，避免将文化要素工具化为装饰符号，并在讨论章节中对“正统与创新”“传播与消费”的边界作出审慎辨析。

通过上述研究设计与方法安排，本文希望在不削弱课堂实践复杂性的前提下，将跨学科组织、媒介转换、作品生成、公共呈现，转化为可分析的研究路径，从而对鹤山狮头非遗在美术教育中的知识生产与教育转译机制给出具有证据支撑的解释。

四、鹤山狮头的非遗知识谱系与表征结构

（一）二维视觉与文本成果的转译

本研究的第一阶段以二维视觉与文本成果作为主要载体。ABR 强调作品及其生成过程本身可以成为研究材料，作品不只是呈现结果，也承载着理解如何被组织、如何被表达、如何被修订的痕迹（Barone & Eisner, 2012; Leavy, 2015）。因此，本阶段的“二维成果”并非同质化的一类作业，而是被刻意区分为三种表征形态，分别对应三条不同的学习逻辑与证据功能：美术与历史以“美术简报”完成语境化叙事，美术与英语以“明信片”模拟对外传播情境，美术与心理以“曼陀罗式填色”引导象征意义进入情绪联结与自我表达。

具体而言，美术与历史的融合主要通过“美术简报”推进，其核心特征是图文结构的组织能力。



图 1. A 同学“美术简报”



图 2. B 同学“美术简报”



图 3. C 同学“英语明信片”

以图 1、2 为例，A、B 学生分别将标题、栏目、文字段落与视觉主体进行版式编排，形成一种接近“学习型信息图”的表达。其以醒目的题名建立主题识别，部分分栏文字呈现历史线索与象征解释，狮头形象则作为视觉凸显，其余部分补入鼓具等关联物象，构成对象、语境、相关符号的并置关系。这样的简报形式迫使学生们完成信息取舍与叙事压缩。学生们需要把资料中关于起源、演变、地域风格与象征语汇的内容压缩为可讲述的段落，段落之间要有因果或时间顺序，而不是零散摘抄。图像不再仅是“画一只狮头”，而是要回应文字中的关键点，例如把某些具有辨识度的结构部位画得更突出，或用标注、色块与构图强调。

其次，美术与英语的融合虽然同样是图文并置，但表征逻辑与简报不同，它通过明信片把学习放入“对外传播”的语境之中。例如图 3 展示了 C 同学明信片的两面：正面以狮头形象为主体，同时引入烟花、山形、茶杯等情境物象，并用英文标题“The Heshan Lion head”直接命名对象；背面则以英文书信体进行介绍，包含称呼、主体信息、邀请语和署名等基本结构。与简报相比，明信片的限制更强，版面更小，信息容量更低，这反而形成一种重要的学习机制：学生必须把复杂文化信息压缩成“最值得让他者理解的三四句话”，并在词汇与句型层面做出选择。很多时候，学生会在这一环节显露出从“自明叙述”转向“他者可读”的转变，比如他们会主动补上“这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在节庆”“人们如何使用它”这类框架句，而不是只写“很有特色”。因此，明信片在研究中不仅体现英语学习，更是一种转译的约束装置，它

把文化理解推向可沟通性与可传播性，使“解释是否清晰”成为可观察的证据。就活动意义而言，这一模块为非遗教育补入了现实的传播维度，使学生不仅学习传统，也学习如何对外讲述传统，从而把“传承意识”落到表达能力与受众意识上。

第三，美术与心理的融合以曼陀罗式填色为主要形式，其重点不在信息叙事，而在象征语汇如何进入个体经验。图 5、6 呈现了学生们在狮头线稿基础上进行对称填色与局部强化的不同结果，各自颜色层层叠加，强调眼部与额部的节奏关系，背景以重复色块形成稳定框架。此处“曼陀罗”并非要求严格的圆形结构，而是一种心理教育中常用的视觉自我调节路径。其以可控的重复填色和对称组织引导注意力聚焦，使学生们在相对稳定的形式框架内进行情绪表达与意义投射。这一模块在非遗教育中补足了“体验层”的一块空白，它让学生通过色彩与节奏化填色建立与传统符号的个人关系，从而把非遗从外部文化对象转化为可感知、可反思的经验资源。

综上，本阶段之所以要区分简报、明信片、曼陀罗式填色三种二维形态，并不是为了追求形式多样，而是为了让鹤山狮头的非遗知识在课堂中获得三种不同的可见化路径：简报提供语境化与结构化叙事，使知识可被组织与比较；明信片提供对外阐释的传播约束，使表达的清晰度与受众意识成为证据；曼陀罗填色提供情绪联结的经验入口，使象征意义能够被个体化并被反思性书写。对研究而言，这三类二维产出共同构成 ABR 研究的初步结果，即非遗知识在课堂中被选择、压缩、重组，并以不同媒介规则固定为可追溯的图文证据。



图 5. “曼陀罗式填色”狮头作品



图 6. “曼陀罗式填色”狮头作品

(二) 从二维表征到三维泥塑的再生产

二维成果让学生能够用图文较清楚地呈现鹤山狮头的历史语境与象征要素，然亦存有天然局限。纸面容易呈现轮廓与色彩，却难以真实观察和处理狮头的立体细节，正因为这些关键细节在二维中难以被充分感知与验证，研究进一步引入三维泥塑实践，把理解推向可触摸、可调整、可检验的层面。相较于简报、明信片与填色作品侧重叙事与符号的清晰表达，三维制作把学习推向结构与工艺的可行性。学生不仅要保留狮头的识别性特征，还必须在体积、比例、层次、连接方式与细节处理上作出一系列连续决策。正是在这种“材料的反馈”中，非遗知识从符号认知进一步进入“做中知”的层面，转译由解释型表达推进为

工艺型理解。

具体而言，学生往往先在二维形成草图或口头讨论中明确几项必须被保留的核心要素，随后进入体块搭建。学生会先用大块泥塑确定基本外形与厚度，再以分层叠加的方式建立额部、眼眶、鼻头、嘴部等结构层次，最后通过小体块与线条刻画完成眉毛、花纹、牙齿、毛边或须部的效果（图7）。这个过程对应 ABR 常见的生成性修订，作品不是一次成型，而是在反复对照、修补与微调中逐渐趋于稳定（Barone & Eisner, 2012; Leavy, 2015）。从课堂观察来看，学生在这一阶段最明显的变化是注意力从“画面好不好看”转向“结构能不能成立”，他们会更频繁地用手指去确认对称与层次，或把作品放远一点看整体比例，再回到局部做调整（图7）。



图7. 三维狮头的制作过程



图8. 三维泥塑狮头与狮头冰箱贴展示

三维作品的成果呈现出明显的同构与差异并存。从图8等可见，学生作品在整体结构上保持了狮头的共同识别框架，例如眼部夸张、额部凸起、鼻口集中、下方垂饰与毛边的处理等，但在色彩配置、表情气质与附属元素上出现了丰富变体。有的作品强化传统红白黄的节庆感，有的则引入蓝、紫等冷色系统，形成更具当代审美的风格分化。部分作品还将红包、橘子、灯笼等小物

件与狮头组合，形成“节庆语境的微缩场景”，使三维作品不只停留在“单个物件造型”，而成为可叙述的文化片段。近景进一步显示了另一类变化，即在保留核心构件的前提下，学生对眼睛、眉部与面部比例进行了“卡通化”的再设计，强化了大眼、睫毛与圆润体块等特征，使作品呈现更强的亲和力与个人风格。这种差异并不等同于偏离传统，相反，它体现了一个重要的转译结果：学生

已经能够区分必须保留的识别性要素和允许发挥的表达性空间，并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这恰恰是非遗教育中传承与创造能够同时成立的关键位置。

（三）具身体验与公共呈现的闭环生成

前两阶段分别在二维图文与三维泥塑层面建立了可追溯的作品证据，若止步于仅“做出作品”，非遗学习仍可能停留在课堂内部的理解与再现。研究因此进一步把鹤山狮头重新放回其更接近“活态传统”的两种维度之中：一是具身体验，通过舞狮实践让学生直接面对动作、节奏与协作所构成的身体知识；二是公共呈现，通过作品展示与观者反馈使意义进入公共语境，促使学生对自身创作做出解释与修订。两者共同构成 ABR 所强调的闭环路径，即作品的生成并不终止于完成，而是要在过程记录与公共呈现中被再次检验与稳定。

具身体验环节以舞狮实践为核心（见图 9）。从具身认知的视角看，理解并非单纯发生在头脑内部，而是在身体、环境与任务要求的耦合中生成；身体既限制也塑造认知，运动经验能够反过来重组对概念与符号的理解（Wilson, 2002; 叶浩生, 2015）。在舞狮体验中，学生首先直接面对动作如何让形象成立的问题，例如俯仰、转向、蹲起带来的视线与重心变化，以及两人配合时节奏同步、步幅一致与空间距离的控制。与纸面观察不同，动作会把细节的意义放大：某些在图像中看似装饰的部位，在运动中反而决定“神采”是否清晰；学生也会更敏感地意识到“哪里需要夸张、哪里必须稳定”，从而把先前在二维和三维作品中形成的要素认识带回到真实动作情境中进行检验。具身体验在本研究中承担的不是附加活动，而是一种“反向校准机制”，它让学生重新确认狮头细节与结构在动态情境中的功能性意义，为后续解释与展示提供更有依据的经验支撑。



图 9. 狮头的具身体验



图 10. 作品展示

公共呈现环节以成果展示为中心（如图 10）。作品一旦进入展示场域，就不再只是课堂任务的终点，而会在命名、分组、陈列与观者互动中被重新组织为公共文本。博物馆与公共学习研究指出，学习并非只发生于个体内部，观看情境中的物理环境、社会互动与个人经验会共同塑造意义建构（Falk & Dierking, 2013; Hooper-Greenhill,

2007）。这一视角与本研究的展示设计高度契合，作品通过分层展示架、系列化框景与节庆语境背景被组织为可比较的“风格谱系”，观者的提问与评论促使学生以更清晰的语言回溯自身的形式决策。ABR 强调作品不仅是呈现结果的媒介，也可以成为推动理解再生成的论证媒介，尤其当作品进入公开交流时，解释压力会促使研究者与学习

者对证据与意义进行再组织 (Barone & Eisner, 2012; Leavy, 2015; McNiff, 1998)。展示环节因此不仅产生“呈现证据”, 例如布展逻辑、标签文本、作品分组方式等, 同样也会产生“反馈证据”, 如观者评论、现场提问、学生回应与反思, 等等, 从而使本研究能够从“做出了什么”推进到“为何这样做以及在公共语境中如何被理解”。

五、研究结果

本研究以 ABR 组织鹤山狮头非遗的跨学科美术学习, 研究证据主要来自作品、生成过程与公开呈现三类材料的连续互证。整体结果显示, 非遗在课堂中并不是被“讲授完毕”的对象, 而是在多种媒介与任务约束下被不断转写、修订并获得稳定意义的知识过程。研究最终形成一条可清晰追溯的闭环, 图文表达使语境与象征变得可读可讨论, 材料制作使结构与细节变得可触可检验, 舞狮体验与展示反馈则把狮头如何在动作中成立与作品如何被“他者”理解带回到学习者的解释中, 促成意义回流与再组织。在二维层面, 简报、明信片与曼陀罗式填色三种形式分别承担了不同的转译功能; 三维制作则把二维中难以充分把握的部分逼到台面上, 作品呈现出清晰的共识与差异并存。此外, 具身体验与公共呈现进一步把学习推向活态与公共维度, 而作品展示则通过命名、分组、陈列与观者互动形成解释压力, 促使学习者回到自己的形式取舍与文化依据, 完成反思与修订。由此, 研究所得到的不仅是作品集合, 更是一套可论证的知识生产路径, 语境化知识、表征化知识、结构化知识在不同媒介中显影, 并在行动与反馈中被验证与稳定。上述结果为跨学科美术教育中的非遗课程提供了可迁移的实践框架, 也为非遗知识生产与教育转译提供了可追溯的证据链解释。

参考文献:

[1] 江门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江门市第九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EB/OL].(2022-07-01).

[2] 江门鹤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传承鹤山狮艺, 看鹤山这样出招! [EB/OL]. (2023-12-13).

[3] 派翠西亚·李维. 艺术本位研究的9堂课[M].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9.

[4] 叶浩生. 身体与学习: 具身认知及其对传统教育观的挑战[J]. 教育研究, 2015, 36(4): 104-114.

[5] BARONE T, EISNER E W. Arts based research[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12.

[6] BEANE J A. Curriculum integration: Designing the core of democratic education[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7.

[7] IRWIN R L, DE COSSON A (Eds.). A/r/tography: Rendering self through arts-based living inquiry[M]. Vancouver: Pacific Educational Press, 2004.

[8] LEAVY P. Method meets art: Arts-based research practice[M]. 2nd ed.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15.

[9] MCNIFF S. Art-based research[M].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1998.

[10] UNESCO.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EB/OL]. (2003-10-17). <https://ich.unesco.org/doc/src/01852-EN.pdf>

[11] UNESCO. Road map for arts education: Building creative capacities for the 21st century[EB/OL]. (2006)[2026-01-13]. https://www.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s/fichiers/2022/03/lisbon_roadmap.pdf

[12] UNESCO.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education[EB/OL]. (n.d.). <https://ich.unesco.org/en/education>

[13] UNESCO. Funding priority 2: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formal and non-formal education (Global programme document; duration 2022 – 2025)[EB/OL]. (n.d.).

[14] SPRINGGAY S, IRWIN R L, KIND S W. A/r/tography as living inquiry through art and text[J]. Qualitative Inquiry, 2005, 11(6): 897-912. <https://doi.org/10.1177/1077800405280696>

[15] WILSON M. Six views of embodied cognition[J].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2002, 9(4): 625-636. <https://doi.org/10.3758/BF03196322>

校企双导师赋能非遗影像创作与教学革新 ——以《再会金元川剧团》为例

叶伟¹ 张林林²

(1.吉利学院, 四川 成都 641423, 2.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影像化记录与传播, 成为连接高校影视教育与社会服务的关键场域。本文以纪录片《再会金元川剧团》的制作实践为核心案例, 仔细分析“校企双导师制”怎么助力非遗影像的深度创作与高校影视教学的模式革新。研究发现, 行业导师的实践经验与校内导师的理论支持形成的配合方式, 能解决高校教学中实践不够深、成果不扎实, 以及非遗传播中叙事太雷同、难以出圈的双重问题。这个模式靠“长周期、深介入”的项目带动, 不仅培养了学生“深描式”的创作能力与文化转译素养, 还做出了能参与国际交流的文化精品。本研究想要给应用型高校构建“教学—创作—传播”一体化的产教融合新模式, 提供一套有理论启发和实践参考的可行办法。

关键词: 校企双导师制; 非遗影像; 教学改革; 文化传播; 产教融合; 纪录片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53

A Dual-Mentor Model for ICH Documentary and Teaching Reform: Leveraging Industry Academia Collaboration — The Case of *Choice After Seven Years*

Ye Wei¹, Zhang Linlin²

¹ Geely University of China, Sichuan, Chengdu 641423, China

² Chengdu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Station,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The visual record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has emerged as a pivotal nexus connecting academic film and television education with societal engagement. Taking the documentary *Choice After Seven Years* as a central case study, this paper meticulously examines how the "College-Enterprise Dual-Mentor System" empowers the in-depth creation of ICH imagery and facilitates pedagogical innovation within higher educa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synergistic mechanism formed by the practical expertise of industry mentors and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 provided by academic mentors can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dual challenges prevalent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lack of practical depth and the tenuous connection between academic outputs and tangible societal impact, alongside the issues of narrative homogenization and limited reach in ICH dissemination. Driven by "long-term, deeply engaged" project-based learning, this model not only cultivates students' "thick-description-style" creative capabilities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literacy but also yields cultural works of sufficient caliber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feasible, theoretically-informed, and practically-referenced framework for applied universities seeking to construct an integrated "teaching-creation-dissemination" model that deepens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Keywords: College-Enterprise Dual-Mentor System;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Imagery; Teaching Reform;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Documentary

作者简介: 叶伟(1982—), 男, 博士, 研究方向为影视艺术;

张林林(1985—), 男, 本科,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主任记者

一、引言

数字媒介深度重塑着文化生态，非遗保护与传承迎来了机遇和挑战都有的“数智时代”。影像这种现代叙事和记忆建构工具，已经成了非遗活态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另外，国内高校的影视艺术教育正积极回应新文科建设的要求，要培养有专业技能、文化洞察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高阶创作人才。但传统的实践教学因为和行业前沿脱节、和社会真实议题离得远，陷入了“技术实训”和“文化内涵”分家、“课堂作业”和“社会成效”不沾边的困境。

“校企双导师制”是深化产教融合的关键机制，现在被不少人提倡。这个制度要通过找行业一线专家和校内专业老师一起指导，把真实项目、市场标准和前沿动态融进教学过程。现在的研究大多盯着这个制度的宏观模式搭建或单个教学效果分析，却很少仔细研究它在完整的高标准艺术创作项目里——特别是在要懂深厚文化、会复杂叙事的非遗影像创作领域——具体怎么起作用、怎么配合，还有它的综合价值。

纪录片《再会金元川剧团》给这项研究提供了很典型的样本。该片由行业导师（成都市广播电视台首席记者）和校内导师一起执导，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担当主创（见图1）。作品不仅获得国内多项专业奖，更参加了被誉为纪录片界“奥斯卡”的第36届法国阳光纪录片节，做到了从课堂作业到行业认可、再到国际传播的三步跨越。本文以此案例，搭出一个整合“双主体协同（导师）—深层次实践（教学）—创新性转化（非遗）—跨域性传播（作品）”的全流程分析框架，仔细论证校企双导师制怎么成为推动非遗影像创作质量上升与影视教学改革的核心动力。

二、核心概念与学理支撑

（一）非遗影像传播的核心特质：从“技艺记录”

到“文化转译”与“记忆建构”

当代非遗影像的核心价值不止是简单的档案记录，它是一次实打实的文化转译实践。它有两个核心特点：一个是“活态叙事性”，就是用视听语言，把静态、按规矩来的技艺转成动态、有生命力的人物故事和情感变化，比如《再会金元川剧团》拍摄川剧演员跨越七年的坚守和选择；另一个是“记忆建构性”，即影像不只是客观记录，

还会主动参与打造社会文化记忆的过程，通过挑选、重组和美学表达，给地方性知识加上当代解读和普遍意义，把地方故事变成文化寓言。这些特点打破了非遗影像“记录即目的”的局限，让文化传承有了新的发展。

（二）高校影视教学中双导师制的协同机理：从“角色互补”到“生态共建”

校企双导师制不是校内外老师的简单拼凑，而是围着复杂创作项目形成的“动态育人共同体”。它的协同效果比单个老师的能力加起来强，是因为在以下三个维度上做到了互补融合。

表1 校企双导师三维度对比

维度	校内导师核心角色与赋能	行业导师核心角色与赋能	协同融合点（以《再会金元川剧团》为例）
理论与方法	提供学科理论框架、学术伦理规范、文化研究方法论及美学体系支撑。	导入市场与受众洞察、行业技术标准、传播渠道资源及项目运营逻辑。	把学术深度和传播效度结合，保证项目既有文化价值又有作品品相，比如定下《再会金元川剧团》“七年对比”的叙事结构。
实践与创作	抓好教学进度，指导田野调查得规范、要反思，训练学生的作者意识与文化批判思维。	主现场拍摄调度、人物采访、危机处理，传授高效创作流程与实战技巧。	在实际创作的时候，指导学生解决从激活历史素材到设计当代影调的全流程问题，把理论用到实际创作里。
素养与价值观	涵养学术品格、文化责任感与深耕精神，引导学生思考影像的社会意义。	灌输职业信仰、团队协作精神与创新转化意识，连接“技艺-产业”价值链。	一起带学生在长期跟拍里体会“坚守”的伦理深度，完成从技能学习到价值认同的转变，符合双导师制“价值共育”目标。

这种深度协同最后要做的，是建一个“教学、科研，加上创作和服务”四个放一块的健康教学生态系统，让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加上艺术创新和社会文化服务一起起作用。

（三）地方文化跨域传播的语境适配原则：构建“可沟通的文本”

非遗影像要突破地域和文化圈子，要遵守跨文化传播的“语境适配”原则。这要求创作时，要挖掘有“人类情感共通性”的主题（比如《再会金元川剧团》里的“传统与生存”“热爱与奉献”），要把“在地化符号”转成大家能懂的内容，用具体人物的命运传递共通的人文关怀，还要符合目标传播渠道（比如国际影展）的审美习惯和技术标准（比如专业的字幕、声画质量），非遗跨地域传播的核心是在文化独特性和传播通用性之间找平衡。

三、高校影视教学与非遗影像传播的双重困境

（一）高校影视教学的现存瓶颈

现在高校影视教学常碰到三个脱节：一是项目和社会脱节：短期、虚拟的课题作业没法让学生深入社会实际，作品流于表面，对真实问题没深入关注；二是技能和文化脱节：太看重软件操作和形式技巧，没重视挖掘题材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深度，导致作品“有技术无温度”；三是教学和行业脱节：课程内容跟不上行业变快的叙事方式

（如短视频化、交互性）和技术应用（如 VR、AIGC），培养的人才和行业需求对不上。

（二）地方非遗影像传播的现实难题

多数地方非遗影像掉进两个误区，影响传播价值实现。第一个是记录的内卷化：内容同质化严重，只停留在工艺流程的表面展示，没仔细关注传承人的命运与时代冲突，叙事节奏和语气老套，很难吸引年轻受众，这个问题和相关研究结论一致；第二个是传播的孤岛化：传播渠道单一，只在地方电视台或小型展映播放，没构建跨媒介叙事矩阵，也没做精准的受众分层，更别说对接国际传播平台，没法把文化价值发挥到最大。

（三）案例的突破点：《再会金元川剧团》的创新实践启示

《再会金元川剧团》的创作，就是对上述困境的一次全面突破，它的示范价值很明显。在教学上，证明了用长时间、深度参与的真实非遗项目当载体，能串起理论、实践和价值观教育，解决教学“空心化”问题；在创作上，展示了“深描式”人物刻画和“对比性”时间结构，能给地方故事带来厚重的史诗感和艺术感染力，打破非遗影像叙事瓶颈；在传播上，验证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完成度，顺着“地方奖项—国家级行业奖—国际影展”一步步往上走，最后作为中国优秀纪录片代表参加第36届法国阳光纪录片节，见图2。这部片子给非遗影像破圈传播提供了实际例子。



图1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周文彬在拍摄现场



图2 《再会金元剧团》在第36届法国阳光纪录片节中国展台现场

四、实践路径：基于案例的双重融合创新策略

(一) 高校影视教学革新路径：以非遗创作为纽带的项目制重塑

其一，重构课程体系。参考“识、赏、传、创”四阶育人体系，围绕非遗选题，做跨学期、跨课程（如《纪录片创作》《新媒体纪录片创作》）的纵向项目制课程群。《再会金元川剧团》项目就能放进这里面，当作核心教学案例和实践模板，形成“理论学习-实践打磨-成果转化”的闭环教学体系，解决短期作业和长线创作规律脱节的问题。其二，双导师全程跟着指导。定好联合备课、分段主控和复盘的规矩，符合双导师动态协同的模式。比如在《再会金元川剧团》项目里，前期调研和学术架构主要靠校内导师；现场拍摄和人物沟通由行业导师牵头；后期剪辑和风格定调就由两边一起指导学生完成，保证作品既有文化深度又有专业水准。其三，调整评价体系。做“过程性贡献（田野笔记、策划案）+作品性成果（成片质量）+社会性影响（参赛、展映、点击量）”的多元评价模型，把行业奖项和国际展映认可度直接当作教学成果的重要考核指标，形成“以赛促学、以展促教”的闭环激励。

(二) 地方非遗影像跨域传播路径：以案例为参照的升级策略

从“记录者”变“转译者”：《再会金元川剧团》聚焦非遗持有者的“生命史”，通过长期跟拍捕捉其与时代变迁的互动，用个体命运的微光反映文化传承的主旨。同时，用好数智技术做创新表达，比如建数字档案、试VR呈现等，但要以内容为主，不搞技术炫技，守住“非遗影像本真性与创新性平衡”的原则。再说调整叙事方式：打造“传承人IP”和情感共鸣点。把传承人当叙事核心，塑造他鲜活的个性和丰富的内心，打造有温度、有故事的“文化IP”。在叙事上，保持文化庄重感的同时，适当用点年轻人喜欢的节奏和形式（比如微纪录片、Vlog片段），让传播更吸引人。最后说搭建传播渠道：阶梯式和矩阵式传播。定下先做地方口碑、再冲国内行业奖项、最后进国际影展的阶梯式传播路线，靠行业导师资源对接好不同层级平台。同时，建融媒传播矩阵，把长片精髓拆成系列短视频，在社交媒体做话题营销；用“非遗+新媒体”模式增加互动，最终把作品放进地方文化数字资源库，实现长期使用和教育转化。

五、结语

纪录片《再会金元川剧团》从四川遂宁的乡间庙台走到法国阳光电影展，这不是巧合。这是校企双导师制在非遗影像创作领域内，一次成功的系统性赋能实践。这个案例能说明，当高校的学术智慧与行业的实战经验，在一个长期创作项目中紧密结合、一起发力时，释放的能量很大且多面——它既能培养出符合时代需求、有思想和技术实力的影视人才，也能做出打动人心、走出国门的文化精品。

这给新时代高校影视艺术教育怎么回应“文化传承创新”的国家战略和新文科建设的内在要求，提供了个既有理想高度又有现实温度的生动范本。推动基于“长期主义价值观的产教融合生态系统”做到制度化、常态化，还要兼顾创新，会是未来高校影视专业深化内涵建设、履行文化使命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 [1] 陈昱西.非遗影像研究对中国非遗发展的启示[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5,(02):52-55.
- [2] 宋在军,胡红梅.产教融合背景下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J].传媒,2021,(01):82-84.
- [3] 朱荣清,钟欣颖.非遗纪录片创作中的叙事策略研究[J].电影文学,2022,(13):14-19.
- [4] 刘倩,欧阳宏生.多措并举稳步推进中国纪录片高质量发展[J].电视研究,2022,(06):16-19.
- [5] 刘少梅.非遗保护背景下川剧传承人的实践探索[J].四川戏剧,2024,(07):107-109.
- [6] 唐瑞峰.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获奖名单揭晓广电总局印发《关于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J].电视指南,2019,(16):6-7.
- [7] 宋迎东.构建“四链协同”的产教融合卓越工程人才培养体系[J].中国高等教育,2025,(19):41-45.
- [8] 高士丁.校企协同机制在高校人才培养中的应用[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4,46(S2):236-238.

公共数据开放与农业经济韧性

王光荣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0000)

摘要:“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增强农业韧性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对风险挑战及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数据作为数据要素,其开放与利用为提升农业经济韧性提供了新的研究渠道。本研究旨在探究公共数据开放影响农业经济韧性的内在机理与实际效应,以期完善数据开放政策、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在实证研究部分,本研究构建了2012-2023年中国29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检验发现:第一,公共数据开放对农业经济韧性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的韧性提升效应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农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更为凸显。

关键词:公共数据开放;数据要素;农业经济韧性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64

Open data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Wang Guangrong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afeguard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ddressing risks and challenges,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 key factor of production, the opening-up and utilization of public data provides a new path for improving the resilien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This study aims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effect of public data opening-up on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data opening-up policies and empowe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the empirical study,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a panel dataset of 293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3, and measures the public data opening-up level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dex of each region. Tests using econometric methods such as fixed effect model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show that: first, public data opening-u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Second,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resilience-enhancing effect of public data opening-up is more prominent in regions with higher levels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advance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Keywords:Public Data Open;Data Elements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一、引言

农业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农业系统稳定的基石。农业安全面临诸多风险,受到干扰的农业经济系统恢复至正常模式已成为当前农业经济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关于农业现代化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

的战略目标,并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路径。积极应对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增强农业经济韧性,建设“韧性强”的农业强国,已然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热点话题。公共数据资源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效率、强化风险应对能力、促进产业融合创新,显著提升农业系统的适应性与恢复力。数据要素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抓手”，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数据资源开放作为农业优效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源动力，对增强农业韧性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消费环境，诱发了新型消费方式，刺激了市场需求，推动了农产品的销售，推动了国内农业经济循环，增强了农业经济对外部冲击的抵抗能力，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作用，促进农业经济韧性提升，对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农业强国”战略目标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日益严峻的自然生态风险，提升农业经济韧性，成为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保障农业经济系统平稳运行的重要选择。在外部冲击频发与突发的现实背景下，研究公共数据开放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对提升农业经济冲击应对能力、维护农业安全、助推农业强国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二、研究现状

2.1 公共数据开放的事实特征

政府数据平台是指将政府信息库以数据形式通过政府授权网站集中进行呈现的媒介。公共数据开放则是指放开数据集合使用的权限，让社会个体和企业均能够根据需求无偿从政府数据平台获取数据资源。政府数据平台开放的内容涉及面广，包括经济建设、信用服务、财税金融、交通服务、政府机构与社会团队、环境与资源保护、农业农村等一系列主题，逐步推进数据资源共享和政务信息化建设。早在2012年，北京市和上海市相继进行政府数据平台试点，长沙市、佛山市和深圳市等城市紧随其后，政府数据平台上线数量逐年增长。至2025年7月，全国城市级（含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及地级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231个，省级平台26个，合计257个省、市级平台。若按往年约5%的增速估，2026年城市平台数量还会有小幅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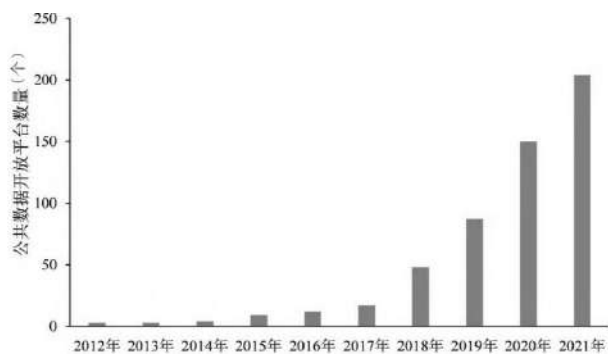


图1 历年城市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数量增长趋势

2.2 农业经济韧性的事实特征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要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充分强调了政府对锻造农业韧性的重视程度。

2011-2021年我国农业经济韧性表现为转型升级能力>适应调节能力>抵御风险能力。进一步分析总体韧性可知，各省域农业经济韧性总体呈现增强趋势，江苏、河北、广东、河南等地排名靠前，这些地区分布于沿海或平原地区，地理环境条件优渥，适宜进行农事生产活动；另一方面这些地区较早进行土地制度改革，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改革成果不断得到拓展，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对助力农业经济的发展有较强的推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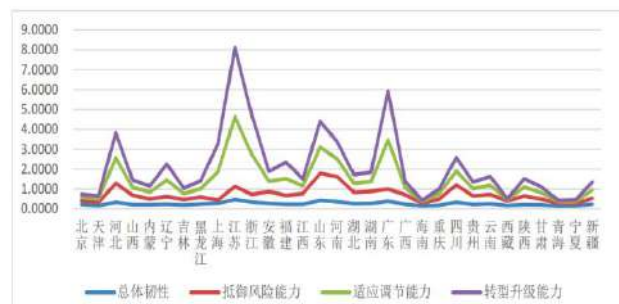


图2 2011-2021年我国农业经济韧性变化趋势

我国各区域农业经济韧性水平发展趋势来看，东部区域韧性整体情况优于中、西部地区。但从韧性增速来看，中、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且在2021年中、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韧性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已经很小。我国为在2021年完成全面脱贫战略目标，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这一群体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使得中、西部地区获得更大力度的财政补贴与优惠，对推动农业经济韧性增强作出重大贡献。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韧性相对最低，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存在农业科技落后、劳动力素质水平较低、自然环境严峻等问题，这些都不利于农业经济韧性的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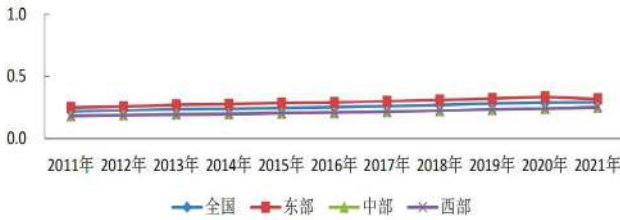


图3 2011-2021年全国及各区域农业经济韧性一级维度特点

为了能更直观地展现我国农业经济韧性的空间差异特点，本文参照张明斗（2022）所提出的农业经济韧性分类标准，将其划分为高韧性水平（韧性值 > 0.30）、中韧性水平（0.15 < 韧性值 ≤ 0.30）以及低韧性水平（韧性值 ≤ 0.15），并以这一标准为依据，对2012年与2025年我国各省的农业经济韧性水平展开了划分。（以下划分排名不分先后）2012年，处于高韧性水平的省份仅有河北、江苏、山东、河南和广东。这些省份多位于沿海地区或平原地带，地理环境优美，农业发展基础扎实。当地气候宜人，水土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因而具备较强的恢复能力。到2025年，我国高韧性水平的省份数量从5个增至9个，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及中西部农业生产规模较大的省份。这些省份韧性突出，面对外部冲击、突发事件以及国际国内经济和社会转型矛盾加剧的情况，能够有效抵御，展现出强大的恢复力，有力保障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平稳发展。2025年，我国所有省份处于中韧性水平，这与这些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农业科研人才培养力度较弱以及科研资金投入较少有关，这些因素制约了其农业经济韧性的发展。2012年仅有5个省份处于低韧性水平，这与当地自然资源匮乏以及未将农业发展置于首位的战略方针相关。而到2025年，我国大部分省份迈入中等农业经济韧性水平，且没有省份处于低韧性水平。由此可见，2012-2025年间，我国“三农”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与成就，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表1 我国农业经济韧性水平的类型划分

农业经济韧性水平	2012	2025
高韧性水平	山东、江苏、河北、河南、广东	安徽、山东、河南、吉林、北京、湖南、甘肃、江苏、黑龙江
中韧性水平	北京、上海、	天津、陕西、内

浙江、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新疆、湖南、湖北、山西、辽宁、陕西、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安徽、福建、江西、广西、

蒙古、宁夏、海南、重庆、四川、云南、北京、上海、福建、江西、贵州、西藏、陕西、山西、青海、广东、广西、新疆、湖北、辽宁

低韧性水平
天津、海南、西藏、青海、宁夏

三、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计

本文研究主题是以公共数据平台为表征的数据要素集聚效应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考虑到各地并非同时成为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建设的试点城市，本文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DID方法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评估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对农业经济韧性所产生的政策效果。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AER_{i,t} = \alpha_0 + \alpha_1 Didi_{i,t} + \sum X_{i,t} + \mu_i + \gamma_t + \epsilon_{i,t}$$

其中，被解释变量 $AER_{i,t}$ 表示城市 i 在第 t 年的农业经济韧性；核心解释变量 $Didi_{i,t}$ 为公共数据平台建设的政策虚拟变量； $X_{i,t}$ 表示一系列可能会影响农业经济韧性的控制变量。此外， μ_i 、 γ_t 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本文主要关注核心解释变量 $Didi_{i,t}$ 的回归系数 α_1 ，其代表了以公共数据开放为表征的数据要素集聚效应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平均处理效应，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判断其符号应为正。

3.2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农业经济韧性（AER）：指农业系统抵御冲击和破坏的能力，具体来说即当农业系统面临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和市场震荡等情况时的弹性恢复能力，以及重新整合资源、反向获得升级的能力。郝爱民和谭家银（2022）的做法，将指标体系分成二个维度：抵抗能力、适应能力。并采用熵值法进行测算，最终得到农业经济韧性指数。

表2 农业经济韧性驱动因素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属
抵抗性	生产韧性	耕地面积	正向
		农作物播种面积	正向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正向

适应性	经济韧性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正向	人均道路面积	正向
		第一产业增加值	正向		
		农民纯收入增长率	正向		
	生态韧性	农民人均纯收入	正向		
		村庄道路硬化率	正向		

农作物播种面积	3437	5.924	0.966	1.391	6.049	9.944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3441	9.152	0.760	4.477	9.259	12.230
耕地面积千公顷	3441	5.598	1.032	1.030	5.705	13.558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千瓦	3440	9.494	0.619	4.870	9.550	17.084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万吨	3441	9.362	0.635	2.586	9.458	17.030
农药化肥施用量万吨	3440	5.656	0.587	4.020	5.764	13.129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3441	10.299	0.646	3.412	10.428	14.073
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	3440	3.475	0.343	2.822	3.435	6.379

核心解释变量：公共数据开放（DID）。借鉴辛冲冲，袁一杰，韩韵格（2025）的做法，本文将公共数据开放试点城市作为该地区数据要素集聚效应的代理量。如果该地区上线了试点城市，则属于实验组城市，在入选当年及之后年份的 did 变量取值为 1；反之，未入选城市则属于对照组城市，did 变量取值为 0。

控制变量：

(1) 财政支持力度：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2) 城镇化率（urb）：城镇化进程能够推动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形成“以城代乡”模式，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对农业经济韧性产生正向影响；但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农村居民不再选择只依靠农业，对农业经济产出的预期下降，会选择以非农方式获得主要家庭收入，劳动力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三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业产出的效率。城镇化率以城镇人口占全省人口比重来表示。

(3) 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比。

(4) 产业结构高级化：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1+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2+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3。

3.3 数据描述

本文以全国 293 个地级市 2012-2023 年的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以及农业经济韧性有关的数据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 2012—2023 年，研究样本包含了 3441 个观测值。对于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局、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对于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

四、实证结果

4.1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策略。列（1）报告了仅加入解释变量与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公共数据开放（DID）的系数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列（2）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DID 的系数为 0.0372 仍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较小的系数变动表明本文选取的政策实验外生性较强，受到资源禀赋因素及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潜在影响较小。就本文研究的中国地方政府推动的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这一特定情境而言，其经济特性主要偏向于促进农业经济的模式。

表 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VarName	Obs	Mean	SD	Min	Median	Max
did	3441	0.237	0.425	0.000	0.000	1.000
第一产业增加值万元	3441	14.311	0.937	4.869	14.437	19.584
财政支持力度	3441	-1.526	0.355	-2.254	-1.527	0.303
产业结构	3441	0.155	0.253	-0.492	0.170	1.739
城镇化率	3441	-0.539	0.161	-1.475	-0.526	-0.110
产业结构高级化	3441	0.155	0.253	-0.492	0.170	1.739
产业结构高度	3441	0.868	0.034	0.758	0.872	1.045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农业经济韧性					
did	0.0390** (0.0186)	0.0372** (0.0185)	0.0375** (0.0185)	0.0414** (0.0184)	0.0506*** (0.0183)
财政支持力度		-1.673*** (0.280)	-1.579*** (0.319)	-1.261*** (0.320)	-1.069*** (0.318)
产业结构			-0.0322 (0.0526)	-0.0352 (0.0522)	0.224*** (0.0625)
城镇化率				3.500*** (0.476)	4.054*** (0.478)
产业结构高度化					-2.247*** (0.305)
_cons	13.99*** (0.0173)	14.38*** (0.0663)	14.38*** (0.0672)	12.50*** (0.264)	17.11*** (0.677)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441	3441	3441	3441	3441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水平；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 t 值

4.2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了以下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二是替换模型，三是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1) 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测度方式，以农作物播种面积衡量农业经济韧性，并进行基准回归。结果在(1)所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农作物播种面积有效提升了农业经济韧性，与基准模型的结论一致，基准模型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2) 替换模型。尽管双重差分法是政策评估的常用方法，但本研究的核心政策（公共数据开放）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非随机试点选择与多期渐进交错执行的特点，难以满足 DID 所需的严格外生性与共同趋势假设。因此，我采用更为稳健的 OLS 回归框架，重点分析变量间的关联模式，并辅以丰富的稳健性检验以增强结论的可靠性。

(3)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除了公共数据开放这一外生政策冲击外，在研究期内还可能存在其他政策会对农业经济韧性产生影响，从而混淆了本文的研究结论。根据国家在 2012 年、2013 年和 2015 年分三批公布的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本文在模型 (3) 中加入了“智慧城市”试点城市虚拟变量后，重新进行回归。从表第 (3) 列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加入“智慧城市”政策虚拟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仍然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基准回归中对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是稳健的，较小受到其他竞争性政策冲击的影响。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替换被解释 变量	(2) 更换模型	(3) 排除其他政 策
did	0.0310 (1.90)	0.0507 (1.76)	0.0430 (1.59)
财政支持力度	-0.500 (-1.74)	-1.078* (-2.14)	-1.052* (-2.19)
产业结构	0.320*** (5.82)	0.226* (2.07)	0.226* (2.17)
城镇化率	2.928*** (6.85)	3.993*** (3.82)	3.867*** (3.88)
产业结构高度化	-0.926** (-3.19)	-2.546*** (-4.70)	-2.594*** (-5.05)
_cons	8.953*** (15.17)	15.49*** (12.40)	16.61*** (13.24)
N	3441	3441	3437

4.3 异质性检验

进一步探究，公共数据开放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是否因地区农业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存在不同。理论上，高发展水平地区拥有更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可能更有效地将数字技术转化为韧性；而低发展水平地区可能因基础薄弱，面临“数字鸿沟”，效应较弱甚至不显著。分组标准：采用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总产值 / 农业从业人员）作为衡量地区农业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并依据其样本中位数将全样本划分为“高发展水平组”与“低发展水平组”。异质性检验表明，高水平地区应聚焦技术深化；低水平地区则需补齐基础设施与技能短板，避免数字鸿沟扩大。

表 6 异质性检验结果

	(1) 高	(2) 低
--	----------	----------

did	0.0495** (3.23)	0.107* (2.52)
财政支持力度	-0.365*** (-3.93)	0.0280 (0.11)
产业结构	0.247* (2.19)	0.222 (1.30)
城镇化率	1.126*** (4.34)	1.652** (2.95)
产业结构高度化	-5.631*** (-18.27)	-5.549** (-13.48)
_cons	19.60***	19.21***
N	1720	1721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了 2012-2023 年我国地城市面板数据,采并基于政府数据平台上线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公共数据开放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公共数据开放有效推动了农业经济韧性的发展,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果仍然成立;(2)公共数据开放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在第一产业占比较高的地方和城镇化率水平同样较高地区具有更大的影响效果。因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持续推动政府公共数据平台的建设和优化,充分发挥数据这一基础要素对农业经济的催动作用。对于还未上线政府数据平台的其他地区,应将其作为重要任务推进,通过上线公共数据平台提高政府透明度以及工作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应推动政府数据平台向智慧化、数字化方向发展,既要降低农村用户获取数据的门槛限制,又要简化操作流程,为农民提供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各地政府要以提高政府公共数据资源开放水平为目的,注重公共数据资源的共享与配置,从而充分发挥数据要素推动农业方面的积极影响。

5.2 政策建议

要注重扩大公共数据开放程度,提高公共数

据资源的效率,深化数据要素在农村产业中应用的潜力。因地制宜地打造乡村特色产业和配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经济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一方面,借助政府数据平台的共享数据,精准定位各地产业发展规划,注重特色农产品、乡村旅游等品牌塑造,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和业态模式,积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打造乡村特色产业,从而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另一方面,要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质量,提升数据传输速度和容量,确保数据流通更高效、更准确,避免数据开放因基础设施不足而流通受阻,从而深化数据要素与农村产业的有机融合,助力乡村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 [1]辛冲冲,袁一杰,韩韵格.公共数据开放与乡村振兴——来自政府数据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5(3):123-134
- [2]郝爱民,谭家银.农村产业融合赋能农业韧性的机理及效应测度[J].农业技术经济,2023,(07):88-107.
- [3]李义姝,严奉宪.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以长江中下游 77 个地级市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25,(04):38-53.
- [4]李敬锁,万群.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财政支农政策的门槛效应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25,(03):4-17.
- [5]赵巍,徐筱雯.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02):87-96.
- [6]孙聪,夏恩君,黄洁萍,等.数农融合发展对农业韧性的影响[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45(06):76-94.

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河南县域高中美术教育的 困境突破与振兴路径

仝召昇^{1*} 赵佳亮¹

(1.洛阳师范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00)

摘要: 河南省作为中原文化传承的核心阵地, 其中县域高中美术教育当前面临定位功利化、师资结构性短缺、资源利用低效、区域发展失衡等困境。在“城挤乡弱村空”的教育大环境下, 教育家精神所蕴含的赤诚情怀、扎根坚守、因地制宜、普惠公平特质, 为解决上述困境提供了核心遵循。本文将结合河南省县域教育实际与中原文化资源, 从精神内涵契合、现实困境剖析、振兴路径三个维度来展开研究, 探索县域高中美术教育振兴体系。

关键词: 教育家精神; 河南县域高中; 美术教育; 美育公平; 振兴路径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57

Guided by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Breaking Dilemmas and Exploring Revitalization Paths for Art Education in County High Schools of Henan Province

Tong Zaosheng^{1*}, Zhao Jialiang¹

¹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ang, Henan 471000

Abstract: Henan Province, as the core position for the inheritance of Central Plains culture, currently faces dilemmas such as utilitarian orientation, structural shortage of teachers, inefficient use of resources, and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its county high school art education. Against the broader educational backdrop of “overcrowded cities, weak rural areas, and empty villages,” the educator spirit—with its core qualities of sincere devotion, rooted perseverance, adaptation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inclusive equity—provides a fundamental guideline for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 This study will integrate the realities of county-level education in Henan with Central Plains cultural resources, examining the topic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integration of spiritual connotations, the analysis of practical dilemma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revitalization paths, to construct a revitalization system for county high school art education.

Keywords: Educator Spirit; County High Schools in Henan; Art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Equity; Revitalization Path

作者简介: 仝召昇(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洛阳师范学院, 学科教学(美术);

赵佳亮(2003—), 男, 硕士研究生, 洛阳师范学院, 美术与书法, 美术教育方向;

通讯作者: 仝召昇

一、前言

河南省地区作为中国教育和人口大省，省内县域高中承载了60%高中学生的教育使命，地区美育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到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以及人才培养的全面性。2025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中也指出，要深刻认识县中振兴在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重大使命，在促进社会公平和服务学生成长成才中的重要作用，把县中振兴作为办强办优基础教育的大事来抓，扩大县中教育资源，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1]。

在2022年河南省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实施方案》中也明确提出，要“补齐县域美育短板，构建具有河南特色的美育体系”，并明确到2025年实现普通高中美育教师足额配备、艺术课程开齐开足。^[2]然而，河南县域高中美术教育目前发展仍然处于不均衡状态，美术教育长期处于教育体系的边缘地带。美术教育多窄化为艺考培训，全员美育覆盖不足。丰富的中原文化资源，长期不能转化为美育教学优势，与发达地区的高中美育差距持续扩大。在当前背景下，以教育家精神引领县域高中美术教育振兴，是落实美育政策、发展县域美育的必然路径。

我国职业教育“双师型”师资的提法是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在当代教育体系中，视觉艺术教育作为一种促进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重要方式，正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不同于传统的知识传授型学科，视觉艺术训练通过绘画、雕塑、摄影等多种媒介，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自由探索与个性表达的平台，使其能够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建构自我认知，激发创造潜能，同时增强情感体验与社会归属感。

二、教育家精神与县域美术教育的契合逻辑

（一）教育家精神内涵核心要义

教育家精神的核心要义可以概括为四维特质，在河南县域美术教育场景中呈现鲜明的本土化特征。一是赤诚情怀。要以全员美育为核心，抛弃功利化导向，兼顾乡村学子审美启蒙与中原文化传承的双重使命。二是扎根坚守。应对县域师资流失难题，教师要有耐住清贫、深耕基层的教育自觉，筑牢师资队伍根基。三是因地制宜。要立足河南县域文化资源与经济水平，以低成本创新激活本土资源来开发校本课程，弥补硬件设施不

足。四是普惠公平。要聚焦河南县域广、城乡差距大的特点，推动美育资源向偏远县域、特殊群体倾斜，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二）河南县域高中美术教育的特殊性与振兴目标

美术教育具有育人与文化传承的双重属性，一方面，需要为乡村学子提供基础审美教育，打开视野，另一方面，河南每个县域均有独特的文化资源，如开封的朱仙镇年画、商丘民权画虎村、安阳殷墟、三门峡陕州地坑院，这些当地课程资源为美术教育提供天然素材，但受限于“师资缺、硬件弱、观念旧”的约束。当前县域高中美术教育需要实现三转三升，也就是要从艺考导向转向全员美育、从照搬教材转向本土创新、从单兵作战转向系统推进。

（三）二者融合的理论支撑

高中阶段美术教育对图像识读、美术表现、审美判断、创意实践、文化理解等五大核心素养的培育，符合教育家精神以人为本的育人情怀，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脉文化，它与美术教育资源丰富，本质是通过教学实现文化传承的过程，县域教师在开发当地特色校本课程时，也会相对容易。河南省美育政策中推动优质美育资源向基层倾斜的导向，与教育家精神普惠公平的价值追求统一，为县域美育资源均衡配置筑牢根基。

三、教育家精神视角下河南县域高中美术教育的现实困境

（一）功利化定位背离美育本质

由于升学压力，河南大多数县域高中将美术教育窄化为“艺考集训”，忽视了面向全体学生的美育功能。美术学科经常被主科挤占，美术学科逐渐变为应试教育的附属品。这不仅违背了以美育人的初衷，也错失了传承本土文化的机会，与教育家精神的赤诚情怀背道而驰。

（二）师资面临“引、育、留”三重困局

河南县域高中美术教师队伍结构性短缺问题突出，成为制约教育质量的核心瓶颈。一是引才难，高校毕业生不愿来。美术专业毕业生优先选择郑洛等城市就业，豫西卢氏、豫东兰考等偏远县域，近三年美术教师招聘通过率不足30%，部分学校甚至由语文、数学教师兼职美术课。二是

留才难，现有教师留不住。农村县域教师待遇偏低、教研氛围淡薄，职业发展空间有限，县域教师对所在岗位不满意，因此他们往往把县域作为跳板。三是教不精，现有教师普遍缺乏系统培训和开发本土课程的能力，难以设计出贴合县域学生的教学内容^[3]。

（三）资源利用陷入低效化、单一化困境

一是本土资源闲置。河南县域丰富的文化资源未被有效激活，多数高中美术课仍以素描、色彩为主。二是硬件设施短缺。豫南西峡、南阳淅川等山区县域高中，无标准美术教室，缺乏素描石膏像、水彩颜料、专业画板等基础器材，部分学校甚至用普通教室临时替代美术课堂。三是教学模式固化，大部分县域高中普遍采用教师讲授，学生临摹的传统模式，缺乏互动式教学，难以激发学生兴趣。

（四）区域与群体发展差距显著

河南县域美术教育呈现两种极端。郑汴洛周边县域依托城市辐射，美育资源相对充足，部分学校配备专职教师、标准化美术教室及写生基地。而豫东兰考、豫南新蔡等偏远县域，美术器材靠社会捐赠、教师靠短期实习支教，教学质量不能保障。以及留守儿童、农村学子参与美术竞赛、博物馆研学、作品展览的机会极少，审美素养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三、教育家精神引领下河南县域高中美术教育的振兴路径

（一）重塑美育定位，回归育人本质

要以教育家精神中的赤诚情怀为引领，破除功利化导向，从学科本体转向育人本体的价值取向，确立全员美育，文化传承的双重定位。

一是要落实课程保障，严格按照河南省美育政策要求，开齐开足美术课程，将美术课纳入学校核心教学计划，严禁文化课占用。

二是深化文化浸润，将中原文化元素融入日常教学，如安阳县域高中可以在素描课中加入殷墟青铜器造型解析，商丘县域高中可以在色彩课中讲解画虎村农民画的色彩运用，让学生在审美学习中亲近本土文化。

三是要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建立多元评价机制，从主体多元、过程多元、标准多元着手，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团队协作能力、创意思维、文化解读表现纳入综合素质评价，替代唯分数论，鼓励学生阐述美术创作中的文化思考^[4]。

（二）以坚守筑基，构建河南特色师资保障体系

依托教育家精神中的扎根坚守特质，破解师资难题，为美术教育筑牢人才根基。

一是需要依托政策引才留才，比如河南省“特岗教师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将美术教师纳入县域紧缺人才招聘目录，给予专项激励，降低人才流失风险。

二是搭建名师教研平台，创建虚拟教研室，定期开展专题培训。多对美术教师队伍开展本土资源转化培训，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手把手指导教师掌握传统技艺，同时也可以助力校本课程的开发。

三是用榜样故事筑牢教师职业归属。评选“河南县域美育标兵”，宣传扎根基层的优秀教师事迹，通过官方推广，增强县域美术教师的职业荣誉感与归属感。

（三）激活本土资源，丰富教学实践

以教育家精神中的因地制宜特质为核心，立足河南县域资源禀赋，实现低成本、高实效的教学创新。

一是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注重课程资源的开发。教师要从传统的教书匠转变为教育学的研究者，成为教育家式的教师，将县域内的历史遗存、非遗技艺、民俗文化转化为教学素材。尹少淳教授指出：“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仅是开展基本的美术教学活动的保障，也是提升美术教学的水准和扩大美术教学范围的需要。”^[5]

二是推进低成本教学创新，利用本土材料开展创作，降低硬件依赖。例如用麦秆、玉米皮制作编织画，用黏土仿制仰韶彩陶，用废旧布料创作拼贴画，还可以借助“河南省基础教育资源平台”，共享郑州、洛阳等城市的优质美术课视频，弥补师资不足。

三是搭建实践展示平台。每学期多次举办美术作品展，联合当地文化馆、博物馆开展研学活动，多与美术馆合作，定期展出学生的创作作品。多组织县域间学校的美术交流活动，激发学生美术创作热情。

（四）以公平立根完善资源均衡共享机制

以教育家精神中的普惠公平特质为导向，缩小区域、群体间的发展差距。

一是补齐硬件短板，争取省级美育专项资金，按标准配齐美术教室、器材设备，建立“县域美术器材共享库”，通过巡回借用解决资源短缺问题。

二是构建区域联动网络。以郑汴洛为核心,组建“河南县域美育联盟”,推动优质资源跨区域流动,共享优质教案、课件、教学视频。教师之间多进行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观摩、教学研讨、专题讲座和技能培训,促进教师队伍专业能力和教学观念的提升。^[6]如洛阳伊川一高将《龙门石窟造像美学》课程资源免费开放给豫西各县域高中。

三是多关注特殊群体。开设艺术疗愈类课程,通过绘画、手工创作疏导学生心理压力。为家庭困难学生免费提供创作材料,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平等享受美育资源。

三、结语与展望

河南县域高中美术教育的振兴,其实就是教育家精神在基层美育实践中的生动诠释。当前,美术学科面临功利化定位、师资短缺、资源匮乏、发展失衡等困境,根源在于教育理念未能充分落实。只有用情怀重塑教育目标,让美术教育回归“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本质,保障师资根基,破解“引育留”的难题,以创新活化地方资源,实现低成本高效教学,保障资源公平分配,缩小城乡群体差距,才能推动河南县域高中美术教育突破困境、实现美育的高质量发展^[3]。

未来,随着河南省美育政策的深入落地与教育家精神的广泛践行,河南县域高中将会逐步形

成“一县一品”的美育特色,陕州的剪纸、民权的农民画、安阳的青铜美学将成为县域美术教育的鲜明标识,让美术教育真正成为滋养县域学子心灵、传承中原文化根脉、守护教育公平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Z].2025-09-18.

[2]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实施方案[Z].2022.

[3] 钟志伟,魏红梅,陈卓.教育生态学视野下县域教育生态的现实困境与破解策略[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24,44(12):37-44+55.

[4] 高兴琴.地方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徽州版画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25,(18):32-34.

[5] 尹少淳.美术教育学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26.

[6] 刘海娟,郝亚丽.县域城乡研修共同体助力美术教师素养提升[J].华夏教师,2025,No.344(08):9-11.

基于速度与力量训练对提高南拳套路运动员的 竞技比赛能力的研究

赵嘉诚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长春 130022)

摘要: 随着武术套路向竞技化的发展, 南拳运动员的专项体能训练日益受到重视。本研究以南拳为例, 旨在深入探讨如何提高南拳速度力量科学训练方法。通过对南拳技术动作特点的分析, 发现力量、速度、是南拳专项体能的核心组成部分, 且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研究表明, 科学的训练对南拳运动员的竞技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为南拳运动员的训练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 也为南拳套路项目的训练理论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 速度力量; 训练方法; 南拳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66

Study on the Effect of Speed and Strength Training on the Competitive Ability of Southern Fist Routine Athletes

Zhao Jiacheng

Jili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angchun, Jilin 130022

Abstract: As Wushu taolu has evolved into a competitive sport, event-specific physical preparation for Nanquan athletes has received heightened attention. Taking Nanquan as the focal disciplin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scientifically grounded methods for developing speed-strength qualities. Analysis of Nanquan technical movements reveals that strength and speed are the core constituents of event-specific fitness and are mutually reinforcing.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systematic, evidence-based training significantly enhances competitive capacity, offering both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oaches and athletes while contributing to the broader research literature on Nanquan training theory.

Keywords: speed-strength; training methods; Nanquan

1. 前言

南拳作为中国南方传统武术的重要流派, 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富的技法在武术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其动作短小精悍、刚劲有力, 注重实战与健身相结合, 深受广大武术爱好者的喜爱。随着武术竞技化和国际化的不断发展, 南拳运动员在比赛中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传统技法, 还需要具

备良好的力量素质和速度素质, 以满足现代竞技体育对运动员身体素质的高要求。

力量素质是各项体育运动项目的基础, 是发展运动速度的重要手段之一, 也是提高武术南拳运动员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而速度力量是南拳运动员取得高水平运动成绩的主要素质之一。在多年的训练实践中, 使我们认识到速度力量是南

拳运动员必不可少的专项力量素质,它对改进技术、提高神经系统的灵活性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因此,抓好南拳运动员的速度力量训练是提高专项成绩的重要途径。

2.相关概念界定

2.1 南拳相关概念界定

南拳是中国传统武术中以南方地域为核心形成的拳种总称,以其独特的技法、劲力特点和文化内涵区别于北方拳种。南拳是流行于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四川等南方各省的拳术的总称^[1]。南拳是我国南方拳种的统称,中国武术流派之一,流传于我国长江流域及南方各地的诸多拳种,是现代竞技武术套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常指以“刚猛迅疾、桥手密集”为特征的武术体系。在发力上,南拳追求猛勇彪悍的阳刚之美,常乘势发声,以声催力、以声助威,内外合一,形神兼备。

2.2 南拳速度与力量的概念界定

力量素质是各项体育运动项目的基础,是发展运动速度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提高武术南拳运动员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3]。南拳的速度并非单纯的肢体快速移动,而是结合招式节奏与攻防需求的“精准速”,强调在短距离内爆发瞬间启动速度,如冲拳、标指等动作,要求从蓄力到发力的转换耗时极短,同时配合步型调整(如马步、弓步的快速切换),确保攻防动作在有效距离内快速触达目标。

其力量则以“刚劲沉实”为核心,属于“短劲爆发型力量”,区别于长拳的舒展发力,南拳更注重腰马合一的根基力量传递——以稳固的步型为支撑,通过腰部转动带动肩、臂、腕关节,将下肢力量集中于拳、掌、指等发力点,形成短距离内的刚猛冲击力,如“铁线拳”的桥手发力、“洪拳”的砸拳,均追求力量的厚重感与穿透力,而非单纯的力量数值大小,且力量爆发需与呼吸配合(如发力时呼气),实现“劲发于腰,力达于梢”的效果。南拳动作刚健朴实,上肢动作较多,腿法、跳跃较少。有时发一猛劲,因势呐喊,以声助气,以气催力。步法稳固,拳势猛烈,富阳刚特点的拳种^[4]

2.3 竞技比赛能力

竞技比赛能力是指运动员在比赛中为发挥训练成果、争取优异运动成绩所必须具备的综合参赛本领。它是运动员在比赛情境下,将体能、

技能、战术能力、心理能力和知识能力等要素有机整合并临场发挥的能力系统,其核心在于将训练水平转化为比赛表现的效率与稳定性。

3.提高速度力量对南拳技术水平的重要性

由于武术套路展示的连贯性要求,可选用循环训练法将不同动作模式的训练动作整合起来,使训练呈站点式,在不同的位置完成不同的动作^[5]。速度力量是由速度与力量两个因素相结合所组成的,它是衡量一个运动员在一定的重量负荷下快速用力的一种能力。因此,它也是南拳运动员速度训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南拳的特征是快速勇猛、刚劲有力。有研究报道,历时1分20秒左右的南类套路运动,是由平均每次持续时间4秒51快速运动、3秒03的中速运动、2秒65的慢速运动和2秒14的停顿动作交替组成的,其中快速运动时间占整个套路总运动时间的43.97%,而每次大强度快速运动的持续时间,其中6秒以内的约占总次数的79.8%。由此可见,提高运动员短时间快速运动能力和爆发力,即提高运动员磷酸原系统的供能能力,是提高运动成绩的重要环节之一。由于速度力量是在一定的重量负荷下,突出了动作速度要求,因此,一般负荷量要较轻,这对于训练水平低、力量基础差的青少年运动员来说,则更为有效。因为这一阶段的运动员由于还没有建立正确的技术概念,在发展力量素质时,如采用较大的负荷重量来练习,往往会使神经系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下,这样就会造成肌肉僵硬,力不从心,从而使技术上动作出现错误,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错误的动力定型,极大地影响将来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这一阶段抓好运动员的速度力量训练则更为重要,它为运动员掌握合理的技术动作和降低由于力量素质水平不高而出现的错误率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将来进一步发展力量素质打好扎实的基础。

4.南拳速度力量训练的原则和方法

认识到了发展速度力量对提高南拳技术水平的重要性,但训练中安排是否合理,手段的设计是否具有针对性,都将对这一素质的提高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训练中应因人而异,因项目特点而在制定训练方法时,应针对各自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

4.1 竞技南拳套路的的速度力量训练应与专项技术相结合

南拳套路完整动作的快速重复练习,要求运

动员逐步提高克服自身重量和器械重量的能力。发展速度力量,可采用负重练习的方法,如穿沙背心、绑沙袋进行实用性南拳步法、弓架的操练,改变器械的重量,在不改变完成动作的幅度、速度、动作规格要求的前提下,进行发展速度力量的练习。由于速度力量训练的目的在于培养快速完成动作的能力,因此采用负重和变换器械重量的训练发展速度力量时,负荷量要适宜,使速度和力量两方面都得以提高,适合专项的要求。在安排速度力量训练时,特别是在对训练水平低、力量基础差的运动员训练中,速度力量训练的负荷重量一般采用轻的负荷。并能设计一些与专项技术动作的用力方向、用力特点相近似的练习手段。由于这些练习负荷较轻,运动员较容易在自控的条件下进行有一定速度的训练,从而能逐步地培养肌肉用力的本体感觉。同时,在训练中把单个练习动作的多次重复与若干个单个练习动作组合起循环练习相结合。单个动作练习的多次重复对身体局部肌肉起到连续刺激作用,这是南拳运动员发展速度力量所必须的。因南拳项目的技术特点是快速、爆发性的发力,而若干个单个动作练习动作组合起来作循环练习,可使不同动作的用力结构刺激着不同部位的运动机体,使不同部位的肌肉收缩与松弛交替地进行工作,而暂时松弛的肌肉由于压力减少,使肌肉组织血液及养料的供应通过被按摩的血管得到及时地输送,从而保证肌肉能在较长时间里连续有效地工作。此外,也利于神经系统的调节,推迟疲劳的产生。

4.2 速度力量训练应及时与发展最大力量相结合

随着运动员年龄增大及训练水平的提高,单纯地坚持采用小重量负荷练习会使速度力量的发展受到限制。因为通过一段时间这样负荷的训练,使神经系统、肌肉产生对强度的适应,因而发生速度力量障碍。因此在训练过程中要及时发展最大力量,进一步给运动机体产生新的刺激,打破速度力量的障碍,促进其继续提高。在安排最大力量练习时,也要重视有一定的动作速度。在安排负荷时,应尽量减少运动员通过最大努力才能完成的负荷重量,这样安排的目的,一是防止运动员超负荷后容易受伤,二是有利于能较快地把最大力量训练的效果转移到速度力量上来。凡用最大力量的二分之一以上的力量负荷练习,就可有效地发展最大力量。因为这时参与工作的肌纤维主要是白肌纤维,这样的负荷也可使运动员神经系统得到激发,便机体动员更多的运动单元参加工作,从而使

肌肉中用于快速运动的物如肌红蛋白、肌凝蛋白、白肌纤维等得到提高,最终达到提高速度力量的目的。在训练实践中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一般采用以杠铃为器械的练习手段,只要安排得合理,一样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4.3 速度与力量对提高南拳套路运动员的竞技比赛能力的重要性

在南拳套路竞技中,速度不仅是“一眼定输赢”的评分爆点,更是串联劲力、节奏、意象的神经中枢;力量则像深埋土中的老根,为所有腾挪转合提供瞬间爆发的源头活水。

裁判也会在第一眼捕捉的是运动员起势0.3秒内的加速感,步落拳到、身随步移,肩膀同锁所形成的“视觉压缩”直接奠定“刚猛”基调;若速度不足,即使后续发力再厚,也会因“拖影”被扣掉0.1—0.2分的节奏分,这在0.5分就能决定名次的全运会赛场几乎等同于致命。

高速移动中,人体通过髓鞘化神经通路把反应时压缩至160毫秒以内,使运动员在“马步双推掌”转“麒麟步蝶掌”的0.8秒窗口里完成三次重心切换,此时股外侧肌与臀中肌以>90%最大随意收缩(MVC)爆发,既稳住髋轴,又为下一步腾空侧踹储备弹性势能;如果速度滞后,神经—肌肉耦合时间延长,重心漂移>3厘米,落地即出现“抖胯”失稳,被裁判认定为“中轴涣散”,难度分值瞬间降档。

力量训练的价值则体现在“一快藏三拙”:当核心—下肢—肩带形成 ≥ 4.5 倍体重的刚性链条后,运动员可在0.18秒内完成“弓步双鞭拳”的末梢加速,拳速峰值达11.2 m/s,肘关节在 $270^\circ/s$ 角速度下锁死,产生>800 N的末端冲击力,借助筋膜回弹无需额外蓄力即可接“腾空摆莲 360° ”,实现“无间隙连招”,既节省0.2秒耗时,又避免二次呼吸调整带来的节奏断裂。

更重要的是,速度—力量耦合决定了空中姿态的“开窗”角度:当起跳垂直速度>2.8 m/s、髋—膝—踝三关节峰值功率合计 ≥ 18 W/kg时,运动员可获得>62 cm的腾空高度,在0.48秒滞空内完成“摆莲—盘肘—震脚”三环套月,落地瞬间地面反作用力达14 BW,经跟腱—小腿—股四头肌的刚度缓冲后,在0.12秒内衰减至静息水平,既保证“落地生根”的稳度,又让裁判看到“棉里藏针”的寸止张力。速度不足则腾空高度<50 cm,动作环数被迫缩减,难度系数直降0.3;力量缺口会使落地缓冲时间>0.18秒,出现“跺步”或“挪步”,被

扣 0.1—0.3 的稳定分。实战中，速度—力量还扮演“战术掩护”角色：高速冲拳可在 0.08 秒内闭合 40 cm 打击距离，迫使对手后移半步，瞬间夺取赛场中线；随后以 ≥ 10 m/s 的拳速接 ≥ 1200 N 的峰值力打出“弓步钉捶”，在裁判视觉焦点尚未切换时完成“连击”，形成“时间差”得分效应。

在训练层面，8 周 30 m/s 超等长+70% 1RM 复合训练可将下肢刚度提升 18%，牵张—缩短周期 (SSC) 缩短 12%，使“麒麟步转接腾空双飞踢”的过渡时间从 0.92 秒压缩至 0.74 秒，难度动作成功率由 78% 升至 93%，全国比赛平均得分提高 1.45 分；同时，峰值功率 ≥ 20 W/kg 的运动员其血乳酸清除率提高 22%，在套路后段仍能保持 >9 m/s 的拳速，避免“尾段塌陷”这一南拳评分大忌。

在心理维度上，速度—力量优势通过“视觉压倒”制造对手的心理落差，使其在接招瞬间出现 0.05—0.1 秒的“凝视冻结”，为己方创造二次加速窗口；脑电研究显示，当运动员以 >10 m/s 拳速完成“扑面掌”时，对手 P300 振幅下降 30%，判断延迟增加 25 ms，足以让己方完成“虚步穿桥”变线，从而主导节奏。

综上所述，速度让南拳“形”如霹雳、眼不可追，力量让“劲”沉如山、根不可摇，二者在神经—肌肉—能量—心理四轴同步升级，方能在 0.1 秒、0.1 分的微观战场里累积出冠亚军的宏观差距，构成现代竞技南拳套路“唯快不破、以劲为魂”的核心竞争力。

4.4 速度与力量的训练方法

4.4.1 速度训练

快速空击训练：选取南拳基础组合（如“弓步冲拳 + 马步架打”），以最快速度完成，每组 30 秒，做 5 组，组间休息 1 分钟。训练时强调动作连贯性，减少多余位移，专注“起拳快、收拳更快”。

靶击反应训练：由教练持靶，随机给出靶位（拳靶、腿靶），练习者根据靶位快速完成冲拳、蹬腿等动作，每组 15 次，做 4 组。要求反应时间控制在 0.3 秒内，强化神经反应速度与动作衔接。

轻负爆发训练：手持 0.5-1kg 轻哑铃，模拟南拳冲拳、劈拳动作，快速完成出拳 - 收拳循环，每组 20 次，做 3 组。重点保持动作速率，避免负重过大降低速度。

4.4.2 力量训练

(1) 核心桩功训练

以四平马为基础，静态桩功每次 30 秒 - 1 分钟，做 4 组；动态桩功（左右弓步转换）每组 15 次，做 3 组。强化下肢稳定性与核心力量，为发力提供支撑。

(2) 爆发力复合训练

爆发力俯卧撑：采用南拳“四平马”姿势，快速推起身体，胸部离地 5-10cm，每组 12 次，做 3 组，提升上肢爆发力。

蛙跳蹬腿：模拟南拳蹬腿发力，屈膝半蹲后快速蹬地跃起，落地时保持马步姿势，每组 10 次，做 4 组，强化下肢爆发力。

负重转腰：双手持 1-2kg 沙袋，站马步位左右转腰，每组 20 次，做 3 组，激活腰背核心发力链。

(3) 专项对抗训练

弹力带冲拳：将弹力带一端固定，双手套入带中，完成南拳冲拳动作，对抗弹力带阻力，每组 15 次，做 3 组，强化出拳爆发力。

桥手顶推：两人一组，双手搭桥（南拳“四平桥”），相互顶推，每组 20 秒，做 4 组，提升桥手硬度与瞬间发力能力。

5. 南拳套路体能教学实验

5.1 实验目的

验证“南拳体能三合训练模式”（专项力量—爆发力，对套路演练成绩、动作质量与身体素质的影响，建立一套可在高校武术普修课复制的 12 周南拳体能教学范式。

5.2 实验对象与分组

对象：菏泽学院 2024 级武术普修课学生 48 人

(男 24、女 24)

分组：随机分为实验组 (EG, n=24) 和对照组 (CG, n=24)。实验前测评无显著差异 ($p>0.05$)。

5.3 实验设计

(一) 周期：12 周，每周 3 次课（每次 45 分钟体能 + 45 分钟基本功技术）。

(二) 模式：实验组：采用“南拳体能三合训练”——专项力量 (S) + 爆发力 (P) + 柔韧与协调 (F)。

对照组：采用常规体能课（循环跑、俯卧撑、静力拉伸）。

测试节点: 实验前 1 周、第 6 周(中期)、第 12 周(实验后)

5.4 力量速度训练内容

5.4.1 力量训练—南拳六大发力链

动作	负荷	组×次	作用肌群	南拳要点
马步抗阻冲拳	弹力带 20-30%	4×10	胸大肌、三角肌、核心	拳面快速崩弹
桥手掌	自重	4×8—12	肱三、胸、肩	桥手顶发力
麒麟步负重提膝	哑铃 5kg	4×10 (每腿)	髂腰肌、股四头肌	步法移动爆发
单腿跪天蹬	弹力圈	3×12	臀大肌、腘绳肌	下肢鞭扫
俯身硬拉抗旋	杠铃 40-50%	4×6	竖脊肌、臀腿	腰马合一
南拳“二字钳养马”等长静蹲	自重	3×45s	股四、内收	乔马根基稳

5.4.2 速度爆发力模块

周期	动作	符合红色弹力带	组×次	关键点
1-4 基础	弹力带冲拳	自重	4×10	拳面崩弹、核心锁死
5-8 进阶	立定纵跳	自重	4×6	伸髋伸膝同步
	药球胸前连续踢跳	2kg	5×5	快速甩臂
9-12 整合	跳深+冲拳	30cm箱	4×5	落地 0.2s 内出拳
	南拳弓马步跳	自重	3×10	步型不变性

6. 结论与建议

基于武术教学多年的训练指导经验及速度力量训练理论研究, 深刻认识到, 速度力量是南拳专项力量训练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不仅能助力运动员优化技术动作、提升神经系统灵活性, 更是运动员突破专项技术瓶颈、实现竞技水平提升的关键途径与手段。因此, 南拳运动员在开展力量素质训练时, 应优先聚焦速度力量的发展。结合训练实践, 针对速度力量训练提出以下建议:

6.1. 训练初期: 筑牢正确动力定型与本体感觉

运动员在初学阶段, 因年龄较小、专项水平有限, 尚未形成对专项技术结构与用力特点的正

确认知。此阶段速度力量训练应以小负荷重量为主, 紧密结合南拳专项技术动作与用力逻辑, 在保证动作速度与幅度的前提下开展训练, 帮助运动员逐步建立速度力量发力的本体感觉, 形成规范的动力定型。

6.2. 进阶阶段: 以最大力量提升推动速度力量突破

随着运动员年龄增长与训练水平提升, 需及时开展最大力量素质训练, 避免因基础力量不足导致速度力量发展受限。训练负荷应随运动员水平同步递增, 并保证一定的动作重复次数——鉴于南拳套路演练需在无氧代谢状态下完成, 且以刚猛发力为核心特点, 唯有夯实最大力量基础, 才能为速度力量的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6.3 科学调控: 依据训练目标动态调整运动负荷

根据力量素质训练的具体任务, 精准调整运动负荷: 若以发展极限力量为目标, 应采用高强度、少重复次数的训练模式; 若聚焦爆发力提升(爆发力是南拳速度力量训练的重要内容), 则需引导运动员在最短时间内调动最大力量, 且需将此类训练纳入全年系统训练计划。同时, 训练安排需遵循“因人而异”原则, 结合运动员个人特点与不同训练阶段需求, 灵活调整负荷重量与练习速度的配比, 确保负荷调控的科学性。

6.4 协同训练: 速度力量与柔韧性练习相结合

柔韧性练习不仅能增强关节灵活性, 还可提升肌肉力量——通过改善肌肉弹性与张力, 使肌肉更高效地运用速度力量、转化能量。对南拳运动员而言, 柔韧性训练需侧重提升专项所需的动力性伸展能力: 柔韧性越好, 技术动作的完成质量与有效性越高, 运动损伤风险也越低。因此, 在速度力量训练计划中, 需同步融入柔韧性练习, 实现二者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朝旭.“南拳”词义溯源及其演进研究[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23, 43(05): 11-19.
 [2] 丁俊江, 甘强, 朱林贺. 广西竞技南拳基本功练习内容、特点与方法研究[J]. 武术研究, 2023, 8(11): 33-35.
 [3] 徐美玲. 论南拳运动员的速度力量训练[J]. 浙江体育科学, 2004 (06) : 95-97
 [4] 周树生. 南拳运动的技术分析及其训练[J]. 体育科技, 1992, (S1): 40-50.
 [5] 胡建国. 武术运动员专项力量训练探析[J].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19, 27(1): 88-90.

供应链金融影响企业碳风险的经济后果研究

党燕茹¹

(1.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1331)

摘要: "双碳"战略下, 碳风险已成为影响企业财务稳定的系统性因素。基于2007—2023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 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能显著降低企业碳风险, 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优化资本结构实现。企业盈利能力越强, 这种抑制效果越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 该效应在东中部地区、高竞争行业及低技术低污染行业中更为明显, 为将供应链金融纳入企业碳风险管理战略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键词: 供应链金融; 碳风险; 经济后果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2.267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on Corporate Carbon Risk

Dang Yanru¹

1.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Abstract: Under the dual-carbon strategy, carbon risk has become a systemic factor affecting corporate financial stability. Based o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23, the study finds that supply chain finance significantly reduces corporate carbon risk, mainly by eas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optimizing capital structure. The inhibitory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for firms with stronger profitability. Heterogeneity tests show that the impact is larger in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highly competitive industries, and low-tech/low-pollution sectors, providing empirical support for integrating supply chain finance into corporate carbon-risk management.

Keywords: Supply Chain Finance; carbon risk; economic consequence

一、引言

"双碳"目标下, 政策、技术与监管叠加形成的碳风险已威胁企业运营与供应链韧性, 却鲜见供应链视角的系统研究。供应链金融凭借信用增级、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 能否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资本结构降低碳风险, 尚缺实证答案。本文以2007—2023年A股公司为样本, 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首次检验供应链金融对碳风险的直接效应、中介传导及盈利调节, 并从区域、行业竞争、技术污染属性三维揭示异质性场景, 为绿色金融政策与碳减排协同提供微观证据。

二、文献综述

供应链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优化资本结构降低碳风险, 其逻辑链条已在少量但逐步增多的文献中得到验证。Berger等^[1]界定供应链金融依托核心企业信用实现"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同步, 为中小企业提供稳定现金流, 奠定后续风险对冲的资金基础。陈思吉等^[2]进一步指出, 该模式以数据闭环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 削弱外部融资溢价, 为碳合规成本内部化提供低成本资金通道。钟廷勇等^[3]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样本证实, 供应链金融显著抑制企业避税并提升财务透明度,

直接削减因碳违规产生的潜在罚款现金流,形成碳风险的事前缓冲机制。在后果层面,熊熊等^[4]发现融资约束缓解后企业可将闲置流动性转向绿色工艺升级,全要素生产率随之提升,表明碳风险下降通过资源释放路径转化为真实经济效益。估值方面,证明交易数据的可验证性降低资本市场贴现率,托宾 Q 值持续上升,实现碳风险溢价的事后修复^[5]。异质性上,基于区块链场景研究显示,当信息可追溯强度更高时,供应链金融对碳风险的抑制作用在低技术、高竞争行业更为显著,印证技术耦合度对“资金—排放”传导效率的边际放大效应。综合上述研究,供应链金融已超越传统融资功能,成为以核心企业信用替代排放抵押、以数据闭环替代碳评级的跨组织碳风险管理工具^[6],为绿色金融政策与“双碳”目标协同提供可复制的微观框架。上述文献共同勾勒“融资优化—成本节约—估值修复”链条^[7],为后续检验供应链金融碳风险治理的经济后果提供机制路径与情景边界。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 2007—2023 年间 A 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而文本数据则来源于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公告及新闻报道等渠道。在数据预处理阶段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筛选措施:首先,剔除了已终止上市的公司样本;其次,排除了金融业的样本以及 ST 或 PT 的样本;进一步,剔除了资不抵债的企业;最后,剔除了存在数据缺失的样本。经过上述筛选,最终获取了 29 234 个公司和年度样本数据用于后续分析。

(二)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碳风险的衡量方式参照钟廷勇等^[3]的研究,用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其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作为碳风险的衡量指标。其中,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行业能源消耗进行近似估算。具体计算方式为:企业碳排放量=行业能源消耗总量×二氧化碳折算系数×企业营业成本/行业营业成本,其中,二氧化碳折算系数采用厦门节能中心所制作的标准,设定为 2.493。该指标值越大,表明企业的碳风险水平越高。

2 解释变量

供应链金融的涉入程度通过关键词频定量分

析方法进行测度,参考卜君等^[9]的研究,将供应链金融应用模式分为应收类、预付类、存货类和综合类,使用 Python 功能详细统计关键词在公司年度财务报表中出现的频次,将其作为该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程度的初始衡量指标,并将其加 1 后取自然对数,作为供应链金融涉入程度的衡量指标。

3 主要变量

本研究构建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考虑到 Olley 和 Pakes (1996) 的研究中使用半数法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OP 法),但在估计过程中存在样本损失的情况。因此,本文利用 LP 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计算和处理^[6]。特别地,考虑到 OP 法下较多年度投资额为 0 或负值的企业在估计过程中被忽略,因此 LP 法将中间品投入替换原有的投资额作为代理变量进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并实现对该代理变量合意度的检验。

企业价值 (Tobin)。借鉴何瑛、张大伟的研究思路,利用托宾 Q 值作为代理变量,具体为:托宾 Q 值=(流通股市值+非流通股市值+负债市值)/总资产。

4 控制变量

为精准剔除其他潜在因素对碳风险的干扰效应,本研究借鉴已有研究在模型中控制了反映企业性质、企业财务表现与企业治理特征的变量。具体如下:企业规模 (Size)、销售毛利率 (GrossProfit)、息税前资产回报率 (ROA2)、超额雇员率 (ExcessEmployeeRate)、净利润增长率 (NetProfitGrowth)、上市年限 (ListAge)、资金占用比率 (Occupy)、管理费用代理成本率 (Mfee) 和审计费用 (AuditFee)。此外,还控制了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

(三) 模型设定

在前文基础上,本文已从经济现象、理论与实证多维度论证了供应链金融对降低企业碳风险的积极作用,并围绕“供应链金融—碳风险—经济效益”范式展开系统分析。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碳风险缓释究竟能否转化为企业生产力与盈利模式的持续升级,并最终塑造长期竞争优势。供应链金融通过融资松绑与资本结构优化,不仅削减了合规成本波动,更为绿色技术投资腾挪出稳定现金流;当碳风险下降后,企业得以扩大低碳工艺、数字化改造与要素重组,推动全要素生

产率外移。同时，资本市场将减排收益折现为估值溢价，形成“碳风险贴现—绿色增长期权”叠加效应。因此，供应链金融在碳风险治理层面的裨

益，已成为企业综合竞争力跃迁的关键杠杆。基于此，本研究同样利用和构建递归方程以检验其中的作用机制：

$$Eco_{t+1} = a_o + b_o SCF_{t-1} + g_o Controls_{it} + \eta + ind + e_{it} \quad (7)$$

$$CRisk_t = a_o + b_o SCF_{t-1} + g_o Controls_{it} + \eta + ind + e_{it} \quad (8)$$

$$Eco_{t+1} = a_o + b_o SCF_{t-1} + b_1 CRisk_t + g_o Controls_{it} + \eta + ind + e_{it} \quad (9)$$

其中，Eco 为企业经济效益变量组，具体分别由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企业价值(Tobin)两个变量来衡量。特别地，同样考虑到供应链金融在实现企业碳风险与经济效益提高所需要的时效性和滞后影响，因此对供应链金融变量、企业碳风险变量和经济效益变量(托宾 Q 值)分别进行滞后 1 期、当期数据结构和前置 1 期的处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TFP 与 Tobin's Q 同属经济效益变量组(Eco)，但两者对碳风险的响应机制与时滞存在本质差异。TFP 反映的是企业当期资源配置与技术效率的变化，在模型中未进行前置处理即表现出显著性，说明碳风险下降对生产效率的改善具有即时性。而 Tobin's Q 作为资本市场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期指标，其调整具有前瞻性，因此本文对 Tobin's Q 采用前置一期处理，以捕捉投资者对企业碳风险下降的反应。两者处理方式不同，但均在理论预期方向上显著，进一步验证了碳风险对经济效益机制的稳健性与机制差异性^[6]。上述处理使本项研究在供应链金融影

响企业碳风险的经济效益讨论中增强了其中逻辑递进关系的考察，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反向因果的干扰。

以下表 1 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碳风险指标平均为 3.039，但标准差高达 12.55，最低仅 0.000 21，最高却达 2 003，说明企业间碳风险差异巨大，且分布高度右偏。供应链金融水平均值 0.376，标准差 0.656，变动范围 0~4.543，显示多数企业供应链金融使用程度较低，但存在少数高值。托宾 Q 值平均 2.029，标准差 1.703，最小 0.662，最大 122.2，同样呈右偏分布，多数公司市值与资产重置成本之比集中在 2 倍左右，但有极少数极高估值。供应链滞后一期为 0-1 的虚拟变量，均值 0.316，表明约 31.6%的观测期企业在上一期已采用供应链金融。前置一期托宾 Q 值与当期水平十分接近，均值 2.028，标准差 1.726，极值分布亦相似，说明企业估值在时间维度上保持相对稳定。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1)	(2)	(3)	(4)	(5)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碳风险	29 234	3.039	12.55	0.000 210	2 003
供应链金融	29 234	0.376	0.656	0	4.543
托宾 Q 值	28 922	2.029	1.703	0.662	122.2
供应链滞后一期	29 234	0.316	0.465	0	1
前置一期托宾 Q 值	24 833	2.028	1.726	0.662	122.2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29 234	6.717	0.848	3.601	10.28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供应链金融、碳风险与全要素生产率

表 2 回归结果显示，供应链金融滞后一期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0.017，碳风险下降 0.444，后者对生产率有显著负向拖累。机制可概括为“融资

约束缓解—绿色技术采纳—动态能力激活”。供应链金融依托核心企业信用，盘活存货与应收账款，为中小企业提供与绿色投资久期匹配的耐心资本，降低资本误配并推动节能减排设备落地^[8]。代理成本率与碳风险正相关反向验证：治理薄弱时资金易被套利，碳风险积聚并拖累生产率。进一步

看，碳风险下降释放的合规现金与声誉缓冲资金转向研发、数字化及人力资本，资本和劳动有效投入强度提升。样本中碳风险降幅最大的四分位组贡献了生产率提升的主要部分，证实“碳风险缓释”是供应链金融释放效率红利的核心渠道。与此同时，碳风险下降显著降低外部融资溢价，银行

下调环境风险系数，企业融资成本再次下降，资金回流技术升级，形成“融资成本下降—绿色投资增加—生产率提升—碳风险下降—融资成本再下降”的累积循环，使供应链金融对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具备持续扩张的内生动力。

表2 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碳风险的影响：经济效益（全要素生产率）

主要变量	(1) 全要素生产率	(2) 碳风险	(3) 全要素生产率
供应链金融滞后一期	0.017*** (4.91)	-0.444** (-2.40)	0.017*** (4.84)
碳风险			-0.001*** (-4.7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101*** (-34.13)	28.803*** (6.02)	-3.084*** (-33.93)
年份—个体	YES	YES	YES
<i>N</i>	26 811	26 811	26 811
<i>R</i> ²	0.954	0.153	0.954

表3 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碳风险的影响：经济效益（企业价值）

主要变量	(1) 前置一起托宾 Q 值 F1TQ	(2) 碳风险	(3) 前置一起托宾 Q 值 F1TQ
供应链金融滞后一期	0.025* (1.79)	-0.437** (-2.38)	0.025* (1.79)
碳风险			-0.015*** (-4.4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1.433*** (31.39)	28.236*** (6.03)	11.637*** (31.72)
年份—个体	YES	YES	YES
<i>N</i>	22 591	27 155	22 591
<i>R</i> ²	0.659	0.152	0.659

（二）供应链金融、碳风险与企业价值

进一步地，本节继续将研究的关注点转向对企业价值层面经济效益的考察，表3显示，供应链金融滞后一期托宾 Q 提高 0.025，碳风险下降 0.437；碳风险系数-0.015 显著，中介比例约 26%。机制在于：应收账款证券化与存货质押把沉淀营运资本转为即期现金，企业无需预留环保处罚准备金，释放的流动性投向绿色改造，抬升未来自由现金流；平台实时披露碳排放数据，降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下调贴现率，将“碳风险下降”显性化为估值溢价。治理良好者把溢价转化为持续

ROIC 改善，代理成本高者则削弱效应。综上，供应链金融通过“碳风险贴现效应”与“增长期权激活效应”叠加，把隐性减排收益转化为可交易资本利得，实现企业价值重估。

（三）供应链金融经济效益的稳健性检验

在本小节中，稳健性检验沿用“剔除异常区间—替换变量—换估计法”框架。剔除 2008 年金融危机后 2011 至 2023 年样本，供应链金融对 LP 法全要素生产率仍保持 1% 显著；改用 OP 法结果一致；引入托宾 Q 作为效益维度，系数方向与显著性不变，且滞后两期滚动均值显著性升至 1%，

证实跨期累积效应。时间—行业联合固定效应吸收不可观测冲击，结果依旧稳健。机制上，现金流保险释放预防性现金，绿色工艺与能效投资即时提升资本生产率；区块链、物联网及核心企业信用实现能耗、排放数据实时披露，降低环境信息不对称，系统下调贴现率，形成“生产率—估值”联动。三重稳健共同指向“融资约束缓解—要素重置—技术升级—市场重估”链条，跨越度量、区间与估值维度，为政策与金融实践提供可靠依据。

稳健性检验以多重维度验证了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正向影响并非统计偶得，而是由融资约束缓解触发的技术升级与资本市场重估共同驱动的长期机制。该机制既不受生产率测度方法差异的干扰，也不受样本区间政策噪音的左右，更在治理环境、规模特征与盈利结构的交叉检验中表现出高度一致性，为其推广至政策制定与金融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经验基础。

表4 供应链金融经济效益的稳健性检验

主要变量	(1)	(2)	(3)	(4)	(5)
	个体—年份聚类			替换解释变量	
	TFP_LP	TFP_OP	FITQ	TFP_LP	TFP_LP
供应链金融滞后一期	0.017*** (4.11)	0.017*** (4.32)	0.025* (1.87)		0.016*** (4.63)
供应链金融2				0.016*** (3.63)	
常数项	-3.101*** (-11.00)	-0.816*** (-3.13)	11.637*** (20.18)	-3.011*** (-34.74)	-3.088*** (-31.8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个体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26 811	26 811	22 301	28 542	25 034
<i>R</i> ²	0.954	0.933	0.659	0.951	0.958

表5 企业碳风险经济效益的稳健性检验

主要变量	(1)	(2)	(3)	(4)	(5)
	个体—时间聚类			个体*行业高维回归	
	TFP_LP	TFP_OP	FITQ	TFP_LP	FITQ
碳风险	-0.001** (-2.31)	-0.001** (-2.41)	-0.015*** (-3.50)	-0.000* (-1.65)	-0.012*** (-2.83)
常数项	-3.008***	-0.795***	12.227***	-4.346***	8.68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个体	YES	YES	YES		
年份*行业				YES	YES
<i>N</i>	28 542	28 542	23 859	28 550	24 232
<i>R</i> ²	0.951	0.929	0.655	0.846	0.276

(四) 企业碳风险经济效益的稳健性检验

表5显示，无论LP或OP测算TFP，抑或托宾Q度量价值，碳风险系数始终显著为负；加入年份×行业高阶固定后，LP-TFP负效应仍保持10%显著，托宾Q负效应维持1%显著，结果稳健。LP与OP一致性排除度量噪音，托宾Q的额外资本成本约1.2%—1.5%，表明市场提前将远期环境

成本资本化。机制上，高碳风险通过“现金流压缩”与“资本调整成本”两条互补路径抑制效益：环保支出与罚款准备直接削减自由现金流，技术升级资金受限，TFP下降；同时，外部融资溢价抬升，绿色项目边际资本成本增加，正NPV项目被推迟，技术前沿停滞。两条路径叠加使负向弹性稳定在0.001—0.015区间，不受算法或区间干扰。

本小节将样本区间统一截断至2011—2023

年后,表6结果显示碳风险对经济效益的负向冲击在统计与经济意义上同步强化:LP-TFP系数-0.001($t=-4.86$)、OP-TFP系数-0.000($t=-4.39$)、托宾Q系数-0.014($t=-4.19$)均跃升至1%显著。在剔除金融危机及后续刺激政策扰动后,微观层面“环境成本—技术效率”传导链得以纯净呈现。2011年以来,碳交易试点扩围、环保税开征与绿色信贷指引落地使碳价与合规成本更具可预期性,高碳风险对现金流的线性压缩效应凸显;资本调整成本上升同步延迟绿色技术投资,技术前沿外推受阻。LP与OP结果一致放大,证实碳风险通过“投资预期—前沿收缩”路径抑制生产率;托宾Q系数显著提升,反映资本市场在更干净的制度环境下将碳风险纳入远期现金流折现,估值惩罚更为敏感。综合系统性稳健性检验,算法、指标、识别与区间四维闭环交叉验证,确认碳风险对企业经济效益的负向冲击是一条跨越度量方式、估值维度、识别策略与样本区间的稳健、可再现且具经济显著性的经验规律,而企业治理质量与资金实力决定了其对该负向冲击的缓释边界。

表6 企业碳风险经济效益的稳健性检验:更换区间样本回归

主要变量	(1)	(2)	(3)
	TFP_LP	TFP_O P	FITQ
碳风险	-0.001** * (-4.86)	-0.000* ** (-4.3 9)	-0.014*** (-4.19)
常数项	-3.032** * (-32.1 5)	-0.717* ** (-8.0 7)	12.149*** (30.8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年份	YES	YES	YES
N	26 128	26 128	21 706
R ²	0.956	0.938	0.667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2011—2023年A股数据证实,供应链金融通过“降碳风险—提生产率—抬估值”的稳健链条,把环境合规成本转化为可交易资本利

得。核心企业信用盘活营运资金,降低绿色投资调整成本;高颗粒度碳数据披露压缩信息不对称,下调贴现率,形成资金—技术—效率—估值正向循环。政策层面,建议将供应链金融纳入企业碳风险管理标准框架,对披露完整碳信息的链上融资给予再贷款贴息,激励核心企业输出信用并共享数据。金融机构应开发利率与碳强度挂钩的订单融资,把环境绩效嵌入授信额度与定价。企业需完善治理,设立绿色信息官,确保低成本资金精准投向工艺升级与能效改造,以锁定长期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 [1] Berger A N, Udell G F. A more complet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SME finance[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6, 30 (11) : 2945-2966.
- [2] 陈思吉.环境规制能否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J].科技和产业,2023,23 (22) :40-47.
- [3] 钟廷勇,马富祺,唐嘉尉,等.国家审计能够降低企业碳风险吗?[J].审计研究,2023, (04) :41-54.
- [4] 熊熊,马佳,赵文杰,等.供应链金融模式下的信用风险评价[J].南开管理评论,2009, 12 (04) :92-98+106.
- [5] 张芳,章璐,冷奥旗.供应链金融支持绿色普惠融合发展创新与政策建议研究[J].西南金融,2024, (07) :26-36.
- [6] 杨彭宇,贾静,郭可佳,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碳减排:直接影响、作用机制与带动效应[J].统计与决策,2024,40 (10) :173-178.
- [7] Nguyen J, Phan H. Carbon risk and corporate capital structure[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20, 64: 101713.
- [8] 宋华,黄千员,杨雨东.金融导向和供应链导向的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绩效的影响[J].管理学报,2021, 18 (5) : 760-768.
- [9] 卜君,朱悦.供应链金融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J].财经问题研究,2024,(05):89-104.

中世纪巴黎大学艺术学院辩证法教学的实践形态与价值意蕴

——基于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的思考

张凯

(中南民族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 作为中世纪巴黎大学四大学院的核心与基础, 艺术学院肩负着专业教育前普通教育的使命, 其辩证法教学是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化初期的核心实践形态。辩证法教学以“课程、方法、考核”为三维支撑, 课程维度定位于“七艺”框架, 以“三科”核心身份聚焦逻辑训练; 方法维度确立论辩为主的标准范式, 通过“阐释”与“究问”实现从文本解析到思辨交锋的进阶; 考核维度以“论证能力”为核心, 依托执教授予权审核与就职礼“辩定”仪式完成学术资格认证。这一实践体系是“基督教教育目标”与“中世纪认知条件两者的必然产物, 深刻印证了涂尔干“形式主义教育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核心论断, 既实现了个体层面理性心智的系统化塑造, 又成为凝聚学术共同体、推动社会整合的精神纽带。本文不仅还原了经院辩证法教学的历史本真, 也为当代高等教育通识教育改革、批判性思维培养与学术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历史镜鉴与学理支撑。

关键词: 辩证法教学; 涂尔干; 教育思想的演进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68

The Practical Forms and Value Implications of Dialectics Teaching in the Faculty of Arts at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in the Middle Ages

——Reflections Based on Durkheim's 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Thought

Zhang Kai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Abstract: As the core and foundation of the four facult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Faculty of Arts shouldered the miss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prior to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ts dialectics teaching constituted the core practical form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Western higher education. With "curriculum, method and assessment" as its three-dimensional pillars, dialectics teaching was position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Seven Liberal Arts in the curriculum dimension, focusing on logical training as the core component of the Trivium; in the methodological dimension, it established a standard paradigm centered on disputation, realizing the evolution from textual exegesis to speculative confrontation through exposition and quaestio; in the assessment dimension, it took argumentative competence as the core and completed the certification of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by virtue of the examination for the license to teach and the disputation ceremony at the inceptio. This practical system was an inevitable product of both the educational goals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cognitive conditions of the Middle Ages, and it eloquently confirms Durkheim's core thesis that formalistic education possesses historical rationality. It not only realized the systematic cultivation of the rational mind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but also served as a spiritual bond that fostered the

cohesion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promoted social integration. This paper not only restores the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of scholastic dialectics teaching, but also provides historical reference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reform of general educ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communities in contemporary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Dialectics Teaching; Durkheim; 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Thought

《教育思想的演进》是涂尔干教育社会学的经典之作，全书贯穿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观察视角与研究方法。这种“反思”的核心要义，在于对社会理想的理性批判——无论是宗教理性、世俗理性抑或科学理性，本质上都是特定历史阶段中，人们所追求的社会“应然”与社会“实然”的碰撞与张力。正是这种“反思性”的历史视角，为我们突破刻板认知、重新审视中世纪巴黎大学艺学院辩证法的实践形态与价值逻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作为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化的雏形，中世纪巴黎大学艺学院的辩证法教学，长期被简单标签化为“经院形式主义”，未能得到全面客观的审视。既有研究或局限于教育史层面的实践梳理，仅聚焦“究问法”“公开论辩”等形式考证；或孤立强调其逻辑训练价值，忽视了其在学术共同体凝聚与社会整合中的关键作用，难以展现其多维价值意蕴。反观我国高等教育语境，辩证法教学的价值同样被严重窄化：要么被简化为纯粹的逻辑技巧训练，丧失了批判反思的本质；要么因价值目标模糊而陷入边缘化困境，其共同体凝聚功能未能得到充分释放。面对当代高等教育中批判性思维培养缺位、学术共同体凝聚力薄弱、个体理性与群体共识失衡等现实困境，我们亟需回溯历史传统，从中汲取思想资源与实践镜鉴。

一、中世纪巴黎大学艺学院辩证法教学的实践形态

（一）课程维度：“七艺”框架下的定位与内容设置

“七艺”作为西方古典自由教育的载体，以“文法、修辞、逻辑（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为核心学科，集中体现了中世纪追求“百科全书式”知识整合的教育目标。这七门学科并非完全并列，而是依其教育取向划分为“三科”与“四艺”：前者聚焦人类心智及思维表达的形式训练，后者

则指向外部世界的事物认知。辩证法作为“三科”的核心与灵魂，在涂尔干看来，正是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文法中心”教育的深化与进阶，本质是形式主义教育的逻辑升华——其始终以个体心智的逻辑训练为核心旨归，这条主线贯穿了从古希腊萌芽到经院哲学鼎盛的完整思想脉络。

这一核心定位，直接体现在课程教材选择与内容侧重上，进一步凸显了逻辑的主导地位。亚里士多德《工具论》、波菲利为《范畴篇》撰写的导论、普里西安《文法基础》等核心教材，均以逻辑思辨为核心导向，课程内容聚焦三段论推理、命题辨析、经院命题论辩等实践。此时的文法教学虽仍占有一席之地，却已完全服务于思维训练——其探讨的并非拉丁文或希腊文的具体结构，而是所有语言的通用逻辑规则，是从特定语言中抽离出的“通用文法”，这种文法堪称“语言的几何学”，旨在为逻辑训练提供统一的符号载体与表达工具。

（二）方法维度：论辩为主的标准范式

艺学院以“逻辑论证”为核心，形成了“阐释”和“究问”两种核心教学方法，覆盖从基础训练到高阶思辨的全过程，两者都是以三段论的形式为基础，论证的每一步都环环相扣，并相互参证，确保大小前提的逻辑自洽。“阐释”本质上是对一篇文本进行的长篇辩证法分析，教师用一系列的三段论推论对文本的观点进行拆解，直至显示出其最基本的要素，并且能展示各个要素之间的必然关联。相比于单向逻辑推演的“阐释”，“究问”显得更有动态思辨性与活力，教师以文本中的争议性命题为起点，却又不局限于书本：首先中立呈现正反两方的所有论证依据，进行不偏不倚的辩证审视；继而明确自身立场，构建严谨的辩护逻辑；最后逐一驳斥对立观点，完成完整的论辩闭环。这种方法以“问题”为锚点，充分激活了思维的批判性与创造性。

“究问”的论辩形式不仅是教师乐于使用的教

学方法，更渗透于中世纪巴黎大学的整个学术共同体生活。教师需每周面向学生公开论辩，每年冬季还会由四个同乡会推选教师，在穷者圣尤里安教堂举行庄重的论辩；业士们在同乡会内、学生们在课下也以论辩为日常研习形式。正如涂尔干引用索邦神父的论断：“这种练习甚至比诵读还有用，因为它能够有效地阐明所有的疑难，任何东西只有在论辩中经过反复咀嚼之后，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

（三）考核维度：以“论证能力”为核心的评价体系

中世纪巴黎大学的教师职业准入与学术能力认证，其核心内容包括执教授予权与就职礼，二者以“论证能力”为核心共同构成职业准入的法定环节，维系了教师行会的专业性。

执教授予权本质是教学资格的审核权，起初由巴黎圣母院主教独断垄断，完全掌控准入标准与授予权限。但随着教师行会的抗争，最终形成“主教掌程序性权力、行会掌实质性权力”的分权格局——主教负责形式性授权，而申请者是否具备教学资质，核心取决于教师行会对其学术功底与论证能力的实质评判，从根本上确立了行会在学术评价中的核心地位。

就职礼则绝非单纯的形式化入职仪式，而是兼具象征意义与实质考核的关键程序，其核心环节便是以“论证能力”为核心的“辩定”。作为对申请者学术能力的评定，“辩定”要求申请者围绕经院核心命题展开公开论辩，充分展现逻辑推演、命题辨析与反驳辩护的综合能力；在早期制度中，获得执教授予权者还需在就职礼后履行“连续40天公开论辩”或“问题测定”的义务，通过持续性的思辨交锋，最终完成学术资格的全面认证。

二、中世纪巴黎大学艺学院辩证法教学的价值意蕴

任何制度都植根于特定时空语境，与时代需求相适配，既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亦无行之百世而无弊的永恒性。中世纪巴黎大学艺学院的辩证法教学亦不例外，其价值内核潜藏于制度实施时的各方诉求与共识之中。这种凝聚了时代语境的“历史意见”，既集中映现了当时的核心需求，更是评判这一教学制度价值意蕴的根本凭据与真实标尺。

（一）中世纪艺学院辩证法教学本体论依据

探讨艺学院辩证法教学的本体论依据，本质

是厘清其“存在的根本理由”。根据涂尔干历史社会学的因果分析方法，辩证法教学的产生与演变并非主观选择或偶然结果，而是“基督教教育目标”与“中世纪认知条件”两者的必然产物，其合理性根植于特定历史语境的客观需求，而非抽象的理论预设。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心智教育，以传授特定知识内容与行为模式为核心，这些内容与模式彼此孤立、缺乏内在统合，本质是“外在技能的堆砌”——如同为心智装配一副可拆分的盔甲，各部分仅能应对具体场景，却无法塑造统一的心智结构。其教育目标聚焦“技能适配”，而非“心智统合”，与当时城邦生活的实用需求高度契合。而基督教文化孕育的教育观，彻底转变了这种碎片化取向，核心在于推动人的“灵魂深层转向”——这种转向强调整体性与统一性，要求塑造稳定的心智与意志倾向，而非拼凑孤立的技能模块，这一转变正是辩证法教学得以兴起的本体论前提。

这种整体化教育目标投射到教学实践中，便催生了“七艺”这种百科全书式的课程体系，但其核心重心必然向“三科”（文法、修辞、辩证法）倾斜，这是中世纪认知条件的客观限定，构成了本体论依据的另一核心维度。涂尔干强调，中世纪对客观外部世界的认知水平远逊于近现代，自然科学与实证知识体系尚未成型，以外部事物为研究对象的“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缺乏足够的知识积累与认知工具，难以承担“塑造整体心智”的核心使命。相比之下，以人的思维本身为对象的“三科”，形成了层层递进的形式训练逻辑：文法是“语言的形式训练”，为思维提供统一的符号载体；修辞是“表达的形式训练”，让思维能够清晰外化；而辩证法是“思维的形式训练”，直接指向理性本身的统合与完善——三者中，唯有辩证法能够直击基督教“整体心智塑造”的核心诉求，通过标准化的概念界定、命题推演与逻辑反驳，为个体提供统一的思维工具，让“灵魂深层转向”从抽象目标转化为可操作的教学实践。

（二）中世纪艺学院辩证法教学的个体价值：个体理性的系统化塑造

辩证法教学的个体价值核心，是通过标准化的逻辑训练，推动个体心智从经验直觉向逻辑自觉跃迁，完成理性自主的系统化塑造，这与涂尔干强调的“形式主义教育以逻辑训练塑造理性心智”的核心主张高度契合。在中世纪之前，欧洲民众的思维多依赖经验感知与权威盲从，缺乏系统

性的逻辑框架，而辩证法教学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为个体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思维工具。

其核心训练路径始于逻辑规则的夯实。艺学院以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为核心教材，聚焦三段论推理、命题辨析、概念界定等基础训练，要求学生精准把握“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推理结构，规避“偷换概念”“逻辑断裂”等谬误。这种训练并非机械背诵规则，而是通过“究问法”的实践流程深化：学生需围绕“共相是否实在”等经院命题，先中立呈现正反方论据，再通过逻辑反驳剔除矛盾观点，最终确立合理结论。涂尔干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中指出，这种训练让个体“摆脱对权威的盲目服从，形成‘概念界定—命题推演—逻辑反驳’的思维范式”，使模糊的经验直觉转化为清晰的逻辑思维。

更重要的是，辩证法教学启蒙了批判性思维与理性自主。公开论辩作为核心教学场景，要求学生无论面对教师、权威教义还是主流观点，都需以逻辑为依据展开辨析，而非被动接纳。阿伯拉尔的教学实践便突出这一特质：他鼓励学生质疑经院权威的论断，通过“提出问题—列举反方—逻辑辩护”的交锋，让学生明白“真理不在于身份高低，而在于论证严密”。这种训练打破了中世纪常见的权威崇拜，培养了个体“以理服人”的理性精神——学生不再满足于“是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在辨析中形成独立判断能力。正如涂尔干所言，辩证法训练使个体“从经验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获得心智的自主与自由。

（三）中世纪艺学院辩证法教学的社会价值：学

术共同体与社会整合的双重纽带

辩证法教学构建了学术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为中世纪学术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统一的范式与秩序。在中世纪之前，欧洲学术因战乱与割据呈现碎片化状态，不同地区的学者缺乏共通的思维工具与交流标准。而艺学院以辩证法为核心的教学体系，确立了一套标准化的逻辑规则：从概念界定的精准性、命题表述的严谨性，到三段论推理的规范性、辩论流程的程式化，形成了“可通约”的学术语言。无论是巴黎大学的经院学者，还是牛津大学的思辨家，即便身处不同地域、持有不同见解，都能依托这套逻辑范式展开对话与争论——他们围绕“共相是否实在”“上帝的预知与人类的自由意志”等核心命题，遵循“提出问题—列举反方观点—逻辑反驳—确立正解”的经院式辩论流程，在思辨中寻求共识。这种统一的学术范式，

不仅打破了地域与语言的隔阂，更培养了学者们“尊重逻辑、敬畏真理”的学术伦理：辩论不以身份高低定胜负，而以论证的严密性分优劣，这种理性化的学术传统，让分散的学者群体凝聚成具有共同追求的学术共同体，为中世纪后期大学的兴起与学术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此外，辩证法教学承担了社会整合的核心功能，成为维系中世纪社会精神统一的关键载体。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结构以“教权与王权并立”为核心，而教会作为精神权威，面临着整合不同阶层思想的艰巨任务。辩证法教学通过将宗教教义与逻辑推演相结合，让抽象的信仰变得“可论证、可理解”，从而增强了教义的说服力与传播力。经院学者们并非简单灌输宗教教条，而是运用辩证法对《圣经》教义进行系统化、逻辑化的阐释，将信仰与理性融为一体。这种“理性化的信仰”既满足了知识分子对思辨的需求，也让普通民众通过清晰的逻辑链条理解教义核心，避免了信仰的盲目化与碎片化。同时，艺学院培养的人才成为社会整合的“毛细血管”：这些接受过系统辩证法训练的学者，一部分进入教会成为神职人员，以理性化的布道统一信徒思想；另一部分进入世俗政权担任官员，以逻辑化的思维处理政务、制定规则，成为连接教权与王权、贵族与民众的桥梁。在封建割据、思想多元的中世纪，这种通过辩证法训练形成的“共同思维方式”与“共同价值认同”，如同精神纽带，将分散的社会阶层凝聚在一起，减少了思想冲突与社会动荡，为中世纪社会的稳定运转提供了核心支撑。

中世纪艺学院的辩证法教学，以其双重纽带作用深刻影响了中世纪的社会结构：作为学术共同体的精神内核，它构建了统一的学术范式与伦理；作为社会整合的核心载体，它凝聚了多元阶层的思想共识。这种社会价值的本质，是将个体层面的逻辑训练转化为群体层面的理性秩序——通过塑造具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个体，形成理性化的学术群体与社会群体，从而在分散的中世纪社会中，构建起精神与秩序的统一。即便在当代，这种“通过思维训练凝聚共同体、整合社会”的价值依然具有启示意义：统一的思维规则与价值认同，始终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核心基础。

三、结语

中世纪巴黎大学艺学院的辩证法教学，绝非“经院形式主义”的刻板标签所能概括，而是基督教教育目标与中世纪认知条件共同催生而成，揭

示了教育发展的核心规律——任何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教育实践，必然是“教育目标”与“现实条件”动态适配的产物。其以“课程、方法、考核”为三维支撑的实践形态，既回应了基督教“整体心智塑造”的教育诉求，又适配了中世纪的认知局限，构建了系统化的理性培育体系，彰显了形式主义教育的历史合理性。

辩证法教学所蕴含的“逻辑训练塑造理性”“统一范式凝聚共识”的核心智慧，对当代高等教育仍具深刻启示。面对批判性思维培养窄化、学术共同体凝聚力不足等现实困境，我们可从中汲取养分：在通识教育中强化逻辑思辨的核心地位，以“问题导向”的论辩式教学激活批判反思本质；在学术评价中坚守“以理服人”的伦理，筑牢共同体的共识基础；在教育改革中平衡个体理性培育与

群体价值认同，实现教育的育人与整合双重功能。

参考文献：

[1] 展立新.揭秘历史“隐得来希”,发轫现代大学理论——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历史观和大学观述评[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02):176-188.

[2] 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M].李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02.

[3] 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M].李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11.

[4] 黄旭华,李盛兵.中世纪大学执教资格授予权博弈——基于分权制衡的视角[J].教师教育研究,2014,26(06):80-85.

[5] 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M].李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6.

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调查及影响因素研究

张卓^{1*}, 葛蒲², 唐勛¹, 熊芮姝涵³, 余皓天⁴

(1.西安医学院卫生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21; 2.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3.西安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21; 4.西安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21)

摘要: 目的: 了解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为医学类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提供依据。方法: 以陕西省某医学院校2023级与2024级学生为研究对象, 2025年9月采用整群抽样开展问卷调查, 共回收有效问卷348份。结果: 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总体得分为(3.94±0.63)分, 处于较高水平; 在各维度中, 沟通合作能力得分最高(4.19±0.73)分, 防范风险能力得分相对较低(3.52±0.54)分。多因素线性回归提示, 性别为女性与创新创业能力得分呈负相关; 担任过学生干部、接受过创新创业教育、参加过创新创业竞赛以及参与科研活动均与创新创业能力得分呈正相关。结论: 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整体较高, 但仍受教育经历与实践参与影响。建议高校通过课程体系优化、竞赛与科研实践融合、导师制与平台支持等路径提升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关键词: 医学生; 创新创业; 思维素养; 技能现状; 影响因素

基金项目: 西安医学院2025年创新创业教育研究课题(2025CCJG-15); 陕西省“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2025年度课题“深度学习视域下医学院校管理类课程设计与应用研究”(SGH25Y3603); 西安医学院2025年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以学习者为中心的高等继续教育学习支持服务体系研究”; 西安医学院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025CXHZ-18); 西安医学院2025年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S202511840108X)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69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ency Among Medical Students: Level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Zhuo Zhang^{1*}, Pu Ge², Xu Tang¹, Ruishuhan Xiong³, Haotian Yu⁴

¹School of Health Services Management, Xi'an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China

²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China

³School of Clinical Medicine, Xi'an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China

⁴School of Public Health, Xi'an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ence among medical students and identify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reby providing evidence for improv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medical colleges.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September 2025 using cluster sampling among second and third-year medical students at a medical college in Shaanxi Province, China. A total of 34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Results: The overal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ence score was 3.94 ± 0.63, indicating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Among the subdimensions,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scored the highest (4.19 ± 0.73), whereas risk prevention scored the lowest (3.52 ± 0.54).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showed that female

作者简介: 张卓(1989—), 女,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

葛蒲(1997—), 男, 博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为健康管理;

唐勛(2004—), 男,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

熊芮姝涵(2007—), 女,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临床医学;

余皓天(2007—), 男,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精神医学。

通讯作者: 张卓

gender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ence. Serving as a student leader, receiv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s, and engage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mpetence scores. Conclusion: Medical students demonstrated relatively high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ence; however, competence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and practical engagement. Medical colleges are encouraged to optimize curriculum design, integrate competitions with research-based practice, and strengthen mentorship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platforms to further enhanc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ence.

Keywords: medical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inking competence; competence level; influencing factors

一、前言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纵深推进与“新医科”建设加速落地的双重背景下，高等医学教育正面临着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塑造”的深刻转型。近年来，国家持续强化高等教育服务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导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要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深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推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重塑，强化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以适配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与产业升级需求^[1]。

培养具备创新精神、科研素养与创业潜能的高素质医学人才，不仅是响应“健康中国”战略对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诉求，更是破解医学学科交叉融合、技术转化瓶颈的关键路径^[2]。医学教育作为卫生健康人才供给的源头，既要夯实医学生的专业诊疗能力，更需强化其在复杂医疗场景中的创新思维、资源整合与风险应对能力，以适配人工智能辅助诊疗、互联网医疗等新业态带来的行业变革。

创新创业能力作为医学生综合素质的核心构成，是衡量医学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其形成与发展受个体特征、教育体系、实践平台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创新创业教育、科研训练与竞赛实践是提升医学生创新能力的关键抓手^[3-5]，但当前国内相关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其一，现有研究多侧重理论探讨，缺乏实证支撑与系统的影响因素分析；其二，创新创业教育与医学专业融合仍不够紧密，实践教学支持相对薄弱，医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与行业需求之间仍存在差距，成果转化能力提升面临瓶颈。此外，创新创业能力作为涵盖目标管理、沟通合作、风险防范等多维度的综合素养，现有测评工具对医学专

业场景的适配性仍需进一步优化，难以精准捕捉医学生在临床实践、科研转化中的能力特征。

鉴于此，本研究以陕西省某医学院校2023级与2024级医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标准化量表开展横断面调查，系统评估其创新创业能力的整体水平与维度差异，深入剖析性别、学生干部经历、创新创业教育参与等关键影响因素，旨在为医学类院校构建“专创融合”的课程体系、推进竞赛与科研实践一体化培养、完善导师制与平台支持机制提供实证依据，助力培养更多适应行业发展需求的创新型医学人才。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陕西省某医学院校2023级与2024级在校医学生为研究对象，于2025年9月开展问卷调查。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发放问卷共366份，剔除填写不完整或逻辑明显异常的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48份，有效回收率为95.08%。所有研究对象均自愿参加并知情同意。

2.2 研究工具

2.2.1 人口学与社会学特征问卷

本研究采用自编社会人口学资料问卷收集一般资料，内容包括：性别、年级、生源地、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是否接受过创新创业教育、是否参加过创新创业竞赛及是否参与科研活动等。本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相关伦理原则，调查过程严格保护受试者隐私，数据仅用于科研分析。

2.2.2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量表

采用《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量表》评估研究对象创新创业能力水平。量表共包含7个维度，

分别为：目标确定能力、行动筹划能力、果断决策能力、沟通合作能力、把握机遇能力、防范风险能力、逆境奋起能力。量表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选项为“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计 1~5 分，得分越高表明创新创业能力水平越高。各条目得分累加为量表总分，总分越高提示创新创业能力越强。

本研究中，该量表结构效度与内部一致性良好：量表整体 KMO 值>0.90，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 ($P<0.001$)，各条目因子载荷均>0.50，累计方差解释率>78%，提示结构效度较好；各维度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0.93，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3 研究方法

采用 SPSS 27.0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与统计分析。计量变量以均数±标准差 ($\bar{x}\pm s$) 表示，分类变量以频数和百分比[n(%)]表示。组间比较根据变量类型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 (ANOVA)。以创新创业能力总分为因变量，将社会人口学特征及创新创业相关经历作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筛选影响因素。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3.1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现状

本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 348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5.08%。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总分为 (3.94±0.63) 分，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各维度得分中，沟通合作能力得分最高 (4.19±0.73) 分，防范风险能力得分相对较低 (3.52±0.54) 分。各维度具体得分情况见表 1。

表 1 陕西省某医学院校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分

	均数	标准差
总分	3.94	0.63
目标确定能力	4.08	0.54
行动筹划能力	3.94	0.62
果断决策能力	3.77	0.62
沟通合作能力	4.19	0.73
把握机遇能力	4.06	0.63
防范风险能力	3.52	0.54
逆境奋起能力	4.02	0.62

3.2 不同特征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分比较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是否接受创新创业教育、是否参加创新创业竞赛、是否参与科研活动的医学生，其创新创业能力评分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具

体比较结果见表 2。

表 2 陕西省某医学院学生创新创业评分比较

变量	分组	人数	创新创业能力评分
性别	男	75 (21.55%)	3.96±0.71*
	女	273 (78.45%)	3.92±0.63
年级	2023 级	205 (58.90%)	3.94±0.62
	2024 级	143 (41.10%)	3.94±0.63
生源地	乡镇	154 (44.25%)	3.96±0.64
	县城	77 (22.13%)	3.92±0.62
	地级市	80 (22.99%)	3.94±0.71
	省会城市	37 (10.63%)	3.93±0.72
担任过学生干部	否	290 (83.33%)	3.90±0.60*
	是	58 (16.67%)	4.04±0.73
接受过创新创业教育	否	208 (59.79%)	3.89±0.62*
	是	140 (40.21%)	4.00±0.59
参加过创新创业竞赛	否	278 (79.89%)	3.88±0.64*
	是	70 (20.21%)	4.03±0.69
参与过科研活动	否	205 (58.89%)	3.90±0.62*
	是	143 (41.11%)	3.98±0.66

* $P<0.05$

3.3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多因素分析

以创新创业能力总评分为因变量，将社会人口学特征及创新创业相关经历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性别为女性与创新创业能力得分呈负相关 ($\beta=-0.022$, 95%CI: -0.041~-0.003, $P=0.025$)；担任过学生干部 ($\beta=0.116$, 95%CI: 0.098~0.134, $P<0.001$)、接受过创新创业教育 ($\beta=0.079$, 95%CI: 0.062~0.095, $P<0.001$)、参加过创新创业竞赛 ($\beta=0.124$, 95%CI: 0.107~0.140, $P<0.001$) 以及参与科研活动 ($\beta=0.059$, 95%CI: 0.043~0.075, $P<0.001$) 均与创新创业能力得分呈正相关。见表 3。

表 3 陕西省某医学院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影响

因素的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类别	β (95% CI)	P
性别	女	-0.022 (-0.041,-0.003)	0.025
担任过学生干部	是	0.116 (0.098,0.134)	<0.001
接受过创新创业教育	是	0.079 (0.062,0.095)	<0.001
参加过创新创业竞赛	是	0.124 (0.107,0.140)	<0.001
参与过科研活动	是	0.059 (0.043,0.075)	<0.001

四、讨论

本研究基于陕西省某医学院校 2023 级与 2024 级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总体处于较高水平 (3.94 ± 0.63), 提示当前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已具备创新意识与能力培育基础。从维度得分来看, 沟通合作能力得分最高 (4.19 ± 0.73), 而防范风险能力得分相对较低 (3.52 ± 0.54), 反映出医学生在团队协作与沟通表达方面优势更为明显, 但在创新创业过程中的风险识别与应对能力仍存在提升空间。

4.1 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总体水平较高的原因分析

析

本研究中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总体得分较高, 可能与近年来国家及高校持续推动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密切相关。“新医科”建设强调学科交叉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创新创业相关课程、训练项目及实践平台的逐步完善, 为医学生提供了更多接触创新理念、科研训练与转化实践的机会^[6]; 另外, 医学专业学习过程本身包含大量问题导向学习 (PBL)、案例讨论与临床思维训练^[7-9], 有助于促进学生的目标规划、行动筹划与决策判断能力形成, 从而在总体能力水平上表现较好。

4.2 沟通合作能力得分最高的可能原因

沟通合作能力得分最高, 可能与医学教育强调团队协作及医患沟通的培养特点有关。医学学习与临床见习过程中, 学生需要在多学科协作、病例讨论、医患交流等情境中完成任务, 这种高频率的团队互动训练能够强化其沟通表达、协同合作与资源整合能力。同时, 医学生群体通常具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与任务执行意识, 较容易在团队情境中形成积极互动, 从而表现为沟通合作维度得分突出。

4.3 防范风险能力相对较低的原因及启示

本研究结果显示, 防范风险能力在 7 个维度

中得分相对较低。其原因可能在于: 医学生虽然具备一定科研思维与创新意识, 但对创新创业过程中的市场风险、资源风险、管理风险与法律合规风险等内容接触较少, 风险识别与评估训练不足。此外, 医学教育长期以“循证、安全、规范”为导向, 学生更习惯于在明确规则与流程下完成学习任务, 而创新创业活动具有不确定性强、试错成本高的特点, 容易导致学生在风险应对方面信心不足。因此, 高校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时, 应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模块, 增加真实案例分析、模拟创业训练与项目孵化实践, 使学生在实践中提升风险识别与策略调整能力。

4.4 多因素分析结果的解释: 教育经历与实践参与是关键影响因素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提示, 担任学生干部、接受创新创业教育、参加创新创业竞赛、参与科研活动与创新创业能力得分呈正相关, 而女性与创新创业能力得分呈负相关。

担任学生干部是创新创业能力的正向影响因素。其原因可能在于学生干部往往承担组织协调、任务分配与资源整合等工作, 能够在实践中提升领导力、沟通协调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这类经历也有助于增强自我效能感与团队协作意识, 从而促进创新创业能力整体提升。

接受创新创业教育能够显著提升创新创业能力得分。创新创业课程与训练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创新意识, 还可提供项目策划、商业模式、市场分析、融资逻辑等系统知识, 使学生能够将“创新想法”转化为“可实施方案”, 从而提高目标确定、行动筹划及机遇把握等维度能力。该结果也提示高校应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推动课程从“知识普及型”向“能力导向型、实践导向型”转变。

参加创新创业竞赛与创新创业能力呈正相关。竞赛通常以团队形式完成, 需要经历项目选题、方案设计、路演展示与答辩反馈等过程, 能够有效促进学生的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及创新方案迭代能力^[10]。同时竞赛平台能使学生获得外部评价与资源链接, 增强其参与创新创业实践的动力与信心。

参与科研活动是创新创业能力的重要正向影响因素。科研训练强调提出问题、查阅文献、设计方案、数据分析与结果解释, 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意识和持续改进能力。对于医学生而言, 科研经历不仅有助于形成科学研

究素养,也为未来医学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奠定基础^[11]。因此,推动“科研训练—创新项目—竞赛展示—成果转化”的链条式培养模式,可能是提升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有效路径。

本研究还显示女性与创新创业能力得分呈负相关。这可能与性别在创新创业参与机会、角色期待与自我效能评价方面存在差异有关^[12]。建议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与项目培育过程中加强性别友好支持,例如建立女性导师支持体系、提供更多领导角色与项目实践机会,鼓励女性医学生参与科研与竞赛,从而缩小能力差异。

4.5 对医学类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建议

结合本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改进建议:(1) 优化课程体系:构建“基础认知—能力训练—项目实践”递进式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将医学创新、成果转化、风险管理与知识产权等内容纳入教学。

(2) 推动竞赛与科研实践融合:以科研训练为基础,以竞赛项目为载体,鼓励学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创新创业项目,实现“以研促创、以赛促创”。

(3) 强化导师制与平台支持:建立由临床专家、科研导师、企业导师组成的多元导师团队,为学生提供持续性指导;完善创新创业孵化平台,为项目提供场地、资源与政策支持。(4) 提供管理与组织实践机会:通过学生组织、社团及项目管理训练提升学生干部培养质量,促进学生在真实任务中提升领导与协作能力。(5) 关注群体差异与精准培养:针对女性、未参与科研竞赛等学生群体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培训与实践机会,提升创新创业教育覆盖面与公平性。

4.6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为单中心横断面调查,样本来源于陕西省某医学院校,结果的外推性仍需多中心研究进一步验证;其次,创新创业能力受多因素影响,本研究纳入变量有限,后续可进一步加入家庭支持、学业压力、职业规划、人格特质等因素进行更全面分析。

参考文献:

[1]王运武,田阳,任楷文.教育数字化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构想及实现路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解读[J]. China Medical Education Technology, 2025, 39(4).

[2]琴郭.健康中国目标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构建策略分析[J]. 体能科学, 2025, 5(6): 53-56.

[3] Ruan Y, Zhang J, Wang J, et al. Academic competition-based learning cultivates scientific literacy to promote profess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medical undergraduates[J].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2025, 13: 1590832.

[4] Rath S, Russo M N, Rotman M. Evaluating an Internal Pitch Competition for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in Medical Innovation: The Alligator Tank at Mayo Clinic Florida[J].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Science, 1-21.

[5]延辉佟,晓琳黄,天龙原,等.基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改革对策[J]. 现代教育前沿, 2025, 6(2): 161-164.

[6]刘永兵,侯莘,段培,等.新医科背景下护理学微专业建设现状[J]. Chinese Nursing Research, 2025, 39(12).

[7]平谭,子红范,雪梅谭,等.PBL在环境工程微生物实验教学中的应用[J]. 现代教育前沿, 2025, 6(10): 105-109.

[8]高秀芝.基于“学生中心,问题导向”的高等数学PBL教学研究[J]. Advances in Education, 2025, 15: 727.

[9]胡晓.中学英语项目式学习(PBL)教学成效研究——基于近十年国内外文献综述[J]. Advances in Education, 2025, 15: 1506.

[10] Watson H R, Millin P, Close J, et al. 'Let's work together to pass medical school': a qualitative study of medical student attitudes to teamwork,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J]. FEBS Open Bio, 2025, 15(2): 359-372.

[11]胜达陆,伟铭杨,秋妍罗,等.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赋能新工科人才培养——缺陷纳米催化项目的科研与实践育人路径[J]. 现代教育前沿, 2025, 6(8): 1-5.

[12] Barrera-Verdugo G, Cadena-Echeverría J, Durán-Sandoval D, et al. Deepen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self-efficacy and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mong Business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of Generation Z[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2025, 23(2): 101186

地方性红色资源融入思政课的教学改革探索 ——以潘家峪惨案主题“三阶育人”模式为例

王楠¹ 赵婉华¹ 张妍¹ 潘素芳¹

(唐山师范学院, 河北 唐山 06300)

摘要:《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是高校思政教育的主要课程。当前,该课程面临“知行脱节”“价值引领浅表化”等问题。本研究以潘家峪惨案这一地方性红色资源为切入点,打造“真相建构—责任内化—行动转化”的“三阶育人”模式,通过史料实证、情感共鸣、实践转化的递进式教学设计,将历史事实与价值引领、理论教学与实践体验、本土资源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基于唐山师范学院的教学改革实践,本文系统阐释该模式的思政教育价值、理论基础、实施路径,为地方高校利用地方性红色资源深化思政课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式。

关键词:潘家峪惨案;三阶育人;地方性红色资源

基金项目:唐山师范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25JGYB085)。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2.270

Exploration of Integrating Local Red Resources into the Teach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Taking the "Three-Stage Educ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Theme of the Panjiayu Tragedy as an Example

Wang Nan¹, Zhao Wanhua², Zhang Yan³, Pan Suofang⁴

School of Marxism,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China

Abstract:The "Ideological Morality and Legal Education" course is a key cours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Currently, this course is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disconnec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and "surface-level value guidance". This study takes the Panjiayu Tragedy, a local red resour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constructs a "three-stage education" model of "truth construction - internalization of responsibility - action transformation". Through progressive teaching designs involving historical evidence,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it integrates historical facts with value guidance, theory teaching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local resources with modern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value, theoretical basi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is model, providing a replicable and scalable practical model for local universities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by utilizing local red resources.

Keywords:Panjiayu Massacre; Three-level Education Model; Local Red Resources

作者简介:王楠(1989—),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赵婉华(1980—),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张妍(1981—),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校大学生法治教育;

132 潘素芳(1975—),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校大学生法治教育。

通讯作者:王楠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思政课程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必须充分激活红色资源的育人价值，引导青年学生从历史中汲取精神滋养、坚定理想信念。

当前，高校思政课红色资源融入实践仍面临不少突出问题。一是资源开发“重国家级、轻地方性”。对本土惨案史、抗争史等红色资源挖掘不深、利用不足。二是教学模式“重理论讲授、轻实践体验”。难以引发学生情感共鸣，导致爱国主义教育流于表面。三是育人链条“重认知传递、轻行动转化”。未能实现“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仍有传播空间。

潘家峪惨案是1941年侵华日军在华北制造的血腥惨案，1230名无辜村民遇害，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铁证，村民的英勇抗争彰显了中华民族

1941年1月25日，侵华日军为报复潘家峪村民支持抗日根据地建设，将全村1230人逼入西大坑，进行集体屠杀。这一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扫荡”政策的典型缩影，与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人体实验等罪行共同构成了日本侵华的系统性暴行铁证。惨案中，村民手持农具与日军殊死搏斗，展现出“宁死不屈、保家卫国”的民族气节，是抗战精神的生动诠释。挖掘潘家峪惨案的历史细节，能够为思政课提供鲜活的历史素材，让学生直观感受战争的残酷与民族的抗争，筑牢历史认知的根基。

现实维度：驳斥历史虚无主义与培育家国情怀的利器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频繁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侵华罪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青年群体中仍有传播空间。潘家峪惨案纪念馆史料、幸存者口述史、地方志记载等一手证据，构成了“军事档案—民间记忆—实物证据”的证据链，能够有力驳斥“侵华战争美化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观点。

同时，结合当代国际形势，引导学生思考“如何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能够唤醒学生对和平的珍视与对历史责任的反思，强化“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全球视野的新时代青年。

（二）“三阶育人”模式的理论基础

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理论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品德形成是“认知—情

族的不屈气节，是极具教育价值的地方性红色资源。唐山师范学院地处冀东红色沃土，与潘家峪惨案纪念馆毗邻，具备挖掘本土红色资源、开展沉浸式思政教育的天然优势。

基于此，学校立项“潘家峪惨案主题‘三阶育人’模式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探索”教学改革项目，旨在通过系统化的课程设计、多元化的教学方法、长效化的实践机制，将潘家峪惨案的历史事实转化为思政教育的鲜活教材，破解传统思政课的育人困境，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改革提供实践样本。

二、潘家峪惨案的思政教育价值与“三阶育人”

模式的理论基础

（一）潘家峪惨案的思政教育价值

历史维度：日本侵华暴行的铁证与民族精神的载体

“感—意志—行为”的递进过程。“三阶育人”模式遵循这一规律：“真相”阶段聚焦认知层面，通过史料实证让学生掌握潘家峪惨案的历史事实，形成正确的历史认知。“责任”阶段聚焦情感与意志层面，通过情感共鸣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强化守护历史记忆的责任意志。“行动”阶段聚焦行为层面，通过实践项目推动学生将责任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实现品德形成的完整闭环。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强调学习是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而非被动接受信息。“三阶育人”模式通过沉浸式体验、问题链引导、跨学科融合等方式，为学生提供主动参与、自主探究的学习情境。例如，组织学生参观惨案遗址、访谈幸存者后代、创作红色主题作品，让学生在实践中主动建构对历史的理解，深化对民族精神的认同，避免思政教育沦为“填鸭式”灌输。

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理论

课程思政强调“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实现全课程育人。“三阶育人”模式不仅局限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还为其他专业课程提供了红色元素融入的示范。例如，新闻学专业可探讨“历史事件的媒体呈现”；法学专业可分析“战争责任的法律界定”；文学专业可研读惨案幸存者回忆录……实现红色教育与专业教学的有机融合，拓宽育人覆盖面。

三、“三阶育人”模式的构建与实施路径

（一）第一阶：真相建构—基于史料实证的历史认知培育

史料系统化梳理与课程深度融入是夯实教学根基的核心。学校联合潘家峪惨案纪念馆组建专项团队，开展全方位、精细化的一手史料挖掘与梳理工作，形成三类核心史料体系，为思政课教学提供坚实支撑。一是军事档案类史料，重点搜集整理中日双方关于冀东地区“扫荡”行动的军事命令、作战计划、战报等原始文献，通过比对双方史料还原日军推行“三光政策”的意图，清晰勾勒出惨案发生的历史背景与必然性。二是民间记忆类史料，组建口述史采集小组，记录幸存者亲身经历，整理受害者家书、后裔访谈实录等素材，深入挖掘村民在绝境中的互助精神、反抗意志等人性光辉，丰富历史叙事的细节与温度。三是实物证据类史料，联合纪念馆对馆藏农具、衣物、破损家具、现场照片等文物进行系统化登记与解读，标注每件实物背后的历史场景与人物故事，为抽象的历史叙事提供可触摸、可感知的实物支撑，让史料真正“活起来”。

校馆合作共建教学资源，构建协同育人长效机制。双方携手共建“思政实践教育基地”，打破校园与场馆的壁垒，实现资源互补与优势叠加。一方面，邀请纪念馆资深研究员担任校外导师，结合馆藏史料开展专题讲座，深度解读史料背后的历史逻辑与时代内涵，帮助学生建立专业的史料分析视角。另一方面，常态化组织学生参与纪念馆志愿工作，投身史料分类整理、口述史校对、文物基础修复与展陈辅助等实践，让学生在近距离接触一手史料的过程中，提升史料辨析与历史解读能力。同时，将纪念馆实景转化为沉浸式教学课堂，定期组织学生赴西大坑、潘家大院等惨案遗址开展现场教学，结合实物展品、场景复原与影像资料，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共情体验，切实增强历史认知的真实性与深刻性，筑牢铭记历史的思想根基。

数字化赋能为沉浸式学习注入新动能。依托学校“智慧教学 VR 实验室”，运用虚拟现实技术精准重建 1941 年潘家峪村落原貌、街巷布局及惨案关键发生场景，还原当时的生活氛围与历史情境。学生通过 VR 设备“穿越”至历史现场，直观感受惨案发生的全过程，这种沉浸式体验打破了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极大增强了历史认知的冲击力与感染力。同时，搭建线上史料数据库平台，整合上传口述史完整视频、文物高清图片、历史

文献扫描件等资源，配套设置史料解读专栏与在线讨论区，支持学生自主检索、跨时空交流探讨。数字化手段既实现了史料资源的便捷共享，又为个性化学习、深度学习提供了可能，推动史料教学从“被动接收”向“主动探究”转变，构建起“线下实景+线上数字”的立体化育人格局。

（二）第二阶：责任内化—基于情感共鸣的价值引领强化

构建三级问题链引导深度研讨，层层递进激活学生思维。一级问题聚焦历史事实，精准锚定核心史实，如“潘家峪为何成为日军报复的目标？”“惨案中村民的抗争方式有哪些？”，引导学生通过史料研读、文献梳理，厘清惨案发生的时代背景、具体过程与关键细节，筑牢历史认知基础。二级问题聚焦情感共鸣，搭建史实与情感的桥梁，如“幸存者口述中的哪些细节让你深受触动？”“惨案中的互救行为体现了怎样的人性光辉？”，鼓励学生结合一手史料，走进历史场景，在共情中体会遇难者的苦难与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三级问题聚焦价值思考，实现历史学习的升华，如“今天的我们为何要铭记潘家峪惨案？”“历史记忆对当代青年有何意义？”，通过课堂研讨、小组讨论等形式，让学生在思想碰撞中深化情感体验，将历史事实内化为家国情怀与责任意识。

推动跨学科融合的情感表达，丰富教学形式与内涵。整合文学、艺术、历史学等多学科资源，设计多元化情感表达活动。文学赏析环节，选取经典作品，组织学生朗读感悟、撰写读后感，用文字定格情感共鸣，锤炼语言表达能力。艺术创作环节，以“红色记忆”为主题，开展版画创作、短剧编排等活动，让学生通过笔墨勾勒历史场景、以角色扮演还原抗争瞬间，在创作中寄托对先烈的缅怀之情，提升审美与实践能力。历史对比环节，将潘家峪惨案与南京大屠杀、德国纳粹集中营惨案对比分析，引导学生探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战争创伤，深挖“战争与和平”的时代主题，拓宽全球视野，强化守护和平、担当使命的责任意识。

（三）第三阶：行动转化—基于实践体验的责任担当落地

“红色记忆守护者”实践项目

一是历史真相传播行动。精心选拔政治素养高、表达能力强的学生组建“红色宣讲团”，提前开展系统化培训，邀请历史专家、纪念馆研究员

讲解潘家峪惨案史实细节、历史背景及时代意义,确保宣讲内容准确严谨。宣讲团分批次走进本地中小学、城市社区、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通过情景讲述、互动问答、史料展示等形式开展宣讲,打破传统宣讲的枯燥感。同时,组织学生团队结合新媒体传播特点,制作时长3-5分钟的史实科普短视频、图文并茂的宣传册、主题海报等传播载体,依托校园公众号、社区居民群、短视频平台广泛推送,让本土红色历史走出纪念馆,触达更多不同年龄层人群,筑牢历史记忆根基。

二是记忆传承志愿行动。建立常态化志愿服务机制,组织学生定期前往潘家峪惨案纪念馆担任志愿讲解员,为参观者提供专业讲解服务,生动讲述惨案背后的英雄事迹与民族精神。同时,引导学生深度参与纪念馆日常工作,协助工作人员整理幸存者口述史资料、核对文物档案、参与文物清洁与保护巡查等工作,在亲身实践中感悟历史厚重感,切实肩负起红色记忆“传播者”与“守护者”的双重使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研究性学习与社会实践结合

以潘家峪惨案为核心主题,引导学生开展针对性研究性学习,精准设置三大类选题方向:“潘家峪惨案的历史影响研究”聚焦惨案对本地社会发展、民族意识觉醒的深远意义;“地方性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探索潘家峪红色资源利用路径;“历史虚无主义的应对策略研究”立足史实,探讨新时代守护历史真相的有效方法。学生通过实地走访潘家峪村、纪念馆,走访惨案幸存者及家属,查阅地方志、历史文献、档案资料等多种方式搜集素材,撰写高质量研究报告。建立成果转化机制,挑选优秀研究成果优化完善为可落地的政策建议,提交给纪念馆及相关部门,实现“学习—研究—服务”的有机统一,让研究性学习真正服务于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

多元考核体系保障行动实效

构建“理论+实践+情感”三位一体的多元考核体系,全方位检验活动成效。一是理论考核,要求学生结合所学史实与感悟,撰写《从潘家峪惨案看民族精神的时代价值》等主题小论文,重点考核学生对历史事件的认知深度、理论分析能力及素养水平。二是实践考核,制定量化评分标准,根据学生参与宣讲活动的场次、志愿服务的时长与表现、研究性学习的完成质量等进行综合评分,

精准考核实践能力与责任担当。三是情感考核,通过课堂发言、历史读物读后感、红色主题文创作品创作等多种形式,评估学生对红色历史的情感共鸣程度。同时,建立长效跟踪反馈机制,持续记录学生参与爱国主义活动的频率、对历史事件的关注热度等行为变化,动态优化活动设计与教学方法,切实提升育人实效。

四、结论

潘家峪惨案作为地方性红色资源的典型代表,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价值。“三阶育人”模式通过“真相建构—责任内化—行动转化”的递进式设计,将历史事实转化为价值引领,将理论教学转化为实践体验,有效破解了思政课“知行脱节”“价值引领浅表化”等现实困境。

该模式不仅为唐山师范学院《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改革提供了具体路径,也为地方高校利用本土红色资源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了有益借鉴。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改革需要不断创新理念、方法与路径,充分激活红色资源的育人效能。未来,将持续优化“三阶育人”模式,深化校地协同合作,丰富教学资源,扩大育人覆盖面,让红色基因融入青年血脉,让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简介:王楠,男,汉族,1989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唐山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N]. 人民日报, 2016-06-24 (01).
- [2] 教育部: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 [Z]. 2020.
- [3] 张雷声: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路径探析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 (5):143-151.
- [4] 李辽宁: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政课融合的价值与路径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0 (8):97-101.
- [5] 王树荫: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创新 [J]. 中国高等教育, 2022 (1):42-44.
- [6] 陈金龙: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与传承路径 [J]. 教学与研究, 2021 (2):5-13.

数字化转型下外语教学改革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机遇与挑战

邹梦露

(1.青岛黄海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55)

摘要: 在新文科建设与教育数字化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 高校外语教学正由“技能本位”向“素养导向”转型, 课程思政与外语教学改革的深度融合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路径。本文立足数字化转型语境, 围绕混合式教学、虚拟仿真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形态, 分析数字化手段如何通过教学载体多元化、呈现方式多模态化与互动模式对话化, 促进思政元素的情境化嵌入与学习过程的证据化呈现, 从而提升外语课程的育人效能。同时, 本文指出技术滥用可能引发思政教育碎片化与价值弱化, 师资数字素养与思政素养协同不足制约融合质量提升, 评价指标缺失与过程证据薄弱导致融合效果难以量化与持续改进。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技术赋能—内涵引领”同构为原则, 强化“外语+思政+数字化”复合型师资建设, 并重构兼顾过程性与终结性、定量与定性的多元评价体系, 形成“教—学—评”闭环, 推动外语教学改革与课程思政同频共振、提质增效。研究旨在为构建“语言能力—文化素养—价值观念”三位一体的高校外语教学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 外语教学改革; 课程思政; 混合式教学; 生成式人工智能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92

Integr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Reform and Curriculum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Zou Menglu

Qingdao Huanghai University, Qingdao 266555,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ongoing New Liberal Arts initiatives and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education digitaliz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is undergoing a transition from a “skills-based” orientation to a “competency-based” (literacy-oriented) approac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CIP) with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refor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thway for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virtue (moral education). Grounded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echnological modalities such as blended learning, virtual simulation, and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nalyzes how digital approaches—through diversified instructional media, multimodal presentation, and dialogic interaction—facilitate the contextualized embedding of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and the evidence-based documentation of learning processes, thereby enhancing the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Meanwhile, the paper highlights that misuse of technology may lead to the fragmentation of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 weakening of value guidance; insufficient synergy between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and ideological-political literacy constrains the improvement of integration quality; and deficiencies in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weak process evidence make integration outcomes difficult to quantify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Accordingly, this study proposes a principle of aligni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with “substantive value guidance,” strength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posite faculty team with competencies in “foreign languages + CIP +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reconstructing a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that balances formative and summative assessment as well a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hereby forming a closed loop of “teaching–learning–assessment”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and quality enhance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reform and CIP.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building a three-in-on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system integrating language competence, cultural literacy, and value orientation.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reform; curriculum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blended learning;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在新文科建设与教育数字化战略深入推进的双重背景下，高校外语教学正在经历由目标、内容与方法共同驱动的结构重塑：课程定位从以语言知识与技能训练为中心的“技能本位”，逐步转向强调综合素养、批判性思维、跨文化理解与公共表达能力的“素养导向”。这一转向意味着外语课程不再仅承担“学语言、用语言”的工具性功能，而需要在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之外回应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由此，课程思政作为高校育人体系的核心路径，与外语教学改革的融合不再是外在叠加的政策要求，而是外语课程实现育人价值与学科转型的内在必然：外语学习过程天然关联价值判断、文化立场与话语选择，跨文化交际与国际传播能力培养更要求学习者具备基于中国立场的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从而使“语言能力提升”与“价值观念塑造”具备同向同构的融合基础。外语教学不仅承担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使命，更肩负塑造青年学生正确价值观、培育文化自信与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责任。孙有中等人指出，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需紧扣时代趋势，实现技术与教育的深度协同，这一观点为二者融合提供了重要遵循[1]。

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这一融合提供了新的实现条件。以混合式教学平台、移动终端、虚拟仿真、学习分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化工具，凭借交互性、多元化与智能化特征，正在打破传统课堂在时间、空间与资源供给上的限制：混合式教学延展了语言学习的场域，使教学从单一课堂走向“课堂—平台—社群”的连续空间；多模态资源提升了文化议题与价值主题的可感知性，使思政元素能够通过案例、叙事与场景任务更自然地嵌入语言实践；智能化工具则以即时反馈与个性化支持降低学生参与复杂议题讨论的语言门槛，为思政元素的隐性渗透与精准传递搭建了全新平台。然而也应清醒看到，数字化并

不天然等同于育人质量提升，技术扩张甚至可能放大既有问题并生成新的治理难题：平台化教学可能引发信息过载与学习过程碎片化，生成式AI可能带来学习真实性与主体性削弱；若思政融入停留在材料替换与环节叠加，易出现“表面可见、内在无效”的价值弱化；同时，外语教师需同时具备语言教学能力、思政素养与数字化能力，而现有培训与评价机制往往难以形成闭环，影响融合推进的深度与可持续性。基于此，本文旨在探讨数字化转型语境下外语教学改革与课程思政融合的机遇所在、现实难题，并提出针对性思考，为构建“语言能力—文化素养—价值观念”三位一体的外语教学体系提供参考。

一、数字化转型为二者融合注入的全新机遇

数字化技术的迭代升级，正从教学载体、呈现形式与互动模式等多个维度，为外语教学改革与课程思政的融合开辟新赛道，并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传统教学中“融入场景单一、学习证据不足、育人效能难以放大”等痛点。与以往依赖教材文本与课堂讲授的线性路径不同，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平台化资源供给、多模态内容呈现与智能化学习支持，使课程思政能够更自然地嵌入语言学习过程，实现“价值引领不脱离语言训练、语言训练内含价值生成”的协同目标。总体来看，这一机遇主要体现在思政融入场景的拓展、课堂互动结构的重塑以及资源整合效率的提升三个方面。

（一）教学载体多元化：拓宽思政融入场景，提升情境化与可感知性

传统外语教学中，思政元素多依托课本文本、教师讲解与课堂提问进行传递，受限于材料形态与教学时空，容易出现“生硬植入”“点到为止”的问题：思政内容被作为补充段落或价值总结出现，难以进入语言学习的核心活动链条，学生也难以

在真实语境中形成判断与表达。数字化工具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局限。首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平台能够整合微课、纪录片、外媒报道、政策解读、国际案例等多元资源，为语言输入提供更真实的语境支撑。例如，在跨文化交际主题教学中，引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案例视频或国际媒体报道，不仅丰富了语篇类型与语用情境，也使学生在理解与比较中更直观地把握中国实践的全球意义，从而实现语言学习与价值理解的同步推进。其次，虚拟仿真技术可以构建沉浸式跨文化交际场景，如模拟国际会议、文化交流、公共沟通等真实情境，让学生在角色扮演、协商对话与危机应对等任务中进行语言决策与价值选择，引导其在互动中坚守文化立场、践行包容互鉴的价值理念。再次，AI语言工具（智能翻译助手、写作反馈系统、口语测评与对话练习等）能够基于课程主题提供个性化练习与即时反馈，使学生在反复修订与迭代输出中提高表达质量，同时在任务指向的价值议题中训练立场表达与证据组织能力。李丹等人的研究显示，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AI工具对显性思政元素的识别准确率可达82.7%，为思政载体的精准适配与资源匹配提供了技术支撑[2]。从“载体”层面看，数字化使课程思政更容易走向情境化、任务化与可视化，为隐性融入提供了更坚实的实现条件。

(二) 互动模式革新：激活学生主体性，增强思政育人的对话性与生成性

课程思政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能否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真实参与与主动建构，而非停留在被动接受。数字化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弹幕互动、在线讨论、即时投票、小组协作与项目式学习等形式，重塑课堂互动结构，为价值引领从“讲授型”走向“对话型”“生成型”提供了可能。在外语课堂中，教师可借助平台发起“中国故事外语讲”主题讨论，引导学生用目标语言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故事、时代楷模事迹，并在同伴提问、补充与质询中完善叙事结构与论证逻辑，使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通过语言实践逐步深化。更进一步，线上协作工具能够支持跨班级、跨院校的联合项目式学习，让学生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多样性”“全球治理”等主题开展资料检索、立场形成、证据整合与成果呈现，在协作探究中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感悟”的转变。与传统课堂相比，数字化互动的价值在于可持续与可留痕：学生讨论、协作、修订与展示的过程能

够形成可追溯的学习证据，为后续评价与改进提供依据，也使思政育人从一次性说理走向持续性生成，提升感染力与说服力。

(三) 资源整合高效化：缓解思政资源筛选压力，推动资源供给体系化与共享化

在传统外语教学中，思政资源的筛选与适配往往依赖教师个体经验与时间投入，存在资源分散、针对性不足、更新不及时等问题，导致不少教师在实践中“想融入但无从下手”，或只能采用零散材料临时补充，难以形成稳定的教学主线。数字化转型为资源供给体系化提供了基础条件。高校可以建设外语课程思政数字化资源库，将经过筛选的文本、音频、视频、课件与案例按语种、课程类型、能力目标与思政主题分类归档，形成“可检索、可复用、可更新”的资源体系，从而显著降低教师备课成本，提高资源适配效率。宁琦指出，数字人文赋能外语学科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在于构建系统化、可共享的数字化资源体系，这一思路为资源库建设提供了关键指引[3]。同时，网络平台的开放性与共享机制使优质资源更易在校际、区域甚至跨语种范围内流动，教师可以借鉴国内外先进教学案例，将全球视野与家国情怀融入语篇解读与任务设计，帮助学生在比较与辨析中形成更为稳健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资源整合的高效化不仅解决“资源从哪里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融合如何稳定推进”提供制度性支撑。

二、二者融合面临的数字化转型挑战

尽管数字化为外语教学改革与课程思政融合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源形态、更灵活的教学组织方式以及更便捷的学习支持手段，但在具体落地过程中，技术应用、价值引领与制度保障之间并未天然形成协同，实践层面的矛盾反而更容易被放大。尤其在“平台化教学”“数据化管理”“智能化工具”快速进入课堂的情境下，一些课程出现了“技术工具强势介入、育人逻辑弱化”的现象：教学看似更加现代化、活动更加多样化，但价值目标与语言目标缺乏同构设计，思政元素难以在学习过程中递进生成，最终容易陷入“重技术、轻内涵”“重形式、轻实效”的误区。总体来看，当前挑战主要集中在技术滥用引发的育人碎片化、师资能力结构性不足以及评价体系滞后三个方面。

(一) 技术滥用导致思政教育碎片化与价值弱化

数字化转型最容易出现的偏差，是将“技术使

用”等同于“教学改革”，将“资源堆叠”等同于“思政融入”。在一些课堂实践中，教师把课程思政简化为多媒体素材的拼贴：播放思政视频、插入若干案例图片或热点材料之后，缺乏必要的语篇解读、价值澄清与任务化转化，导致思政内容停留在“观看/接收”的浅层环节，难以进入语言学习的核心活动（理解—表达—论证—反思）。更进一步，生成式AI的普及也带来了新的风险：部分教师借助AI快速生成教案、课堂提纲或讨论问题，但由于缺乏对“思政目标—语言目标—任务链”的结构化设计，往往出现逻辑衔接松散、价值议题与语言训练脱节的问题，课堂最终呈现为“材料很多、主线不清；观点很多、论证不足”。与此同时，数字化平台的信息海量性与碎片化呈现方式容易造成学生“信息过载”：学生接触到大量主题相关材料，却缺乏足够的引导去提炼核心概念、辨析价值冲突与形成稳定立场，从而使价值引领停留在碎片化刺激与表层情绪认同，难以沉淀为可迁移的判断能力与表达能力。

此外，智能教学工具的算法设计往往更偏向语言技能测评与学习行为统计（如词汇掌握、听说训练频次、作业完成率等），对价值判断、文化理解、论证质量等思政维度缺少可评价的指标接口，进一步加剧“技能训练”与“价值塑造”的结构性失衡。尤其需要关注的是，生成式AI在语料来源、价值取向与文化立场上可能存在偏差。李丹等人的研究指出，生成式AI存在明显算法偏见，西方文化渗透率达71.3%，对思政价值引领可能产生干扰[2]。在缺乏有效筛选、引导与课堂规则的情况下，技术不仅无法赋能，反而可能成为价值弱化与立场漂移的风险源。

（二）师资能力不足制约融合质量的提升

外语教学改革与课程思政融合对教师能力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语言教学能力，还需要具备将思政目标转译为“可教学、可任务化、可评价”的课程设计能力，并能熟练运用数字化平台与智能工具实现混合式组织与证据化评价。换言之，融合推进的关键不在于“教师是否愿意做”，而在于“教师是否具备做成的能力组合”。现实中，部分外语教师存在明显短板：一方面，思政意识与理论理解不足，对课程思政内涵把握不深，容易将其理解为内容叠加或主题点缀，导致挖掘思政元素时停留在文本层面，难以形成与语言学习高度耦合的任务链与讨论路径；另一方面，数字化技能欠缺，对混合式平台、学习数

据、AI工具的应用停留在操作层面的“会用”，缺乏教学法层面的“善用”，难以把技术转化为促进学习与价值生成的脚手架，甚至因技术不熟练导致课堂节奏被工具牵引，出现“为用技术而用技术”的反向依赖。刘晶等人的研究指出，在AI赋能背景下，外语教师需要重构数字身份，成长为兼具语言教学、价值引导与数字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而当前多数教师尚未达到这一要求[4]。与此同时，高校层面面向“外语+思政+数字化”的系统化培训供给不足，常见培训要么偏技术操作、要么偏政策宣讲，缺少围绕“目标同构—任务设计—证据评价—课堂治理”的整合型能力路径，导致教师难以获得可迁移的课程设计方法与可复制的优秀案例，从而成为融合推进的核心瓶颈之一。

（三）评价体系不完善导致融合效果难以量化与持续改进

在数字化教学环境中，评价体系不仅是检验学习效果的工具，更是牵引教学改革方向的制度杠杆。如果评价仍然主要指向语言知识与技能，那么课程思政就容易被边缘化为“展示性环节”或“材料性装饰”；如果缺乏对过程证据的采集与解释机制，融合实践就难以形成可持续优化的闭环。当前评价模式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在评价内容上，仍以词汇语法、听说读写技能等为核心，对文化素养、价值判断、跨文化伦理、公共表达责任等思政维度缺乏可操作的指标体系与评分标准，导致教师“想评但无从评”，学生“重分数而轻素养”；其二，在评价方式上，过程性评价占比不足，虽然平台记录了大量学习数据，但这些数据往往呈现碎片化、行为化特点（点击、时长、次数），难以直接对应“价值生成”与“论证能力提升”，最终仍高度依赖终结性考试与一次性作业，无法客观反映学生在讨论、协作、反思与作品迭代中的素养发展。评价体系的滞后不仅削弱融合质量保障，也会降低教师投入融合改革的动力，使课程思政更易回落到“可展示、不可检验”的形式化路径。

三、破解融合困境的路径探索

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多重挑战，外语教学改革与课程思政融合不能停留在“增加平台工具”“丰富素材形态”的表层改良，而应回到外语教学的基本规律与思政育人的核心要求，建立能够长期稳定运行的课程结构与质量保障机制。总体而言，破解融合困境需要在三个维度同时发力：一

是以“目标—任务—证据—评价”一体化为核心，实现技术赋能与育人内涵的同构；二是以教师能力结构升级为抓手，形成可持续的专业发展路径；三是以评价体系重构为制度杠杆，推动融合从“可展示”走向“可检验、可改进”，最终实现外语课程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提质增效。

（一）坚持技术赋能与内涵引领并重，筑牢融合根基

数字化工具的价值不在于“使用本身”，而在于其是否能够服务于立德树人的目标实现与外语能力的有效建构。因此，技术应用必须从“工具驱动”转向“目标驱动”，以课程目标为牵引完成资源选择、活动设计与评价机制的系统匹配。首先，在教学设计层面，应将课程思政从“内容叠加”转向“能力嵌入”，把价值目标转译为可教学的能力指标，并通过语言任务链实现自然融入。例如，在跨文化交际主题中，不仅安排文化知识输入，更应设计包含立场表达、证据支持与受众意识的输出任务，通过对话、辩论、协商等互动形式，使学生在语言实践中完成价值澄清与判断训练。其次，在资源使用层面，高校应引导教师围绕教学目标筛选与加工数字资源，避免“素材堆砌”与信息过载”。数字资源的引入应遵循“可讨论、可论证、可产出”的原则：材料必须能够支持学生完成观点形成、证据组织与表达呈现，而非仅作为课堂装饰。再次，在技术治理层面，应推动智能教学工具的迭代优化，使其逐步具备对思政相关能力的支持接口与评价维度。例如，在口语或写作智能反馈中引入论证结构、证据使用、受众适配、跨文化语用得体的指标，让语言技能与价值能力在评价逻辑上形成一致性。此外，应加强平台内容管控与资源审核机制，建立可靠的外语课程思政数字资源库，形成“可共享、可更新、可追溯”的资源供给体系，避免低质信息与偏差内容对价值引导产生干扰，从而为融合提供安全、稳定、高效的教學环境。

（二）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协同育人能力

融合质量的上限最终取决于教师能否完成“外语教学—思政育人—数字技术”三者的结构性整合，因此师资建设应从“单项培训”升级为“能力结构重塑”。建议构建“专项培训+教研共同体+实践赋能”的三位一体培养体系，形成从理念到方法、从方法到课堂的连续提升路径。首先，专项培训要从政策宣讲或工具教学转向“课程设计能力训

练”，重点提升教师在三方面的关键能力：一是思政元素的学科化挖掘能力（如何在语篇、话语、跨文化情境中提炼可讨论的价值议题）；二是任务链与课堂治理能力（如何把价值议题转化为可执行的语言任务并组织对话与论证）；三是数字化与AI工具的教学法能力（如何把工具作为脚手架而非替代者，并建立可审计的学习证据机制）。其次，建立教研共同体与案例共建机制，通过集体备课、同课异构、课堂观摩与评课等方式，沉淀可复制的融合范式与任务模板，降低教师个体探索成本，提升整体实施一致性。再次，以项目化实践赋能推动能力内化：鼓励教师参与混合式课程建设、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虚拟仿真实验项目或AI辅助教学改革项目，在真实课堂中迭代方案、积累数据与证据，形成从经验到模型的提升路径。最后，应建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与工作量认定制度，将融合课程建设、资源库贡献、教学研究与质量提升纳入考核与奖励体系，避免教师将融合工作视为“额外负担”，从制度层面保障融合推进的可持续性。

（三）重构多元评价体系，保障融合实效

评价体系既是质量保障工具，也是改革方向的制度杠杆。若评价仍主要指向语言知识与技能，课程思政将难以进入课程运行的核心环节；若缺少对过程证据的采集与解释机制，融合实践也难以形成持续改进的闭环。因此，应建立“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定量评价+定性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形成覆盖语言能力、文化素养与价值观念的多维指标框架。其一，在评价内容上，需要将思政相关能力具体化、可操作化，避免停留在抽象态度判断。可将评价指标聚焦于学生在语言实践中的可观察表现，例如：观点表达的清晰性与立场合理性、证据引用与论证结构的完整性、跨文化语用策略的得体性、信息核验与偏见识别能力、公共表达责任与受众适配意识等，并将课堂思辨表现、线上主题发言、作品集与实践成果（如“中国故事外语创作”“跨文化交流项目报告”）纳入评价范围。其二，在评价方式上，应充分利用数字化平台的数据追踪优势，但必须将“行为数据”转化为“学习证据”，避免仅以点击率、观看时长等替代真实学习质量判断。可通过草稿迭代记录、讨论纪要、同伴互评、反思日志、口头答辩与情境任务表现等方式构建证据链，并结合教师评价、同伴评价与自我评价形成多主体评价体系，提高评价的公平性与可解释性。谢幼如等

人提出,数字化转型赋能课程思政评价创新,需要依托技术实现评价维度的多元化与评价过程的精准化,这一观点为评价体系重构提供了重要依据[5]。其三,在制度层面,应将融合教学质量纳入教师考核与课程质量监测体系,以评价反向牵引教学设计优化,形成“目标设定—任务实施—证据生成—评价反馈—持续改进”的教-学-评闭环,避免融合实践停留在可展示但不可检验的层面。

结语

数字化转型为高校外语教学改革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挑战。从机遇层面看,平台化资源供给、多模态呈现方式与智能化学习支持显著拓展了思政融入的场景与路径,使外语课堂能够由“文本讲授”走向“情境化实践”,由“单向灌输”走向“对话式生成”;从挑战层面看,技术滥用导致的育人碎片化、师资能力结构性不足以及评价体系滞后等问题,亦可能使融合滑向形式主义,出现“技术热、内涵弱”“看得见、评不出”的偏差。由此可见,二者的深度融合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外语教学突破传统困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其成效取决于能否在数字化条件下建立稳定的育人结构与质量保障机制,而非单纯依赖工具引入或资源扩充。

面向未来,高校外语教学应在数字化浪潮中坚守育人初心,摒弃“技术至上”的误区,将技术应用纳入课程目标与育人逻辑的整体框架之中:以技术赋能为支撑,推动思政元素由“内容叠加”转向“能力嵌入”,通过任务链与情境化活动实现价值生成;以师资建设为核心,构建“外语教学能力—思政素养—数字化能力”协同发展的教师专

业成长机制,提升课程设计、课堂治理与证据化评价的综合能力;以评价重构为保障,建立覆盖语言能力、文化素养与价值观念的多元评价体系,强化过程证据采集与可审计性,形成“教—学—评”闭环,促使融合从“可展示”走向“可检验、可改进”。崔国鑫指出,外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需立足时代特征,实现理念与方法的双重创新,这一论断为二者融合的长远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6]。唯有在理念、方法与制度层面同步推进,才能培养出兼具扎实语言能力、深厚文化素养与坚定价值信念的新时代外语人才,使外语教学在数字化转型中真正焕发育人活力,并为国家对外开放与文化自信建设提供更具支撑力的人才与话语基础。

参考文献

- [1] 孙有中,张莲,陈法春. 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目标、原则与路径[J]. 外语界, 2024(2):2-3.
- [2] 李丹,肖勇. 人工智能赋能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智能挖掘与融合路径创新研究[J]. 前沿教育研究, 2024(3):45-53.
- [3] 宁琦. 数字人文赋能外语学科的思考与探索[J]. 外语界, 2023(1):12-17.
- [4] 刘晶,李佐腾. AI赋能课程思政建设中的高校外语教师数字身份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25(6):78-84.
- [5] 谢幼如,邱艺,章锐,等. 数字化转型赋能高校课程思政的实施进路与评价创新[J]. 中国电化教育, 2023(8):92-98.
- [6] 崔国鑫. 高校外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思考与探索[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0(10):37-42.

日语 MTI 《专题翻译》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

金锦善¹

(1.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 本研究以哈尔滨师范大学东语学院日语 MTI 《专题翻译》课程为实践载体, 围绕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与实践路径展开探究。首先结合《专题翻译》课程素材特性, 论证融入思政教育的必要性, 明确核心原则, 继而探讨具体板块的思政元素的挖掘方式和融入路径, 再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者融为一体的课程思政要求为指导, 设计“遣唐使”一课的思政教学案例。旨在为高校 MTI 日语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为翻译教师实现思想引领与能力培养的双重教学目标提供借鉴。

关键词: 日语 MTI; 《专题翻译》; 课程思政; 教学设计

基金项目: 哈尔滨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与质量提升工程(课程建设)项目“《专题翻译》案例课程建设”

(项目编号: KCJS202402)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93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Thematic Translation” for Japanese MTI

Jinshan Jin¹

¹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Thematic Translation” course for Japanese MTI at the School of Eastern Languages,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as the practical carrier,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Firstly,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f the “Thematic Translation” course, it demonstrates the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larifies the core principles. Then, it discusses the methods for exploring and the paths for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specific course modules. Furthermo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requir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at integrate “knowledge imparting,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value shaping” into a unified whole, this study designs 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case for the lesson “Japanese Envoys to Tang China”. The research is intend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Japanese MTI courses at universities and offer insights for translation teachers to achieve the dual teaching objectives of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ability cultivation.

Keywords: Japanese MTI; Thematic Transl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structional design;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发表重要讲话,做出重要批示,为面向未来的中国高等外语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在当前国际政治格局下,全球化人才的培养应当兼顾专业技能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强化,同时注重政治立场端正、家国情怀涵育与文化自信塑造,为其未来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翻译教学一直是外语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教学主体是中外具有价值属性的语篇,对学生的价值观容易形成影响^[1]。当前翻译类课程思政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总论类,聚焦课程思政内涵与实施思路;二是教学模式探索类;三是具体翻译教学实践中的思政融入探索类^[2]。但现有研究多数围绕高校本科翻译课程展开,针对翻译硕士研究生的相关研究较少。笔者在知网(CNKI)检索栏里输入“研究生外语课程思政”仅搜到20篇论文,其中多数为针对外语或英语撰写的研究,没有找到“研究生日语课程思政”为题的论文。我国日语课程思政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基础日语》《高级日语》《日语泛读》《二外日语》等课程为中心,就教学设计、课程内容等具体实践问题展开讨论^[3]。在当前的日语MTI课程思政教育中,教学设计与实践环节尚显不足,亟需系统性的充实与深化。

基于此,本研究以哈尔滨师范大学东语学院日语MTI《专题翻译》课程为实践载体,围绕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与实践路径展开系统性探究,首先结合《专题翻译》课程七大板块素材特性,论证融入思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明确核心原则,继而构建教学框架,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者融为一体的课程思政要求为指导,设计“遣唐使”一课的教学案例,形成全链条思政育人闭环。本项研究期望能为高校日语MTI专业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提供参考思路,并为翻译课程教师在落实价值引导与翻译能力并重的教学目标方面,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路径。

二、日语MTI《专题翻译》课程及融入思政元素的必要性

2020年4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日语专业教学指南》^[4]面世,旗帜鲜明地将立德树人作为日语教育的根本。要在坚持爱党爱国、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课程体系建设,探索日语专业教学的新模式、新举措,通过日语教学,努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责任感、沟通能力强、人文素养高、国际视野宽的复合型日语专业人才^[5]。翻译课程思政,就是要突出课程原有的人文精神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使教学知识内涵更加丰富,能力培养更趋务实,更加自觉、有效地把知识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道德品格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真正承载起育人的功能^[6]。新时代对翻译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MTI日语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

《专题翻译》作为日语翻译硕士研究生重要课程,涵盖致辞类、交流合作类、外事活动类、时事新闻类、娱乐活动类、旅游参观类、政治与外交类等七大板块文本翻译。本课程旨在培养研究生具备高级专题翻译实践能力与跨文化交际素养,同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文化自信,培养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成为德才兼备、中外融通的高层次日语翻译人才。

本课程七大板块翻译素材中,政治与外交类、致辞类素材聚焦国内外重要政策表述、外交讲话、官方致辞等内容,引导学生在翻译实践中精准把握国家立场、传递中国声音,强化家国情怀与政治素养;交流合作类、外事活动类素材围绕国际合作项目、中外外事往来场景展开,帮助学生在跨文化翻译中理解多元文化,提升国际视野与合作意识。

同时,课程融入时事新闻类素材,结合当下热点议题培养学生的时代敏感度与责任担当;旅游参观类素材以国内外文旅资源、文化遗产相关文本为核心,让学生在翻译中挖掘文化内涵,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传播能力;娱乐活动类素材则兼顾趣味性与思想性,选取积极健康的文化娱乐相关文本,丰富翻译场景的同时传递正向价值观。多板块内容相互补充、有机融合,为课程思政“多维融合”教学模式提供了坚实的内容支撑。

上述各板块素材均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具备天然的课程思政融合优势。因此,在本课程教

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势在必行。既能依托各类文本引导学生在跨文化转换中坚守价值立场、传递正向理念,又能实现语言技能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深度统一。为此,教学团队紧扣这一核心需求,精选适配素材,构建起兼具专业性与思想性的内容体系,为课程思政落地筑牢基础。下面以“交流合作、外事活动”类素材为例,探讨其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

三、《专题翻译》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案例

(一) 具体板块的教学设计

本章节以《专题翻译》课程“交流合作、外事活动”类教学板块为中心,选取其中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相关内容,围绕遣唐使、鉴真东渡、阿倍仲麻吕(晁衡)、禅宗东传、罗森及其《日本日记》及鲁迅的留日经历等课程知识点设计思政教学。针对本板块内容的思政教学维度、核心元素、思政落点如下:

表1 课程思政元素

维度	核心元素	思政落点
文化自信	中华文化主体性	构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
文明互鉴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树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价值观
历史观	唯物史观与辩证思维	提高复杂历史认知能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	形成兼具国际视野与文化定力的价值观体系

在本板块教学中,将表1所列思政元素自然地融入各专题的翻译实践,除达成知识掌握与能力培养目标外,本板块亦致力于实现以下课程思政教育目标:

1.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学生在翻译过程中,学习古代至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理解中华文化对日本社会发展的贡献,感悟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增强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

2. 树立文明互鉴理念,提升国际视野。探讨中日文化在语言、艺术、科技等领域的融合与创新,理解文明多样性对人类进步的推动作用。

3. 培养辩证历史观,强化批判性思维。通过

翻译,学生能够客观掌握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双向影响,辨析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优越论等错误观点,避免片面历史认知。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鉴真东渡、鲁迅与藤野先生等人物事迹中学习诚信、友善、敬业等精神,联系实际生活弘扬核心价值观。

(二) 具体课堂教学案例

本节课将重点围绕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遣唐使”主题,将课程思政融入翻译教学实践。通过翻译实践,学生能够了解当时中日两国在生产技术、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经济贸易、宗教等领域的交流,探究日本文化的特点,阐释其模仿性与创新性。旨在通过翻译训练引导学生深化对文明互鉴与文化遗产的认识。

1. 案例教学目标

本节课将实现以下三个思政目标:

知识传授:通过翻译实践,学生不仅掌握翻译理论和技巧,还能系统掌握遣唐使的历史脉络,了解日本通过遣唐使在大化改新、汉字演变、佛教东传、建筑技术、医学知识等方面对唐朝文化的吸收与移植,以及遣唐使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运作模式,探究遣唐使对中日两国的双向影响。

能力培养:通过翻译实践,学生不仅提升中日交替翻译能力,还可以从多维度探讨遣唐使现象,如结合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分析其兴起与衰落的原因,提升综合分析与逻辑推理能力。通过研讨环节,学生结合当代文化交流实际,用日语提出创新性见解,如何借鉴遣唐使经验推动新时代中日文化交流,养成其独立思考与创新意识。

思政目标:通过翻译实践,学生能够了解唐朝文化对日本的深远影响,能够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同时,通过日本对唐文化的本土化改造案例,学生能够理解文化自信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在开放交流中保持文化主体性,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2. 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法:导入环节、拓展知识环节;
讲授法:翻译主题内容环节、拓展知识环节;
讨论法:讨论环节、交流环节、拓展环节;
任务驱动法:完成600字的感想文,并进行交替翻译。

3. 教学过程

表2 《专题翻译》课程教学过程

教学步骤	教学内容及说明	融入思政点	融入方式及评价点
课前	课前作业：学生搜集关于遣唐使的资料进行翻译，并思考从中得到的感悟。	学生在翻译遣唐使过程中，思考从中得到的感悟。	课前作业 资料翻译 (作业维度评价)
	1.教师播放小视频《遣唐使》，以提问的形式引出本节课任务“遣唐使—学习中国文化的盛举”。	文化自信 使命担当 文明互鉴	播放视频 提问 (课堂表现维度评价)
课 中	2.向学生交代本节课学习内容和学习目标： 本节课教学内容： ·翻译：关于遣唐使的史料 ·讨论：遣唐使对中日两国的影响及从中得到的感悟。(中日交替翻译) ·拓展：文明存在代差时，应采取的态度。(中日交替翻译) ·思考：文化传播规律。	明确本节课教学目标，引起学生兴趣。	
	3.翻译主题内容 3.1 交替翻译：共3组，每组2人，以交替翻译的形式介绍遣唐使。 3.2 其他小组讨论、点评其翻译效果。 ①小组讨论及点评 ②小组提出建设性翻译文本修改建议 ③教师点评	团队意识 合作共赢 团队意识 国际视野 文化自信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交替翻译作业内容 (作业维度评价) 讨论及点评 (课堂表现维度评价) 归纳总结
中	4.交流分享 学生以交替翻译的形式，发表对遣唐使的个人感悟。(输出)	谦逊 勇气 传承文化 拥抱世界	交替翻译感悟 (课堂表现维度评价)
	5.知识拓展 当文明存在代差时，主动学习需要怎样的勇气与智慧？这与当代中国科技引进与自主创新的辩证关系有何相通？	谦逊 勇气 国际视野 全球意识	师生共同探讨 师生一起翻译 (课堂表现维度评价)
总 结	6.总结 教师对本次课堂翻译实践进行总结，并作以下思政方向结语：遣唐使的频繁往来，既彰显了盛唐文化的包容性与辐射力(强化文化自信)，也体现了日本主动吸纳外来文明的开放心态(深化文明互鉴认知)；而“唐制本土化”的过程(如日本对均田制的调整)，则印证了“文明交流需立足自身根基”的辩证法则(具有唯物史观)。	尊重 创新 人类命运共同体	教师总结
课 后	以“文明势差→知识流动→本土重构”思路，完成一篇600字的感想文，进行交替翻译。	思考文化传播规律	课后作业 (作业维度评价)

关于过程性评价，具体评价方法如下：

表3 过程性评价维度

评价类型	课堂表现 (50%)	课后作业 (50%)
过程性 评价	课堂翻译质量 (30%)	思政契合度 (10%)
	拓展环节表现 (10%)	历史与当代的联系 (10%)
	学习态度 (10%)	翻译质量 (30%)

4. 思政教学效果分析及教学反思

本节课结合“遣唐使”的案例，能够更加明确其在东亚文化圈形成中的枢纽作用。通过“遣唐使”案例教学，学生能够系统掌握翻译理论知识与实践技巧，了解公元7-9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核心史实，突破“单向文化输出”的认知局限。多数学生能够用中日双语清晰阐述日本对唐文化的“吸收、改造、创新”过程，加深对日本文化及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理解的同时，准确对比遣唐使时期

与当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异同,体现出对历史脉络与文化逻辑的深度理解。通过本节课学习和实践,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际观,提高文化自信、跨文化理解能力,增强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达到专业学习、能力培养、价值引领融为一体的教学目标。

本节课的特色亮点及经验启发方面,一是翻译实践与思政价值的有机融合。通过中日史料翻译,学生能够提高史料翻译技能的同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际观。二是具有跨学科视角。从政治使命、文化使命、宗教使命等多维度了解文化传播的复杂性,体现研究生课程的创新性。三是批判性思维与价值观引导并重。通过文字、建筑、宗教等的本土化方面的讨论与翻译,解构“文化单向输出”的固有迷思,了解文明互鉴的“双向成就”。四是“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史鉴。使学生完成以“文明势差→知识流动→本土重构”为视角的感想文过程中,引申当代文化输出的精准化策略。

反思课程教学,未来需在三方面发力。一是强化“现实锚点”,结合 RCEP 框架下的文化贸易、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播等新议题,拓展思政资源的时代维度;二是进一步完善“评价闭环”,完善“翻译质量、实践表现、价值认知”的综合评价体系;三是史料翻译的客观性,如“遣唐使”相关史料涉及中日历史叙事的多重视角。在翻译教学中,可

参考文献:

[1] 孙颖,王佳音.翻译专业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165-168.

[2] 陈卉,蒋玉岚.MTI应用翻译思辨教学模式中的课程思政元素[J].语言与文化研究,2022(03):67-73.

引导学生对比不同文献的表述差异,探讨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历史叙述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四、结语

本研究以哈尔滨师范大学东语学院日语 MTI《专题翻译》课程为实践载体,围绕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路径展开系统性探究。研究首先结合课程涵盖的致辞类、交流合作类等七板块素材特性,充分论证了《专题翻译》中融入课程思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明确了语言翻译教学与价值引领深度融合的核心原则。继而立足日语 MTI 人才培养目标,探讨了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入路径,并以“遣唐使”一课为具体实践案例,设计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的教学实施方案,最终形成课前自主研习、课中实践讨论、课后反思升华的全链条思政育人闭环。

该研究通过具象化的教学实践,为高校日语 MTI 翻译类课程思政改革提供了可落地的思路与范式,进一步凸显了多领域翻译素材与思政元素融合的实践价值。后续可拓展教学案例覆盖面,持续优化课程思政与教学内容的融合路径,推动日语 MTI 课程思政教学向精细化、深度化发展,助力培养兼具专业翻译能力、家国情怀与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3] 陈多友.党的二十大精神赋能日语专业课程思政的多维透视[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4(2):87-98.

[4]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日语专业教学指南[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5] 许宗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日语专业教学指南》解读[J].外语学刊,2020(5):7-14.

[6] 刘贵珍.研究生翻译课程思政教育路径研究[J].海外英语,2021(03):15-16.

基于数智化的应用型本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康松龄¹ 刘琰¹

(1.广州理工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42)

摘要: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刻影响着组织运行方式, 人力资源管理正由传统事务性管理向以数据支持决策和人机协同为特征的数智化管理转型。数智化进程改变了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边界和运行逻辑, 也对专业人才的能力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在界定人力资源管理数智化内涵的基础上, 分析了数智化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人才需求的新特征, 系统梳理了应用型本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在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实践教学与师资建设等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进一步从重塑以数智化胜任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构建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课程体系以及完善数智化取向的师资建设与教学评价机制等方面, 提出了应用型本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策略与实现路径。研究认为, 坚持以人为本理念, 将数据分析能力与管理专业判断有机融合, 是提升应用型人力资源管理人才培养质量、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方向。

关键词: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人才培养; 数智化转型

基金项目: 广东省高教厅人才培养专项项目 (项目编号: 粤教高函[2024]30号-415), 广州理工学院校级教改项目 (项目编号: 2023JG055)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95

Talent Cultivation for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Major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under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Kangsongling¹, Liuyan¹

¹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uangzhou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xt-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s gradually shifting from traditional transactional administration toward a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model characterized by data-driven decision-making and human – technology collaboration. This transformation has reshaped the functional boundarie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generate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petency structure of professional talent.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merging characteristics of talent demand under the digital – intelligent context and systematically identifies the key challenges faced by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programs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cluding talent cultivation objectives, curriculum design, practical training, and faculty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is paper proposes corresponding talent cultivation strategi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focusing on reshaping talent cultivation objectives centered on digital – intelligent competencies, constructing a curriculum system that deeply integrates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improving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mechanisms with a digital – intelligent orientat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adhering to a people-oriented management philosophy while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data analysis capabilities with professional managerial judgment is essential for enhancing the

作者简介: 康松龄(1980—), 女,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

刘琰(1978—), 女,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

通讯作者: 刘琰

quality of application-oriente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Major; Talent Cultivation;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一、引言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深度嵌入社会经济运行过程,推动组织形态与管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2023)明确提出,要以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和组织治理创新。作为组织运行的重要职能,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边界与管理方式也随之由传统的事务性管理逐步转向依托数据分析和智能工具的决策支持模式。目前不同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应用水平上呈现出明显差异。部分领先企业已构建较为成熟的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了招聘、绩效与培训等环节的流程优化,而不少中小企业仍处于数字化转型初期,管理活动在较大程度上依赖经验判断。这种发展不均衡使市场对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的能力结构提出了更加多层次的要求。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念引导下,人力资源管理从业者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应具备基本的数字工具应用能力和跨学科协同素养,以适应管理变革。

应用型本科高校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在应对上述变化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部分高校在课程更新速度、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以及教学方式创新等方面,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数智化发展的实际需求尚存在差距,培养模式仍偏重于静态知识传授,学生的数据思维与人机协作能力培养相对不足。由此,系统研究数智化背景下应用型本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路径,对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以及服务行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人力资源管理数智化内涵与人才需求

(一) 人力资源管理数智化内涵

人力资源管理数智化本质是以数据资源为核心,将数字技术与智能分析方法系统性融入人力资源管理全过程,通过重构管理流程与决策逻辑,实现管理方式的整体转型。与仅侧重信息记录和流程电子化的数字化管理不同,数智化更强调对数据价值的深度挖掘及其在管理决策中的实际运用,推动人力资源管理由经验驱动向数据与智能

协同驱动转变。因此人力资源管理数智化体现为一种以数据思维为基础的管理理念更新,即在企业人力资源选、育、用、留等核心环节中,通过数据整合与分析手段提升管理判断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在这一过程中,数据作为重要的管理资源,与信息系统和智能分析工具相结合,为管理决策提供支持,但并不替代管理主体本身的专业判断与责任承担。数智化强调人机协同,而非完全依赖技术自动化,这也是其区别于单纯应用智能化技术或手段的关键特征。

在管理实践中,人力资源管理数智化表现为管理对象与管理过程的重新组织。通过数据分析实现对组织人力资源状态和管理运行效果的动态识别,从而增强管理活动的精准性与适配性。这将降低人力资源管理中传统事务性工作的比重,使管理者能够更多参与到决策支持和组织优化等高价值活动中。虽然受到企业规模、资源条件和技术基础差异的影响,人力资源管理数智化在现实中的推进程度并不均衡,多数企业仍处于由传统信息化向数智化转型的过渡阶段;但是由于人力资源管理数智化不仅是技术工具层面的改进,更是管理理念与运行机制的系统性调整,目标是构建以数据支持决策、以人机协同为特征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因此这是当前企业管理发展的主要路径与趋势;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涌现,进一步加速了企业的管理变革。

(二) 数智化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人才需求

在数智化背景下,组织不仅重塑了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运行方式,也重新界定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能力结构。相较于传统的人资管理,数智化情境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呈现出管理对象复杂化、管理内容延展化以及人才能力复合化等特征,对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提出了更高层次和更为多元的要求。

其一,人力资源管理对象由单纯调节劳动关系向人与多要素协同配置的资源管理转变。传统人力资源管理主要围绕员工个体及其劳动关系展开,管理对象相对清晰。然而,当数字系统、智能技术不断深度融入组织运营管理过程,人力资源管理的对象逐步扩展为基于数据的人与业

务流程的综合体系。例如，在绩效管理场景中，人力资源管理着依赖业务流形成的数据进行管理指标确定及考核，因此绩效算法模型和数据平台将成为影响管理结果的重要因素，人资管理者不仅需要关注员工行为本身，还需理解数据指标的生成逻辑及其对管理决策的影响，从而帮助组织识别提高绩效的路径与方法。

其二，人力资源管理内容由事务执行向决策支持和价值创造延伸。随着数智化工具在组织中的广泛应用，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逐渐突破以事务处理为主的工作边界，更多参与到组织运行优化和战略支持过程中。通过对人员结构、绩效结果和培训效果等数据的综合分析，人力资源管理可以为岗位配置优化、人才梯队建设以及激励机制设计提供依据。例如，在人员流动率分析和绩效改进管理实践中，将业务数据分析应用于识别关键岗位的人力资本回报情况，从而支持企业在人员配置和激励资源投入上的决策。这种转变推动人力资源管理由传统意义上的成本中心，逐步向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管理单元转变，相应地提高了对人力资源管理人才在数据解读与管理决策支持方面的能力要求。

其三，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的能力结构正由单一管理技能导向，转向以专业判断为核心、以技术工具为支撑的复合型能力结构。这一转变强调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即数据分析和智能工具主要作为辅助决策手段，而非替代管理者的专业判断。在实际管理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人才需要能够理解并合理运用数据分析结果，同时结合员工个体差异、岗位特征与组织情境作出综合判断，避免将管理活动简化为对技术结果的机械执行。同时，“以人为本”的管理思维依然是管理变革时代下核心的人力资源管理思维，这种以人为中心、以数据为支撑的能力结构，体现了数智化条件下人力资源管理岗位对复合型应用人才的现实需求。

（三）应用型本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

其一，培养方案与行业数智化需求衔接不足。在数智化背景下，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人才提出了融合数据分析与管理决策的新要求，但部分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仍以传统职能模块为主，对数智化内容的融入缺乏系统设计，相关课程多停留在工具介绍或概念层面，未能有效覆盖企业实际管理中对数据理解与应用的能力需求，导致学生

所学知识与行业发展趋势存在脱节。

其二，实践教学条件与数智化管理情境不匹配。部分高校实验实训平台建设相对滞后，难以模拟真实的企业数智化管理场景。实践教学往往集中于基础操作训练，较少围绕管理决策展开的综合性、情境化训练，使学生难以在实践中理解数据结果背后的管理含义，实践能力提升受到限制。

其三，复合型师资力量相对不足。数智化条件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同时具备扎实管理理论基础和数字技术理解能力的复合型教师较为缺乏。部分教师在数智化管理实践经验方面相对有限，在引导学生开展跨学科思考和处理复杂管理问题时存在一定困难，从而制约了人才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三、数智化背景下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策略与路径

（一）以数智化胜任力为导向，重塑以人为本的人才培养目标

数智化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职能正由成本控制和流程维护逐步向价值创造与决策支持延伸，这要求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层面实现系统性调整。应用型本科院校应立足行业数智化转型的现实需求，重新界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将人才培养的重重心由培养以事务执行为主的传统人事管理人才，转向培养以人为本、以数据为支撑的数智化管理支持的现代化人力资源管理复合型人才。新的培养目标应在夯实人力资源管理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将数智化胜任力作为核心导向，重点强化学生对数据的理解与分析能力、对智能化管理工具的应用能力，以及在复杂组织情境中对人、业务与组织关系进行综合判断与协调的能力。学生不仅需要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制度逻辑，还应能够在组织运行过程中，基于数据分析结果识别人员配置、绩效改进和人才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借助数字化平台开展人岗匹配、人才画像分析和决策支持，从而推动管理活动由经验驱动向证据支持转变。人力资源管理数智化并非削弱人的主体地位，而是通过技术手段更精准地理解人、支持人和发展人，使管理决策更好地服务于员工成长与组织长期发展。通过确立以数智化胜任力为核心、以人的价值实现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高校能够为课程体系重构和实践教学设计提供清晰的目标指引，

使应用型人才培养在逻辑上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保持一致。

(二) 围绕真实管理问题, 构建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课程体系

为推动数智化人才培养目标有效落地, 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围绕企业真实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 对现有课程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 形成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与行业应用相互支撑的课程结构。在理论课程层面, 应在坚持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的基础上, 适度打破学科边界, 将数据分析方法、人工智能基础及数字化管理逻辑课程有机融入专业必修课程之中, 重点引导学生理解数智化技术在管理决策中的支持功能, 而非停留于工具层面的操作训练。在实践教学层面, 应

构建多元化的实践载体体系。一方面, 通过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和情境化案例教学, 模拟企业在招聘配置、培训评估和绩效反馈等环节中的数智化管理场景, 使学生在具体问题情境中学会解读数据结果, 并结合员工个体差异和组织目标进行综合判断; 另一方面, 应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 依托行业企业共建实践教学基地, 通过设立数智化人力资源管理特色班、订单式培养项目或真实业务导向的实习实训模块, 引入企业真实数据和管理任务, 提升实践教学的真实性和复杂度。通过以真实管理问题为核心、以多层次实践平台为支撑的课程体系设计, 促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以数据证据为基础、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管理思维, 从而有效提升其在不同数智化水平组织环境中的实践应用能力和岗位适应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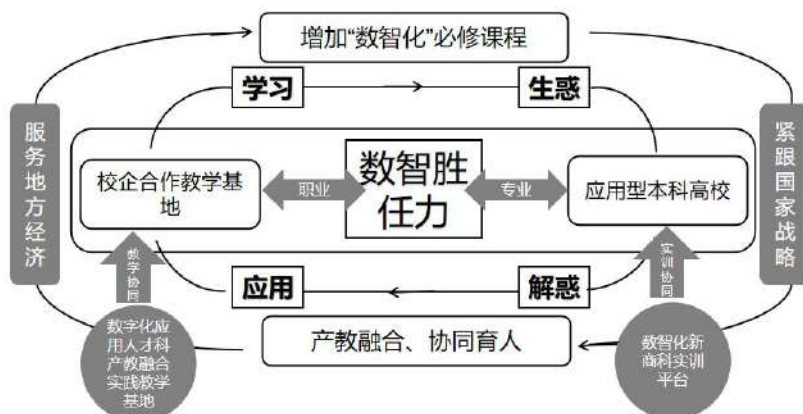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课程体系

(三) 强化数智化取向的师资建设与教学评价机制

师资队伍建设和推动数智化人才培养的关键支撑。高校应通过制度引导和资源支持, 鼓励专任教师参与数字技术培训或进入数智化转型企业开展顶岗锻炼, 着力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重点提高将技术工具与管理情境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水平。同时, 可引入具有实践经验的行业专家参与教学与课程共建, 形成校内外协同的人才培养机制。在教学评价方面, 应逐步引入基于学习过程的数据化考评方式, 将学生在实践操作、问题分析和综合决策中的表现纳入评价体系, 避免单一结果导向的考核模式。通过建设具备数智化素养的师资队伍, 并辅以过程性、数据化的教学评价机制, 高校能够形成持续优化的人才培养闭环, 切实提升应用型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的培养质量。

数智化转型正在持续改变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 也对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现实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已逐步走出以事务处理为主的传统路径, 开始更多参与到组织运行优化和管理决策支持之中。这一变化表明, 单纯依赖经验和制度操作的人才培养模式, 已难以完全适应当前的发展环境。

四、结论

随着企业管理情境的不断变化, 用人单位对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的要求也更加多元。企业更加看重从业者对数据结果的理解能力、对管理问题的分析能力以及在实际情境中的应用能力。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中, 应当围绕这些能力进行系统设计。从教学实践情况看, 当前部分高校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中, 仍存在课程内容更新不及时、实践教学深度不足以及师资结

构有待完善等问题。只有在明确培养目标的基础上,加强课程改革、深化校企合作、提升教师数智化教学能力,才能逐步缩小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之间的差距。在数智化背景下推进应用型本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改革,是顺应管理变革趋势的必然选择,也是在新发展阶段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人力资源管理数智化并不

是简单引入技术工具,而是对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整体调整。数据分析和智能系统的应用,应当用于提升管理判断的科学性和前瞻性,而不是取代管理者的专业判断。在这一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仍然是人力资源管理者不可动摇的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 张爽,汪昕宇.产教融合驱动应用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数智化改革[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26,40(01):8-16.

[2] 徐晗,朴雪涛.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数智化转型:功能定位、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1(02):97-105.

[3] 武慧.数智化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应用思路和方法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5,(14):96-98.

[4] 张建国.数智化驱动的人力资源管理人才培养创新研究[J].数字经济,2025,(05):111-113.

[5] 魏丹霞,何光远,刘润刚.数字技术背景下新商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探索[J].教育观察,2025,14(10):36-38+68.

[6] 申云凤,王栓萌.大数据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J].产业创新研究,2024,(21):181-183.

[7] 王婧盈.人工智能技术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需求与培养中的研究[J].市场瞭望,2024,(18):190-192.

[8] 黄丽霞,周志鹏,石海龙.应用型本科院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研究——基于数据驱动与优化[J].科教导刊,2022,(02):62-67

外语学科区域国别课程教材的全球素养培养研究

吴晶¹

(1.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要: 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已将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其培养方向之一。在区域国别人才培养中, 全球素养是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 而教材是人才培养的有力支撑。本研究从外语学科区域国别课程的美国国情教材入手, 分析教材在中国背景下将全球素养框架中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以及中国立场融入人才培养的方式。研究发现: 美国国情教材能够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国情知识、培养学生开放的态度、提升学生的认知行为技能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中国立场。研究认为, 未来区域国别教材的修订、开发和使用中仍需进一步优化教材编写标准、增加能力素养模块、重视教材二次开发, 以更好地培养区域国别人才的全局素养。

关键词: 外语学科; 区域国别; 教材研究; 全球素养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本科高校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文化安全视域下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 SJGYB2024150); 本文亦为2025年度黑龙江省大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项目“大中小学英语教材语言安全教育融入研究”成果。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299

A Study on Global Competence Cultivation in Textbooks for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Courses of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

Wu Jing¹

¹ Colleges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Abstract: To meet the needs of national strategies, the disciplin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has designated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as one of its training orientations. In the cultivation of country and region talents, global competence constitutes a crucial aspect of international talent development, and textbooks serve as a strong pillar for talent training. This study takes textbooks on U.S. studies cour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ing how these textbooks integrate the knowledge, skills, attitudes, and values outlined in the global competence framework, as well as Chinese perspectives, into talent cultivation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extbooks on U.S. studies can provide students with abundant knowledge of the country's conditions, foster an open attitude, enhance their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skills, and help them establish correct values and Chinese perspectives. The study argues that in the future revisio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textbooks,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optimize textbook compilation standards, add competence-oriented modules,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econdary development of textbooks, so as to better cultivate the global competence of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talents.

Keywords: Foreign Languages Discipline;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textbook research; global competence

作者简介: 吴晶(1986—), 男, 博士, 研究方向外语教育、区域国别。

152 **通讯作者:** 吴晶

一、引言

我国作为全球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因此急需大量既熟悉对象国语言文化又了解其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的人才，具有较好的全球素养和中国立场，以服务我国发展战略。为此，2018年1月，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将“国别与区域研究”纳入英语专业的知识领域中。对于外语专业如何培养区域国别人才，专家学者们也从课程体系构建（常俊跃，2024；等）、培养实践（马和斌、董岩，2025；等）、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对策（郑春荣，2020；等）进行了思考和探讨。教材作为人才培养和课程建设的依托，却鲜有学者关注。区域国别教材有别于传统的侧重语言教学的教材，存在缺乏国别主题知识的系统性（常俊跃，2020）以及规范性和统一性（杜飞，2020）。但是就教材如何编写、应该关注哪些能力素养，需要进一步探索。因此，本研究将以目前已有的区域国别课程教材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对学生全球素养培养的关注。

二、外语专业本科阶段区域国别人才培养规格

教材建设要服务于人才培养，因此教材的设计、编写和应用都离不开具体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进行区域国别教材的研究，需要了解区域国别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

由于当前我国区域国别教育尚未形成统一成文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但是一些学者已经提出了区域国别人才应该具有的能力。常俊跃（2020）认为区域国别人才应该具有通晓相关国家区域的语言、了解相关国家区域的人民、通晓相关国家区域的国情区情、有效进行跨文化沟通、成功开展涉及相关国家区域工作、能够研究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

当前我国外语学科区域国别人才培养主要在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层次进行，但是本科层次的区域国别人才占多数，既为高层次的区域国别硕博人才培养提供后备军，也为各领域提供大量区域国别应用型人才。因此本科层次的区域国别人才培养需要更加重视。对于外语专业本科阶段区域国别人才培养，主要以应用型区域国别通才和应用型区域国别专才为主（钟智翔、王戎，2020）。为此，常俊跃和李莉莉（2020：34）提出外语学科本科层次区域国别人才的培养规格，明确了学

生应达到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

“知识方面，学生需要比较系统地掌握对象国家与区域的语言、文化、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知识；能力方面，学生需要具备良好的对象国家与区域语言能力、跨语言跨文化沟通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创新思辨能力、灵活应对和处理涉外工作能力及一定的问题研究能力；素质方面，学生需要具有深厚的中国情怀、开阔的国际视野、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及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

对于本科阶段外语专业培养区域国别人才而言，既要保证学生的语言能力，又要保证区域国别知识的培养。因此，内容语言融合的教学理念能够很好地将两者结合起来，并在前期的教育教学中取得满意的效果（常俊跃等，2020）。而人才素质培养方面，对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人文素养和中国立场的强调与全球素养的议题不谋而合。人才素质培养贯穿于整个课程教学中，涉及因素较多，如教师、教材、环境等，但是教材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且具有指导性，因此一套好的区域国别教材对于学生素质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图1 全球素养的目标维度（OCED 2018 转引自：唐丽芳、杨芸艺，2019）

三、区域国别人才培养中的全球素养

“全球素养（Global Competence）”也称作“全球胜任力”，这一概念最早是于1988年由美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CIEE）在名为《为全球素养而教：美国未来的通行证》报告中提出的，此后逐渐受到全球各国的广泛关注。2018年，经济合作组织（OCED）提出“PISA2018全球素养框架”并将“全球素养”定义为四个维度：能够分析地区、

全球和跨文化议题,理解和欣赏他人的视角和世界观,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进行开放、适当和有效的互动,并为全人类的福祉和可持续发展采取行动的能力(OCED, 2018: 11),而四个维度是由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四个要素所支撑,如图1所示。

根据OCED在2020年发布的关于全球素养测评结果的报告显示:全球素养不是学科学习的产物,而需要专门的关注和培养。虽然影响全球素养包括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张民选、朱福建,2020),但是对于国家来说,学校教育是提升培养人才的主要渠道。李杨和曾小平(2018)指出“我国全球素养教育情况不容乐观,全球素养思想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尚未形成系统的全球素养教育与评价体系”。PISA评测的对象是15岁学生,但其倡导的理念适用于各层次的教育阶段。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出口,更应该重视全球素养的培养。根据全球素养提出的四个维度,即与外语学科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目标不谋而合,这些素养正是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区域国别人才所必需的(郑春荣,2020)。

然而,PISA提出的四个维度是面向全球公民而言的。但是具体到某一国家,人才培养都是为国家服务的,因此要有国家和民族立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区域国别人才培养需要始终立足中国语境,扎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需求,既要培养学生全球视野和包容性,也要学会处理好中国国家利益和文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张力,全面考虑我国文化价值理念(左璜、魏国武,2020),使学生成为具有中国立场的全球化人才。

作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方向,在中西方文化对比、国际视野和中国立场上尤其需要突出其思政特色。根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下文称《纲要》),要在课程教学中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维度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结合专业知识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部,2020)。

因此,本研究在OCED提出的全球素养的维度基础上,根据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涉外特点,结合《纲要》对文史哲类专业课程的要求,在其价值观维度中融入中国立场的思政内容,以完善中国背景下区域国别人才全球素养培养目标。

四、区域国别教材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目前,外语学科国别和区域方向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素质的涉外人才,而高质量的教材是培养区域国别人才的有效保障。教材的内容在思想性、科学性、系统性等方面,对于人才培养起着导向的作用(杨鸣,2017)。因此,区域国别教材要满足人才培养的要求,需要兼顾人才培养目标和大纲的要求。良好的区域国别教材能够为英语专业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国情区情知识和语言能力的提升提供有力的保障。目前国内较为广泛使用的区域国别教材是由大连外国语学院编写、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区域国别系列教材,教材已经印刷第三版(见表1)。区域国别课程教材的开发为英语专业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提供了英美国家和其他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和社会文化等国别通识知识,也为语言能力培养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时,教材的主题选材和习题设计为区域国别人才素养的培养提供了保证。

表1 国别区域国情系列教材

教材名称	作者	出版年份
美国国情:美国历史文化(第3版)	常俊跃、夏洋、赵永青	2023
美国国情:美国社会与文化(第3版)	常俊跃、李莉莉、赵永青	2021
美国国情:美国自然人文地理(第2版)	常俊跃、赵秀艳、赵永青	2016
英国国情:英国历史文化(第3版)	常俊跃、夏洋、赵永青	2023
英国国情:英国社会与文化(第3版)	常俊跃、李莉莉、赵永青	2025
英国国情:英国自然人文地理(第3版)	常俊跃、赵秀艳、赵永青	2016

五、区域国别教材对全球素养的培养

内容语言融合的区域国别教材编写内容为介绍英语国家历史、地理和人文方面的原版英文材料,在课程内容的系统性上涵盖了相关主题的主要内容。本研究主要关注“美国国情”系列的三本教材《美国历史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和《美国自然人文地理》并进行分析。该系列教材包含了丰富的主题(见表2),并围绕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展开教学,以帮助学生了解美国历史、地理和社会文化,培养学生对异域文化的敏感性,培养学生对其他民族包容的态度和国际的视野。此

外,教材还针对课程内容编写了多样化的综合性训练,帮助教师和学生对已有内容进行拓展学习,以达到教学目标。对于全球素养的培养,内容语言融合教材也展现出它的关注。由于教材的课文以原版内容为主,因此在全球素养培养方面,除了节选的课文内容外,主要通过课后综合训练活动体现。

(一) 丰富学生的国别知识

知识是培养全球素养的基础,是指不同地区

表2 “美国国情”系列教材涉及主题

《美国社会与文化》	《美国历史文化》	《美国自然人文地理》
理解美国社会与文化	探索时代	美国全景
美国人的性格	殖民时期	东北部风景
美国宗教	独立战争时期	东北部地貌
西部传说	年轻的共和国	东北部沿海城市
美国教育	西进运动	东北部重要中心
美国政府和政策	内战	东南部土地变化
多民族性	重建	东南部游历
爱情和婚姻	镀金时代	中西部风景
家庭生活和社交礼仪	一战中的美国	西南各州
美国节假日	咆哮的20年代	西南地貌
美国体育	大萧条	西部概览
美国银幕	二战中的美国	自然庙宇和太平洋城市
美国音乐	战后美国社会	最新的州
美国文学	转型中的美国	回顾:美国各州
	迈向新世纪	

“美国国情”系列教材是基于内容语言融合理念编写,选取了大量真实、地道的原版语言材料,为提升学生的语言知识水平提供了高质量的语言输入,同时选取的材料内容丰富,涵盖了历史、地理和社会文化主题的节选文章,拓宽了学生对对象国国情的掌握。

教材选用了丰富的图片、表格、地图和插画等资源,能够使学生直观地感受到主题内容。如《美国自然人文地理》教材为了让学生对美国的

的生活习惯、风俗习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联系等全球性信息(OCED, 2018: 12)。区域国别教材的基本关注点就是培养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国情区情,使学生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在“美国国情”系列的三本教材中,分别包含了美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文化以及自然人文地理等知识,帮助学生深入了解美国的全貌,为其他素养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材内容涉及的具体主题包括:

地理概况一目了然,添加了大量的地图和州花、州鸟、州旗和地标建筑等图片,第二版教材还使用了立体化多媒体资源,提供二维码供学生学习。如此丰富的图文信息,能够有效地拓宽学生的视野,了解对象国的国情,为培养学生审查分析当地、全球和跨文化议题时奠定基础。

为了加强学生对国情知识的掌握和对语言能力的学习,在习题设计方面做了精心安排。以《美国社会与文化》教材为例,在每个单元开始之前设计了“Test your knowledge about American culture”板块的内容,会对学生的已有的美国文化知识进行预测试,在文章阅读之后的“Knowledge Focus”和“Language Focus”部分帮助学生提取文章重点内容和语言知识,并对相应主题进行讨论。此外,在有限的教材内容之外,还提供“Books to read”和“Movies to see”版块,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扩展资源进行学习,极大扩展了学生的国别知识。

(二) 培养学生的开放态度

态度是个人对他人、团体、机构、议题、行为或符号所表现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将信念、评价、情感和倾向融合并体现在行动中。全球素养要求个人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持开放态度,尊重文化差异并具有全球意识(OCED, 2018: 17)。区域国别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具有全球视野、文化理解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国际化人才。因此,在教材中也有所体现。

“美国国情”系列教材是对于培养学生开放的国际态度也涉及,主要体现在主题相关话题的讨论环节。如《美国社会与文化》课程的第一单元“Understanding American Society and Culture”的“Comprehensive Work”板块就中美文化差异设置题目,要求学生进行讨论。按照“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the Chinese”“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the Chinese”“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cultural differences”一步

一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讨论,以培养学生“尊重差异”的态度。第八单元“The U.S.A---A Nation of Nations”在“Essay Writing”部分要求学生加速全球化的未来做预测,培养学生关心人类未来福祉的能力和态度。

(三) 提升学生的认知行为技能

技能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进行复杂且组织有序的思维模式或行为模式的一种能力,即认知技能或行为技能。全球素养要求人才具备信息推理技能、跨文化交际技能、多维分析技能、解决冲突的技能以及适应技能(OCED, 2018: 13)。区域国别教材在提供相关国家的国情区情的基础上,也关注到了技能素养的培养。在“美国国情”系列的三本教材中的“Before You Read”和“Comprehensive Work”部分都对学生的信息获取能力、沟通交流能力、换位思考能力的培养有所涉及。

《美国自然人文地理》教材在每个单元“Before You Read”部分都设计小组活动,要求学生通过互联网或图书馆资源查找单元主题的更多信息,并做课堂讲演,如第六单元的“Form groups of three or four students. Try to find, on the Internet or in the library,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economy of the Southeast of the USA which interests you. Prepare a 5-minute classroom presentation.”。这类活动设计能够培养学生通过互联网和其他渠道获取信息的能力,同时提升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为培养学生的信息情报搜索能力打下基础。

此外,“美国国情”系列教材也注重学生文化对比和换位思考能力的培养,为学生未来进行国际交流提供支持。如《美国社会与文化》教材第三单元“The American Character II”的“Comprehensive Work”板块就中西方文化差异设置情景对话“When East meets West, many problems occur”,要求学生设身处地感受差异,并进行讨论,引导学生换位思考,了解跨文化差异,解决跨文化冲突。这些话题和活动的设计与全球素养的技能维度能力的培养完全契合。

(四) 树立学生正确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们追求人生目标时的信念,是人们在做出选择和判断时有意或无意使用的标准。全球素养重视人的尊严和文化的多样性,因为它们是影响个体处理不同文化信息、决定如何与他人和世界交往的关键因素。拥有这些价值观的人

会更加了解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并具有反对不公平、无知、暴力、压迫和战争等消极行为的意识(占小红、温培娴, 2018)。

“美国国情”系列教材在价值观培养方面也主要体现在课堂活动和课后习题的设计中。如《美国社会与文化》在第一单元“Understanding American Society and Culture”的“Knowledge Focus”部分的“Pair work”中,设计活动要求学生讨论一些价值观问题,同时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如“How do you understand ‘individuality’? Is this value acceptable to you?”引导学生了解文化差异,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更进一步了解,培养学生的正确价值观。第四单元“Religion in the U.S.A”的“Comprehensive Work”板块要求学生使用网络搜集 Mother Teresa 等名人轶事做报告,培养学生的信息获取能力,同时学习 Mother Teresa 等名人的优良品质。《美国历史文化》在第十三单元的“Essay Writing”部分,引导学生通过写作,讨论“多元文化主义和不看肤色是否存在冲突”以及“成为种族、民族或宗教的少数/多数群体面临的困难”,引导学生形成种族平等价值观。此外,在“美国国情”系列教材每个单元最后的“For Fun”部分,为学生推荐单元主题相关的网站、图书和电影等材料课后学习,选取的材料也能够为学生塑造价值观产生积极引导。

钟智翔和王戎(2020)指出区域国别人才的培养应强调全球视野与中国立场相结合,强调能力、知识与人格塑造相结合,要培养学生的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要在促进个性化发展的基础上坚定其信念、完善其人格、建立起他们的中国知识体系。因此在人才培养中也要关注学生的中国立场,培养学生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第7单元“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在“Essay Writing”部分要求学生对比中美政府的优缺点,培养学生的分辨能力,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美国自然人文地理》在第一单元的练习中要求学生“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的地理概况”,第三单元要求学生讨论家乡的山川湖海,培养学生爱国爱家的价值观。

六、结语

内容语言融合的区域国别教材从编写理念到活动设计,都有助于培养外语专业学生的全球素养,与中国背景下全球素养框架下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以及中国立场基本契合。本文以“美

国国情”系列教材为例进行了简要分析,发现教材能够充分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方面的素养,但是对于培养学生态度和价值观以及中国立场,教材涉及较少且多属于潜移默化的方式,缺少明示性的内容设计。

为了培养未来能够有效进行跨文化沟通、开展涉外工作以及研究、解决相关区域国别问题工作的人才,区域国别人才培养任重道远。虽然现有的区域国别教材已经关注到学生的国情区情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但是为了使学生拥有较好的全球素养,在具体的教材开发、编写、修订和运用中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 制定区域国别教材的编写标准。当前我国区域国别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有部分教材,但是编写侧重各有不同,因此需要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指导委员会形成明确的区域国别教学大纲和质量标准,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应具有的能力素养。在此基础上编写区域国别教材,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有纲可依。

(二) 增加明确的能力素养模块。未来对现

参考文献:

[1]常俊跃.外语专业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探索与反思[J].中国外语,2024(6):17-25.

[2]马和斌,董岩.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实践体系构建探析[J].青海民族研究,2025,(3):131-137.

[3]郑春荣.全球治理视域下国别区域人才培养探析[J].中国外语,2020(6):20-25.

[4]常俊跃.对外语学科构建国别区域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思考[J].外语高教研究,2020(2):9-16.

[5]杜飞.“英语+国别与区域研究”复合型人才培养路径探索——基于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视角[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4):57-63.

[6]钟智翔,王戎.论外语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及其人才培养[J].国别和区域研究,2020(4):168-188+198-199.

[7]常俊跃,李莉莉.增设国别区域学专业,服务国家对外战略——我国高等教育本科阶段设立国别区域学专业的思考[J].外语界,2020(3):29-35.

[8]常俊跃等.基于内容语言融合教育理念的英语专业课程体系及教学改革探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9]唐丽芳,杨芸艺.全球素养教育:国际动向与我国的发展方向[J].外国教育研究,2019(4):91-102.

有教材的修订和新教材的开发中,可以根据全球素养等培养目标,在教材中增加能力素养模块和课堂内外的活动设计,如知识模块、能力模块、态度模块和价值观模块等,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提升学生的能力素养。

(三) 重视教材二次开发。无论是现有教材还是增加能力素养模块的教材,在教学中都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因此教师对于教材的二次开发或者深度开发便尤为重要。因此在区域国别人才的全球素养培养方面,需要老师根据教学目标、学生实际学习情况,紧跟时事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度调整加工,合理选用补充材料等,有效进行教学和人才培养,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

总之,教材作为区域国别教育的载体,要想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全球素养,既需要学科专业层面的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和教材编写标准的制定,同时也需要教师对教材灵活有效地使用,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培养出既有全球素养又具有中国立场的区域国别人才。

[10]OECD.Preparingouryouthforaninclusiveand sustainable world[EB/OL].2018.http://www.oecd.org/pisa/Handbook-PISA-2018-Global-Competence.pdf.2025-10-13.

[11]张民选,朱福建.国际视野下的学生全球胜任力:现状、影响及培养策略——基于 PISA2018 全球胜任力测评结果的分析[J].开放教育研究,2020(6):4-16+28.

[12]李杨,曾小平.PISA2018 全球胜任力评测[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8(5):25-32.

[13]左璜,魏国武.教师全球素养的内涵、结构及发展路径:国际视角[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0(4):65-73.

[14]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OL].2018.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6/06/content_5517606.htm.2025-08-30.

[15]杨鸣.论教材建设与高校人才培养的关系[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7(11):192+195.

[16]占小红,温培娴.PISA2018 全球素养测试述评[J].比较教育研究,2018(9):95-102.

人工智能赋能高职电商教学的模式构建与实施路径研究

方磊¹

(1.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商务研究中心, 浙江 宁波 315012)

摘要: 本研究以数字经济背景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为着眼点, 致力于探索并构建一套融入人工智能技术的高职电子商务专业教学框架。通过有机融合建构主义、情境学习等多元教育理论, 形成了涵盖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评价四个维度的整合型教学模式。研究系统阐述了此模式的落地应用方案, 并借助典型教学案例验证了其可行性。在此基础上, 从制度设计、资源支持、师资发展等多个层面提出具体推进策略, 以期高职电商专业教学创新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 人工智能赋能; 职业教育; 电子商务; 教学模式; 数字化转型

基金项目: 获宁波市新型智库——人工智能与品牌创新研究院资助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309

A Study on Constructing and Implemen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Enabled Teaching Models for E-Commerce Program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Fang Lei¹

¹ Zhejiang Business Technology Institute, Digital Commerce Research Center, Ningbo,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ndeavoring to explore and construct an AI-integrated teaching framework for e-commerce program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y organically integrating multiple educational theories including constructivism and situated learning, an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l encompassing four dimensions—teaching objectives, content, methods, and evaluation—has been developed. The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scheme of this model and validates its feasibility through typical teaching cases. On this basis, specific promo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institutional design, resource support, and faculty development,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eaching innov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commerce programs.

Keywords: AI-enabled; Vocational education; E-commerce; Teaching model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作者简介: 方磊(1986—),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电子商务、高职教育。

158 **通讯作者:** 方磊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前阶段, 电商领域正经历着一场广泛而深入的结构转型。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57 次统计报告, 2025 年前 11 个月我国数字化消费规模已达到 17.92 万亿元[1]。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部分, 电商的增长速率和影响范围尤为突出。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及云计算为代表的创新技术, 正在成为推动电商生态重构的重要力量, 其应用已覆盖从智能服务系统[2]、个性化推荐机制[3]到营销数字化与供应链效能提升的全流程, 人工智能已经和电商价值链的各环节实现了深度融合[4]。

随着电商行业结构的深刻调整, 市场对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企业愈发需要兼具商业运营知识、数据洞察能力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为此, 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自 2022 年 5 月起实施, 明确倡导职业教育应“对接市场需求、提升就业质量, 注重实践导向、强化综合能力, 尊重个体差异、推行分类培养”[5]。然而, 现有高职电商教学体系仍面临突出的适配困境, 如课程内容与技术演进脱节, 教材未能及时反映行业真实变化; 实训资源与场景支撑不足, 缺少贴近业务实战的软硬件环境; 教学形式仍以教师为中心, 学生主动参与有限; 考核评价方式也未能全面评估学生在真实职业场景中所需的综合素养。上述问题使院校输出的人才与产业实际需要之间依然存在明显落差。

近年来, 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持续受到国家层面的密切关注。自 2019 年起,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6]与《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7]等一系列政策相继颁布, 为职业教育向数字化方向转型提供了明确的指引。2025 年, 教育部等九部门进一步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中, 明确提出应“发挥人工智能对教育创新的驱动作用”[8]。在此趋势下, 在高职电商专业教学中开展人工智能赋能的模式探索, 已成为推动该领域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本研究致力于构建一套由人工智能支持的教学框架, 以期解决教学难题, 提高人才培养成效, 助力职业教育向更高质量迈进。

一、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人工智能赋能教学模式是面向教育数字化需求的一种创新教学形态。此模式旨在培养满足新时期商务环境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以当代教育理论为基础, 运用人工智能对教学中的目标设定、内容组织、方法运用与评估方式开展整体性重塑。

此模式具备五方面特征, 一是依托数据驱动[9], 教学决策建立在学习行为数据分析之上; 二是注重人机协同[10], 形成教师、学生与人工智能系统的三方有效互动; 三是支持自适应与个性化[9], 能够针对学习者个体差异规划专属的学习方案; 四是构建情境沉浸体验[11], 借助仿真技术模拟高度逼真的职业场景; 五是贯彻评价全程化[12], 实现对学习进展的持续性跟踪与动态化反馈。

此教学模式建立在多元扎实的理论根基之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构成了其核心指引, 强调学习者需在真实情境中主动构建认知, 为设计智能化学习环境提供了依据[13]。情境学习理论关注实践共同体的培育, 支撑了构建融合虚实要素的教学场景[13]。精准教学理论在大数据时代延伸出新意义, 为因材施教贡献了方法论指导[9]。同时, 混合学习理论倡导线下与线上资源的有机结合[10], 发展性评价理论着眼于学习过程中的能力增长评估[12]。此模式所依据的理论并非相互割裂, 而是彼此关联、协同配合, 共同为教学框架的构建与实践提供学理依据。在人工智能快速革新演进的背景下, 我们需不断深化理解、扩展、更新这些理论, 以保证教学模式始终保持前瞻视野, 并灵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二、模式构建的系统框架

此模式围绕“业务驱动, 智能协同”这一中心思想, 建立了分层递进的能力目标框架。此模式由职业核心素养、人工智能技术运用能力与高阶智能思维三个维度构成, 分别对应基础知识获取、工具技能掌握及复杂思维训练。其中, 职业核心素养维度侧重于电子商务运营、市场数据分析等实务技能的培育; 人工智能技术运用维度聚焦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智能分析平台等技术的实操应用; 高阶智能思维维度则着力于培养数据驱动的决策意识与系统性创新思维。

在教学内容体系的架构上, 此模式设计了基础理论模块与动态实践项目相结合的课程组织框架。基础模块旨在帮助学生系统习得电子商务概论、网络营销等学科核心知识, 并借助微课等形式支持其开展适应个性差异化的学习。动态项目则紧密追踪行业前沿, 通过与领军企业协作共建真实教学案例库, 形成“产业动态追踪—教学案例开发—课堂实施检验—持续优化迭代”的闭环机制。此外, 体系强调跨领域的知识整合, 在专业课程中有计划地渗透数据科学、用户体验设计等相关学科内容, 以促进学生形成综合知识框架。

在教学方法的设计中,本模式建立了“预备、实施、延伸”三个环节的连贯性教学过程。教学起始环节,学生借助智能化学习支持系统完成定制化预习,系统依据学生的既有知识基础推荐适配的学习材料。课堂教学环节主要引入基于项目的学习与案例分析,组织学生开展协作式探索活动。教学延伸环节则依托沉浸式虚拟实训环境,引导学生进行巩固拓展操作练习。在此全过程中,人工智能系统持续提供即时反馈与适应性指导,教师的职能从知识的传递者转型为学习过程的设计者、引导者与支持者。

此模式致力于构建一套综合性多元评估机制,将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相融合。借助学习分析技术,持续采集涵盖学习全过程的多维度数据,例如资源使用、任务达成及课堂互动等情况。运用智能化评估系统,对学生的项目成果与实践表现进行多角度、多指标的评判。此体系尤为强调对学生能力增长情况的评估,重点关注其提升空间与未来潜能。评估结论需及时向师生双方反馈,并作为优化教学方案与学习安排的重要参考。

三、实施路径与推进策略

学校应分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硬件层面优先建设智慧教学空间与虚拟仿真实训环境,部署多屏交互及集成VR/AR技术的设备。软件层面采用“平台中枢+应用生态”架构,以学习管理系统为基础,接入多元化的人工智能教学工具。网络需实现千兆有线接入与全区域无线覆盖,以支撑规模化在线教学。整体建设应兼顾实用性与前瞻扩展性,为技术升级预留空间。

在教学资源建设上,校企采取共建持续更新的策略。双方联合电商头部企业共建教学资源库,引入其真实项目与脱敏数据,开发虚拟仿真实训内容,构建高还原度的电商工作场景。同时,学校建立资源质量标准,实施分级管理与动态淘汰,并特别注重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作用,提升资源开发的效率与品质。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学校应建立涵盖培训赋能、企业实践与教学科研的整合型发展机制。差异化、阶梯式的教师研修项目值得推崇,并依据教师专业基础设计针对性培养方案。通过校企共建实践平台,学校组织教师深度参与企业真实业务,支持教师开展教学创新研究,促进研究成果向课程与教学转化。建立健全激励制度,将人工智能教学应用成效作为教师专业发展评价的重要指标,有效调动教师参与教学创新的内在动力。

在教学质量管控方面,学校需构建覆盖教学全周期的质量保障机制。学校需确立科学质量指标体系,明确各环节核心质量规范,借助大数据分析工具,对教学过程进行动态追踪与实时观察,形成教师、学习者及用人单位等多主体参与的评价反馈渠道。教学单位定期组织实施基于证据的教学成效评估,建立质量风险预警与干预机制,以便及时识别并化解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四、典型案例分析

(一) 智能客服实训系统应用案例

学校与行业知名电商企业开展协作,共同引进了一套依托自然语言处理的智能客服训练平台。此平台高度还原真实电商场景中的客服交互环境,具备自动应答、情绪识别、多轮会话等核心功能。学生可借助平台演练服务话术和训练应对复杂问题,系统同步跟踪并记录其应答时效、问题解决成功率及客户满意度等关键绩效数据。训练过程设计为递进三个阶段,初始阶段侧重于基础服务话术的模拟对话练习,进阶层级着重应对客户投诉与售后纠纷等复杂情境,高阶阶段连通真实电商平台的脱敏咨询记录,开展实战化训练。平台能够提供即时的反馈与针对性指导,协助学生全面提升服务能力指标。最关键的是,学生可通过平台内嵌的数据分析模块,深入洞察客户行为模式与真实需求,从而形成基于数据洞察的客服流程优化能力。

(二) 数据化运营教学项目实践

在“网店运营”课程教学框架下,学校开展以数据为核心的运营实践项目。该项目要求学生组建团队共同模拟经营网店,并运用Python、Power BI等分析工具,完成从市场洞察、用户画像刻画到销售趋势预测的全流程训练。课程团队与多家电商企业协同,引入经过脱敏的真实业务数据集。项目按四个阶段展开,一是数据采集与整理阶段,指导学生掌握使用八爪鱼等工具获取并清洗平台数据;二是数据分析与挖掘阶段,借助专业工具深入解析用户行为;三是运营策略规划阶段,依据分析结论制定针对性方案;四是策略执行与效果评估阶段,落地方案并持续追踪优化。各阶段均配有明确的操作规范与考核要求,提升学生数据分析报告水平,赋予其成果商业应用潜力。通过此类贯穿业务全链的实践,学生不仅获得了扎实的数据分析技能,更逐步建立起依靠数据做决策的思维方式。

(三) 虚拟直播实训平台建设案例

为适应直播电商的迅速兴起,学校部署一套沉浸式直播模拟实训平台。该平台集成虚拟人驱动、语音交互与实时渲染等技术,能够高度模拟真实直播环境。学生可在虚拟场景中开展直播销售练习,系统监测并分析观众数量、互动频率、成交转化率等关键指标。实训采用分阶段递进设计,初级阶段通过虚拟主播进行表达与话术基础训练,中级阶段需完成从商品介绍、促销设计到成交转化的全过程演练,高级阶段则结合真实产品与营销策划,开展贴近实战的综合训练。系统依据实时数据提供反馈与策略建议,帮助学生持续优化直播方法,提升直播运营与销售推广的综合能力。借助平台的数据分析功能,学生还能剖析影响直播效果的核心变量,并据此持续完善直播。

五、推进策略与保障机制

完善的制度体系是教学模式有效运行的重要支撑。学校需制定管理规章,清晰界定各部门职能,构建跨部门协同的工作框架。学校还需健全激励机制,将教学创新成果计入考核评价体系,对表现突出的单位与个人予以表彰或激励;学校还需建立容错免责机制,鼓励开展教学创新,为改革实践营造包容氛围;学校还需形成常态化评估与改进机制,按时对教学实践开展评估,保障改革路径不偏离预期目标。

持续的资源供给是支撑此教学模式运行的基本保障。学校需建立长效的资金支持体系,将教改相关开支列入学校年度财务计划,确保教学环境改造、技术引入、数字化资源建设等项目的投入。学校应积极拓展资金来源,通过申请财政专项、开展校企合作等多种途径获取外部支持。学校需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投入与消耗,推动建立校内资源共享机制,促进教学设施、实训空间等的统筹使用与开放共用。

深度的产教协同为模式运行提供了不竭动力。学校需与电子商务企业及科技公司构建长期稳定的战略协作关系,通过联合创办产业学院、引进企业实际业务、合作建设实践基地等形式深化协同。学校需推动校企间人员的双向交流,选送教师进入企业顶岗实践,同时聘请行业专家兼任产业导师。学校应积极参与地方数字经济领域的建设项目,致力于将学校打造成为区域电商人才培养与创新的中心,并确保融合举措切实服务于人才培养。

健全的质量监督是教学模式运行的重要保障。学校需构建覆盖教学全过程的质量监控机制,确立科学的质效标准,明确各环节应达成的质量目标;学校需借助大数据分析工具,对教学开展情况进行实时跟踪与评估;学校需形成教师、学生、用人单位等多主体参与的评价反馈网络。学校需定期组织教学成效测评,及时发现不足并实施优化,并重视评估结果的转化应用,使其切实用于教学实践改进。

六、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构建人工智能赋能的高职电商专业教学框架,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给予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该框架以“业务场景驱动、人工智能协同赋能”为中心思想,通过对教学诸要素的整体性重构,推动教学流程向精准、个性、动态和智能化方向演进。此框架预期有助于应对传统教学中的典型问题,切实提升人才培养的实效。

在后续发展中,伴随技术持续进步,人工智能支持的教学模式仍需不断演进与改进。一方面,学校需密切关注第五代移动通信、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演进动态,适时将相关新工具与新方法纳入教学实践。另一方面,学校应深化对该教学模式应用成效的实证研究,以持续优化其应用方案与执行策略。同时,学校需重视并着力保障教育公平,建立相应支持机制,确保每位学生均能获得人工智能带来的学习增益。

学校应积极把握数字化进程,主动推进教学体系的革新,在制度设计、资源配置、师资发展等维度给予系统支持。学校应深化同行业企业的战略协作,携手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通过持续的迭代优化,使人工智能增强型教学模式能更有效地培养适应数字经济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北京: CNNIC, 2025.
- [2] 胡海菊, 刘悦华, 李亚坤. 电商供应链销售模式选择下的智能客服应用与服务质量提升决策研究 [J/OL]. 系统科学与数学, 1-25[2026-02-12]. <https://link.cnki.net/urlid/11.2019.01.20260203.0918.002>.

[3] 师慧. 基于电商环境的推荐算法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J]. 中国管理信息化,2024,27(24):125-127.

[4] LI Y, & XUE R. Explo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e-commerce specialty[J]. 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actice,2024,7(4):18-24.

[5]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Z]. 2022.

[6] 国务院. 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Z]. 2019.

[7] 教育部等九部门.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Z]. 2020.

[8] 教育部等九部门. 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Z]. 2025.

[9] 刘宇辉, 陈熹. 人工智能赋能高职课堂实现精准教学的应用研究——以电子商务专业为例[J]. 科教文汇,2025,(23):155-159.

[10] GUANGYING W, LIJUAN X. Curriculum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E-commerce programs in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empower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Highe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2025, 2(10):115-121.

[11] ZHANG J.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study based on educational ecology theory[J]. Journal of Explo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2025, 1(1): 101-121.

[12] 徐春艳. 人工智能赋能高职学生发展增值评价: 三重逻辑耦合、价值重构与实践路径[J]. 机械职业教育,2025,(12):32-35.

[13] 蔡凤伟, 娄迎军, 田润娴, 等. 人工智能赋能电子商务共享专业建设研究——基于创新创业视角[J]. 商场现代化,2025,(13):29-31.

新质生产力驱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策略研究

刘静静¹

(1.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 建设数字中国和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从创新发展、产业升级和资源优化三个方面对新质生产力驱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 并深入探究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关键性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银发经济产业体系亟需革新、数字鸿沟持续扩大、政策与市场环境障碍等现实困境, 以泰康之家为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其发展策略, 进一步针对我国目前银发经济领域的发展瓶颈, 提出强化技术创新与应用、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弥合数字鸿沟、构建政策协同机制与市场治理体系的突破路径, 旨在推动银发经济可持续性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银发经济; 高质量发展; 机理; 困境; 路径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1.310

Research on Strategies for Dri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ilver Economy with New Productive Forces

LiuJingJing¹

¹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Shaanxi

Abstract: Constructing Digital China and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actively responding to population aging are important directions for advancing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new productive forces dri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ilver economy from three aspect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resource optimization,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predicaments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ilver economy, including insufficient capacity for ke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 urgent need for the reform of the silver economy industrial system, the widening digital divide, and obstacles in the policy and market environment. Taking Taikang Community as a typical case, the paper analyzes it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depth. Furthermore,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in China's silver economy, it puts forward breakthrough path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layout,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and establishing a policy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a market governance system, aiming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ilver economy.

Keywords: new productive forces; silver econom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echanism; predicament; path

作者简介: 刘静静(2001—),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

通讯作者: 刘静静

一、引言

截至 2025 年末,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为 32338 万人,占总人口的 23.0%。银发经济,即面向老年人群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正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1]。银发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是与银发相关的所有经济活动和行为的总和,它不仅是产业,也包括事业,其涉及面广,银发产业链条长,带动作用大^[2]。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联动的综合命题^[3],银发经济则是实现这一命题的重要抓手。推动银发经济发展,需要以全新视角看待银发经济发展,以新质生产力驱动银发经济发展,以有效机制保障银发经济发展,以重点突破带动银发经济发展^[4]。2024 年 1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数字时代生产力发展质态的转变,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符合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的一种跃迁^[5],也是转型时期更能转化科技创新的资源^[6]。党中央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站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的前沿发挥着统揽全局的作用,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不断出台政策促进银发经济发展^[7]。因此,深入剖析新质生产力与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积极探索有效的发展路径,对于更好地满足老年群体的美好生活需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新质生产力驱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从经济学角度看,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涉及技术创新、生产要素、生产组织形态与产业体系等主要因素。技术创新是生产力的关键推动力,生产要素是基础,生产组织形态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产业体系反映产业结构^[8]。新质生产力驱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就是以创新发展激发银发经济市场活力、以产业升级推动构建现代化银发经济产业体系、以资源优化驱动银发经济城乡及区域的协同发展。

(一) 创新发展:激发银发经济市场活力

科技创新催生新型养老产品和服务,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凭借数字赋能为银发经济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为银发经济市场注入了新活力。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实现老年人生理指标的多维度实时监测;智能家居系统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了家居环境的

智能化管理;智能养老机器人不仅为老年人提供情感上的慰藉,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模式创新拓展银发经济发展空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进一步提升科技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最终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9]。互联网+养老服务模式打破了传统养老服务的时空限制,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此外养老金融、老年共享经济等新模式也层出不穷。产业升级以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未来化转型,以及各个产业之间的融合与协同的增强为主要特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10]。

(二) 产业升级:构建现代化银发经济产业体系

产业融合构建多元化生态体系,新质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养老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了产业协同发展,构建了多元化的养老服务生态体系。医疗+养老通过整合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为老年人提供集医疗、康复、护理、养老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旅游+养老将健康养生理念与旅游活动联合,提供了将旅游于养生保健结合的新型旅游方式。产业集群发展促进产业链协同,新质生产力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了养老产业的集群发展,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养老产业的集群发展加强了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可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吸引更多的人才、资金和技术等资源向养老产业集聚,为养老产业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产业链上的衍生机构可以结合养老企业的动态服务需求,提高本企业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三) 资源优化:推动银发经济城乡、区域协同发展

数字技术普惠推动城乡养老服务均等化,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技术普惠重构养老资源配置逻辑,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为实现养老服务均等化提供技术支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构建起城乡联动的智慧养老服务网络,形成城市资源下沉、乡村需求上达的双向流通机制。资源调配优化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构建智能化资源调配体系,推动东部技术优势与中西部资源禀赋的深度耦合,形成东数西算+银发经济的协同发展格局。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区域需求预测模型,能够精准识别供需缺口,动态优化资源配置,有效提高养老服务资源利用率;产业协同创新平台通过构建跨区域的养老产业联盟,推动东部发达地区技术优势与中西部人力资源优势的深度耦合。

三、新质生产力驱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新质生产力虽为银发经济注入创新动能，但仍面临多重结构性矛盾。技术层面，产业层面，传统路径依赖与协同机制缺失制约资源整合；数字技术普惠性不足与企业间数字壁垒加剧发展失衡；政策支持碎片化与市场监管滞后进一步削弱效能释放。本部分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双向视角，系统剖析制约新质生产力驱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障碍，为后续路径设计提供现实依据。

(一) 关键性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在银发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关键性技术创新能力的不足已成为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之一。当前，银发经济市场需求呈现多样化、个性化和快速变化的特征，而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却难以与之匹配，导致供需失衡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投入不足，研发能力有限，缺乏专业的技术研发团队和先进的研发设备，难以开发出满足老年群体多样化需求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企业的技术成果转化效率较低，许多创新成果未能有效转化为实际应用，导致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显著差距。此外，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缺乏对市场需求的深入分析和精准预测，导致产品和服务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优秀的科研人员是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企业难以提供较好的薪酬条件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科研人才；企业内部创新机制不完善和创新激励不足，进一步加剧了银发经济领域的技术创新团队实力薄弱、缺乏创新活力和创新能力的现象。

(二) 银发经济产业体系亟需革新

当前我国银发经济产业体系仍面临传统发展模式的深层桎梏，传统养老机构由于管理方式的滞后、信息化渗透率等原因，导致行业内普遍存在生产效率低下，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和老年群体日益多样化的服务需求，这种低效的生产模式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还限制了服务质量的提升，导致市场竞争力不足。银发经济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合作，产业布局呈现明显的离散化特征。现有的各类养老经济产业之间的合作不够紧密，无法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一体化的服务；许多专业小型养老机构内缺乏专业的医疗服务团队、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不畅等问题频发。此外，当前养老与医疗、旅游、教育等产业的融合仍停留在

初级阶段，行业内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

(三) 数字鸿沟持续扩大

截至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1.61亿人，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达52.0%。这意味着接近一半的老年人尚未接入互联网。对于已在互联网覆盖范围内的老人而言，普遍存在如数字能力不足、对数字技术的认知不足、对数字化服务的接受度较低等现实问题。银发经济领域内仍有许多传统企业尚未完全实现数字化转型，企业内部普遍存在信息系统不兼容、数据孤岛、数字化水平参差不齐现象，导致资源无法有效整合和共享，这种数字壁垒不仅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效率，还阻碍了银发经济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银发经济产业链中的数字壁垒同样还体现在不同企业之间，具体表现为技术标准不统一、数据接口不兼容等问题上，这种技术壁垒导致企业间的信息流通受阻，难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四) 政策与市场环境障碍

政府在银发经济领域内财政投入方面，虽然政府有一定投入，但与庞大的市场需求相比，资金缺口依然较大，此外，养老服务设施用地紧张、审批难度大、价格高等问题也严重阻碍了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与扩张；对于从事银发经济行业内企业的优惠范围较窄，抑制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现有的金融支持政策未能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压力，主要表现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对银发经济企业的贷款审批较为严格、贷款额度有限、利率较高等现实情况；人才引进政策力度较弱，难以吸引和留住大量技术人才和复合型管理人才。政府对市场监管力度不足，导致银发经济市场产品良莠不齐、虚假宣传、恶性竞争等现象屡见不鲜。此外，新兴的银发经济业态内还存在行业内标准化建设滞后的问题，既缺乏覆盖适老产品研发、智慧养老服务等关键领域的国家标准体系，又存在质量认证、售后保障等环节的制度空白。

四、案例研究：新质生产力在银发经济中的实践探索

(一) 案例背景

中国的泰康之家是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专注养老、护理、康复实体建设运营和创新服务的专业品牌，采用持续照护模式，独创医养结合特色，打造大规模、全功能、高品质、连锁医养社区。截至目前，泰康已完成在北京、上

海、西安等 36 个核心城市连锁医养社区和康复医院的布局。规划总地上建筑面积约 494 万平方米,可容纳超 8.6 万名老人,规划超 5.7 万个养老单元以及超 4300 张医疗床位。近年来,泰康之家的社区用户入住率呈现出持续增长且高位运行的状态。

(二) 案例分析

技术创新方面,开展智慧医养赋能养老服务,泰康之家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通过产学研深度合作构建智慧医养生态,其与科技企业联手打造智慧医养平台,整合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养老服务全流程数字化。社区部署的智能床垫和泰随行定位报警卡,可以实时监测老人健康数据并快速响应紧急情况;企业研发的智能陪伴机器人,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情感互动与康复训练支持。

产品适老化改造方面,坚持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的设计理念,泰康之家将适老化改造与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从建筑到产品全方位适配老年人需求,社区采用无障碍设计,加宽通道、防滑地面与连续扶手保障老年人的行动安全;居住空间降低橱柜高度、设置圆角家具,并配备紧急呼叫系统,实现了物理环境与数字技术的无缝衔接;同时,还专门为老年人配备大字体、高对比度、操作简便的智能设备,让老年人可以轻松使用数字化产品。

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以保险+医养模式引领行业变革,泰康之家通过创新保险+医养模式,推动养老产业从单一服务向复合型生态转型。泰康将虚拟保险与实体养老深度绑定,既解决了老年人养老资金的问题,又拓展了企业的产业链。其还通过全国连锁布局实现候鸟式养老方式,并结合数字化平台优化资源调配,形成了医、养、康、护一体化产业链,不仅提升了自身竞争力,还为整个养老产业提供了转型升级的范本。

产业上下游协同方面,积极构建数字化养老生态圈,泰康之家注重整合产业上下游资源,其与医疗机构合作建立社区康复医院,与科技企业联合开发智能设备,形成医疗+科技+地产的闭环生态,并借助数字化平台,实现了医疗数据、养老服务、生活需求的互联互通,提升产业链的整体效率,推动整个生态的协同创新。

弥合数字鸿沟方面,开展分层培训与适老产品创新,泰康之家推出了技术适老+教育扶老双策略,技术适老方面,开发一键式智能设备,简化了智能设备的操作流程,提高了智能化产品在老

年人群体中的易用性;教育服老方面,在社区开设数字化培训课程,由专业人员和志愿者手把手教学,从基础操作到智能应用逐步引导,并制定分层培训方案,更好地帮助老年人掌握数字化工具。

人才管理方面,设计数字化培训体系与职业发展通道,在人员管理方面,泰康之家构建了数字化人才管理和成长体系,首先,成立了泰康职业培训学校,通过开展线上+线下的培训课程,借助数字化工具模拟护理场景对员工开展定期培训。其次,企业内部建立了从初级护理员到高级专家的晋升通道,通过数字化绩效考核系统客观评估员工能力,由数字化评估结果来确定员工的晋升,激励企业内部人员的成长。

品牌打造方面,数字化营销与口碑传播并重,泰康之家借助数字化手段强化了品牌的影响力,线上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智能养老设施和场景、社区内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等内容,吸引潜在客户;线下通过举办数字化体验活动,让老年人能够亲身体验智能设备与智慧服务,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此外,泰康还通过数字化平台不断收集客户反馈信息,持续优化养老服务质量,并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打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三) 案例总结与启示

在技术创新与数字化转型方面,泰康之家走在行业前列,通过构建智慧医养平台,整合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了养老服务全流程数字化;在产业创新驱动方面,泰康之家首创保险+医养模式,推动了养老产业从单一服务向医、养、康、护一体化生态转型,在银发经济领域内起到了引领创新的作用;在产业协同与适老化改造上,泰康之家通过全国连锁布局与候鸟式养老模式,形成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体的服务网络,并整合医疗、科技、地产等上下游资源,构建数字化养老生态圈,促进了银发经济产业的协同发展;社区内适老化物联网产品的引进,以及分层培训与一键式智能设备的推广,为老年人创造了安全、便捷的智慧养老环境,有效弥合了老年人与智能设备之间的数字鸿沟。泰康之家通过数字化技术与创新机制的深度融合,不仅破解了养老行业的人才短缺、技术落后等难题,更推动了银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五、突破路径:新质生产力驱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在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在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不断渗透的趋势下，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赋能，不断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不断优化要素组合、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不断促进市场革新并推动经济社会向更优质、更高效、更绿色的方向发展^[11]。

（一）强化技术创新与应用

技术创新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在银发经济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战略，要通过科技的自主创新驱动质量变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12]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内部的研发中心，吸引高端科技人才；中小企业则可以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搭建搭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创新机制、定期开展员工技术培训，通过专业的技术培训课程以及完善的激励制度，提高培养员工的技术创新能力、激发员工创新积极性，以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此外，还可以由银发经济行业协会或政府来设立激励基金，对表现优异的企业给予奖励，鼓励企业加大对银发经济市场的投入，提升技术市场化效率，推动关键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

在新技术产品研发过程中，企业还要强化市场调研，深入分析老年群体的消费行为、偏好和需求变化趋势，同时遵循无障碍原则，构建与老年群体的专属沟通渠道，以便及时获取反馈信息，确保研发出的产品能够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企业还应注重服务模式的创新，可以开通线上平台业务，实现服务的便捷化和个性化。

（二）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

推动养老产业多元化发展，是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的关键举措。政府要从全局性、整体性及系统性的角度出发，更新新业态产业理念思路，创新统筹协调机制，积极引导协调有关管理部门和重点企业，加强沟通协作，凝聚发展合力，提高沟通效率^[13]，以避免有些地方将发展银发经济等同于单一的养老保障事业。打造更加完善的产业链条、创建各企业间的协同机制，应建立政府引导+龙头企业牵头+中小企业参与的协同创新网络，并以养老服务企业为核心，联合医疗、康复、金融等关联产业，构建医康养护一体化产业链；优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打造养老产业集群，通过集群内企业间的知识溢出与资源共享，以降低创新成本、提升整体竞争力，从而推动养老产业与智能制造、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

经济的核心是可供选择的产品和服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则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14]。要想摆脱低技术生产的模式，企业就要加速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提升生产和服务的智能化、自动化水平；建立智能养老云平台，整合老年人健康数据、服务需求与资源供给，实现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动态匹配；积极引入区块链技术优化供应链管理，提升养老物资采购、配送的透明度与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也能够达到提高产业效率的效果。

（三）弥合数字鸿沟

促进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应在坚守普惠性的基础之上，协同政产学研等多方力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教育机会和资源^[15]。政府层面，政策主张依托社区服务中心、老年大学开设数字扫盲课程；社会层面，企业积极开展数字助老志愿服务，组织青年志愿者入户指导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家庭层面，子女要积极帮助父母进行日常数字技能训练，形成代际互助机制。

强化智能产品方面的适老化技术研发与应用。在硬件设计上，推广一键呼叫语音控制等简化交互方式；宣传推广方面，企业应积极举办银发经济博览会等社会活动，适时为消费者提供产品试用与体验服务，增强消费者的信任感。构建跨行业、跨区域的银发经济数据共享平台以应对企业数据孤岛问题；同时建立国家级养老数据中心，整合医疗、社保、教育等多维度数据，以保障数据共享的安全性，消除企业间数据共享顾虑。此外，成立银发经济标准化委员会，重点制定智能养老设备接口规范、健康数据格式等标准。

（四）构建政策协同机制与市场治理体系

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加强在财政、人才培养、市场引导方面的政策建设。在财政补贴方面，要重点支持银发经济领域内的行业建设，包括设立银发经济专项发展基金给予财政支持和扩大税收优惠范围，以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优化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审批流程，为养老行业提供最大化的便捷，并降低企业用低成本；针对银发群体实施差异化补贴，给予购买创新型适老产品的老年人相应的个人所得税抵扣，减轻消费者负担。从多方面入手优化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政策；积极引导银发经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贡献企业价值，降低企业融资门槛，为银发经济行业构建多元化融资渠道；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机制，

培育银发经济行业协会,发挥其在标准制定、行业自律、权益维护等方面的桥梁作用。

要加快制定银发经济国家标准体系,建立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加大对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此外,建立消费者投诉快速响应机制,形成预警—查处—反馈的闭环监管,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中国共同富裕进程中将形成规模巨大的银发经济,尤其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产业按比较优势适老化转型,才能壮大银发经济^[6]。

六、结论

本研究聚焦新质生产力驱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策略研究这一主题,深入剖析了新质生产力对于银发经济的驱动机理和现实困境,并通过泰康之家的成功案例研究提出了相应的突破路径。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持续关注,新质生产力驱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会不断深入,突破重重现实阻碍,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本文以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出贡献,并为推动银发经济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王春娟,杜雨轩.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数字经济驱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机理与路径[J].商业经济,2024,(03):2+197.

[2]黄石松.事业产业协同促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J].中国社会工作,2024,(05):19-20.

[3]穆光宗.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聚焦迁移与老龄化[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04):16-21+2.

[4]林宝.发展银发经济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J].人民论坛,2024,(13):17-19.

[5]任保平,豆渊博.新质生产力:文献综述与研究展望[J].经济与管理评论,2024,40(03):5-16.

[6]张夏恒,马妍.新质生产力驱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的机理、困境与路径[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3):115-122.

[7]于欣雨.新质生产力赋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N].北京科技报,2025-01-27(007).

[8]杜传忠,疏爽,李泽浩.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经济纵横,2023(12):20-28.

[9]石建勋,徐玲.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24,(01):3-12.

[10]吕心妍,睢党臣.数字适老化赋能银发经济新业态的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J/OL].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5,(02):56-66.

[11]郭金来.以新质生产力引领我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前沿,2024,(06):94-100.

[12]司聪,任保平.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与路径[J].经济问题,2024(1):1-9+17.

[13]何颖,王晖.推进文旅康养产业与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J].新西部,2024,(04):99-103.

[14]金牛,原新.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口基础、战略导向与路径选择[J].河北学刊,2024,44(02):158-166.

[15]操太圣.老年教育的社会价值及高质量发展方向[J].人民论坛,2024,(13):3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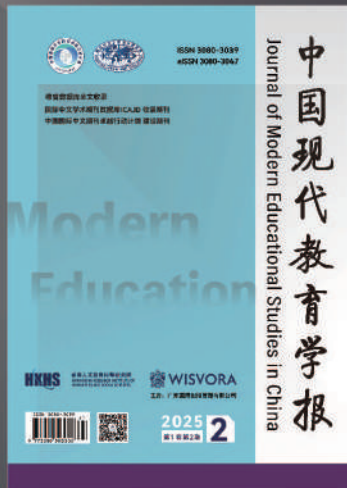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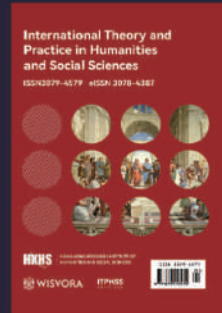
[16]林毅夫,付才辉,张皓辰.中国式老龄化: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见解[J].学术论坛,2024,47(01):1-15.



WISVORA

WISVORA 出版社：专注于学术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编辑、论文出版和国际索引、期刊创办、期刊托管等服务，增强学术研究的全球传播和影响力。

www.wisvora.com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是一份聚焦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服务教育强国战略的学术期刊。期刊以推动教育学理论发展与教育实践创新为核心使命，重点关注课程改革、教育政策、教学理论、教师发展教育技术等重大议题，致力于在新时代教育变革背景下，探索更加科学、高效、人本的教育路径。

印刷出版 ISSN 3080-3039
电子出版 ISSN 3080-3047

权责声明

期刊所刊载的评论、意见、观点等均出自文章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出版社的观点或看法。对于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内引用材料给任何个人、机构、及其财产所带来的任何损失及伤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郑重声明，本出版社的出版业务，不构成对任何产品商业性能的保证，也不表示本社已承认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内容适用于某特定用途。如有疑问，请寻找专业人士协助。



学术赠阅